

傳播研究與實踐

科技部TSSCI期刊

第5卷 第2期 2015年7月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高教專題

以傳播學門為例

群師圖像：從教師背景勾畫臺灣媒體素養的教學實況／劉慧雯

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臺灣傳播博士謀職歷程：行動者的經驗述說／劉忠博

研究誌要

學用落差的論述分析與敘事——

《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之比較／戴伯芬

研究論文

繪本敘事轉述為影像歷程初探：以繪本《雨果的祕密》之跨媒介轉述為例／賴玉釵

院線紀錄片再媒介化之媒介化分析：以【看見台灣】經驗為例／曹琬凌

在傳統與現代性迳譯之間的媒介實踐：

新加坡《叻報》的萌芽與開展（1881～1911）／黃國富

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

多元價值的缺席：傳播科系實習教育的再思考／管中祥

口述歷史專題

作育英才而不是打造匠才：臺灣新聞實務教育的改革進行式／張春炎

典籍再現

評《風險社會》／周桂田、徐健銘

主 編

翁秀琪／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客座教授

編輯委員（依姓氏筆劃排列）

王孝勇／靜宜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林富美／世新大學傳播管理學系教授

林麗雲／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邱皓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陶振超／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副教授

陳炳宏／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教授

陳憶寧／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

黃東益／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簡妙如／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編輯顧問

李金銓／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講座教授兼傳播研究中心主任

周成蔭／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館長兼美國杜克大學中國與日本文化研究客座副教授

林靜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

侯 傑／中國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胡元輝／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專技副教授

胡智鋒／中國傳媒大學媒體藝術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倪炎元／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教授

夏曉鶯／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郝曉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教授

高 綱／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張惠晶／美國伊利諾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張錦華／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張讚國／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學系教授

郭良文／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教授

郭振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信息學院榮譽教授

陳國明／美國羅德島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程曼麗／中國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

黃清龍／旺旺中時集團《旺報》社長兼總編輯

黃鈴媚／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教授

黃懿慧／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臧國仁／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鍾振昇／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鍾蔚文／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名譽教授

執行編輯

黃順星／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助理研究員

英文編輯

沈錦惠／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

Editor

Weng, Shieu-Chi /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Address: No. 1, Lane 17, Sec. 1, Mu-Cha Rd., Taipei 116, Taiwan
Tel: +886-2-22368225 ext.3138
Fax: +886-2-22369094
Email: scweng@cc.shu.edu.tw or scweng13@gmail.com

Editorial Board

Chen, Ping-Hu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Chen, Yi-Ning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Chiou, Haw-Jeng /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Huang, Tong-Yi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Jian, Miao-Ju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Lin, Fu-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Lin, Lihyun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Tao, Chen-Chao /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Wang, Hsiao-Yung / Providence University, Taiwan

Advisory Board

Chang, Chin-Hwa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wan
Chang, Hui-Ching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SA
Chang, Tsan Kuo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en, Guo-Ming /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USA
Cheng, Man-Li / Peking University, China
Chow, Eileen Cheng-Yin / Duke University, USA
Chung, Jensen /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Chung, Wei-We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Gao, Gang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Hao, Xiao-Ming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ou, Jie / Nankai University, China
Hsia, Hsiao-Chuan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Hu, Yuan-Huei /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Hu, Zhi-Feng / Head of the Center for Media Arts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China
Huang, Ching-Lung / Want Daily News, Taiwan
Huang, Christine Yi-Hui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uang, Lin-Mei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Kuo, Chen-Yu /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Kuo, Liang-Wen /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aiwan
Lee, Chin Chuan /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Lin, Jing-Ling /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wan
Ni, Yen-Yuan / Ming Chuan University, Taiwan
Tsang, Kuo-Jen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Executive Editors

Huang, Shun-Shing /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English Editor

Shen, Mary C. H. /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wan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 5 卷 第 2 期 2015 年 7 月

 **JCRP**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舍我** 紀念館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編者的話

距今約一百年前，1917 年 11 月 7 日，韋伯在慕尼黑大學向大學生發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演說，比較德國與美國大學體系之異同，談論體系如何影響年輕人選擇學術研究作為志業。

韋伯說：「……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錢永祥編譯，1991：139）。

一百年後看韋伯說的，高等教育的核心：學術，不禁讓人產生濃濃的失落感，還有一絲抹不掉的憂心。

臺灣的高等教育近年面臨了五年五百億、追求卓越、評鑑制度、少子化與私校退場、大量採用兼任教師減少成本、兼任教師的勞動權益等等問題。然而，高等教育在不同的學科領域，面對的問題都不太一樣。本期我們從傳播學門的角度，分別自傳播高等教育的課程改革、傳播系所的實習教育與社會實踐、傳播學門博士畢業生的就業處境，以及媒體如何再現傳播這個行業等 4 個角度切入，以一般論文、研究紀要、田野筆記和口述歷史等形式，深入剖析傳播學門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各項試煉。

臺灣的傳播教育內涵，約自 1990 年代從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開始思考變革之道，究竟應走專業教育還是通識教育是當時辯論的重點。這波變革，隨後也影響到世新、中正、輔仁等有傳播科系的大學。張春炎以口述訪談方式，輔以書面資料，寫成〈作育英才而不是打造匠才：臺灣新聞實務教育的改革進行式〉，對於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傳播教育內容變革有興趣的讀者，本文極具參考價值。

劉慧雯的〈群師圖像：從教師背景勾畫臺灣媒體素養的教學實況〉一文，探問傳播教育近年浮起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臺灣，媒體素養的授課教師到底有沒有專業門檻？本文在考察 103 學年度臺灣各大專院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師資學歷經歷背景、聘任單位，以及其他開設課程之後，發現媒體素養授課教師雖然有相當高比例擁有博士學位，以傳播相關學位為主，也有一定程度教師有媒體實務經驗，然而，臺灣的媒體素養授課人力，仍呈現多個兩極化的現象，顯示媒體素養在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尚未明確。

以上兩篇論文處理的是傳播教育傳道者及其產出內容變革的問題。另一篇也

與傳播教育內容相關的專題論文，本刊以「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欄目刊出的，是管中祥以多年致力推動文化實習概念的親身經驗寫成的，〈多元價值的缺席：傳播科系實習教育的再思考〉。本文反覆致意的觀點是：傳播教育可以強化多元文化教育，透過實習課程安排讓學生進入田野，理解不同的文化群體，培養多元價值，從「被報導」的群體理解他們的處境與想法，進而改變傳播教育中「多元價值的缺席」。

流浪博士的問題，也是臺灣近年高等教育，特別是人文與社會學門面臨的極大挑戰。「而據報載，教育部長吳思華 2014 年 11 月底在『全國大學研發主管會議』中指出，國內大學每年釋出約僅 800 名職缺，但畢業博士人數已逾 4,000 名，其中約有 3,500 人尋覓教職，加上海外歸國博士人數約 300 名，每年就有近 3,800 名博士應徵這 800 個職缺。因此吳思華說，『國內每年至少 3,000 名博士畢業生找不到學術工作』」，劉忠博在專題論文〈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臺灣傳播博士謀職歷程：行動者的經驗述說〉一文中如此寫道。劉忠博以自己畢業後覓職的心路歷程為經，文獻為緯，指出：博士班的教育應該幫助學生發展適應環境的能力，並提供跨國／境的招聘資訊。對已畢業的博士來說，政府更應正視「學術勞動的臨時工化」，改善其勞動條件。

高學歷高失業率、學用落差成為臺灣近來關注的社會問題。戴伯芬的〈學用落差的論述分析與敘事——《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之比較〉，探問三個學用落差的問題：一是探討不同的平面媒體如何報導學用落差的危機？如何「問題化」高學歷者的就業問題？其次，分析不同媒體對於國家政策的報導方式與內容的差異，瞭解媒體如何回應教育政策；最後，則從被報導人的立場，探討個人如何回應媒體的報導？是否具有抵抗的可能性？讀者可以從本文中探知臺灣三家主要的平面媒體如何再現「學用落差」的問題。

本期除以上五篇與高教問題相關的論文外，另收錄三篇一般論文，分別是：賴玉釵的〈繪本敘事轉述為影像歷程初探：以繪本《雨果的秘密》之跨媒介轉述為例〉、曹琬凌的〈院線紀錄片再媒介化之媒介化分析：以【看見台灣】經驗為例〉，以及黃國富的〈在傳統與現代性透譯之間的媒介實踐：新加坡《叻報》的萌芽與開展（1881～1911）〉。

周桂田、徐健銘合寫的〈評《風險社會》〉，評介 Ulrich Beck 教授於 1986 年出版的該書。1986 年有發生在前蘇聯的車諾比核災和在美國的挑戰者號事故，Beck 教授透過他對德國社會和全球風險的觀察，進而作出《風險社會》一書中的種種判斷。本文的兩位作者指出，「風險社會這本書核心著重在關於工業社會的「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12)。Beck 雖然探討「後」的情況，但是他其實

是藉由風險研究和其論述來改革現代主義者的計畫。他所探討的反身性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對啟蒙計畫的重構與修補。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著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次現代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危機，而非加深當前對制度的不信任與衝突」。

參考書目

錢永祥編譯（1991）。《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臺北：遠流。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翁秀琪

2015 年 6 月 9 日

目次

專題研究論文／論壇：高教專題：

以傳播學門為例

- 群師圖像：從教師背景勾畫臺灣媒體素養的教學實況／劉慧雯 1
- 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臺灣傳播博士謀職歷程：行動者的經驗述說／劉忠博 31

研究誌要

- 學用落差的論述分析與敘事——
《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之比較／戴伯芬 53

研究論文

- 繪本敘事轉述為影像歷程初探：
以繪本《兩果的祕密》之跨媒介轉述為例／賴玉釵 79
- 院線紀錄片再媒介化之媒介化分析：以【看見台灣】經驗為例／曹琬凌 121
- 在傳統與現代性遙譯之間的媒介實踐：
新加坡《叻報》的萌芽與開展（1881～1911）／黃國富 155

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

- 多元價值的缺席：傳播科系實習教育的再思考／管中祥 193

口述歷史專題

- 作育英才而不是打造匠才：臺灣新聞實務教育的改革進行式／張春炎 215

典籍再現

- 評《風險社會》／周桂田、徐健銘 235

Contents

FEATURE RESEARCH ARTICLES / FORUM: Special Issue on Higher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Media Literacy and Its Teaching Reality: A Sketch of Teaching Media Literacy in Taiwan Based on Instructor Backgrounds / Liu, Hui-Wen 1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octorate Employments: An Agency Perspective / Liu, Chung-Po 31

Research Not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of Education-Job Mismatch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ed Daily News*, *China Times* and *Apple Daily* / Tai, Po-Fen 53

RESEARCH ARTICLES

From Picture -- Book Story to Film Narra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media Adaptation Process of *Hugo* from *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 Lai, Yu-Chai 79

The Mediatiz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Cinema-Released Documentaries: A Case Study of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 Tsao, Wan-Lin 121

Media Practic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Burgeoning Development of *Lat Pau* Singapore (1881 ~ 1911) / Wong, Kock-Hoo 155

FIELDNOTES: REFLECTIONS AND PRACTICES

Absence of Diversity Values: Rethinking Internship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 Kuang, Chung-Hsiang 193

ORAL HISTORY FORUM

Cultivating Craftsmen, rather than Training Skilled Workers: Taiwan Journalism Practice Education Under Reform / Chang, Chun-Yen 215

REVIEW AND REFLECTION

A Book Review of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 Chou, Kuei-Tien & Hsu, Chien-Ming 235

群師圖像：從教師背景勾畫臺灣媒體素養的 教學實況

劉慧雯*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媒體素養的授課教師到底有沒有專業門檻？在考察 103 學年度臺灣各大專院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師資、學歷、經歷、背景、聘任單位，以及其他開設課程之後，本文發現媒體素養授課教師雖然有相當高比例擁有博士學位，以傳播相關學位為主，也有一定程度的教師有媒體實務經驗；然而，臺灣的媒體素養授課人力，仍呈現多個兩極化的現象，顯示媒體素養在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定位尚未明確。

關鍵詞：教學現實、專業門檻、媒體素養、臺灣高等教育

* Email: huiwen@nccu.edu.tw
投稿日期：2015 年 2 月 13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4 月 10 日

壹、前言

2014年11月29日，臺灣社會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從六都首長到地方自治代表，不但應選名額破萬，參選人數更接近兩萬人（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選舉結果一出，自然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開票後，新聞媒體除了追逐當選者選舉政見，開始尋覓行政團隊職缺人選，對於落選的政治明星，也展開了選後人生的大規模追逐與猜測。其中，嘉義市長候選人陳以真的「選後規畫」，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選後3天，陳以真表示將回到學校教書。此言一出，引起知名作家伊格言在臉書批評「根本是羞辱教書這個職業」（蘋果日報，2014年12月3日）。這個批評引來陳以真任教學校校長的回應表示，陳以真曾擔任過記者、主播，以及青輔會主委，因此借重其公關企劃與媒體文案製作的專長，邀請陳擔任通識中心專任教師。暫且不管陳以真返校任教的資格爭議，在該校介紹專任老師的頁面上，記載著其教授課程包括：「應用國文」、「人際關係」、「民主政治與當代社會」，以及「媒體識讀」等四門課程。

其中，「媒體識讀」¹這門課程引起我的好奇：媒體素養的授課教師到底有沒有專業門檻？考察現在在臺灣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我們所描繪出的媒體素養教學圖譜，又會是如何？這是本文意欲回答的問題。

貳、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媒體素養教育應然與實然的落差

什麼樣的學歷背景或專業資歷才具有教授「媒體素養」的資格？「媒體素養」真的是一門專業到需要特定資格的人才能任教的科目嗎？還是說只要擁有媒體相關資歷經驗或任何層級學位，就足以教授媒體素養這門課？

翻遍中英文文獻，幾乎未見有關媒體素養教師資格的討論。不過，若要說到「媒體素養」這門課的定位，卻經常可以清楚地定位在「通識」這個類屬中。教育部自民國100年（西元2011年）起，在大專院校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將公民定位為需要倫理、民主、科學、媒體與美學五大素養的現代人。根據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子計畫主持人楊倍昌的考察，若由授課教師自行定義，則所有執行過「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課程中，3年來共計有241門將自己界定

1 「媒體識讀」與「媒體素養」皆翻譯自 Media Literacy 一詞。余陽洲（2004）與吳翠珍、陳世敏（2004）等人曾針對中譯名詞的選擇有過一場辯論。本文以下統一使用「媒體素養」一詞，原因參見劉慧雯（2015）。

為「媒體素養相關課程」（楊倍昌，2014：18）。這 241 門課程實際授課內容五花八門，但若挑選出在課程大綱，或課堂單元中有「媒體素養」元素的課程卻可以發現，狹義的媒體素養課程將銳減到 34 門，僅占自行認定者的 14%。

現在問題來了，作為一種「現代公民的基本素養」，媒體素養無限制地「蔓延」到各個不同的領域²，而且「自行認定」與「狹義定義」之間的落差高達 86%，原因是什麼？到底是因為這門課太年輕、不夠厚重，沒有明確的哲學內涵？還是因為這門課尚未建立經典與核心議題？（楊倍昌，2014：20）。楊倍昌認為，兩者皆是，而且，更麻煩的是，「媒體」作為現代社會的基底，確實是所有領域皆可能跨足接觸的範疇。這導致了媒體素養不可與所有社會生活領域切割的大前題。而所謂的「融入式教學」，則更加深了大學教育中老師、學生將媒體內容轉化應用於教學與作業素材的可能與可行性（黃俊儒，2014）。然而，在蜻蜓點水式的媒介（內容）批判，以及一知半解的媒體內容製作技術教學，真的足以支撐發展近百年的「媒體素養」教育內容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一般而言，一門課的老師該具備什麼樣的資格，通常由該課程設定的目標來決定；在沒有專業背景的情況下，受命負責特定課程的老師，常需要藉由進修、研習等活動，加強對課程的認識。以媒體素養來說，在高中公民課本已列入第一冊應學習項目的情況下，由地方政府教育主管機關主辦的「教師研習營」，就成為擷取高等教育媒體素養研究成果，轉化為中學階段媒體素養教育的重要領域知識來源。這顯示，教師專業背景與所授課程之間，應有具體顯著的正面關係。陳炳宏、廖志恒、葉大瑋、郭旭棋（2014）認為，媒體是當代民主的基石，除非臺灣放棄成為民主國家，不再企望建立公民社會，否則媒體就應為所有人關注。從這個角度出發，陳炳宏等人為媒體素養課程設定了兩個大目標：體認民主社會中媒體與閱聽人的互動關係，以及獨立分析批判媒介內容，並進而產生足以影響媒體的行動力。

換言之，在當代社會生活不可能脫離媒體的前題下，媒體素養不但是基礎課、通識課，同時也是廣泛融入於各專業領域的常識級知識。這麼基礎的課程，到底是由誰來教授？描繪教授媒體素養的群師圖像，有機會為我們提供理解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在大學階段）的具體形象。

教授媒體素養有沒有資格門檻？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回答。第一個角度是：這門課的授課內容是否需求教師專業專長？這是應然面的描繪。第二個角

2 根據楊倍昌（2014：18）的考察，自行認定為「媒體素養」的課程五花八門，課名涵蓋諸如永續農業、統計學、民族問題、生命彩虹、某某職涯規劃……等。

度是：這門課實際上由誰來授課，這群老師聚集出什麼樣的專長背景？這是實然面的敘述。本文將透過文獻考察來說明第一個角度：從課程內容設定來回答，然後在第肆節透過考察臺灣地區刻正教授媒體素養的老師專長背景來瞭解。

參、文獻考察：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

說起媒體素養教育，一般咸認為與傳播科技的發展有密切的關聯；特別是兩位英國學者 Leavis & Thompson (1933) 倡議系統性地教授傳媒知識計畫，更被認為是廣播被廣泛應用之後，人人都需要傳播知識，因而發展出來的媒體素養教育先驅³。除了傳播科技之外，傳播學門則在網際網路普及的初期，便嗅到傳播技藝訓練已經不足以描繪資訊社會、資訊時代的專播工作的專業內涵；這個想法也促使媒體素養自傳播領域跨界擴散到所有社會活動的領域中。Blanchard & Christ (1993) 就曾大聲疾呼要傳播教育注意人文素養，強化思辨、美學、專業倫理，以及持續學習等內涵。對傳播學門的發展來說，從專業技術訓練轉向媒體素養通識的歷程中，對整個學門最大的好處，似乎是將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都納入到（可能）授課名單中。吳翠珍、陳世敏（2014）便認為，新媒體的技術門檻降低，由公民新聞製作的報導比專業媒體工作者更快、更深入、更在地，「讀者就是作者的時代已經來臨」，專業邊緣化，導致媒體專業訓練不但可能落在科技後面，更有可能落在讀者後面。如此一來，媒體素養教育的開展，似乎能成為傳播學門知己知彼的一根救命繩，在傳播專業遭遇學門危機時，得以化危機為轉機，為傳播學術人才另闢蹊徑出路。

不過，這麼一來，傳播教育中的媒體素養，是否從此就不再與「傳播專業」掛勾，而成為一門基礎的、平台式的統合課程了呢？如果不再訴求專業，那麼，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又該具備有什麼能力資格？我們首先從媒體素養課程該教些什麼的討論中，試著找出答案。

一、有關媒體素養教育的 7 個爭論

發軔於 1930 年代的媒體素養教育，隨著傳播科技及大學教育發展變動，成為一股「媒體素養運動」。Hobbs (1998b) 在 20 世紀末的討論指出，媒體素養運動本身，至少累積出 7 個爭論中有待確定的議題。而這些爭論議題的起點，就是

3 Kubey (2003) 則認為媒體素養教育是從 1970 年代中期開始迅速發展。

不同背景的授課老師，對媒體素養所下的不同定義。Hobbs 問道：多元歧異的教師背景對媒體素養教育來說，到底是與商業化媒體的戰爭中，提供給閱聽人的充足彈藥，還是造成媒體素養核心概念越來越模糊、越來越不穩定，甚至越來越分歧的原因？

媒體素養課程能夠統合、需要統合嗎？從 Hobbs 提出的 7 個爭論來看，課程統合可能沒有這麼容易。因為這些爭論牽涉參與、設計媒體素養教學實作的每位老師，對於同一組問題的不同回應。

例如，Hobbs 列出的第一個爭論點就是：媒體素養教育的目標是不是在保護兒童青少年，使他們免於媒體造成的負面影響？這問題看起來非常容易回答，然而，這種提問方式卻顯然將眼光聚焦於「有問題的媒體內容」，一竿子打翻媒體所可能擁有的不同功能與差異表現；甚至忽略了正面地使用媒體乃是民主制度的基礎磐石。更麻煩的是，這種「保護論點」不但遭到特定立場的學者批評為菁英主義 (Collins, 1992; Halloran & Jones, 1992; Hart, 1997)；實務上，也已有研究顯示受教育的學生也並不買帳，甚至可能導致媒體素養教育徹底「學校化」，而完全與學習者的生命經驗脫節 (Buckingham, 1990; Masterman, 1985; Williamson, 1981)。從這個爭議的內涵來看，授課教師所設定媒體素養「目標」，決定了這個學習經驗在個人生命中的地位。

第二個爭論問題是：「教授媒介產製技能」在媒體素養教育中是否必要？支持者認為，親自操演一次，能夠讓學生體認媒介歷程，引發出的批判、反思與表達將會更精準 (Goodman, 1996)。但反對媒介技能教學的學者認為，在學校學習媒介內容生產技能，經常切除了媒體工作環境，這使得意識型態真正運作的面貌無法被有效揭露 (Stafford, 1992)。特別是在大學學院的傳播科系中的技術教學，由於缺乏反思，等於將媒體素養技職化，與原本用於鍛鑄公民的素養概念相左。支持與反對雙方的殊異立場，有可能使得媒體素養課程設計出現不小的差異。

第三個爭議點是，媒體素養是否應該聚焦於流行文化文本？特別是在中小學階段的媒體素養教育，使用流行文化文本合適嗎？(Greenaway, 1997) 儘管有些家長認為流行文化文本就是媒體整體需檢討的內容，但 Dewing (1992) 卻認為，只有採用正在媒體上出現的材料，才能跳脫傳統媒體研究領域的窠臼，進入到日常生活中協助閱聽人做批判性思考。而且，也只有應用流行文化文本的討論，才能在科技時代將媒體素養與資訊素養 (information literacy)、計算機素養 (computer literacy)、印刷素養 (print literacy) 區分開來 (Masterman, 1994; McClure, 1996)，從而能夠正視媒體表現。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本項爭論的

焦點在流行文化內容，然而，當教授媒體素養的老師有意識地拒絕媒介內容，那麼，其所設定的教材教案，就比較不可能涉及新穎而快速變動的流行文化素材。更進一步言，當老師對特定流行文化內容（如：電影）不熟悉或不具有考察分析的興趣能力時，能夠轉化為授課素材的範圍與方式，自然也就會縮小、變少。這顯示，教授媒體素養的老師，可能需要發展其他媒體長才。

關於媒體素養是否應該有更清楚的政治或意識型態目標（agenda）也是這一波討論的重點。儘管有些研究者認為如果不能在技術與倡議之間作清楚的聯繫，就有可能導致以新的意識型態取代舊的刻板印象（Bazalgette, 1992），但是試圖透過媒體素養教育倡議公共媒體制度、討論媒介管制與媒介政策（Lemish & Lemish, 1997），乃至於媒體改造運動的聲浪，卻也從來未曾缺席。在一定程度上，授課教師要有能力注意到媒體素養與倡議之間的關係，然後才有機會從相對超然的角度，解讀每一種教學設計中可能出現的意識型態。

那麼，媒體素養是否該以幼稚園到高中（K-12）階段的學校教育為主要執行單位呢？的確有些研究者主張、甚至發展出由家長在家執行的媒體素養教案設計（Axelrod, 1997）。不過，這個問題彰顯了「媒體素養融入制式教育」這個要求本身的政治性格：一門每週至少需要兩小時的課程，在有限的上課時間中，會排擠掉哪些既有課程呢？這個政治問題引出了第六個爭論：媒體素養該是門獨立專業的課程，還是該融入到既有課程中？Kress (1992) 認為，融入既有課程有兩個壞處：第一，授課教師具有媒體教育背景的機會不高，導致媒體素養更容易被犧牲；第二，媒體教育將被視為邊緣主題、補充性質，最終消失。從人力的角度觀之，被邊緣化的媒體素養教育，有可能表現為沒有專責教師的狀態；這一點，我們或可從本文後半部的實然考察中看出端倪。

最後，媒體素養課程的活動是否可以接受來自媒體組織的資助？除了直接的金錢資助外，其他像是免費提供媒體素養所需要的影視教材、協助媒體參訪等，都能讓許多缺乏資源的偏鄉教師有機會將媒體素養課程設計得更為生動、深入。但是，提供這些材料與機會的媒體組織，到底是基於社會責任，還是將媒體素養課程看做是公關宣傳的可能通道？這一點確實需要授課教師在考慮是否接受資助時，具體明確地思考。

這些爭論雖在 20 世紀最末期就已提出，但一直到今天，仍未見確切的答案。媒體素養教育從目標、立場觀點這些理念問題，到實際執行的場域、手法、資源取得等操作細節，無一不是每一位授課教師都必須不斷思考、掙扎、乃至於試圖取得平衡的大問題。更別說媒體素養教育到底有沒有實際的成效，則更是各式官方、非官方資源投入時，一定會提問的問題。

對此，Martens (2010) 分析了 165 篇⁴ 收錄於傳播與大眾媒體資料庫 (Communication and Mass Media Complete database from EBSCO)，在文章題目或摘要中出現「媒體素養」、「媒體教育」的文章，試圖瞭解討論媒體素養教育所使用的概念、理論以及對未來的擘畫。研究結果顯示，絕大多數研究者都同意媒體素養除了教授媒體相關知識，也應該教授內容產製技術。前者應該包括媒體產業、媒介訊息、閱聽人以及媒介效果；後者則應該表現為對媒介內容的近用、分析、評估以及產製。

不過，Martens 更重要的結論是，媒體素養教育是多重面貌的 (multifaceted)；而且這多重面貌，與參與媒體素養教育的授課教師背景多元豐富，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也就是說，媒體素養課程教些什麼，一定程度上由老師的背景來決定。這正是本文從教師背景下手，希望描繪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圖譜的切入點。

二、媒體素養的目標：從紙媒、電子媒體到資訊社會

媒體素養的教育目標到底是什麼？Aufderheide (1993) 的定義堪稱經典：媒體素養就是要培養近用 (access)、分析 (analysis)、評估 (evaluate) 以及以各種形式創造與傳遞訊息 (create content) 的能力。由此出發，媒體素養課程，就是希望在學校環境中傳授以上能力，讓閱聽人能夠更有技巧地使用媒介內容。(Livingstone, 2004, 亦可參見 Alvarado, Gutch, & Wollen, 1987; Hobbs, 1998a) 由此，媒體素養教育的內涵大致底定。

然而，即便有如此清楚簡單的定義，媒體素養教育的面貌，仍舊十分多元而分歧。Christ & Potter (1998) 以及 Brown (1998) 皆認為，對不同人來說，媒體素養代表了不同意義；Aufderheide 的定義雖然傘狀地廣泛包含許多內容，但卻無法就細項提供教案設計所需要的具體策略 (Martens, 2010)。於是，不同理論家開始從不同角度切入媒體素養教育，試圖說明媒體素養教學操作的可能觀點；其中心理學觀點與文化研究觀點是兩大主流。

心理學觀點的主要理論家 Potter (2004: 58-59) 將媒體素養定義為「當我們暴露在媒介環境中，試圖解釋訊息意義時，需要的一組觀點」，這是「心理學式的資訊處理觀點」(psychological information-processing viewpoint)。在此定義下，人們需要的是一組知識體系，能夠用以理解媒介訊息、訊息效果，以及訊息中隱

4 Martens (2010) 的研究初始蒐集了 243 篇文章，後來刪去了教學指引、短評類型的內容，而僅分析完整的概念或實證研究論文。因此最終的分析對象只有 165 篇。

藏的「我與世界的關係」。同時，當我們暴露在媒介訊息下時，越能主動的利用這組知識體系，就越能達到自己設定的目標，避免因接觸媒介訊息而造成的風險危害。

相對於此，Buckingham (2003) 提出的則是文化研究觀點的媒體素養教育策略。Buckingham 認為，教師不可能僅僅教導一組有限的認知能力，就以為個人在面對任何訊息時可以自主地操作；相反地，他認為應該提供一組關於媒體的概念，作為接收媒介訊息時的理論框架。這組概念應該包括：製作 (production)、語言 (language)、再現 (representation)，以及閱聽人 (audience)。在操作上，Buckingham 認為，媒體素養的目標是要讓學生能夠系統地反思閱讀與書寫的過程，瞭解並分析自己作為讀者與作者的經驗；因此，實務上，老師與學生應該是一種對話關係，在來回往復的討論中理解每個閱聽人的位置與思維。

對照 Potter 與 Buckingham 觀點可以發現，Potter 能夠快速而大量地教學，並且可以評估素養教育的即時成效；而 Buckingham 側重個人經驗，建構式的教學法，則讓學生更深入自己的經驗。然而兩者都有缺點，Potter 的模式可能流於紙筆測驗、道德準則；而 Buckingham 模式則因為訴求師生之間的往復討論顯然不太可能有效率，同時也更要求老師「因材施教」的教學技巧。

從媒體素養運動後來的發展來看，來自文化研究的批判觀點媒體素養已經成為主流。論者從意識型態的角度指出，早期起源於英美等民主國家的媒體素養教育將資訊環境與民主體制理所當然地聯繫在一起，忽略了不同體制、不同民主階段社會遭遇的不同媒體議題 (Fedorov, 2011; Liao, 2008; Phang & Schaefer, 2009; Toepfi, 2014)。既然討論媒體素養策略要考慮各個社會的體制，那麼從心理學角度設定資訊處理模式無文化差異的觀點，自然也就在這一波批判行動中遭到淘汰。

我們可以細究批判的媒體素養的發展脈絡，瞭解這門課程該有的內涵。

眾所周知，「素養」(literacy) 一詞原指聽說讀寫使用文字的能力，特別在識字率不高的年代，能使用文字，即代表文明程度提升。然而，在文化研究代表著作《識字的使用》(The Uses of Literacy) (Hoggart, 1958) 一書出版後，識讀或素養能力被大眾媒體所形塑出的新「用法」，扭轉了素養一詞的意涵，並從此與大眾媒介牽扯不清。根據 Hall (2007) 對《識字的使用》一書的解釋，Hoggart 在這本書中，討論了一種關聯於階級身份的態度與價值觀，特別是為工人階級提供服務的商業價值，聯手為英國二戰前後的工人階級創造了一種透過大眾媒體傳達的生活風格。然而這種被塑造出來的生活型態其實與真正的工人格格不入；這個落差引發了在勞動之外的文化向度議題，最終展開了「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主義轉向的批判觀點。

在文化研究的視野之下，大眾媒介到底傳送些什麼內容成為媒體批判的重點之一。這個批評的角度，深度影響了1990年代中後期開始，並在2000年左右漸次開花結果的媒體素養研究。文化研究視野中的素養討論模式，正是今日稱為「批判的媒體素養教育」。

所謂「批判的媒體素養」(critical media literacy) 著眼於社會正義與平等的觀點，認為媒體教育應該要引領學生瞭解社會的權力結構(Luke, 1994)，才能發展出以學生為中心的，由下往上的分析觀點。Harding (2004) 更指，若能從邊緣人的觀點(例如：後殖民、女性主義等)重新考察已經被視為常識的諸般(媒體)現象，才能夠打破主流觀點長期以來順理成章主導意義運作造成的困境。Kellner & Share (2005) 歸納定義出批判媒體素養的5個核心概念：

- (一) 非透明原則：即，所有的媒介內容都是「建構的」。從符號學的觀點觀之，意義都是符號之間的差異造成的，因此，Giroux (1997) 主張，任何以「自然」狀態出現的事物，都應該好好深究，還原到其被產製的歷史脈絡中去重新看待。是以，透過批判去除媒體內容的迷思狀態，是媒體素養的重要起點(Masterman, 1994)。
- (二) 符碼與成規：媒介訊息使用的是一種新創語言，有其自身的規則。根據Hall (1980) 的說明，媒介透過「製碼」(encode)，將特定意識型態或文化符碼夾帶在內容中；因此，媒體素養的重要目標，就是要讓學生能分辨符碼的內涵與外延意義(Fiske, 1990)。
- (三) 閱聽人解碼：不同人對於同一媒介訊息可能產生不同經驗。也就是說，閱聽人可以透過偏好的解讀方式，與主導的意識型態對抗；例如Ang (2002) 就認為媒介內容意義不是寓居在文本中，而是在閱聽人解讀過程中與文本形成的交互話語情境(interdiscursive context)中。
- (四) 媒介內容已植入了特定的價值與觀點：主張所有的傳播活動本質上都是主觀的；正如Giroux (1997) 所言，沒有一個理論、事實宣稱或說明是客觀的。日常生活如是，媒體內容亦若是。
- (五) 傳播的動機：媒介組織以獲利或獲權為目標。鼓勵學習媒體素養者思考為什麼特定訊息會被傳送，以及這些訊息是從哪裡來的，應該是媒體素養的重要目標。這裡也特別強調媒介組織的經濟結構對於理解媒介內容的重要性。媒體產業所有權的集中化現象(Bagdikian, 2004)、非民主及非競爭狀態(McChesney, 1999a, 1999b)，乃至於所有權集中導致對選舉新聞的偏差報導，都可以說明媒介影響內容偏向的組織因素。

即便在網際網路普及，新的資訊傳播工具主導社會生活的情況下，也不能完全拋棄這 5 項工作。Livingstone (2004) 認為，從紙媒到螢幕的轉變中，真正的變化不在媒介本身的特性，而是不同媒介對知識與文化的定義，其實大不相同。因此，即便在不同時代不同教學者投入媒體素養工作，在批判的媒體素養觀點之下，傳播者所使用的傳播工具不應是素養教育的核心；相對地，說明並解釋不同媒介（及其使用）構成的知識文化變遷，才是使得一個受教者在課程開展過程中，慢慢地「有素養」（literated）的關鍵。

舉例來說，Johnson-Eilola (1998) 的研究便發現不同世代對於「遊戲」（game）的想法非常不同：持存現代主義傾向的老世代，玩遊戲前要先弄清楚遊戲的規則；但具有後現代主義傾向的年輕世代，則習慣在混亂的環境中掌握工作（遊戲）目標。同樣的現象也被劉慧雯（2015）捕捉到，並從「數位在地人」（digital natives）(Prensky, 2011a, 2011b) 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這組對反概念下手，試圖說明擁有既定社會文化經濟權力的數位移民，面對在符號上設定在地人標準，要求移民涵化其文化，適應其生活的數位在地人時，在媒體素養議題上必要的適應與調整。

有趣的是，不論是 Livingstone 或劉慧雯，都提到了將「由上而下媒體素養教育」翻轉為「在媒體使用者身上發展議題」的教學模式。Livingstone 認為由上而下的媒體素養教育，有可能製造一種來自體制內教育的自我規訓，導致閱聽人被圈限在既定的批判框架中；一旦面臨新的科技、新的情境，既有的教育內容即有可能力有未逮。而劉慧雯則先確認了「近用媒體」在資訊時代已經日常化，在參與的技術門檻降低的情況下，素養教育的核心應該設定在「達成公眾參與目標」上。也就是說，當「媒介」一詞不再僅僅指稱一個組織、一種科技形式，「媒介素養」於是也就不能僅僅只是做技術教學，而更應該具有文化政治的意涵 (Livingstone, 1998, 2004)；這個情況在網際網路成為主要訊息傳遞通道，閱聽人更有能力使用訊息通道後，更值得注意。

從這些關於「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的討論可以確定，「保護主義觀點」（protectionist perspective）(Postman, 1985, 1992)，以及「教育的銀行式概念」（the banking concept of education）(Freire, 1972) 已經無法滿足今日媒體素養教育的需求（亦可參見余陽洲，2014）。媒體素養教育的核心，被認為應該更深刻地植基於閱聽人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對社會參與的想像上。

在臺灣，隨著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推動「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將媒體素養規畫為現代公民的五大涵養之一，也使得媒體素養的官方地位再次受

到矚目。根據教育部委託「媒體素養課程與教學推動計畫」主持人陳炳宏教授的結論，媒體素養的課程目標是「培養耳聰目明且積極主動的媒體公民」。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陳炳宏等（2014）以「解讀、批判、建構、參與」4項主題為本，規畫「媒體監督、媒體近用、媒體教育」等3個行動方案。上述計畫在2014年出版的《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一書，則蒐集了「情境教學實驗」（李明穎，2014）、「創用者的媒體素養」（陳順孝，2014）、「PBL實踐」（王正慧，2014）、「融入服務學習」（周典芳，2014）、「社會參與」（孫嘉穗，2014）等數種教學設計。從該書收錄、提倡的幾種教學方案來看，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正在倡議一種與社會參與（包含服務）密切相關的情境式、融入式學習方案。

這也就是說，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要求學生，同時也要求老師，將媒體置入社會情境中，成為一種深化民主參與的應用型知識。如此要求下，媒體素養授課教師自然不能僅僅守住「媒體專業」、「媒介內容製作技能」，而必須瞭解民主社會體制，從而將閱聽人／學生的民主參與視為媒體教育的主要目標。

肆、媒體素養的教學現實：從授課教師的背景下手

從媒體素養的理念、爭論到教育現場反思的討論中，可以清楚看到媒體素養教學至少涵蓋了媒體實務認知（包括組織、法規以及製作技能），以及閱聽人批判反思兩大能力。這兩大領域需要完備的學識與媒介經驗；在教學對象並不確定⁵的前題下，授課教師所面對的挑戰更可能時時改變。根據黃俊儒（2014）的統計，在100～103學年度之間執行「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的徵件案中，只有30門課程的課名直接與媒體素養相關；占所有徵件的3.6%（徵件通過課程總數838件）。若進一步瞭解開課單位可以發現，這30門課程多開在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另外有零星課程由具有傳播背景的兼任老師在不同學校授課。黃俊儒因而認為，媒體素養課程「在目前臺灣高等教育現況中，呈現出一種『比例低』且『高度集中』的樣貌」（黃俊儒，2014：29-39）。

黃俊儒的分析對象是三年間向教育部申請徵件的30門課程；平均而言，等於一個學年全臺只有10門媒體素養相關課程進入公民素養陶塑計畫。以臺灣現有超過160所大學而言，這個數字所描繪的媒體素養相關課程開設狀況，顯然偏

5 媒體素養的「教學對象」有時是傳播相關科系學生，有時則是通識教育學生。如果是安排在「融入式教學」課程，則教學對象則更有可能是在修習特定專業科目的情況下，接觸媒體素養教育。

低。為了全面瞭解媒體素養開課狀況，以及授課師資，本研究以 103 學年度開課實況為對象，蒐集課程與教師資訊，作為描繪臺灣媒體素養教學圖譜的基礎。

本節將從授課教師背景的角度來描繪媒體素養教育的「現實」，作為考察臺灣媒體素養教育人才圖譜的材料。

一、研究取材

為了獲得中立客觀且最新的授課資料，本研究從教育部網頁上找出臺灣所有大專院校，然後逐一在各校網頁上透過校級選課資訊系統查詢 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⁶開設之媒體素養課程相關資訊，並於登錄表內登錄。登錄項目包括：學校名稱、課程名稱、開課學期、必選修別、教師姓名⁷、教師現職、教師學歷、教師經歷、教師同一學期開設之其他課程等。在此要說明的是，本文所議論者雖為「媒體素養」，然各校因各種原因，開課名稱或有不同，本研究採取「廣泛定義」，將課程內容有 1/3 以上涉及「媒體專業」（包含組織、法規、製作），以及「閱聽人反思批判」（包含分析、評估、製作近用），兩大項目的課程視為本研究廣義媒體素養所稱之範圍。然，為行文簡潔，除非為了說明其他意義，以下所有課程皆以「媒體素養」統稱之。

本研究透過各校課程查詢系統蒐集到的「媒體素養相關課程」資訊顯示，103 學年度全年，共有 37 校共 73 位老師開設 156 門媒體素養相關課程⁸；這些課程的課名不一而足，除了最常見的「媒體素養」、「媒體識讀」外，另外也有「媒體與傳播」、「媒體批判」、「媒體、文化與社會」、「媒體與生活」、「新聞與生活」、「媒體影響與社會生活」……等。在這些課程中，有 28 校 88 門課列為通識課程，4 校傳播相關科系列為系必修；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大仁科技大學二技數位多媒體設計系、育達科技大學華文傳播與創意系等則列為系必修，以上這些學校共開出 7 門系院必修課。全臺唯一將媒體素養訂為全校必修的則是世新大學；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共有 18 位老師開出 26 個

6 本研究調查時間為 2014 年 12 月份（查詢第一學期），以及 2015 年 2 月份（查詢第二學期）。因此，本研究所列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為「開課成功」科目，第二學期則為「預定開課科目」。本次調查發現，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數目為 87 門（班），第二學期開課數則為 69 門（班）。

7 本研究查詢各校選課系統所載明之課程資訊，取得課名後，透過「開課單位」進一步查詢教師學經歷、其他授課科目等資訊，並從中瞭解教師受聘狀況等資訊。在 73 位授課教師中，有二位教師未列出學歷（其中一位雖註記畢業校系，但未說明學位）、一位學歷經歷皆未列。

8 73 位老師中包括一位開設不計學分的服務課程，本文稍後的所有統計資料皆將不計學分的課程刪除，因此 103 學年度實際開課老師為 72 位。

班（含進修班、碩士班、與在職專班各一班）；世新大學涉入媒體素養課程的授課教師人數、人次，以及開課班級數皆占了全臺 1/4 以上。另外，有兩門開設在碩士班的則是世新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碩士班理論組的「進階媒體識讀」，以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的「媒體素養專題」，兩門課皆為選修課。

有趣的是，有些學校開設兩門以上科目名稱不同，但同樣被本研究定義為媒體素養相關的課程。他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開設「媒體素養教育與行動方案」（通識），以及「媒體素養」（社教系選修）；亞東技術學院則開設了「現代公民與媒體素養」，以及「媒體識讀」兩門課。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分別在大學部與碩士班開設了「媒體識讀」與「媒體素養專題」兩門課程。

除了列為全校或全系必修課程的單位外，同一課名開兩班以上的有國立政治大學（三班皆為通識課）、國立東華大學（一班通識、一班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選修）、輔仁大學（兩班傳院必修、一班新聞輔系生必修）、靜宜大學（開設「媒體、文化與社會」四班）、大葉大學（兩班皆通識課）、玄奘大學（「新聞媒體識讀」，一班為大傳系與影劇藝術系選修，一班為原住民專班與廣電系選修）、美和科技大學（四班皆為通識課）等。

二、臺灣媒體素養授課人才側寫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13 年發表的《全球媒體與資訊素養評估架構》（*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Country Readiness and Competences*）所示，關於媒體、資訊的素養議題，隨著科技發展，越來越朝向跨領域發展。同時，媒體與資訊素養所要達到的目標，已經不再以獲得資料、訊息為滿足，而更要求能夠形成知識、甚至智慧，從而能夠達到管理知識、批判思考的境界。同樣的，所謂的「批判思考」，也從近用、評估、分析媒介內容，進一步發展到製造與分享，改變與行動等具體的作為（見圖 1）。

面對科技發展對素養教育提出的多元、跨領域需求，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師資是否相應？這是本文要回答的研究問題。

103 學年度在各校開設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教師共有 72 位。以下分別從授課教師的最高學歷學位與學術專長、聘任單位、媒體相關資歷，以及其他開課狀況來描繪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群像，從中瞭解臺灣媒體素養在大學層級的授課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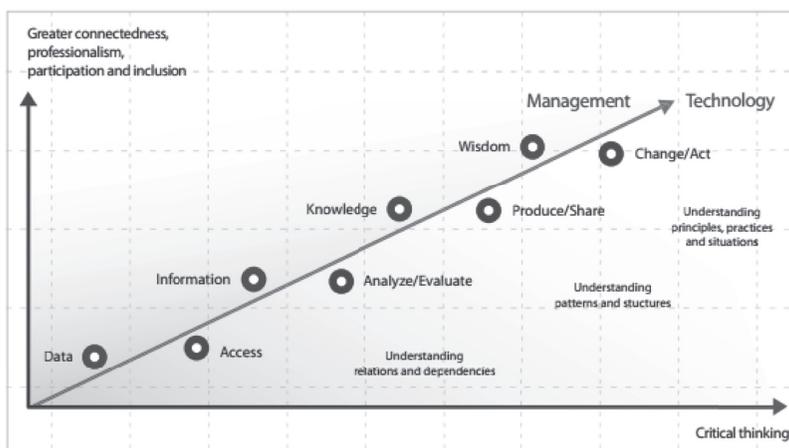


圖 1：跨領域取徑的媒體素養教育

資料來源：UNESCO (2013: 28)。

(一) 學歷與學術專長

在 103 學年度開課的 72 位老師中，除未能於系所資料瞭解學歷與學術專長的 3 位老師外，有 49 位老師有博士學位（69%），20 位老師最高學歷為碩士。顯示媒體素養授課老師擁有博士學位的比例並不低。過去常認為通識課程因為並非科系專業科目，因此多由兼任老師、碩士學位老師負責，但，媒體素養課程 103 學年度的開課狀況與此「常例」並不相符。

在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中，超過半數（26 位）取得傳播相關領域博士學位，21 位老師取得社會人文領域博士學位，2 位老師取得自然或工程領域博士學位。所謂「傳播相關領域」包括了新聞學、（大眾）傳播學、傳播藝術等，屬於傳統媒體相關學術領域。

在社會人文領域取得博士學位的老師，專業背景就比較多元。包括諮商與輔導、政治學、社會學（與文化研究，含應用社會學）、公共事務管理、教育學（含成人教育）、臺灣研究、中國文學等。有趣的是，雖然社會科學領域廣泛（應該還包括諸如經濟、地政、公共行政、財政、勞工等領域），但投入媒體素養教育的主要是社會學、政治學、教育以及文學等四大領域博士。很明顯地，這與素養教學一向屬於教育學領域，且近年來媒體素養教育又特別強調公共事務參與有關係。由此也可以看出，臺灣媒體素養教育有特別重視社會參與的跡象。

另外有兩位老師分別擁有環境工程以及科技管理博士學位。這兩位老師的加入，方使得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從社會人文領域，出現了邁向自然與管理科學領

域的契機，從而較能符合 UNESCO 對媒體與資訊素養教學人才的期待。不過，如果細究這兩位老師投入媒體素養教育的原因可以發現，環境工程背景的老師在其生涯經歷中，絕大多數經歷皆於媒體服務（於報紙擔任環境記者、兼任主筆）；而科技管理背景的老師則擁有大眾傳播學士與碩士學位。說起來，兩位老師的學經歷與媒體仍有一定淵源。這樣背景的老師也提示我們，傳播實務現役或退役工作者，以及次高學歷與傳播相關者，是媒體素養師資頗為重要的來源。

如果在把焦點轉移到碩士學位的老師身上，跨領域的氣氛，就會更為濃厚。在最高學歷為碩士學位的 20 位老師中，有 13 位老師擁有傳播相關碩士學位；2 位老師擁有自然與工程類碩士學位，5 位老師擁有社會人文碩士學位。這樣看起來，投入大學媒體素養教育的最低學位門檻（即碩士學位），似乎仍以傳播領域為最多；不過，仔細深究卻可以發現，學歷背景為傳播相關學位的老師其實主修頗為多元。除了新聞、大眾傳播外，這群老師另外有出版、傳播管理、教學媒體等專長；在 5 位社會人文領域的老師中，則有美國研究所、東南亞研究所、政治、教學媒體等領域專長；最後，自然與工程領域專長的老師，則主要擅長資訊管理與網路工程。

換言之，由於學門分化在碩士與博士等級上的程度不一，使得最高學歷為碩士學位的老師的學術專長看起來多元而廣泛；而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則顯得較為一致。

在考察老師們學歷背景的同時，本文發現，多數非傳播相關科系的老師之所以能夠、或有意願投入媒體素養教育，與老師的職涯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這裡所稱職涯，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老師進入大學體系時的聘任單位，以及老師進入大學體系前的其他經歷。

（二）聘任單位

正如黃俊儒所言，在臺灣，媒體素養課程大多開在擁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中；至於沒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則多由兼任老師零星開設此課程。在本次調查中，本文發現，從老師的聘任單位，可以清楚看到媒體素養課程在單一學校課程地圖中的位置。

在 37 校、72 位授課老師中，扣除無法在學校院系官方網頁上找到聘任單位的 4 位老師，有 20 位老師是兼任老師（14 位講師、3 位助理教授、1 位副教授）；兼任老師的主要聘任單位為各校通識教育中心（9 位）。有趣的是，在兼任老師中，有 3 位老師受聘於學校行政單位，然後兼開媒體素養通識課程；這 3 位老師

的學位背景皆非傳播相關科系。除了通識中心外，也有應聘於系所的兼任教師，這些聘任兼任教師教授媒體素養課程的系所，有 1 個是媒體相關科系，2 個則算「半個」媒體相關科系（分別是「人力資源管理暨公共關係學系」以及「語文與創作學系」；考慮跨領域科系會聘任相關師資，因此本文登錄時亦列入傳播相關科系計算）。本文也發現，幾乎所有兼任老師上下學期都有開媒體素養課程，有些老師甚至一學期開 3 班課程，每學期都開課。103 學年度所有兼任老師一共開出 43 門（班）媒體素養課程，占總課數的 28%。換言之，從開課數量來看，兼任老師在媒體素養教育中並非補充性質，而是非常重要的師資來源。

在 51 位專任老師（含專案教師）中，有 10 位受聘於各校通識中心（含「博雅學部」）。至於通識中心之外的專任教師聘任單位，絕大多數是傳播相關科系：新聞系、大傳系、廣電系、臺灣語文與傳播系、華文傳播與創意系、設計學院等。黃俊儒（2014）的調查雖然是針對申請教育部「公民素養陶塑計畫」的課程所得結論，但本文針對 103 學年度媒體素養相關課程開課的調查結果顯示，擁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確實開設了較多、較集中的媒體素養課程。同時，本文也發現，在沒有傳播科系且由專任老師負責媒體素養課程的 9 所學校中，授課教師只有少數（2 位）的最高學歷是傳播相關科系。這顯示了由通識中心專任老師負責的媒體素養課程，是由學校專任聘用的其他領域教師拔刀相助，而非聘用具有傳播學術專長的老師。顯然，媒體素養教育人才在未設有傳播科系的學校中，僅是一門「課程」，甚至尚不具有足以聘任一位專任教師專責負責的地位或份量。

不過，不知道是因為「傳播專業」定義廣泛，還是傳播專業可以輕易與其他學術專業融為一體，上述「開設媒體素養的通識中心專任教師」雖然只有少數最高學歷是傳播相關，但每一位卻都以不同的方式與媒體實務或學術關聯在一起。有些老師曾在媒體（特別是新聞媒體）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有些老師則是其他層級學位（如：碩士、學士學位）主修在傳播相關領域。初步而言，由通識中心聘任的專兼任老師，大抵都展現了跨領域的面貌。然而這也顯示，在缺乏傳播相關科系的情況下，不論是專兼任聘用，媒體素養教育似乎被認為「只要曾在媒體任職，或曾有傳播相關學位」，就可以開班授課。這顯示媒體素養教育的人才門檻其實不高。

教師的學術專長與聘用單位經常是評估一位老師如何被置放在大學教育地圖中的體制內指標，從以上的分析來看，在既有體制內「鑲嵌」媒體素養課程的方式，深深受到傳統學科學門分類方式的影響。在已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多由本就會聘任的傳播學術專業老師負責；在缺乏相關科系的學校，則由通識中心負

責，而通識中心，則多半並未考量由一位老師專責，而是在既有的老師中，選出具有媒體經驗或（較低）相關學位的老師跨刀協助。Kress (1992) 曾言，當媒體素養以融入於其他專業課程為主要授課方式時，其受到的重視程度就不會太高，最後甚至可能消失。若從人力的角度思考，在沒有專責媒體素養課程教師的情況下，一旦跨領域拔刀相助的老師在原本專長領域的開課需求增加，老師在考量授課學分上限、授課負擔的情況下，應該會選擇他既有的專長；於是，最先被犧牲、停開的課程，就會是媒體素養。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仍有聘任兼任教師教授媒體素養的情況。一般而言，專業系所的兼任教師屬於補充性質，在要求專任教師學位與學術表現的前題下，大多數傳播相關科系的兼任教師以業界師資為主，目的就是在補充充實專業教學所需之人力。那麼，媒體素養到底是一門需要學歷、研究專長來支撐的課程，還是一門可以補充師資兼顧的課程？答案可能就在有傳播科系但仍請兼任師資授課的學校。

像這樣的學校有 5 校，共聘任 8 位兼任老師，開出 21 門（班）課程。數字雖然不高，但其中卻不乏擁有整個傳播學院的學校，非常值得注意。某校在 103 學年度兩個學期開出的 16 班媒體識讀課程，由 2 位兼任教師負責其中 10 班，超過六成；除了這兩位兼任老師外，另一位負責 4 班的專任老師，其聘任單位並非傳播學院；這三位老師共開出 87% 課程。這所學校雖然擁有傳播學院，約有 30 位專任教師，卻僅有 1 位學院內的專任教師開設 2 班。也就是說，這所學校對媒體素養課程的想像可能是：是一門重要通識課程，需要開足，以供全校同學選修；師資則由兼任或非傳院老師等「補充性質」師資負責。反之，另一個擁有傳播學院，仍聘任兼任師資的學校，在 103 學年度開出的 23 門媒體識讀課中，只有 2 班由 2 位兼任老師負責，其他課程不但由校內 16 位專任老師（14 位傳播學院，1 位通識中心、1 位人文社會學院教師）負責，且其中有 4 位教授、6 位副教授、3 位助理教授。不但充分利用傳播學院師資，且教師的教學資歷相對也較豐富完整。這所學校對媒體素養教育的想像，顯然是更有意願以較為固定的人力資源來支應。同時，在專任老師投入媒體素養教育的情況下，也可以預見原本傳播專業教育的實際開課，就需要投入更多專兼任師資。

這樣看起來，雖然教育部大張旗鼓地將媒體素養歸納為現代公民五大核心素養之一，然而，對於傳統上即已投入傳播教育的學校來說，對於該怎麼看待媒體素養的學術位置仍有非常分歧的意見，各校投入的人力狀態，以及看待媒體素養優先性如何等問題上，也有明顯的差別。

(三) 媒體相關資歷

既然媒體素養教育強調對媒體實務（包含組織、法規、製作）的學習，那麼，擁有媒體實務經驗的老師應該是媒體素養教師的重要來源。

本次調查 103 學年度全臺教授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授課教師在各系所中心所列出的經歷⁹發現，曾經在媒體產業任職的老師（26 位）中，以任職報紙為最大宗（15 人次），電視次之（6 人次），雜誌、廣播與網路則分庭抗禮（各 3 人次）。若再深究可以發現，任教於傳播相關科系、擁有媒體經驗的專任教師，也以報紙為主要服務單位（7 人次），電視次之（2 人次），廣播與雜誌更少（各 1 人次）。在兼任老師方面，在 20 位兼任老師中，有報紙經驗的 6 人次，電視 3 人次，雜誌 2 人次，廣播 1 人次，網路 3 人次；這 3 位具有網路實務經驗的老師中，一位擅長網路工程，一位經營政黨網站，一位則為網路媒體記者。

這組分布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對象，因為，近 20 年來，對於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的討論都提到了網路媒體對於社會參與的關鍵影響力，這也促使媒體素養開始朝向新素養（new literacies，參見劉慧雯，2015；Banaji, 2010; Coiro, Knobel, Lankshear, & Leu, 2008; Dalton & Proctor, 2008; Koltay, 2011; Webster & Ksiazek, 2012）發展課程內容。此時，老師能掌握網路社會、社群媒體、數位在地人到什麼程度，就成為網路科技能否納入授課視野的關鍵。倒也不是說既有經驗集中在報紙的老師就無法體察數位時代帶來的素養變化，而是，為什麼網際網路已經發展超過 30 年，相應的網路媒體工作者、網路現象研究者仍非媒體素養的主要教師群？本文以較為悲觀的角度提出兩個可能的解釋。其一，上一節曾提及「現役或退役媒體工作者」是缺乏傳播相關科系學校聘用媒體素養教師的重要來源，這表示，「從事網路媒體工作的現役或退役工作者」尚未投入媒體素養教育。其二，在本來擁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中，媒體素養多由既有專任教師負責，本次調查資料顯示，專任老師絕大多數擁有博士學位。在過去，傳播相關科系多聘用學經歷兼備的教師，在攻讀博士學位需要時間的前題下，不難想見在進入學校之前的媒體資歷多累積在傳統媒體上。然而，這也就表示，目前媒體素養專任教師的「媒體經驗」並不新穎。反過來說，媒體經驗在網際網路的專任教師，顯然尚未投入媒體素養教育。

9 各系所登錄教師經歷資料的邏輯原則不盡相同，本節所述資料為各系所顯示之資料，有一定誤差（例如：有些學校並不列出教師媒體經歷，有些學校僅列一筆主要經歷資料等）。同時，兼任老師由於更動頻率較高，許多學校釋出資訊也非常有限。此外，部分教師曾任職於多個媒體、從事多項工作，因此本節「人數」多實為「人次」。由於資訊落差較大，本節以「趨勢」和大致面貌來描繪教師媒體職涯圖像，並以提出媒體素養面對的教學人力問題為目標。

這兩個「尚未投入」顯示了媒體素養教育一大隱憂，那就是，作為一個需時時關照媒體現實，以培養「現代公民」為目標的課程，媒體素養卻經常是老師們的「第二選擇」：若非先選擇在產業任職，就是先選擇其他學術專業。對照選舉結束後「落選人返校任教」的報導實例，不難想見「（媒體素養）任教」其實並非「生涯規畫」，反而可能是某種不得不然。

本次調查另外還發現，除了媒體外，有些老師有在非傳播相關實務領域的工作經驗；其中，在非營利組織任職為最大宗（11位），政務官、政府部門聘用以及公務員則合計則有5位。至於所謂「媒體經驗」的實際工作領域，則以新聞業為主（22位），節目製作次之（12位），其他領域廣告公關（4位）、文化創意產業（1位），以及網路工程（1位）等不一而足。從媒體素養一路以來堅守批判、分析、評估等核心能力的角度來看，來自新聞業的老師能夠為學生帶來更多組織運作與專業選擇的知識，作為批判媒介（特別是新聞）內容的基礎；這可能解釋了為何授課老師擁有新聞經驗的比例偏高。

（四）其他課程開課狀況

受到教育部對大專教師教學時數規範，所有在103學年度開設媒體素養課程的專任教師除了媒體素養外，都另外開設了其他課程；本次研究調查的51位專任老師中，沒有任何一人專責於媒體素養教學而無須開設其他科目。由於媒體素養的教學內涵多元，且隨著科技與社會變遷越來越複雜，因此，授課教師開設其他科目，對媒體素養教學來說，未必是一件壞事。若以媒體素養為核心，應該可以期待授課老師或者在實務經驗上，或者在教研專長上，至少有一方面與傳播媒體相關。本文統計了老師們開設其他課程的整體狀況發現，所有72位老師中，有41位另外開設了與傳播相關的課程；另外則有28位開出非關傳播的課程。而這些與傳播不相關的課程，則與老師自己的經歷學歷有密切關係。

例如，在教師學歷一節中，本文提及擁有博士學位的老師中，只有一半老師的學位是從傳播相關科系取得；換言之，另有一半老師可能會依照其學歷專長開出非傳播相關課程。不僅如此，當授課老師不同層級學位專長主修不同時，也很可能開出與其最高學歷不同專長的課程。從老師的學歷背景來看，這裡可以看到的「非傳播相關科目」，大抵也不出社會科學（社會學、政治學、國家發展、兩岸、全球化等）、法學、人文學科（中文、國文、英文、修辭）、教育諮商（社會工作、諮商），以及自然科學與工程（科學傳播、環境實務）等科目。比較有趣的其實是擁有傳播相關博士學位，除了媒體素養、傳播相關科目外，另外還開

設非傳播相關科目的老師。細究之下發現，這種情況主要是因為老師各自發展的研究興趣（例如：性別關係），以及學校規畫的課程項目，致使開課面向不受限制。例如，有的老師開設「人文關懷專題」、「多元文化與社會」等課程，多是共同科目性質，支援全校或全院開設的課程。

若從兼任老師的開課狀況來看，就可以更清楚瞭解目前在媒體素養課程授課的兼任老師，在大學教育人才板塊上的角色。在 20 位兼任老師中，只有 3 位老師另外開了傳播相關課程，另外則只有 4 位老師除了媒體素養外還另外開了非傳播相關課程；這 7 位老師中有 1 位係「三項全能」：在 103 學年度開了媒體素養、傳播相關（「新聞寫作與媒體關係」），以及非傳播相關課程（「領導與管理」）；這可能跟該系正好跨在人力資源與公共關係這兩個傳統上分屬商管與傳播領域的科系特色有關。總而言之，兼任老師大多專心開課；比較常見的授課時數分配，其實是一位老師開設兩班以上媒體素養課程。由此看來，不論是一般科目或媒體素養，兼任老師確實較屬於補充性質。

（五）小結

本文考察 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全臺灣大專院校校級選課資訊系統上，登錄「媒體素養相關」課程的開課狀況，試圖從教師學歷、經歷、聘任單位以及開課科目等四個角度切入，瞭解臺灣媒體素養授課教師的群師圖像。

調查結果發現，本年度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七成擁有博士學位，其中有一半是傳播相關博士學位；在最高學歷為碩士的老師中，也以傳播相關科系專長最多，人數超過六成。換言之，大體而言，各校教授媒體素養的教師頗為偏好特定學歷背景。不過，不論學歷背景如何，由於媒體素養課程內容經常牽涉對媒體實務的說明，因此，現役或退役的媒體實務工作者，也是媒體素養教師人力的重要來源。同時，也因為傳播學門本來對實務經驗就更為強調，因此，在擁有博士學位的專任老師中，也有不少人曾經任職媒體。

只不過，所謂「任職媒體的經驗」大致上仍集中於報紙、電視這兩種媒體產業，且以新聞工作為主；近 20 年來被認為重要的媒體近用、社會參與管道：網際網路，卻少見老師曾涉獵實務工作。這顯示了媒體素養教學人力的媒體經驗有可能正在與越來越重要的媒體通道脫節中。

除了學經歷背景外，絕大多數學校的媒體素養列為通識課程，因此，媒體素養教師的聘任單位，也就由傳播相關科系以及通識中心分庭抗禮。其中的差別是，受聘於傳播相關科系的老師，多擁有博士學位，有相應的媒體或傳播專長；

然而，受聘於通識中心的教師，雖然教授媒體素養，卻有一定比例是由其他領域教師跨刀協助開課。這導致了既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媒體素養教師人力本就不缺，且學有專精；但本來就沒有傳播科系的學校，在未能聘任媒體專長教師的情況下，人力與人才素質更見捉襟見肘。如果再加上兼任老師大多受聘於通識中心，就更可以瞭解媒體素養課程在特定學校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比較有趣的是，即使是傳統上重視傳播教學的學校，因為媒體素養的思維大不相同，於是也就出現了非常不同的師資配置邏輯。

本節將本文調查結果以表格呈現見表 1。

伍、結論：從群師圖像看媒體素養教育圖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陳炳宏教授，曾於 2014 年執行教育部「媒體素養課程與教學推動」計畫，透過曾經或正在開設媒體素養課程的老師填答問卷，希望統整媒體素養課程的核心內涵與能力指標。計畫問卷中，羅列了共 22 項授課議題。這些議題從認識媒體的組織與所有權、內容產製，到媒介內容行塑的刻板印象、美學與敘事形式，再到個人媒體使用行為反思、近用媒體以及參與社會的能力等，以及媒介制度、政策與法規，進一步隨著傳播科技更新加入了媒體技術運用與掌握等項目。綜合觀之，雖然一學期 18 堂課不可能將所有議題皆納入討論，但問卷本身就已經足以讓吾人瞭解到媒體素養議題之多元、廣泛與複雜的程度。如此複雜，理論上教授這堂課的老師不僅需具備學術知識涵養，可能也需兼具實務經驗，甚至對於法律架構，以及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等，都需有所

		專任			兼任			小計
		傳播科系	通識中心	其他單位 ²	傳播科系	通識中心	其他單位	
最高學歷	博士	傳播相關科系	23	2		1		26
		社會與人文	10	4	3		4	21
		自然與工程		2				2
	碩士	傳播相關科系	4	1		4	3	13
		社會與人文		1	1		3	5
		自然與工程						2
	小計	37	10	4	5	10	3	69

表 1：媒體素養教師學歷與聘任單位統計表¹

註：1. 有 3 位教師無法取得學歷與聘任資料。

2. 「其他單位」包含：非傳播科系以及行政單位。

涉獵。即使放棄特定一組議題，一個完整的媒體素養課程設計，仍牽涉到至少包括理念與實做兩個面向。這對任何一位老師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

媒體素養教育有沒有師資人力的門檻呢？從40年來對媒體素養該教些什麼、有什麼爭論議題的文獻中，可以清楚看到論者對於媒體素養教育的期待，遠遠超過對大眾媒體的批評或唾棄，轉而更希望能培養閱聽人不但耳聰目明，更能因知悉媒體運作邏輯，積極地將自我主張傳遞出去。社會不斷變遷，現代人所使用的傳播工具、平台越來越訴求社群中的個人；而科技進入社會生活之後提供的諸般能供性（*affordances*）（Dant, 2005），使得個人掌握資訊通道，透過社群連帶傳遞訊息的能力大為增加。在此情況下，「使用的目的」自然也就成為今日媒體素養教育必須提及的項目。可以教授這些內容的，到底是哪些人？

從課程下手的討論，是集合了當代對維護民主、期待公民積極參與的信念所完成的課程擘畫；這個應然面的描繪，很值得期待。然而，本文從人力角度下手所做的實然調查卻發現，或許受限於校院系結構，或許受制於對於大學教育的想像，臺灣的媒體素養授課人才，呈現出幾個兩極對立的分布。

首先是傳播教育人才在各校間的兩極分布。傳統上已經重視傳播教育的學校，聘用大量學經歷皆備的師資；幾個擁有傳播學院的學校，都聘用了至少30位老師。至於沒有傳播相關科系的學校，即使有心發展媒體素養，卻少從「聘任一位傳播或媒體素養專長教師」的角度來配置人力。本研究的調查顯示，從既有教師中挑出「有媒體經驗」，或「有傳播相關非最高學歷」兼授媒體素養課程的思維，最為流行。而且即使擁有傳播學院，也可以從師資人力結構發現，媒體素養在被思考時，竟可以出現「九成以上由專任教師負責」以及「八成七以上由兼任或非傳院教師負責」兩種極端的思維。這顯示，臺灣的媒體素養教育仍有定位不明確的問題。師資人力結構主要牽涉學校聘任結構與意願，並非單一教師可以決定，甚至單一系所或學院也不見得能夠置喙。然而我們或許可以期待透過較為彈性的聘任組合（如：合聘、較為固定清楚的兼任師資聘用原則），賦予至少一位老師專責負責媒體素養教學的工作，同時也開啟該位老師發展媒體素養相關其他教學研究領域（例如：網路文化研究）的空間。這樣，媒體素養教學相對比較獨立，較不受授課教師其他開課需求的擠壓，同時，在專責的情況下，較能通盤思考、注意媒體素養教學的議題發展。

第二個兩極對立分布是老師媒體經歷中新舊媒體的不平均。本次考察發現，不論是兼任或專任教師，有媒體實務經驗的老師，壓倒性地集中於傳統媒體（包含：報紙、雜誌、電視、廣播）；從事網際網路或數位媒體的老師，寥寥無幾。

從過去十五年在臺灣乃至於全球各地開展出的公民運動、社會運動來看，所謂「業餘者教派」(the cult of amateur) (Keen, 2007) 在對抗主流權力時，多應用了包括手機（如，菲律賓推翻 Estrada 的行動，參見 Bociurkiw, 2001）、網路（如：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西雅圖之戰，參見 de Armond, 2000；又如茉莉花革命）在內的通訊工具。如果媒體素養真的越來越強調社會參與，那麼，除了參與主題的有效性、參與手段的合法正當性之外，協助參與的器械工具，勢必是該當討論的題項。由此看來，媒體素養教師不但仍舊應當注意傳統媒體的壟斷、反民主、反智特徵，也該投入新傳播通道的訊息邏輯之研究。

媒體素養授課人才的對立，也出現在兼任專任老師的篩選取得上。從兼任老師的學歷經歷，可以清楚看到「傳播相關學歷」以及「傳播相關經驗」是非常重要的篩選標準。然而相對於「傳播相關學歷」在認定上標準清楚，有關什麼是傳播相關經驗，就顯得頗為模糊。例如，「經營政黨網站」是媒體經驗還是政黨政治經驗？「網路工程資歷」如何與媒體素養關聯？「政務官」資歷何以能宣稱與媒體素養相關？甚至，即使是「某報紙資深記者或主筆」，是否可以未經轉化變受聘為媒體素養課程的教師呢？所謂「媒體經驗」在進入課程時，究竟是指對組織文化的體察反思，還是歷來最為學生所詬病的「老師吹噓經驗、老生常談」呢？相對於此，則是學養豐富、擁有博士學位的專任老師，在取得博士學位的長時間學習歷程中，媒體改變了多少？媒體實務更換到什麼程度？從外部進行研究，對於媒介組織掌握內容的實際操作手法能瞭解多少？這些問題，顯示出媒體素養教育從定義便有的兩難：業餘的閱聽人想要理解專業化的媒體，到底如何可能？這些討論的焦點，都在於「老師能給學生什麼」。然而，針對新素養的討論已經發現，重視學生經驗，由下往上的議題設定，可能是個人面對網際網路浩瀚資訊海洋時，非常重要的能力。從這個角度出發，當我們選擇具有媒體資歷的老師來教授媒體素養時，仍舊應鼓勵或給予媒體素養議題發展的研習學習機會，透過教授媒體素養同儕團體，與各種背景的老師討論「學生議題」在教學上的意義，讓媒體素養教育成為可以自我終身學習的課程。

從 103 學年度臺灣地區所有大專院校開設媒體素養的群師圖像，本文嘗試理解媒體素養的教學圖譜。本文所發現的幾個極端分化狀態，顯示出臺灣媒體素養教育正處於亟需關注的十字路口；有些學校已經投入人力資源，有些學校則仍以補充性質課程看待。

受限於調查時間與人力資源，本研究未能深究媒體素養教師在其他領域的研究成果，也未能討論個別老師課程設計的實際限制。這是未來從人力角度思考臺灣媒體素養教育圖譜時，有待補足的課題。

參考書目

- 王正慧（2014）。〈媒體素養課程設計：PBL 之實踐〉，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185-20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中央選舉委員會（2014）。〈103 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結果概況〉。取自 http://web.cec.gov.tw/ezfiles/0/1000/attach/39/pta_22807_9133369_03796.pdf
- 李明穎（2014）。〈媒體素養的情境教學實驗〉，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159-172。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吳翠珍、陳世敏（2014）。〈媒體素養：傳播教育通識化的途徑〉，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41-8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余陽洲（2014）。〈「媒體識讀」教學 15 年：回顧與檢討〉，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145-15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周典芳（2014）。〈服務學習融入媒體素養課程的教學經驗〉，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205-220。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陳炳宏、廖志恒、葉大瑋、郭旭棋（2014）。〈媒體素養教育之課程設計與理念實踐〉，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85-12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陳順孝（2014）。〈創用者的媒體素養〉，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173-184。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孫嘉穗（2014）。〈媒體素養與社會參與：媒體教育的實踐與部落參與〉，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221-236。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黃俊儒（2014）。〈面對公民社會的大學媒體素養教育：一種融入的可能〉，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29-39。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楊倍昌（2014）。〈媒體講台亂彈曲〉，陳炳宏、柯舜智、黃聿清（編），《教學與學教——高等教育媒體素養教學參考手冊》，頁 17-28。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 劉慧雯 (2015)。〈媒體素養到新素養：試論素養教學策略與認識論的轉變〉，
《中華傳播學刊》，27：67-100。
- 蘋果日報 (2014 年 12 月 3 日)。〈小公主敗選回校教書 作家：羞辱這個職業〉。
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203/517694/>
- Alvarado, M., Gutch, R., & Wollen, T. (1987). *Learning the media: An introduction to media teaching*. London, UK: Macmillian.
- Ang, I. (2002). On the politics of empirical audience research. In M. G. Durham & D.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pp. 177-197). Malden, MA: Blackwell.
- Aufderheide, P. (1993). *Nation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media literacy*. Washington, DC: Aspen Institute.
- Axelrod, L. (1997). *TV-proof your kids: A parent's guide to safe and healthy viewing*. Secaucus, NJ: Carol.
- Bagdikian, B. H. (2004). *The new media monopoly: A completely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with seven new chapters*. Boston, MA: Beacon.
- Banaji, S. (2010). Disempowering by assumption: Digital natives and the EU civic web project. In M. Thomas (Ed.), *Deconstructing digital natives: Young people, technology and the new literacies* (pp. 49-6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Bazalgette, C. (1992). The politics of media education. In M. Alvarado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pp. 140-149). London, UK: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Blanchard, R. O., & Christ, W. G. (1993). *Media education and liberal arts: A blueprint for the new professionalism*.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Bociurkiw, M. (2001). Revolution by cell phone. *Forb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forbes.com/asap/2001/0910/028.html>
- Brown, J. A. (1998). Media literacy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44-57.
- Buckingham, D. (2003).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0). *Watching media learning: Making sense of media education*. London, UK: Falmer.
- Collins, R. (1992). Media studies: Alternative or oppositional practice? In M. Alvarado

-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pp. 57-62). London, UK: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Christ, W. G., & Potter, W. J. (1998). Media literacy, media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5-15.
- Coiro, J., Knobel, M., Lankshear, C., & Leu, D. J. (2008). Central issues in new literacies research. In J. Coiro, M. Knobel, C. Lankshear, & D. J. Leu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new literacies* (pp. 1-22). New York, N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Dalton, B., & Proctor, C. P. (2008).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ext and comprehension in the age of new literacies. In J. Coiro, M. Knobel, C. Lankshear, & D. J. Leu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new literacies* (pp. 297-385). New York, N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Dant, T. (2005). *Materiality and society*.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de Armond, P. (2000). Black flag over Seattle. *Storming Seattle*. Retrieved from <http://www.monitor.net/monitor/seattlewto/index.html>
- Dewing, M. (1992). *Beyond TV: Activities for using video with children*. Santa Barbara, CA: ABC Clío.
- Fedorov, A. (2011). Modern media education models. *Acta Didactica Napocensia*, 4(1), 73-82.
- Fiske, J.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Freire, P. (1972).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London, UK: Penguin.
- Giroux, H. (1997). *Pedagogy of the politics of hope: Theory, culture, and schooling*.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oodman, S. (1996). Media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reform: Searching for redemption in the digital age. *Video and Learning*, 1996(F/W), 1-2.
- Greenaway, P. (1997). Media and arts education: A global view from Australia.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187-19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Hall, S. (2007).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 39-49.
-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is (Eds.),

-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UK: Hutchinson.
- Halloran, J. D., & Jones, M. (1992). The inoculation approach. In M. Alvarado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pp. 10-13). London, UK: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Harding, S. (2004). *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ontrovers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art, A. (1997). Textual pleasure and moral dilemmas: Teaching media literacy in England.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199-211).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Hobbs, R. (1998a). Building citizenship skills through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M. Salvador & P. Sias (Eds.), *The public voice in a democracy at risk*. Westport, CT: Praeger Press.
- (1998b). The seven great debates in the media literacy movement.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8(1), 16-32.
- Hoggart, R. (1958). *The uses of literacy: Aspects of working class lif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bl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s*.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Johnson-Eilola, J. (1998). Living on the surface: Learning in the ag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In I. Snyder (Ed.), *Page to screen: Taking literacy into the electronic era* (pp. 185-210).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een, A. (2007).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New York, NY: Crown Business.
- Kellner, D., & Share, F. (2005). Toward media literacy: Core concepts, debates, organizations, and policy.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26, 369-386.
- Koltay, T. (2011). The media and the literacies: media literacy information literacy, digital literac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3, 211-221.
- Kress, G. (1992). Media literacy as cultural technology in the age of transcultural media. In C. Bazalgette, E. Bevort, & J. Savino (Eds.), *New directions: Media education worldwide* (pp. 190-202). London, UK: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Kubey, R. (2003). Why U.S. media education lags behind the rest of English-speaking world. *Television New Media*, 4, 351-370.
- Leavis, F. R., & Thompson, D. (1933).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The training of*

- critical awareness*. London, UK: Chatto & Windus.
- Lemish, D., & Lemish, P. (1997). A much debated consensus: Media literacy in Israel.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urrent perspectives* (pp. 213-228).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Liao, F. (2008). Achievements and difficulties: Ten years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Canadian Social Science*, 4(6), 50-58.
- Livingstone, S. (2004). Media liter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new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7, 3-14.
- (1998). *Making sense of television: The psychology of audience interpretation* (2nd ed.). London, UK: Routledge.
- Luke, C. (1994). Feminist pedagogy and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8(2), 30-47.
- Martens, H. (2010). Evaluat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oncepts, theorie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2, 1-22.
- Masterman, L. (1994). A rationale for media education. In L. Masterman & F. Mariet (Eds.), *Media, education in 1990s Europe* (pp. 5-87). Strasbourg, France: Council of Europe.
- (1985). *Teaching the media*. London, UK: Routledge.
- McChesney, R. W. (1999a). *Rich media, po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politics in dubious times*.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1999b). The new global media. *The Nation*, 269(18), 11-15.
- McClure, C. R. (1996). Network literacy in an electronic society: An educational disconnect? In R. Kubey (Ed.), *Media literacy in an information age* (pp. 403-439).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 Phang, A., & Schaefer, D. J. (2009). Is ignorance bliss? Assessing Singaporean media literacy awarenes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4, 156-172.
- Postman, N. (1992).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New York, NY: Alfred A. Knopf.
-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London, UK: Penguin.
- Potter, W. J. (2004). Argument for the need for a cognitive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8, 266-272.
- Prensky, M. (2011a).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 In M. Bauerlien (Ed.), *The digital divid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Facebook, Google, texting, and the age of social networking* (pp. 3-25). New York, NY: Penguin.
- (2011b). *From digital natives to digital wisdom: Hopeful essays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Thousand Oaks, CA: Corwin.
- Stafford, R. (1992). Redefining creativity: Extended project work in GCSE media studies. In M. Alvarado & O. Boyd-Barrett (Eds.), *Media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pp. 69-77). London, UK: British Film Institute.
- Toepfi, F. (2014). Four facets of critical news literacy in a non-democratic regime: How young Russians navigate their new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 68-82.
- UNESCO. (2013). *Glob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ssessment framework: Country readiness and competences*. Paris, France: Author.
- Webster, J. G., & Ksiazek, T. B. (2012). The dynamics of audience fragmentation: Public attention in an age of digital media.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39-56.
- Williamson, J. (1981). How does girl number twenty understand ideology? *Screen Education*, 40, 80-87.

Media Literacy and Its Teaching Reality: A Sketch of Teaching Media Literacy in Taiwan Based on Instructor Backgrounds

Liu, Hui-We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re there professional threshold standards for those teaching media literacy in Taiwan colleges & universities? Based on a survey of career and academic backgrounds of 72 instructors of the course in the school year 2014-2015, this paper gives a telling picture of the teaching reality. A majority of these instructors do hold Ph.D. degrees, and mostly communication- related, while quite some others are armed with hands-on experiences in media practices. Various bipolar tendencies still persist, however,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s of human resources for teaching the course. The status of media literacy therefore remains ambivalent in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Keywords: teaching reality, professional threshold standards, media literacy,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 Email: huiwen@nccu.edu.tw

Received: 2015.02.13

Accepted: 2015.04.10

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臺灣傳播博士謀職歷程： 行動者的經驗述說

劉忠博^{*}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摘要

過往探討博士就業問題時，鮮少針對正值就讀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生。求學與求職密切相關，博士在求學時即面臨環境變化的挑戰，探討此階段亦可替博士就業尋求解方。本文從行動者角度出發，建議博士班應幫助學生發展適應環境的能力，並提供跨國／境的招聘資訊。對已畢業的博士來說，政府應正視「學術勞動的臨時工化」，並改善其勞動條件。

關鍵詞：博士就業、學術型工作者、學術勞動的臨時工化

* 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年2月14日
接受日期：2015年5月11日

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未來數千年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作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為凡事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Gerth & Mills, 1946／羅久蓉譯，1991：139；粗體字為筆者所加）

壹、前言：高等教育系統轉變下的博士教育

韋伯（Max Weber）曾在距今將近一百年前的一場聞名傳世的演講〈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以下簡稱〈志業〉）中，分析了學術工作的精神，以此為據批判大學教師試圖扮演先知，以及強藉課堂之便灌輸一己價值的錯誤。他認為，從培養博士開始，獨立思考與方法論的訓練並非一朝一夕即可速成，博士養成掙得學位證書後，著手尋覓教職之過程不啻艱辛，若有幸成為學院一份子，又須兼顧教學與研究，顧此失彼絕非上策。因此，學術工作本屬特殊，再加上難以處理的學術政治，韋伯就說「當年輕學者要我對他們進入大學教書時作些建議時，我幾乎沒辦法負起鼓勵之責」（Gerth & Mills, 1946／羅久蓉譯，1991：138）。

韋伯的觀點可分為從事「學術工作本身」與「學術工作的環境條件」兩個層次來解讀：前者著重學術志業之精神，後者則分析有志從事學術志業的研究生究係處於何種處境。在〈志業〉一文韋伯花費較多篇幅處理前者，對於處境問題則言簡意賅，儘管如此仍屬分析入理。

場景若是搬到今日，同樣有年輕學子希望師長能替未來從事教職提供些許建議，師長們會否樂於提供更多有關後者（環境）的理由呢？

環境的轉變讓韋伯百餘年前的問題——有志從事學術的研究生，目前係處於何種處境——重新浮上檯面。從 1990 年代的大學擴張至當前的退場議題，臺灣高等教育系統瞬息驟變，鑲嵌其中的博士就業問題也隨之浮上檯面。

根據林柏儀（2007）的研究，高教系統的擴張也反映在各類學生人數的增加，亦即除了大學生外，碩博士生的就學人數也相應成長：自民國 85 學年度開始，研究生人數的成長速度便已高於大學生，而在部分研究型大學裡，研究生占學生總數已近一半。博士生人數亦有增加：96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畢業的博士人數就從 3,140 增加為至 4,241¹，6 個學年度平均每年畢業已超過 3,700 人，就業市場能否吸納這些博士仍是未知。

1 參見教育部統計網址 <https://stats.moe.gov.tw/result.aspx?qno=MQA2AA2>。

而據報載，教育部長吳思華 2014 年 11 月底在「全國大學研發主管會議」中指出，國內大學每年釋出約僅 800 名職缺，但畢業博士人數已逾 4,000 名，其中約有 3,500 人尋覓教職，加上海外歸國博士人數約 300 名，每年就有近 3,800 名博士應徵這 800 個職缺。因此吳思華說，「國內每年至少三千名博士畢業生找不到學術工作」（劉嘉韻、蔡永彬、許敏溶，2014 年 11 月 26 日）。

事實上，博士生人數過剩與就業的問題並非臺灣獨有，歐美亦復可見。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以下簡稱 NSF）2011 年之報告顯示（Fiegner, 2011），整體而言，在美國獲頒博士學位者從 2000 年的 41,372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8,069 人。此外，「世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會員國在 1998 至 2008 年間培養的博士人數每年增加 40%（每年約 3 萬 4,000 名）（The Group of Eight, 2013）。

尤有甚者，發展中國家培養的博士人數亦是驚人：印度預計在 2020 年將有 2 萬名博士誕生，而馬來西亞則在 2023 年計畫產出 6 萬名博士。中國大陸 2008 年生產的博士總數就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多國家，隔年（2009）的一年新科博士人數超過 5 萬（Cyranoski, Gilbert, Ledford, Nayar, & Yahia, 2011; The Group of Eight, 2013）。

博士人數的增加雖有助於整體知識的進展，但也引發諸多問題值得關注。如在美國，據 NSF (2012) 指出，在 2011 年畢業的約 49,000 名新科博士中有 65.5% 找到工作（含學術與非學術工作）或即將進行博士後研究；對照 2006 年的 71.6% 已下滑 6.1 個百分點。若聚焦於人文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則比例分別下滑 9.7% 與 4.8%（見表 1；另參考 Jaschik, 2013）。

再看日本，該國 2010 年生產了 1,350 名自然科學領域博士，只有約 55%（746 名）畢業時找到全職工作，此中又只有 162 人留在學術界工作，比例僅一成二。

學門	2006	2011	增減百分比
生命科學	71.7%	62.5%	-9.2%
物理學	72.8%	69.3%	-3.5%
社會科學	74.3%	69.5%	-4.8%
工程學	66.0%	64.0%	-2.0%
教育學	74.9%	68.1%	-6.8%
人文學	66.7%	57.0%	-9.7%

表 1：美國新科博士找到工作的比例比較（2006 與 2011 年）

資料來源：修改自 Jaschik (2013)。

日本政府雖曾企圖引介博士至企業工作，企業卻偏好雇用並培養大學剛畢業的年輕工作者，政策效果有限 (Cyranoski et al., 2011)。

總而言之，博士就業問題在許多國家都已浮現。而面臨此種情勢，對目前仍在學的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生來說，未來該如何選擇職涯？

臺灣過往雖曾針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探討博士就業問題 (蔡瑞明，2010；劉曉芬，2014；謝國雄，2010)，卻少關注人文社會領域在學博士生的職涯發展，但其處境特殊值得拋磚引玉引發討論。相較於理工或自然科學領域的博士教育，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從養成到求職間的投入時間與成本較高，即使目前各界均已設法從制度面革新著手引介博士至企業 (如博士教育課程改革或教育部的產學合作之說，詳後)，但似緩不濟急而難以立竿見影。

繼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博士生在相對較長時間的求學過程中，常面臨外在環境劇烈變化，乃至於影響未來發展 (或就業) 的可能性也大。換言之，彼時踏進學院時的就業條件，很可能因為此時畢業後環境已然驟變而產生重大差異。這種源自相對長時間性而產生的社會環境差別，很大程度會影響這批博士 (生) 的未來考量與規劃。

從以下數字即可窺見這批博士 (生) 的生涯選擇明顯變化：以美國為例，人文學博士生完成學業／拿到博士的比例約僅三成一，也就是約六成七的博士生選擇輟學或放棄學業，高過一般平均之 50% 左右 (Cassuto, 2013)。尤有甚者，如表 1 所示，人文學新科博士畢業即找到工作的比例 (無論學術或非學術職)，不僅以 2011 年為最低 (57%)，2006 年至 2011 年間的下滑比例也最高 (9.7%)。

在畢業人數下降、輟學率高，以及就業困難狀態下，這批在學博士生即使順利完成學業仍未必保證就業，若是放棄學業也不知可另謀何種高就，進退之間著實兩難，因此更有必要討論目前人文社會領域的博士 (生) 如何在環境劇變條件下尋求教職／工作。

底下第貳節文獻探討，將處理目前歐美與臺灣如何面對博士就業問題，試圖在現行解決方案中歸納論述背後的預設。立基於此，第參節將續從作者個人生命經歷 (即行動者角度) 著手，企圖從過往經歷提煉某些有用方案，藉此補足當前討論的缺漏。第肆節是結論，除替博士就業提出些許建議外，也就當前環境變化提出反思。

貳、文獻探討：博士的就業出路

針對如何解決博士就業問題，謝國雄 (2010) 探討社會學領域的相關議題時

曾歸納兩種觀點／立場：第一種是從供給面著手，主張減少招生員額、跨校聯合訓練以此減少博士的產出數量，進而解決博士過多而教職過少的失衡。立場二則提議擴大（社會學博士的）需求，如開發產學合作的中介課程、設立社會學的創業育成中心等，期待發揮擴散效果藉此讓博士生能學以致用，藉此對其他非學術領域或也有所貢獻。

我們可繼續深化、提煉上述謝國雄的看法，如觀點一是以供需法則為問題意識，出發點在於學術界目前並無足夠教職可容納新科博士（即需求問題），解決之道只能減少供給，建議從招生著手降低博士生入學進而達到管控員額的目的。

這種看法雖能馬上達到生員減少的目的，但如蔡瑞明（2010：43-44）所言：「一位剛進博士班進修的學生……可能需要6～7年才能畢業，若再加上兩年的博士後研究，真正的就業問題已經是十年後的事情了，……思考博士班定位的問題，不宜以當下的勞動市場的供需原則來制定教育政策」，但其更根本問題或許是供需法則無法解決「博士或社會學博士所為何來」這類基本問題（謝國雄，2010：48）。研究者普遍認識到供需法則的視野過於簡化，因此多轉向從第二種觀點／立場思索問題。

第二種觀點是以多元出路為問題意識，希望博士生就學過程中就能認識學術教職並非未來唯一出路，因而在博士生教育課程內除保有傳統紮實的學術訓練外，還規劃產學合作課程以能及早接觸學界外工作以利後續就業；在此種觀點下，博士教育課程也應隨之改革。其實，這種立場在世界各國早已展開了不同實作版本，值得介紹。

一、產學博士與調變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的培養

首先，大學業已側重不同類型的博士學位如「產學博士」（Industrial Ph.D.s），這種學位並非全新事物而可視之大學與私人企業間的緊密合作。

如丹麥政府即曾設計一套產學博士制度用以建構「博士生／大學：企業：科學、技術暨創新局（Danish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以下簡稱「創新局」）」三方間的合作。申請者須替自己的研究計畫先行找到指導教授與願意雇用的企業，並由企業方向「創新局」申請補助，而「創新局」在通過申請後會向博士生所在大學支付全額學費，每月另補貼2,700元美金的薪水給公司（約為工資的30%～50%）；一般來說，學業歷時3年（Layton, 2013）²。

2 另參考丹麥創新局網站 <http://ufm.dk/en/research-and-innovation/funding-programmes-for-research-and-innovation/find-danish-funding-programmes/programmes-managed-by-innovation-fund-denmark/industrial-phd>。

法國亦有類似計畫，名為「與產業簽訂的研究訓練協議」（Industrial Agreements for Training through Research）。根據該協議，企業雇用博士候選人（Ph.D. candidates）時可獲得來自「國家研究暨技術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的3年補助（Ori, 2013）。

除了國家提供誘因吸引產業雇用博士（生）外，亦有從課程內容改革著手，研擬訓練博士生的跨學科／學界能力並加速畢業時程以因應時局。如英國政府曾於2002年委託一份研究報告（Robert, 2002），指出雖然1995至2000年間研究生人數不斷攀升，但符合企業所需能力之人才卻愈顯不足，該報告因而建議英國的研究協會（如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簡稱HEFCE與Research Councils UK，簡稱RCUK）施以補助計畫協助博士生學習這類能力。

這份報告雖係針對科學或理工領域博士生，但其建議也被人文與社會科學採納，尤其鼓勵博士生發展跨學科／學界的能力部分，爾後英國政府便以補助之名施以改革博士教育之實。

Humphrey, Marshall, & Leonardo (2012: 49-50) 歸納英國博士生教育的改革有以下3項發展：（一）制定《高等教育品質保證局制定的研究學位實踐守則》（Code of Practice for Research Degrees by the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以下簡稱《實踐守則》），針對全英國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如大學、學院）制定教學指南；與此同時，獨立機構「品質保證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簡稱QAA）可以評估各大學與學院的教學是否符合《實踐守則》。針對研究學位學程（research degree programmes）而言，這份守則也制定相關最低標準以確保學校能維持學生的教學品質。

QAA 雖為獨立機關，其評估結果未具有強制效力卻可作為日後政府或經費補助機構的參考（另參考楊瑩，2013），因此接受補助的各大學／學院亦須回應其評估業務。

（二）監督計劃的擬定。針對施以補助的研究協會也發展了相關監督計劃，如接受補助的學院及其博士生要在得到獎學金後4年內畢業。如英國「經濟暨社會研究協會」（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ESRC）便曾制定相關規定，要求接受ESRC獎學金補助的博士候選人須在4年內提交論文。

就歷年成長來看，ESRC在1980年代早期的博士論文提交率低於30%，現在已近八成。「藝術暨人文研究協會」（The 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也依樣畫葫蘆，用類似作法規定接受補助的博士生；2009年時，博士論文的提交率也已達七成（Humphrey et al., 2012）。

(三) 針對博士生教育的發展在於培養其「調變能力」(transferable skills)，而此種能力的訓練則是前述 2002 年《邁向成功的建制》的結論。這項能力被劃分為 7 類：研究技能、研究環境、研究管理、個人效率、溝通技巧、網絡暨團隊合作、生涯管理，其中調變能力甚至被 QAA 評定為合格博士的標準。例如，QAA 在描述「博士資格要素」(doctoral qualification descriptors)中指出 (QAA, 2011: 32) (括號內文字出自本文)：

(博士要具備) 就業所需的各項素質及調變能力，這需要個人在複雜與未知的情境之中、在專業性或類似的環境之中，展現個人的責任感與極為積極的主動性。

從開始踏進博士班開始(如與指導教授簽定學習協議)，到每年針對其學習進程進行評估，以上這 3 種發展都鑲嵌在博士生的養成各個環節。英國各類研究協會也據此評估那些接受補助的大學是否如實地培養博士生，甚至訂出 4 年畢業的期限，藉以縮短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讀時間。

二、「學術型工作者」(Alternative Academics)

另一方面，一份由美國學術傳播研究院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Institute，以下簡稱 SCI) 主持並於 2013 年發表的研究 (Rogers, 2013) 提供了與前全然不同的改革途徑。相對於力推產學間的合作，這份研究提供的改革途徑乃從「非學術職博士」的當下工作與就業環境思索理應具備的能力內涵，並以此為基礎開展博士教育的課程改革。換句話說，該研究從非學院就職者身上提取經驗，藉此回頭省思既有課程內容的不足繼而推動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研究針對當前具有博士學位然而任職工作卻非學院的「長聘制」(tenure-track) 人士，定義其為「學術型工作者」(Rogers, 2013: 3)：

界定為此種類型的人，傾向用學術訓練的視角看待他們當前的工作，並將學術方法整合其中藉以完成工作。他們參與工作時會帶有知識上的好奇心……，並會運用某些類似學術訓練的能力諸如密集閱讀、歷史性的調查或論證式的書寫來應付手邊之任務。

簡言之，這些工作者多半為圖書館員、博物館員、檔案館員，雖非學院教授，但會憑藉學院內所受訓練來解決工作難題。

此外，這份研究除了調查學術型工作者（人數為 773 人）並請教他們應具備何種能力才能應付職場所需外，也詢問雇主（73 人）雇用這類博士時之必備能力。底下，我們可歸納該研究的 3 項發現：

（一）這些工作者在回想過去擔任研究生時，針對學術及就業環境等議題提及學院並沒有提供足夠資訊；（二）學術型工作者與雇主雙方都認為團隊合作、計劃管理、技術能力是他們得以就任非學術職務的重要能力；但在此同時，他們多回答，當前學術系統的課程之計劃管理與團隊合作訓練最少；（三）雇主認為研究能力（research skills）非常重要的比例達六成七，而令人訝異的是，學術型工作者卻覺得該能力重要者僅占四成九。可能的解釋是，工作者有時並不認為某些活動可視為「研究」（如決策制定的過程），如此會使他們低估自己能替雇主帶來的可能助益。

總結來說，學術型工作者的概念及其群體的出現，反映了對線性學術職涯之反思 (Murray, 2014)；傳統上，念博士班、畢業、找教職乃至升等這種線性路徑是研究生認為理所當然、為所應為之事，然而現實條件已讓這種路徑愈來愈窒礙難行，對於教職崗位只能期待有朝一日得以實現；前述研究便發現 (Rogers, 2014: 8)，這些工作者即使已有現職，仍有七成四的人將來還是想回歸學院教授職位。

三、改革之背景

丹麥的「產學博士」、英國的「調變能力」培養以及美國「學術型工作者」等就業替代途徑，儘管這些作法有助於思考博士班的課程改革，但這些國家的改革各有其目的性，反思他山之石或有助於臺灣高等教育之改革。

丹麥政府建構的產學博士是由「創新局」主導，旨在替產業帶來更多專利與利潤。該局曾於 2011 年和 2013 年評估這項補助計畫，發現 270 家雇用這類產學博士（總共 430 名）的企業，較那些沒有參與這項計劃的企業多了兩倍專利申請數量，毛利也隨之增加 (Layton, 2013)。英國的研究報類似，亦直指培養博士的能力有助於推展知識經濟 (Robert, 2002)。至於美國「學術型工作者」概念的出現，表面而言是為了解決人文學博士的就業問題，也列出計劃管理、團隊合作與溝通能力是當前博士生所欠缺者，但誠如 Knisely (2014) 所質疑，這類替代路徑究竟是替教育體制創造出改革的機會？還是僅僅充當補充機制，當前的權力結構無需改變？

反觀臺灣，高等教育擴張後，除了廣設大學（或讓既有學院升格大學）外，各校籌辦碩博士教育也是擴張的一環，如此亦讓博士的數量大舉增加。與此同時，臺灣的高教政策施以「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計劃，其中論文生產數是獲得經費的重要指標之一，於是教授對博士生協助論文生產的需求也就與日俱增（天下雜誌編輯部，2014）。這些政策使得臺灣博士求學與就業問題的原因不同於歐美，若要解決就業困境也不能簡單地從西方移植。就此而言，從理解臺灣博士生就學時的處境著手或許可行，而這也是本文欲從行動者立場來探討問題的動機。

四、從行動者出發

上述「供需法則」或「多元出路」的觀點雖都替當前困境提供了藥方，但對目前在學博士生而言恐仍緩不濟急，乃因無論第一或第二種觀點都涉及了制度面的調控：第一種觀點波及各校博士班生員名額，茲事體大，增加或減少都易引起爭議；第二種觀點則與博士班課程內容革新有關，即便順利改革，多半仍僅針對新生，能否溯及所有在學者（甚至修業年限過半者）都是未知。

由是觀之，這些作為都牽涉了制度面，欲使其調整恐非一朝一夕，何況對在學博士生的參考價值實則有限。尤有甚者，「多元出路」雖比「供需法則」更能關照博士班教育的課程改革，亦即它確認了博士求學與就業間具有關連性，但前述研究多以目前已就業者立場出發來面對博士求學時的課程如何改革，卻忽略了博士在求學階段即已面臨環境變化帶來的問題，而觀察求學階段的變化亦可替博士就業的問題找出病根。就此而言，本文以下擬提供第三種思考觀點／面向，即筆者求學與求職時的經歷，希冀補充「多元出路」觀點之不足。

本文作者目前任職於中國大陸某大學，從博士養成教育開始直到畢業、求職、任職等歷程正是臺灣博士就業的轉變時刻（2006 至 2013 年），可由以下幾個側面研判轉變的發生：

首先，根據臺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以下簡稱高教工會）的資料，2003 至 2012 年期間，高中職、國中、小學階段的生師比皆逐年下降，高等教育反倒逆勢上揚（高教工會，2014 年 11 月 11 日）。生師比上升的解方理應採增聘教師處理，卻有大學以解聘而非增聘專任教師來面對教學問題（戴伯芬，2012）。無論如何，在生師比與博士畢業生皆逐年上升的情形下，若如吳思華所言，高校每年僅能釋出約 800 名職缺，那麼可想而知，現今博士就業競爭激烈程度早已更勝過往。

其次，2013 年拿到博士學位時，筆者就讀的博士班修訂了〈博士班修業規定〉，關鍵之處係制定博士生所應具備的核心能力，包括「著作出版」、「國際

移動」與「社群參與」，並依這 3 項考核學生的發表、外語以及相關教學或實作能力。該規定也設計一套辦法用以加速研究生適應博士教育與縮短畢業年限，或可理解為培養博士的教學單位面臨環境變化的因應。

從以上可知，此時（2013）的高等教育系統，早已非筆者初入博士班彼時（2006）之樣貌，而筆者的求學與求職行動即鑲嵌在此轉變的過程之中，前述供給法則與多元出路觀點都難以補捉此一動態的面貌。然而，筆者目前雖任職於中國大陸高校，並非表示以下敘述的自身經驗即為後繼者，特別是有意任職大陸高校者可以效法的對象。相對地，筆者提供自身經驗目的僅係喚起重視博士教育培養的歷程，亦即不僅從「結果端」（如就業率或就業表現）來思考當前的博士處境，博士生在就學階段面臨的問題亦與未來就業密切關連，值得重視。

參、高等教育系統變遷下的博士求學與求職歷程

筆者於 2006 年（95 學年度）入學就讀博士班，當時共有 43 名一般生報考，錄取 5 人，且 5 人皆來就讀。但以去年（2014 年；103 學年度）為例，報考人數驟減至 15 人，最後錄取 3 人而實際報到僅 2 人。這或許是大環境變化影響了學生報考的意願，然而環境衝擊的不僅是新生入學，即便目前已就讀的博士生亦不免捲入其中。

一、就業市場需求專業的快速變化

筆者博士班的必修課程中有一門名為「學術志業導論」，剛入學時師長都會安排學有專精人士蒞課演講，講題內容不外乎「好的學問為何」、「研究如何進行」等議題。隨後幾年，演講內容逐漸演變為如何在當前學術環境生存以及學術發表的重要性，議題已圍繞在就業、工作而漸與「學術志業」脫離。

提早認識就業環境並非壞事，然而在求學過程中，環境也同時在變，這使得我們對於未來更充滿不確性。例如，從高教系統對師資的專業需求可知，在知識與實作上皆轉向新媒體領域，而如大數據新聞、動畫製作等實務操作更是熱門。無論知識或實作，新媒體在筆者剛入學時雖已興起，但那時還容許知識的「眾聲喧嘩」，但畢業後的就業市場卻反映另一種面貌。

筆者觀察該博士班近 5 年來（2009 ~ 2013）畢業／肄業者共 19 名，從事學院專任教職者 15 名，非學院教職者 3 名。而在 15 名教職者中，14 人任職私校（有 3 人是科技大學），僅有 1 人任職於公立大學。由此觀之，從事教職仍占多數，

且若寄望能朝教職發展，私校（或科技大學）之可行性較高甚至是唯一選項。然而這些學校對於師資的要求，新媒體的素養實係必備專業。而在實務上，若能兼具數據新聞或動畫製作能力似乎更是關鍵。這些能力並非在筆者初讀博士班時就可預見，畢業後在未能掌握情形下就得進入就業市場與他人競爭，應聘勝算自然不大。

另一方面，若進一步檢視這 15 名從事教職者，不乏曾先擔任「博士後研究」才找到專任教職者、或待業一段時間者、或目前仍任兼任教職者。換言之，從博士身分轉變成專任教師可能存在身分轉換的過渡期，而這個階段的長短與否端視個人狀況與當年度的教職開缺，並無明確答案。

以上簡單調查結果與陳東升、陳也禎（2010）、戴伯芬（2012）等人的研究實有若合符節之處。前者曾經探究臺灣社會學領域的就業狀況，發現本土社會學博士任職於私校多於公立學校。戴伯芬則發現臺灣高校專任教師職缺日益稀少，但兼任教師的需求卻迅速增加：自 2001 年 27,111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4,215 人，成長率約六成四。同一時期之專任教師數量僅增加 8,107 人，成長率僅約二成（戴伯芬，2012；另參考監察院，2012），使得臨時而非長聘性質的工作逐漸成為高教系統的需求主力。由於欠缺就業市場所需能力，這種臨時性兼任職位很自然成為博士就業出路的必要選項。

二、兼任／臨時教師作為可見的未來

由於近五年來筆者所唸博士班的畢業生有九成以上擔任私校專任教職（包括私立大學及科技大學），但即使專任教職，其職也不見得穩固。根據戴伯芬（2012）顯示，自 2008 年後的四年內私校專任教師就少了 1,177 人，占私校專任教師總數 4.6%，同一時間兼任教師與專案教師的數量卻增加。如此看來，私校逐漸以這種臨時性職位來填補專任的教學需求，而對筆者來說，在專任日益減少下，求職於兼任或專案教師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加。

不過，這類臨時性師資的勞動條件著實堪慮。據監察院（2012：11），這些兼任教師：

大多為 45 歲以下之流浪博士，薪資財源來自校務基金自籌經費，工作待遇普遍不佳，且鐘點費多年未調整；又聘期多採一年一聘，工作期程不穩定，且待遇及研究資源遠不及編制內教師，以致需至多校

兼課維持生計；此顯示剛取得博士學位之年輕學者無法獲聘正式教職，淪為流浪博士……。

在多間大專院校兼課乃至於成為上述報告所稱之「流浪博士」的說法，在我們就讀博士班的人際網路間早已流傳許久；閒聊時，朋友們也多以自身或好友的親身經歷來說明這種狀態。事實上，「科技人才與研究成果服務平台」2014年曾進行國內博士就業調查，由問卷所答可知博士兼職情況多，也證實博士生畢業後的就業與經濟來源並不穩定（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4）。

此外，《新新聞》雜誌曾於 1393 期專訪一位政大畢業的博士，明白地點出了流浪博士的處境：

從臺南到臺北的四個半小時車程，是徐文路每周教學生活的起點。徐文路教學的第一站是輔大，早上八點多搭車北上時，若有空閒，他還能在車上小憩一會兒，為接下來的教學馬拉松養精蓄銳……。每周三天密集在五間學校、二十一學分的教課結束後，徐文路才回到臺南的家，為緊接而來的下一周做準備。而這樣的日子，他已經過了五年……。（呂苡榕，2013年11月13日）

依教育部規定，目前在大學兼課的鐘點費約為時薪 630 元，而這位接受《新新聞》訪問的博士在 5 間學校兼課 21 學分的每月所得，扣除交通費後約 4 萬。寒暑假期間無任何收入時就得「拚命接案子、接演講，有時候跟朋友調頭寸，或是靠信用卡先過」。至於能否得到家裡的支持，這名博士則說，「這不是家裡幫不幫的問題，而是你都 40 多歲了，敢和家裡拿錢嗎？每個暑假都拿嗎？」（呂苡榕，2013年11月13日）。

這種臨時而非長聘性質的職位若作為未來的職涯出路，代表的不僅是一份不穩定的工作，也會衝擊新生與目前正在就讀的博士生，讓他們對學術職涯心生疑惑甚至望之卻步。以國立臺灣大學 102 學年度招生為例，該校博士生名額約 1 千人，報到人數不足 600 人，註冊率降到五成八，創歷年新低；臺大對此還決定隔年博士班招生改為每年 2 次（胡清暉，2013年11月23日）。而對正在就讀博士班的學生來說，很可能是在充滿就業不確定性下設法完成博士論文，內心沉重的壓力可想而知。尤有甚者，若期待博士畢業後能找到教職繼而償付過去累積的就學貸款甚至達到階級流動者，恐怕失望會更大。

以上所提，尚未論及博士生亦需如同一般教授接受學院評鑑，以及為了生活而汲汲營生。不過，從前的博士生不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前述 SCI 研究述及博士求職本就不易，從過往到現在皆是如此，象牙塔中的競爭誠屬常態。然而該研究也說，今昔之別在於「學術勞動的臨時工化」（casualization of academic labor）（Roger, 2013: 1），意即當前的教職工作從全職轉變為零碎、不穩定與沒保障，速度之快可謂空前。即使擁有一身本領，面臨現實也只能無奈而低頭；博士生的壓力之大很可能源於此。甚或有學者直言，「年輕人與其困守在學術象牙塔，不如及早出去尋職或創業，奮力一搏，以免整个人生都因為讀博士而受到耽誤與影響！」（周祝瑛，2013年11月27日）。

上述這番話實語重心長，筆者雖無能力創業，但對當下環境的現實感同身受。帶著如此壓力完成學業已很難熬，畢業後尋找教職的又是另一個挑戰，只能多方嘗試。

三、抉擇之間：跨境／國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認識到跨境／國的就業可能是從以下機緣開始。有位師長曾經轉寄香港與澳門的求職資訊並告知或可一試。這位師長的經歷遍及歐美，亦曾訪學世界各地，先前擔任其研究助理時即對其全球視野與學術風範深感欽佩，而當其告知有此機會，且可更為開拓地思考學術職涯時自當深信不疑。也因其鼓勵而開始請益具有類似經歷與背景的老師並傾聽意見，所得也是相似答案，即應思索臺灣以外的可能。於是，他們的意見與見解開始鬆動了筆者的原先看法（即先從兼任或臨時性師資開始做起），接著試圖探索其他可能。

時值 2013 年歲末，其時已然畢業，在一次回校聚餐場合談起求職之事竟也取得意外收穫。有些在場人士是中國大陸籍研究生，從他們身上得知目前對岸高校的就業狀況與人才需求條件。這些高校與臺灣及其他各國一樣看重研究發表，尤其要求 CSSCI 或 SSCI 產出³。不過，其時對於大陸高校的待遇與教師要求仍無具體資料可供參考，縱使遍尋網路也難查到，只好再尋人際網絡。

3 CSSCI 全名為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由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開發的引文資料庫，用來檢索中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論文收錄和被引用情況。目前收錄包括法學、管理學、經濟學、歷史學、政治學等在內的 25 大類的 500 多種學術期刊，可參見該資料庫網站的說明 http://cssrac.nju.edu.cn/news_show.asp?Articleid=119。SSCI 全名為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即「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是由 Thomson Reuters 公司開發的引文索引資料庫，目前蒐錄超過 2,600 份期刊，可參見 http://wokinfo.com/products_tools/multidisciplinary/webofscience/ssci/。

就在新舊年遞嬗之際，兩條資訊管道浮現：其一，筆者就讀的學院曾與對岸青年學者簽訂交流協議，在交流過程中累積不少學者的資料，居中牽線的是一名已畢業的博士班學長，透過他而得以聯繫大陸高校教師進而寫信請教。其中一位開宗明義地表示工資不高，善意地提醒謹慎考慮。其二，筆者的碩班同學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已於 2012 年赴對岸任教，而透過臉書（Facebook）請益後也獲得寶貴資訊；除了獲知對岸高校實際運作狀況外，他也建議參考臺灣最大 BBS 站（PTT）的「AfterPhD」版之大量對岸任教相關資訊；這些資訊對於瞭解對岸的高教系統幫助甚大。

值得一提的是，筆者接觸的資訊（特別是與港、澳或中國大陸高校有關）都是由那些具有特殊經歷的人士提供，他們原就具有橫跨不同地域的學習經驗，而在橫跨異地的過程中自然就能連結兩地不同的人事物。前述那位具有全球視野的師長、擁有德國博士學位的同學、居中牽線青年交換學者的學長以及來臺就讀的陸籍博士生都是這種身分。簡言之，這種身分的人士具有豐沛的「橋接型資本」（bridging capital），能讓不同群體之間產生連繫，資訊因而得以在這些群體之中產生流動（參見 Shirky, 2008 / 胡泳、沈滿琳譯，2012）。

總結以上資訊大致可以擬出以下兩種求職方向，各自代表不同類型高校但亦可能相互重疊：

第一，鎖定新興或正在擴張中的新聞傳播學院；第二，針對「985」或「211」等高校嘗試⁴。第一個理由（即新興或擴張中的學院）乃因這類學院往往存在更強烈的人才需求，相較於歷史悠久、體制完備的學院來說成功機會較大；第二個理由（鎖定「985」或「211」等高校）則因這些重點大學的學術資源與經費相對充沛；然而，這類高校往往也競爭者眾，能否順利入職，仍是未定。當然，這兩種選項若能在某高校合而為一，自是首選。

於是，雖然其時猶如千頭萬緒，但機會也可能稍縱即逝，擬訂策略後便試著投遞履歷，臺、港、澳、及中國大陸都曾寄送，最終獲得 4 封回應，均是大陸高校應邀面試，此時已是 2014 年 3 月初的春分時節；約莫同一時間，臺灣的求職資訊也紛紛出爐（包括專案教師及博士後研究），但由於時間緊迫，只能收拾行李出發至中國大陸；這一天是 3 月 24 日。

前往機場的客運上，司機正聽著學生攻占行政院的新聞。

4 「985」是指中國教育部實施之《面向 21 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其政策支持部分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而名稱是以時任領導的江澤民在北京大學 100 周年校慶的講話時間（1998 年 5 月）命名為「985 工程」；目前共有 39 所院校名列其中（參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985%E5%B7%A5%E7%A8%8B>）。「211」的含義是「面向 21 世紀、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目前有 112 所重點高校屬「211」之列（參見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肆、結論：行動者視野下的建議

現行解決方案可歸納為「供需法則」與「多元出路」兩種觀點，但前者的困難昭然若揭，致使討論焦點多改置於博士教育課程的改革。儘管目前研究發現，現下情勢已影響新生入學意願與已畢業者的未來就業，卻仍忽略從求學階段角度出發亦可替博士課程的改革提供建議。就此而言，本文採行動者角度，試圖從個人求學與求職歷程中發現問題，藉此補充多元出路觀點之不足。

首先，博士生求學階段面臨的問題多出自就業市場所需專業的快速變遷，致使「當前」所學無法應付「將來」所需。筆者在博士生階段所學的新聞／傳播學知識受到外在環境影響更深，尤以傳播技術的變化日新月異，求學階段培養的知識與實作很可能在畢業階段就已過時。尤有甚者，本土博士畢業後多以私校為任職目標，而私校又對時下熱門的知識以及針對具備實務經驗的人才多有需求，沒有相關背景者應聘之勝算更小。

其次，當前博士就業路徑已朝兼任／臨時性的職位發展。以筆者就讀的博士班為例，這種臨時性的職位已然成為博士畢業生的過渡階段，也就是填補從畢業到專任教職間的落差。然而以前文引述的各項報導及調查來看，在此過渡階段中的新科博士除了每日奔波於各校兼課外，還得在寒暑假另找兼職，經濟狀況多不穩定。

再者，若我們將跨境／國就業視為可能，那麼當前這類就業資訊在博士班的流通仍然太少。筆者多依人際關係得知此種就業資訊，而這也與前述 SCI 的調查符合：人文社會領域的學院很少運用正式管道或安排相關課程內容，讓研究生理解當前的高等教育系統與就業條件。總結以上問題，筆者提出以下 3 項建議與一項反思。

一、重新定位博士教育

一般而言，各校培養博士生時多會賦予一定學業年限，經過諸項考核即可完成博士學位，此即傳統對於完成博士教育的認知。然而由於環境變遷快速且人文社會科學的博士生修業時間頗長，畢業後的環境已然與剛踏入博士班時天差地別，即使擁有博士學位也不見得能立即找到專任教職。

就此而言，筆者並非倡議，學生念博士班時需以時下最新、最流行的知識與實作為依歸。相對地，與英國培養學生的「調變能力」類似，我們需要的是適應當下環境的訓練。簡言之，透過這種訓練而加強的不僅是博士生專業的知識，也

是培養將專業知識應用於當下環境的能力，如何從自己所學的專業展開並整合時下熱門議題應是關鍵。

這種訓練必須兼顧專業知識的培養與適應環境的能力，而這種兩能力的養成又須建立在與不同社群互動的基礎上：直言之，過往博士教育側重專業知識的訓練，旨在培養學生對知識的興趣以及作學問的紮實功夫；套用謝國雄（2010：49）所言，即進行「有系統的、嚴謹的、踏實的與深入的訓練」。

然而，博士生沉浸在知識中的學習對象為師長和同儕，藉由他們的助力，儘管專業知識的累積較快，但社群同質性也高，面臨環境變遷問題時的解決策略很可能相似。研究社會網絡的學者對此名之為「回音室效應」（echo chamber situation），意指資訊或想法在封閉圈子中不斷加強，導致新的解決之道無法出現（參考 Pentland, 2014 / 汪小帆、汪容譯，2015：28-38）；若要培養適應環境的能力，恐得從增加博士生與其他社群的互動著手。

此即第二種能力的培養（即適應環境），指博士生應以與不同社群互動為目的，對象可以是產業界或非營利組織人士。就此而言，博士班的定位或角色已非教育的提供者也是媒合者，即視自身為「平台」從而搭建與不同人士的互動甚至媒合研究計劃的合作，並由博士生獨當一面地進行研究計畫。藉由實際執行計畫或與產業合作即可發展其研究管理、執行效率、溝通技巧、團隊合作等的「調變能力」。

二、政府應正視過渡階段的保障

如前所述，博士從畢業至獲得專任教職間存在著過渡階段，專案教師或兼任教師是這個階段的表徵，後果就是產生一批為了教學任務而大量授課且經濟狀況亦不穩定的「吉普賽教師」，連帶影響了教師本身的教學品質與學生的受教權。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高等教育的師資係交由市場去調節人力。或如陳政亮、林敏聰（2012）所言，這是「高教市場化」的後果，政府應以公共力量介入，確保博士在此過渡階段中的勞動權。如陳政亮等人提議的兼任教師專任化、博士後研究的長期保障都是政府可作為的方向。

三、博士招聘資訊應跨國／境化

以筆者的經驗來看，跨國／境流動之所以可行，是因那些具有「橋接型資本」的人士居中牽線，也就是透過人際關係使然，而非正式管道發布的資訊。相對來

看，這或許反映出當前不管由校方或科技部公告的招聘資訊，都鮮少出現非臺灣的高校者。儘管前述 BBS 站的「AfterPhD 版」已有相關跨國／境外資訊且資訊豐富，然因多為匿名分享，縱使具有參考價值，其正確性都尚待查證。就此而言，校方可扮演媒合橋梁，思考如何引進與把關境外／跨國招聘資訊，甚至與國外學校合作協助來臺辦理招聘會。

不過根據前文討論，歐美國家亦存在博士就業問題，這或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共同面臨的結構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究；即使筆者接獲「橋接型資本」的人士幫忙，所得資訊也不存在歐美國家者。換言之，以臺灣的國際位置而言，博士向外移動的方向即已存在限制，建議可先面向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等國家的招聘資訊。

四、大陸教職作為就業選項的反思

在蒐集大陸就業資訊與請益友人過程中就曾不斷被提醒「學術發表」的重要性，特別是發表在 CSSCI 或 SSCI 的期刊論文尤其受到高校重視，實際到職後也發現確實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許多著名高校的博士班（大陸習慣稱博士點）學生也被要求畢業時多多發表論文，求職過程也愈來愈不順利，畢業後如能進入重點高校任職已然堪稱幸運。已有博士畢業生先擔任「博士後研究」（大陸習稱「博士後流動站」）蹲點一到兩年，利用此時間發表論文或申請研究計畫，爾後出站再擬尋職。這表示若有心於求職於大陸高校的博士仍應注意論文發表誠屬應聘關鍵。此外，跨境／國就業之所以可能還涉及家庭因素，有家室妻小者若想移動並不容易。

最後，對於教育部與大學來說，大陸教職雖可作為其他博士的行動參考，但不宜過度放大此舉之重要性。大陸高校的職缺競爭與日俱增，並且職位數量也會隨著時間而日益稀少，這對目前臺灣仍在求學的人文社會科學博士生來說形勢並非有利。因此，真正的問題還需釐清博士教育與臺灣社會間的關係，特別是博士在養成階段時如何將其專業知識整合至當下環境。過度仰賴以人力輸出來解決國內就業問題，著實不智。

參考書目

天下雜誌編輯部（2014）。〈給碩博生的殘酷真相：學術代工盛行，你的價值在哪？〉，《天下雜誌》。取自 <http://m.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4639#sthash.bOg9MHYP.dpbs>

- 呂苡榕（2013年11月13日）。〈流浪博士教師月入三萬多〉，《新新聞》。
取自 <http://www.new7.com.tw/NewsView.aspx?i=TXT20131113142000CF3>
- 汪小帆、汪容譯（2015）。《智慧社會：大數據與社會物理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原書 Pentland, A. [2014]. *Social physics: How good ideas spread -- The lessons from a new science*. New York, NY: Penguin.）
- 林柏儀（2007）。《求學作為勞動：一個學校教育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祝瑛（2013年11月27日）。〈念博士不如去就業〉，《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1127/35466744/>
- 胡泳、沈滿琳譯（2012）。《人人時代：無組織的力量》。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原書 Shirky, C. [2008].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Penguin.）
- 胡清暉（2013年11月23日）。〈台大博士班1年2招 嚴長壽「很感冒」〉，《中國時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1123000871-260114>
- 高教工會（2014年11月11日）。〈【新聞稿】吳思華，你完全搞錯了——改善生師比因應少子女化，沒有大學老師須被裁撤〉，《苦勞網》。取自 <http://www.cooloud.org.tw/node/80724>
- 陳東升、陳也禎（2010）。〈博士「生」了沒？——台灣社會學教學研究人力的現況與未來變遷的分析〉，《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3）：23-35。
- 陳政亮、林敏聰（2012）。〈關於高教市場化的批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9：269-280。
- 國研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2014）。〈2014年 NPHRST 博士就業調查問卷分析報告〉。取自 <https://hrst.stpi.narl.org.tw/112/leDoc.htm>
- 楊瑩（2013）。〈英國 QAA：從機構審核轉為機構檢視〉，《評鑑雙月刊》，42。取自 <http://epaper.heeact.edu.tw/archive/2013/03/01/5938.aspx>
- 蔡瑞明（2010）。〈思考台灣社會學博士的未來出路〉，《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3）：42-47。
- 監察院（2012）。〈調查報告〉。取自 <http://www.cy.gov.tw/sp.asp?xdurl=/CyBsBox/CyBsR1.asp&ctNode=910>
- 劉嘉韻、蔡永彬、許敏溶（2014年11月26日）。〈6萬博士10年後找嘸教職〉，《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41126/36230070/>

- 劉曉芬 (2014)。〈在浪漫與現實之間——人文社會領域博士就業議題初探〉，《臺灣教育評論月刊》，3 (12)：16-22。
- 羅久蓉譯 (1991)。〈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錢永祥 (編譯)，《學術與政治：韋伯選集 I》，頁 131-167。臺北：遠流。(原書 Gerth, H. H., & Mills, C. W. (Eds.).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戴伯芬 (2012)。〈高教危機中的集體行動：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反思與實踐〉，《台灣教育》，677：2-9。
- 謝國雄 (2010)。〈從社會學博士生的供需到下一代台灣社會學家的訓練〉，《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1 (3)：48-54。
- Cassuto, L. (2013). Ph.D. attrition: How much is too much?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chronicle.com/article/PhD-Attrition-How-Much-Is/140045/>
- Cyranoski, D., Gilbert, N., Ledford, H., Nayar, A., & Yahia, M. (2011). The Ph.D. factory. *Nature*, 472, 276-279.
- Fiegenger, M. K. (2011). Numbers of doctorates awarded in the United States declined in 2010.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nsf.gov/statistics/infbrief/nsf12303/nsf12303.pdf>
- Humphrey, R., Marshall, N., & Leonardo, L. (2012). The impact of research training and research codes of practice on submission of doctoral degrees: An exploratory cohort study.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66, 47-64.
- Jaschik, S. (2013). Skepticism about tenure, MOOCs and the presidency: A survey of provosts. *Inside Higher E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ews/survey/skepticism-about-tenure-moocs-and-presidency-survey-provosts>
- Knisely, L. C. (2014). Alternatives to success: Power, social identity, and alt-academic labor. *MediaCommons*. Retrieved from <http://mediacommons.futureofthebook.org/alt-ac/pieces/alternatives-success-power-social-identity-and-alt-academic-labor>
- Layton, R. (2013). *What the U.S. can learn from Denmark's industrial PhD Program*. Retrieved from <http://www.innovationfiles.org/what-the-u-s-can-learn-from-denmarks-industrial-phd-program/>
- Murray, S. (2014). On the alt-ac jungle gym: Toward a feminist approach. *MediaCommons*. Retrieved from <http://mediacommons.futureofthebook.org/alt-ac/pieces/alt-ac-jungle-gym-toward-feminist-approach>

- NSF. (2012).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11*. Retrieved from <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d/digest/2011/nsf13301.pdf>
- Ori, M. (2013). The rise of industrial PhDs. *University World News*. Retrieved from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131210130327534&query=Doctorate+>
- QAA. (2011). *Doctoral degree characteristics*. Retrieved from http://www.qaa.ac.uk/en/publications/documents/doctoral_characteristics.pdf
- Robert, G. (2002). *SET for success: The supply of people with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kills*. Retrieved from http://webarchive.nationalarchives.gov.uk/+/http://www.hm-treasury.gov.uk/d/robertsreview_introch1.pdf
- Rogers, K. (2013). *Humanities unbound: Supporting careers and scholarship beyond the tenure track*. Retrieved from http://katarogers.com/wp-content/uploads/2013/08/Rogers_SCI_Survey_Report_09AUG13.pdf
- The Group of Eight. (2013). *The changing PhD*. Retrieved from https://go8.edu.au/sites/default/files/docs/the-changing-phd_nal.pd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ransi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Doctorate Employments: An Agency Perspective

Liu, Chung-Po*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Studies on doctorate employments, while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the degree holders, rarely pay attentions to Ph.D. students especiall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nfronted with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s while still in their doctoral study, Ph.D. students must learn to meet the needs of job markets. A good grasp of their job perspectives as students would eventually help solve doctorate employment problems. This paper therefore explores how Ph.D. student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mally experience the long course of doctoral study in Taiwan and whether such experiences and trainings sufficiently prepare them for eventual employments. In contrast to old studies that are mainly structure-oriented, the author explor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gency, significantly based on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conclusion,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Ph.D. programs should help Ph.D. students in a way more directly and efficiently, by providing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ot just limited within Taiwa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eriously the tendency of “casualization of academic labor” and improve job conditions for Ph.D. degree-holders.

Keywords: employment for PhDs, alternative academics, casualization of academic labor

* Email: liupublius@gmail.com

Received: 2015.02.14

Accepted: 2015.05.11

學用落差的論述分析與敘事——《聯合報》、 《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之比較

戴伯芬*

輔仁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摘要

以「學用落差」為題，3家媒體報導方式、內容與意識形態具差異，《聯合報》採內控式報導，傾向附和國家政策；《中國時報》以名人專欄為主，要求國家介入；《蘋果日報》多元互動，持自由主義卻帶反智色彩；「博士賣雞排」中被報導人敘事策略是以名人效應反轉污名。未來應關注媒體競爭中報導，與被報導人關係中的敘事及互動傳播的漣漪效應。

關鍵詞：互動傳播的漣漪效應、名人效應、污名、學用落差

* Email: 034739@mail.fju.edu.tw

投稿日期：2015年2月15日

接受日期：2015年5月11日

壹、導論：「發現」高教問題

高學歷高失業率、學用落差成為臺灣近來關注的社會問題。1995年教育部長吳京開放大學管制，授權大學依校務發展特色，自主規劃系所及調整招生名額，形成一波技職學校升格大學的風潮。在新自由主義的思維下，臺灣高等教育體制的「鬆綁路線」造成當前高等教育擴張的危機，媒體揭露了18分可以上大學引發社會大眾諸多批判（林玉文、段鴻裕，2007年8月10日）。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高學歷的失業問題更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特別是2013年國立政治大學博士生賣雞排事件，引發社會正、反兩面諸多討論，學用落差成為媒體報導高等教育危機的核心話題。所謂的「學用落差」依教育部的定義是「大專畢業生所學無法及時與產業需求接軌」¹，採取功能論的立場，從就業市場需求來探討教育訓練的問題，窄化了教育目標，忽略大學做為博雅教育的使命，也未顧及培養創新人才與公民素養的責任。不過，官方的學用落差說法卻被臺灣各媒體大量使用，成為高等教育危機的核心問題。

過去媒體在臺灣社會議題報導上，經常扮演雙面刃的角色，一方面動燭先機，發掘社會問題引發大眾關注，促成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但是，另外一方面，媒體報導也可能帶有特定立場，傳布不實資訊，傷害被報導人，甚至造成社會恐慌，特別是透過媒體對社會弱勢群體造成的「污名」效果。媒體針對高學歷而低度就業的當事人報導，雖然可以讓大眾意識到學用落差的問題，卻經常損及當事人自尊，甚至令其陷入難堪的處境，多數當事人皆不願意現身說法，雞排博士的現身說法卻是一個引發諸多討論的特殊案例。

本研究以學用落差為主題，探討過去臺灣主要的平面媒體對於高學歷就業問題的相關論述，研究目的有三，一是探討不同的平面媒體如何報導學用落差的危機？如何「問題化」高學歷者的就業問題？其次，分析不同媒體對於國家政策的報導方式與內容的差異，瞭解媒體如何回應教育政策；最後，則從被報導人的立場，探討個人如何回應媒體的報導？是否具有抵抗的可能性？

1 教育部技術及職業教育司，〈教育部縮短學用落差具體作法之說明〉，參考網址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88&Page=23655&wid=560d2ade-378e-4cb6-8cb4-c2ce2b227759>

貳、媒體論述的產製與主體敘事

一、意識型態與媒體論述的產製

媒體做為當代社會論述生產的重要機制，在製造意識型態扮演重要的角色。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阿圖塞 (Althusser, 1969) 將媒體視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一環，用以合法化國家的治理，他將意識型態 (ideology) 定義為實踐與再現的系統，讓個人透過他們與再現所創造的想像世界扣連，建構出個人對於真實生活情境的「誤解」，意識型態的國家機器可經由經濟資本主義的優勢文本成功地植入主流的意識型態。相較於阿圖塞由上而下的權力支配論，葛蘭西 (Gramsci) 則用霸權 (hegemony) 概念說明社會秩序的維繫是來自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協商與妥協之後合意的共識，他檢視有機知識份子的角色，說明社會菁英如何建立領導權，將自身階級利益普世化為自然的標準與共識 (Gramsci, 1971)。

受到兩位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影響，霍爾 (Hall, 1982; Hall, Critcher, Jefferson, Clarke, & Roberts, 1978) 認為媒體的作用是透過議題的設定與問題化現象，從而創造出錯誤的真實，是一場意識型態的鬥爭，錨定於特殊的利益、歷史與聯盟關係之中。他透過製碼與解碼的過程來說明意識型態的傳播過程，一方面是在「複雜的支配結構」，包含社會、經濟、意識型態及技術的考量下決定媒體製造者的訊息產製；另外一方面，解碼是一個鏡象過程，閱聽人經由對於訊息的理解而形成優勢解碼，即傾向於符合主流社會規範的文本意義，但是單一媒體材料具有潛在的開放性，仍會出現對抗解碼、協調解碼，對於文本採取排拒的解讀或依個人感受而調整後的解讀 (Hall, 1980)。

霍爾的理論開啟了閱聽人的主動性，雖然他以電視媒介為分析，仍可以應用於平面媒體的分析。由於媒體技術變遷的趨勢，平面媒體產製訊息的方式也發生改變，包含透過電子網絡化與閱聽人形成互動，納入閱聽人可能的反應，以及與不同電視新聞臺做結合，提供跨媒體的影像資訊。但是在霍爾的模型中有兩個面向未被充分討論，一是不同媒體代理人可能基於自身的政治態度、價值偏好而形成不同的論述，呈現符合自身利益的報導，同時媒體報導也是具有回應外在輿情、自我修正的製碼過程，特別是針對單一事件進行連續性的報導過程中，必須在媒體高度競爭適度調整、回應大眾閱聽人看法；二是缺乏被報導人的角色，特別是在個案式的報導當中，報導人在訊息產製過程中會扮演一定的角色，包含他們是否願意現身、用什麼樣的角色現身，報導記者與被報導人之間的社會關係與採訪過程的協商，不但會影響到報導品質，也影響到媒體報導的角度。不過，大多數的媒體研究聚焦於閱聽人分析，較少關注被報導人敘事的角色。

媒體研究同時關注論述 (discourse) 的形成與主體敘事的可能性。《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將論述定義為：「兩個人或更多人在特定的網絡中，用以支配話語的語言規則和慣例之互動」(O'Sullivan, Hartley, Saunders, Montgomery, & Fiske, 1994: 92)。受到傅柯的啟迪，論述是在特定意義中被再現的規則系統，與權力息息相關，透過建立論述／權力的參照關係，可以瞭解不同的媒體如何利用語言來表意，傳達隱而不顯的價值觀，同時也可以理解被報導人如何回應媒體的報導。在臺灣，由於媒體代理人本身政治立場的差異，往往影響到報導題材的選定以及詮釋報導的差異，針對具有政策意涵的社會議題，平面媒體在論述的產製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此，解構論述成為瞭解公共議題與政策辯論的重要切入點。

相對地，敘事指的是：「引導故事組織的安排、策略與慣例」(O'sullivan et al., 1994: 194-195)。敘事在媒體中則被視為決定非虛構故事的特性，決定了故事的結構、順序及成分。晚近敘事被廣泛運用到個人日常生活分析，自傳式的敘事可能創造出個人新的認同與行動。敘事主體為多樣、具有不同策略的主體，呈現多變而不一致的「論述」，透過重述生命中的事件與經歷，偶爾也活出另外一種生命價值 (Andrews, Sclater, Squire, & Tamboukou, 2004)。平面媒體的報導人與被報導人做為敘事的主體，在訪談互動中形成兩種不同的敘事效果，一方面報導人具有主動的敘事權，可以決定如何敘事、說什麼故事，透過報導製造出大眾對於特定團體的印象，甚至製造出污名效果；但是另外一方面，被報導人也具有主動敘事的潛力，決定是否現身說故事、如何說自己的故事。不過，過去媒體報導過程中有關被報導人的敘事在平面媒體報導的不對等權力中往往是隱晦不明的，因而常常被忽略。然而隨著媒體互動性的增加，被報導人逐漸轉為媒體產製過程的參與者，為媒體研究尚待關注的議題。

二、主體敘事：污名 V.S. 名人效應

過去有關大眾媒體對於特定議題與對象的報導，有兩種分析的理論視角，一是利用「污名」(stigma) 概念來進行特定團體的分析；二是探討媒體帶來的所謂「名人效應」。

自高夫曼 (Goffman, 1963) 的《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一書出版以來，污名可以說是近年人文社會學界最被廣為引用的概念之一，影響力擴及人類學、公共衛生、行政、醫學以及傳播學等跨領域的不同學門。污名起源於希臘人設計的身體標記，突顯特定對象的道德狀態異於尋常，指涉像愛滋病患、同性戀、犯罪、酗酒、娼妓、身心障礙者、精神病患、遊民……等等不同社會群體，對

被污名的團體有強大貶抑效應，更損及他們參與公平的競爭機會。不過，高夫曼也注意到在精神病院中的人會透過花招與詭計來維持尊嚴與身分認同 (Goffman, 1968)，這些日常生活的反叛雖然不具顛覆主流意識型態的效果，但是卻能憑個人機巧來達成日常生活抵抗的表現。臺灣的經驗研究也發現臺灣的媒體會污名化弱勢團體，揭露對於他者的再現形式是批判媒體工作者必要的回應策略 (倪炎元, 1999)。

文化研究學者認為媒體報導可能會對特定群體形成再現的迷思，特別關注族群與女性的議題。如康姆佩爾 (Campbell, 1995) 對於美國黑人的報導研究，指出了再現族群的 3 種迷思，包含邊際迷思、差異迷思，以及同化的迷思，說明主流社會對於黑人的印象從視而不見，轉向黑奴與野蠻人正、負面特質並存的他者形象，而晚近則轉向支持黑白種族機會平等的美國文化大熔爐迷思。女性主義者對於媒體也提出 4 種類型的女性迷思，包含：女性的神祕善變性、女職天性、女性情慾自主，以及理想女體的迷思 (MacDonald, 1995)。對於特定群體報導所形成的再現迷思受到主流社會意識型態的影響，也隨著社會變遷而改變。因應社會民主化，媒體的訊息產製已經從國家控制移向開放，不同媒體生產組織可能基於政治立場有別，採取的報導方式與角度因而有不同，形成多元的報導與分析視角。因此，如果能夠積極透過弱勢團體的培力，利用媒體發聲可能達到去污名化的效果 (管中祥, 2011)。

另外一個分析取徑來自媒體商品化所形成的名人效應 (celebrity effect)。以戴安娜王妃為例，哈特利 (Hartley, 1996) 說明支持戴妃的影像建構，與政治文化意識型態、商品消費利益息息相關，一方面透過媒體不斷再現皇室家族而獲得君主政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則是在商業利益中透過消費而被創造與操控。馬歇爾 (Marshall, 1997) 認為名人的地位在本質上呈現出一種弔詭性，戴妃是屬於人民共同建構的，成為我們群體當中的成員。大衛 (Davies, 1999) 進一步說明她的形象是透過媒體與媒體文本互動的一般公眾論述所再現或建構的，並形成大眾對於她的個人認知與情感投入。德西達 (Derrida, 1981) 用「文本交互性」(intertextuality) 來稱呼文本之間的連結與互賴意義的積累，是一種不斷重複、改寫而最後深植人心的敘事。相較於對於「他者」的污名與戴妃的名人效應，有關博士就業的窘境是透過一連串的報導，形成社會大眾對於學用落差的印象，並依個人的立場與地位投射了不同的思考與想像，造成社會對於學用落差的觀點與看法。

參、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同時採取論述分析與敘事兩種方法，來掌握學用落差議題過程中不同媒體的論述，以及被報導個案的敘事。一方面透過分析不同媒體之間意識型態差異的比較，突顯高等教育問題的複雜多元價值，目的在解構媒體論述背後隱含的權力關係；另外一方面則從閱聽人轉而研究被報導人的角色，探索媒體產製過程中報導人與被報導人在報導中的敘事策略，目的在探索被報導人參與媒體產制的可能性。在論述分析方面，本研究採取論述批判分析方法（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此方法源於 1990 年代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學術社群，希望藉由對於符號資料的系統性調查，達到意識形態與權力解祕的作用。受到傅柯影響，論述被定義為一種社會實踐，「隱含著特定論述事件和情境制度、社會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此框架形塑論述，但同時論述也形塑框架」（Fairclough, Mulderrig, & Wodak, 1997: 258）。批判論述分析將語言視為一種權力關係下的社會實踐，在不同取徑下運用不同的理論，而在公共場合和文類中的互文性與再脈絡化競爭論述是關注焦點，目的在促成實踐與應用（Wodak, 2004, 2009）。

應用論述批判分析有助於瞭解媒體如何製造學用落差的論述，但是卻缺乏主體觀點，分析個案報導中的敘事則有助於理解互動式媒體報導過程中新的權力關係。過去的媒體研究著重專業報導者的敘事，檢視報導人如何書寫與報導新聞事件、人物，來塑造大眾的意識形態，甚至對於特定團體造成污名；然而，隨著互動式報導的出現，被報導人不再扮演被動的角色，被報導人參與報導過程，具自我策略的敘事方法可能應對與轉換結構困境，甚至主動反轉污名，透過報導而形成名人效應。

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為《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以及雞排博士宋耿郎的新書《雞排博士教你開一間會賺錢的店》。為了突顯「學用落差」的議題，在操作方面以「博士」、「就業」兩個關鍵字交叉比對，找出相關的報導條目。之所以選擇博士與就業兩個關鍵詞是基於以下兩個理由，首先，博士就業問題是學用落差中最常被媒體報導的爭議話題，具有大量人力資本的博士無法適度就業成為臺灣文憑主義社會最大的反諷；其次，由於博士賣雞排個案引發社會大眾對於學用落差議題的高度關注，形成不同的爭議論點，促成大眾有機會反思主流社會的文憑主義價值觀。

《聯合報》、《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是臺灣具有代表性的報紙，《蘋果日報》除了平面報導之外，包含即時影像資訊，可以即時回應網絡社會閱聽群

眾的意見。為了探討高等教育擴張議題，統一各資料庫的期程，以2003年5月1日到2014年11月30日之間收錄的資料為主。利用《聯合報》、《中國時報》以及《蘋果日報》三家報紙的資料庫做為主要的資料來源，選擇這三個資料庫來進行比對，是想瞭解不同類型的平面媒體對於博士就業報導方式與內容的差異，突顯大眾媒體本身隱而不顯的意識型態。《聯合報》的報導來源為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n.d.），資料時間內有893筆原始資料，經過比對之後得到164筆有效條目；《中國時報》報導來源為知識贏家資料庫（知識贏家，n.d.），總計有650筆，經過比對之後有103筆有效條目；《蘋果日報》的來源主要為該報網路版（蘋果日報，n.d.），得到330筆資料，經過實際過濾之後，符合研究主題約有86筆²。

3家報紙收錄報導條目的原則有一些差異，聯合知識庫以記者的深度報導為主，而地方記者的報導定期進行學校或系所的特色介紹，實際上為學校與系所置入性行銷；知識贏家則收錄投書與評論性文章，特別是具有針砭時事及批判政策的意涵；《蘋果日報》具有互動特性，透過深度採訪與自述報導來發掘不同的聲音。由於不同資料庫收錄報導的標準有異，因此不進行量化的次數分配比較，這是本研究的限制。以下先針對三家報紙對於學用落差報導的方式與內容採取內容分析，進行三家媒體的社論與政策回應分析，以突顯不同媒體報導與主要立場的差異；其次，分析三家媒體對於個案報導方式與內容之差異；最後，聚焦到雞排博士宋耿郎個案，探討媒體如何進行報導，並檢視被報導者如何主動回應報導而創造出新的文本。

肆、學用落差報導與回應的比較

一、學用落差問題的製造

《聯合報》以願景工程為題，進行「為青年尋路」四部曲的系列報導（見表1），在2013年間總共出現16則報導，對於高等教育提出建言。第一部的五篇報導自2013年3月12日開始刊登，背景為大陸，第一、二篇報導從北京大學物理學院院長謝心澄放棄高薪回國談起，說明大陸如何推動「千人計畫」，透過年薪6至7萬美元，外加免費住房、醫療保險、幼兒、中學免費就學等全套福利，

2 舉凡文中引用《聯合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的文章，資料均各引自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知識贏家資料庫（<http://kmw.chinatimes.com/>）、蘋果日報網路版的電子資料（<http://search.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search>），如於文中作為舉例說明所用，無內文引用，則不另列參考書目。

標題	報導	時間
搶救人才 給人給錢·官方挺 領產業升級！他寧棄美國高薪	為青年尋路首部曲／特派記者陳雲上／大陸報導	2013.03.12
搶救人才 跨國採訪 陸推千人計畫 吸海外頂尖人才	陳雲上／大陸報導	2013.03.12
朱經武 談觀念 只要能幫臺灣 大陸人又有何妨	記者王彩鸞／臺北報導	2013.03.12
供需斷層 人求事 事求人……職場黑洞 我在捉迷藏	記者陳雲上／臺北報導	2013.02.26
拚出頭路拒學、人際退縮 尼特的徵兆	為青年尋路 二部曲／記者劉星君	2013.05.27
拚出頭路 跨國採訪 西班牙青年 半數沒頭路 失去戰場的鬥牛士	特派記者江睿智／西班牙報導	2013.05.28
跨國採訪 適性發展 德小四就依成績分流	特派記者江睿智／德國報導	2013.06.03
拚出頭路 職訓……給碩博士 職場敲門磚	記者江睿智	2013.06.04
拚出頭路 跨國採訪 尋找產業救世主 東京大學 TLO 催生 「日本的祖克柏」	特派記者林安妮／日本報導	2013.06.10
為青年尋路 X 世代領航 Y 世代創意 別讓父子搶工作	詹火生／臺大兼任教授、林昭禎／臺大博士候選人	2013.06.11
現象與建言 三帖藥 拚轉骨 不怕倒閉潮 怎麼救高教？整併或退場、碩士班分流、與企業交流 這款大學生……難操不耐磨、素質直直落、經濟怎點火	為青年尋路三部曲／高教轉骨·記者張錦弘	2013.08.26
南韓 打造諾貝爾夢 砸錢不手軟 跨國採訪 南韓翻身契機 企業砸錢 高教大換血 科系融合，是目前南韓理工科系的發展顯學，希望培育出像賈伯斯這樣的天才。	高教轉骨·特派記者魏忻忻／首爾報導	2013.09.02
臺科大校長：別急著升學，愈早就業愈好	高教轉骨·記者鄭宏斌	2013.09.10
訂單式育才 技職教育找回身價	高教轉骨·記者張錦弘	2013.09.09
月底推專法 蔣偉寧：企業協助育才將獎勵	記者王彩鸞／臺北報導	2013.09.22
德國 年金少到死不了 但也過不好 退休想過好日子 還得自掏腰包買養老金 勞工負擔加重了 年輕世代更擔心 低薪買不起私人年金	《聯合報》·A9·為青年尋路四部曲／給他未來·特派記者江睿智／柏林報導	2013.12.10
為青年尋路論壇 12月2日 來聽3位青年奮鬥故事	記者蔡容喬／高雄報導	2014.11.03

表 1：《聯合報》願景工程四部曲報導

來吸引海外頂尖人才；第三篇報導以中研院院士朱經武博士訪談終結，提到美國留住人才經驗與臺灣研究經費使用的諸多限制，得到結論是：「只要能幫台灣，大陸人又有何妨」（王彩鸞，2013年3月12日）。第四、五篇報導則從統計資料描述人力供需失衡問題。

第二部曲的背景是歐洲，說明新世代因面臨就業困難所形成的病態社會心理。第一篇報導以私立美和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翁令珍為訪問對象，認為大學畢業生一出社會就面臨挫折、無助，新世代「繭居族、隱蔽青年、啃老族」成

為當代的家庭與社會問題。接下來在西班牙的跨國採訪報導，同樣呈現出經濟不景氣下年輕世代的就業困境；但在德國、日本的採訪經驗中卻轉而介紹高等教育的經驗，德國介紹教育分流的理念與成效，日本則引介東京大學 TLO 校園內的技轉公司，宣傳大學產學合作機制，並藉機傳達經濟部為協助待業的碩、博士就業政策，提供 2 千個免費專業研習機會與就業媒合。最後一篇報導是由國立臺灣大學社工系詹火生與林昭禎所共同發表的〈青年尋路 X 世代領航 Y 世代創意 別讓父子搶工作〉，批判低薪與不穩定就業造成臺灣人才外流，造成「缺工」與「失業」並存。

第三部曲背景回到臺灣，先介紹教育部次長陳德華的說法，提出大學整併或退場、碩士班分流、與企業交流「三帖藥」，來治療高教病症。第二篇報導探討南韓砸錢努力追求諾貝爾獎的高教政策給予正面評價，引用浦項工大校長金用民豪氣的作法與期待，也論及首爾大學、南韓科學技術院（KAIST）重金邀請諾貝爾獎得主擔任校長，不過最後卻又點出黃禹錫幹細胞造假所引發的研究倫理議題。接下來的 3 篇高教報導分別是由國立臺科大校長廖慶榮提出「別急著升學愈早就業愈好」的建議，國立臺北科大校長姚立德、元智大學校長張進福，以及佛光大學校長楊朝祥指出技職教育斷層的問題，最後一篇則是由教育部部長蔣偉寧提出《技職教育專法》和《促進人才培育與發展條例》，獎勵企業協助教育。

最後一部曲出現於 2013 年 12 月 10 日，僅有 2 篇，第一篇以德國年金為主題報導，提到政府為因應人口老化及退休潮，展開一系列年金改革，由於保費調高、所得替代率下降，造成高齡勞工退休失去社會保障；第二篇則是在高雄國立中山大學舉行的 3 位青年奮鬥故事活動介紹。

《聯合報》的願景工程四部組曲表面上看來是包含跨國經驗的專題系列報導，但缺乏系統性與連貫性，對於高教核心問題避重就輕，反而著重政策與活動的文宣。首先，三部曲的報導形式並未統一，也未對焦當前的教育議題，整合跨國報導的主題，而是隨性地拼湊既有的教育新聞報導，甚至是筆者投書、報社活動預告，專題報導的水準良莠不齊，很難視為統一的「系列」。從報導內容來分析，將高教問題歸因於兩岸對立，以及全球年輕世代退縮與啃老的心態，同時置入教育部官員、大學校長等特定對象行銷產學合作的高教政策，避開教育部放任高教擴張的問責，也淡化高等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問題。

《中國時報》的知識贏家資料庫收錄的相關報導以專欄文章為主，屬對外邀稿性質，涉及議題包含企業低薪、退場機制、教育分流、高教失業與低度就業、雙薪教授以及人才外流等議題。以觀念平臺專欄為例，包含臺灣學界對於教育議

題的討論，相關的教育議題有 3 則。周成功的〈退休教授任教私校 哪裡「不公不義」？〉一文，反駁二春教授不公不義的指控，認為退休教師到私校可以改善師資；張瑞雄〈臺灣問題在人才太多、位置太少〉，批評經建會在總統府專題報告〈人才問題挑戰與因應〉中的 5 大亮點，包括放寬移民限制以吸引外籍人才留在臺灣、讓技職教育產學合作、外國大學來臺設大學、讓碩士班分流，就業導向的碩士生無需再寫論文也可畢業。他認為臺灣高教的根本問題在於經濟表現不佳，無法開創更多就業，高教對外開放的結果反而造成臺灣工作機會被取代；孫振義的〈大學應該坦然面對熄燈號〉，則著眼於大學的轉型與資源再利用，包含學校經營主體、教職人員、設備與空間的重整。從專欄的報導看來，《中國時報》對於高等教育政策主要採取批判性的角度，特別批判政府扮演的角色，但是在報導立場上會出現相互矛盾現象，如一方面批判二春教授不公不義³，另外一方面又刊登反駁的投書看法，顯示《中國時報》對於高等教育的立場並不一致。

《蘋果日報》報導方式較《聯合報》、《中國時報》更加多元，社論與個案報導數量俱多，除了記者採訪報導之外，另有訪問與自述報導，呈現高學歷者的就業、求學以及愛情與婚姻所面臨的困境。一般報導內容著重教育品質下降以及年輕就業市場問題，如〈九成大學生自認素質低〉、〈大學高中化研究所大學化〉，投書像是周祝英〈不景氣中提升大學生水準〉，質疑當前高等教育品質低落；另外一方面，《蘋果日報》也關心年輕世代的勞動剝削問題，如〈中華電信剝削臺灣年輕人〉、〈臺灣悲歌 臺青澳洲挖礦 炸斷手〉，揭露臺灣年輕勞工的困境。

從以上三家媒體資料庫所蒐集到的資料分析，發現三家媒體的報導方式有很大差異，《聯合報》主要以記者專題報導為主，地方記者主要報導特定大學的活動宣傳與廣告，如大學公關室的延伸，對於政策不直接批判，間接藉讀者投書來表現對於政策不滿；《中國時報》除了一般報導、社論皆主動批判教育政策之外，邀請名人專欄評論來呈現高教議題的評論，如觀念平台、名家專論或者是三少四壯集等，對高等教育政策提出不同觀點與立場的評論，報導內容經常出現相互矛盾立場；《蘋果日報》則是用專題報導加上蘋論，配合採訪報導以及自述性報導，反映了報社一致的立場，表達對政策批判，並深掘被報導人的職涯困境。

3 關鍵字搜尋中未包含觀念平台中一篇相關報導，周平，〈雙薪教授應速立法予以規範〉，《中國時報》，2010 年 9 月 20 日。此文明顯與周成功一文的立場相左。

二、差異化的媒體論述

從3家報社的資料庫發現對於高等教育問題的社論總共有19篇(見表2)，《聯合報》有3篇、《中國時報》4篇，《蘋論》則高達12篇，顯示對於高教問題的重視。《聯合報》的社論〈從博士糕餅師反思職業與知識〉強調要拋開傳統職業尊卑的眼光，尊重自我追求的過程；〈從雙薪教授談世代剝奪〉一文從社會所得分配公平性，嚴厲批判雙薪教授對年輕世代造成的排擠效果，更導致民怨延燒向政府對整體軍公教退撫的優遇；〈博士賣雞排 vs. 吳寶春念不成 EMBA〉一文探討「學歷無用論」，認為學歷是一種人力資本的投資與學歷商品化的核心價值，站在實用主義的立場主張「推動現有大學施行終身教育」。

《中國時報》的社論有4篇，〈民粹思維 拖垮臺灣人才競爭態勢〉分析臺灣高教當前的危機為鎖國的民粹思考，對於人才的封閉性以及缺乏競爭的薪資制

報紙名稱	社論標題	時間	內容
《聯合報》	〈從博士糕餅師反思職業與知識〉	2012.08.28	職業尊卑
	〈從雙薪教授談世代剝奪〉	2012.10.19	反對雙薪
	〈博士賣雞排 vs. 吳寶春念不成 EMBA〉	2013.03.22	職業尊卑
《中國時報》	〈《社論》民粹思維 拖垮臺灣人才競爭態勢〉	2011.04.30	彈性薪資
	〈政府不該助長教育資源誤置〉	2011.10.21	反對補貼政策
	〈《社論》臺灣人才斷層危機 不容低估〉	2012.08.09	彈性薪資
《蘋果日報》	〈《社論》雞排博士人生轉軌 凸顯高教多元價值〉	2013.03.22	多元價值
	〈官員沒常識〉	2009.06.15	批判馬政府
	〈棄絕博士學者神話〉	2009.08.21	批判馬政府
	〈高學歷浪費〉	2010.09.22	反文憑主義
	〈博士漏氣〉	2011.03.17	反文憑主義
	〈人才不足還限制外才〉	2011.06.09	人才開放
	〈大學教師不可齊頭加薪〉	2011.06.11	彈性薪資
	〈蘋論：政府又把你我當凱子〉	2011.10.20	反政策買票
	〈考試只有五十幾 沒關係〉	2012.07.19	反文憑主義
	〈學歷背後的魔障〉	2013.03.23	批判馬政府
	〈僵化的在職教育〉	2013.03.25	反文憑主義
	〈太多人考公務員非好事〉	2013.07.09	反公務員
〈博士神話的幻滅〉	2014.06.03	批判馬政府	

表 2：3 家媒體的社論報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聯合知識庫(n.d.)、蘋果日報(n.d.)、知識贏家(n.d.)。

度，是造成人才外流主因；〈政府不該助長教育資源誤置〉則是大力批判國科會的 57K 計畫，反對國科會對特定學門博士生的補貼政策，阻礙博士進入就業市場的競爭；〈台灣人才斷層危機 不容低估〉籲打破齊頭式的平等，以彈性薪資制度來挽救人才流失的危機；〈雞排博士人生轉軌 凸顯高教多元價值〉指出教育的目標在於心智啟蒙、訓練專業技能以及人文解放，從大學做為通識（博雅）教育的立場，主張教育應朝多元取向、包容尊重的社會價值觀。

《蘋果日報》批判高等教育相關的社論數量最多，達 12 篇。其中有 4 篇是對於馬政府與官僚體制的批判，包含〈官員沒常識〉、〈棄絕博士學者神話〉、〈學歷背後的魔障〉、〈博士神話的幻滅〉，批判博士官員缺乏常識，具有傲慢的菁英主義態度，集體性格「是權威、潔癖、孤高、『君子遠庖廚』、欠缺常識、看不起非學術部門的其他專業；仍自戀地浸泡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數千年迂腐醬缸裡」（蘋果日報，2009 年 8 月 21 日）。而此學歷神話乃源於儒家對士大夫的迷信，以及對技能的輕視。有 3 篇是採取學歷無用論的立場，〈高學歷浪費〉討論 61 名博士報考普考，錄取了 5 人，博士與高中畢業者競爭低階白領工作；〈博士漏氣〉討論公務員初等考試放榜，16 名博士都落榜；〈考試只有五十幾 沒關係〉以原住民歌手巴奈的歌《沒關係》來鼓勵學子行行出狀元。其他的報導則分別批判了當前的政策，〈僵化的在職教育〉嚴厲批判政大 EMBA 不收吳寶春事件；〈人才不足還限制外才〉一文則批評當前的移民政策阻礙了外國人才的進入；〈大學教師不可齊頭加薪〉則是反對教育界齊頭式的平等；〈政府又把我當凱子〉批判 57K 生技博士政策，質疑政府是期約賄選與變相買票，反問國科會要交待為何企業不用博士？為什麼不管制博士數量？為何不循市場機制進行公平競爭？而〈太多人考公務員非好事〉一文認為現在社會熱衷公職考試反映了經濟情況惡化、年輕人失去創新以及不事生產。《蘋果日報》對傳統官僚體制與文憑主義展開反諷式批判，一方面強調自由市場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教育體制的管制；另外一方面，也帶著強烈反官僚、反智的色彩，反對年輕世代投入公職考試，反諷博士強擠官場窄門的窘態。

三、媒體回應高教政策的立場比較

當媒體開始大量轟炸「高學歷不務正業」的訊息，國家也開始回應社會對於高學歷者的失業與學用落差的質疑，提出解決就業的政策方案。針對高學歷低就業的議題，教育部在 2009 年推動「就學安全網計畫」與「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

業計畫」，透過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以及強化學校產學合作關係，來穩定學生就學與大專生就業，政府以補助到企業工作的大專畢業生每月2萬2千元與勞、健保及勞退金（俗稱22K方案），來降低高學歷的失業。而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也提出了「生技博士養成計畫」（2003年，俗稱57K方案）、國科會擴大博後徵才計畫（2009），提供博士後進入企業的工作機會。

《聯合報》對於2009年政府一系列的就業政策的報導多加以肯定的字眼，如〈政府籌投650億預算：救休學、助就業〉、〈大專以上失業6.9萬頭路等你〉、〈救高學歷失業 國科會聘高薪助理〉，報導內容主要在宣揚政府的補助政策，雖然同時間登出劉仁沛（國立臺大農藝系教授）的〈產學不升級 就業難媒合〉、陳啟濃（博士候選人）〈有學歷欠磨練……博士滿街跑〉（投縣水里），以及關百華（淡江大學日文系副教授）〈滿街失業碩博士 快檢討高教政策〉的評論，但是社論卻採取不直接批評高教擴張政策。《蘋果日報》比較著重於青年就業困境的真實報導，像是〈大學生起薪2萬8縮水最多〉、〈萬人搶千缺 博士當學徒〉、〈請給我一份工作 沒經驗吃虧 盼給新人機會〉，反映年輕世代就業低薪的困境。

相較而言，《中國時報》除了報導之外，還直接提出批評的報導，如〈各界褒貶不一「碩博士都失業上課能找到工作？」〉、〈聘助理救失業 教部超高薪〉指責政府預算編列浮爛養肥貓。其中一篇記者林志成（2011）〈教部回嗆土財主：大學非職訓所〉的報導，針對有企業要找臺大碩博士生提皮包、買便當，被教育部高教司長何卓飛回嗆：「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企業用人，必須想想自己是否該盡責任」（林志成，2010年5月25日）。《中國時報》不但對於教育政策提出批判性的看法，積極捍衛知識份子的利益與尊嚴，批評企業必須承擔人才培養的責任。

針對科技部的「生技博士養成計畫」與「擴大博後徵才計畫」，《聯合報》同樣未提批判政策。《中國時報》以社論〈政府不該助長教育資源誤置〉來表達異議，認為教育政策必須緊縮，而非持續用政府補貼方式來解決生產過剩的博士失業問題，而蘋論也持類似立場，〈政府又把你我當凱子〉對於政策採取一貫的批判立場，在〈不能馴養反成負擔〉一文中指出當前學用落差的原因，在於「政府卻忽略了社會及企業的消化量，滿足了莘莘學子的升學需求」（黃峰文，2003年11月7日）。對於「57K救博士」方案，標題引用中研院翁啟惠院長的看法，認為「提升產業水平卡實在」。

對於高學歷低就的現象，《聯合報》主要觀點為博士應調整心態、走向國際

化來因應，《中國時報》則認為國家應該控管博士員額、大學退場；《蘋果日報》則認為應由市場競爭機制來決定大學存廢與人才聘僱。在人才流動方面，《聯合報》比較關注兩岸人才交流，中時與蘋果則主張人才開放，同時關心人才外留的問題。對於彈性薪資方面，3個媒體的看法一致，認為大學應採取彈性薪資制，但是《中國時報》以〈「彈薪」無競爭力 延攬國際人才僅1%〉，批評目前的彈性薪資政策並未被真正落實攬才的效果。最後，在高教擴張的對策方面，《聯合報》主張國際化、開放政策；《中國時報》則強調控管大學、建立退場機制；《蘋果日報》則主張開放、市場機制競爭中的大學退場。

透過考查3家平面媒體的報導方式、報導內容、社論以及回應政策的報導（見表3），可以綜合出以下結論，3家媒體雖然都帶著新自由主義的色彩，主張政策開放、市場競爭，但是在教育價值觀以及回應高等教育危機的方式卻有些許差異。《聯合報》為具有實用與功利主義色彩的保守主義，以內控式的系列報導，訴求高學歷者改變心態、走出臺灣，除了社論中有一篇對於二春教授的議題之外，極少回應與批判政策，反而不斷指責教改運動要為高教危機負責；《中國

	政策議題	《聯合報》	《中國時報》	《蘋果日報》
高學歷低就業政策	教育部：「就學安全網計畫」和「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2009）。	肯定，宣傳。	批判，社會問題，應縮小學用落差。	不評論，僅反映年輕學子的就業困境。
	科技部：「生技博士養成計畫」（2003）。	博士調整心態轉業，朝向國際化發展，加強產學合作。	批判，錯誤政策，應緊縮教育。	批判，官僚體制的問題，市場自由競爭，以市場導向的學習。
	科技部：國科會擴大博後徵才計畫（2009）。	肯定，宣傳。	大學退場，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	批判，市場競爭，提升產業水平。
人才流動	彈性薪資、有條件的移民政策。	兩岸開放，引入技術移民；贊成彈性薪資。	全球開放人才、防止人才外流；贊成彈性薪資，但批判成效。	全球開放人才；贊成彈性薪資。
高等教育擴張	教育政策鬆綁、自由經濟貿易區。	國際化、開放性競爭。	國家控管、大學退場。	開放競爭、市場機制的大學退場。
教育價值觀		擁護政府的保守主義、實用主義。	批判政策的保守主義、政策介入控管。	自由主義，反對文憑主義、反智主義、關注青年就業困境。

表3：3個平面媒體對於高等教育立場的比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時報》提供名人專欄表達異議，雖批判高教政策，要求緊縮教育政策、控管博士員額，但傾向於鞏固智識階級的保守主義，擁護彈性薪資政策，強調國家政策干預；《蘋果日報》採取自由主義立場，反對政治干預，提供一般閱聽人即時的回應，一方面同情年輕世代的勞動處境，呼籲社會提供給年輕世代更多機會；另一方面帶有強烈反文憑主義、反智的色彩，批判以智識階級構成的統治集團之愚昧無知。

伍、學用落差：從污名到名人效應

一、三大主流報紙學用落差個案報導的比較

《聯合報》在2003年4月22日以〈留美碩士，台北開計程車〉為題（陳英姿，2003年4月20日），拉開臺灣學用落差個案報導的序曲，記者用「台灣學歷最高的計程車司機」來突顯當事人學非所用的困境，此後高學歷低就業與失業的窘境就成了媒體爭相報導的題材。從3家平面媒體對於個案的報導數量來比較，《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各有6則，而《蘋果日報》的報導多達18則。

《聯合報》的6則報導中正面多於負面。在負面報導方面，留俄博士蔡小姐搶臨時工職缺，以及國立臺大博士生溫先生放棄學業改當業務員，皆反映了當前博士就業困境。在正面報導方面，轉賣雞排博士生宋耿郎以「行行出狀元」來反駁鴻海郭台銘董事長的「浪費教育資源說」，之後《聯合報》對於博士生的轉業報導即趨於正面，如博士生曾志雄因遭遇多重人生變故，中輟學位改投軍旅擔任醫務兵；原住民博士生羅恩加回尖石新光部落，以泰雅族傳統與自然共生耕作方式為基礎，推廣酵素培養土壤的漢方農技，並透過至善基金會原鄉活泉計畫來改善產銷管道；石念祖博士回臺南原鄉賣魚丸，透過臺南市勞工局舉辦「青年創業就業論壇——頭家ㄟ夢」，成為青年創業的正面教材，這3則報導都強調博士生具有轉業主動性，在學術之外的場域取得新的可能性，淡化高學歷者的就業困境。

《中國時報》的6則相關報導，有3則為負面報導，包含魏姓留洋生技博士生人浮於事的感嘆、長春藤名校博士Jay淪為「流浪博士」、甚至是國立中央大學王姓博士生自殺，都表現出博士所面臨的就業市場困境。3則正面報導方面則以李碧娟女博士投筆從戎，強調軍中穩定待遇對於她的就業吸引力；引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美術系兼任助理教授鄭勝華肯定攻讀博士過程的成長與歷練，以及國立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博士藍逸之，勇於嚐試教職之外的工作，回應學用落差；型農博士杜司偉放棄矽谷工作，回高雄桃源區種田，戲劇性的職涯轉換使他

成為微電影中的故事主角。《中國時報》呈現出博士學用落差的兩種處境，一是匿名、受就業市場影響的失業或低度就業窘境，突顯高學歷者的就業困難；二是具名、具有主動性的博士職涯轉換，表達他們成功轉職的經驗。

《蘋果日報》對於學用落差的個案報導的以負面新聞居多，包含〈永不出象牙塔的博士〉、〈天之驕女沒出息〉、〈研究生淪街友 偷多多止飢〉、〈畢業找嘸出路 博士生吊死〉、〈二千碩博士 爭爬電桿〉。從性別角色觀點，吳淡如大談博士之妻的難為，批評永不出象牙塔的博士，「框限他的不是學識，而是他自己的人格特質」（吳淡如，2004年8月13日）。另外一篇施寄青的專欄則呈現女性醫學博士寧被包養也不願意自立的心態，這兩篇專欄呈現出高學歷者偏差的人格與心態，反映了在傳統科舉文化下高學歷人格的偏頗，在於人生目標太過狹隘，以為只要念好書就會有成功人生。

另外3則社會新聞的報導更誇張化高學歷低就業者人生的窘境。在研究生淪為街友一文，刻意詳細介紹該生高中到研究所肄業的學校系所，曾任醫院保全、補習班老師，由於嫌薪水太少，現在家淪為啃老族，放上多多、超商錄影帶以及警局吃泡麵的照片，表現出高學歷者淪落「偷多多止渴」的窘境。在博士生吊死報導中，《蘋果日報》特別配上國立中央大學的校門照片，鉅細靡遺地報導剛通過口試與論文的博士生寫下「出口在哪裡——死」，描繪出該生由於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而輕生。最後一則臺電基層考試報導，標題上強調出2千碩博士「爭爬電桿」，用台電的圖片電線桿與考試圖片並列，並提供臺電基層人員考試的詳細報考人數有1萬8,773人，博士11人、碩士2,138人、大學1萬2,634人、高中職3,990人，甚至報導「台電已在研議未來筆試出題較簡單，讓高中職學歷者有更多機會進入複試」，突顯高學歷爭搶藍領職務人員的困境。這些負面報導配上圖片來誇大高學歷者的「偏差行為」，在博士自殺以及肄業碩士偷竊報導中並刻意羅列當事人優秀學歷來對比當前的慘況；而台電基層考試，標題略過報名最多的大學生而聚焦於碩博士，刻意誇張碩博士當前不堪的處境。

唯一的正面報導只有雞排博士生宋耿郎個案，《蘋果日報》連續用10則報導來密集追蹤「雞排博士」的發展⁴。事實上雞排博士生宋耿郎並未完成博士學位，一開始卻以「博士」為標題（而非博士肄業）來稱之，這一連串主角現身的

4 包含在研究時間點之外的一則最新報導，主題為〈雞排博士跨行當作家 買雞排送新書〉，參考網址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life/20150207/556023/applesearch/%E9%9B%9E%E6%8E%92%E5%8D%9A%E5%A3%AB%E8%B7%A8%E8%A1%8C%E7%95%B6%E4%BD%9C%E5%AE%B6%E3%80%80%E8%B2%B7%E9%9B%9E%E6%8E%92%E9%80%81%E6%96%B0%E6%9B%B8>。

正面強化報導，果然引起大眾對於雞排博士的熱烈討論，讓其他兩大報不得不跟進報導，雞排博士生成為跨媒體報導的代表性個案。

訪問報導有兩篇：〈見人五子登科 博士焦慮深〉、〈博士找事難 學生不讀書〉。個案一為萬年助教小霞碩士研究生（27歲）表達延畢碩士生對於前途焦慮，以及大家普遍不願意再深造博士的心態。個案二為唐山書局老闆陳隆昊，從閱讀人口的減少說明書商經營的困境，也反映現在學子「不讀紙本書」的原因是無法再「以學術為志業」。

在自述性的採訪報導「人間異語」中有3個受訪個案分別表現出兼任教師、博士生以及留洋博士的個案困境。個案一是兼課中文教師李子赫（37歲）談他「三十而立」的生命困境，35歲才完成博士學位，開始在國立大學兼課的游牧歷程，由於就業的不穩定而無法承諾女友一個家庭，以及他因流動兼課的車禍意外，造成他「此恨綿綿無絕期」；個案二是靠學位養「家」的臺大侯姓博士生（38歲），住在月付7,000元的學校宿舍，住宿費用超過她收入的1/3，提到她身邊的博士班友人們多半也把學位擱著、另謀出路，因為他們知道念完博士也未必找得到工作，她不但不打算念完博士學位，還要再考另外一個博士資格，利用博士身分來取得「廉價住屋」，她感嘆：「我常覺得自己明明是青壯年，卻有風中殘燭的悲哀」（侯小姐，2014年11月26日）。個案三是在2000年回國就業的生技洋博士B君，他回國先在某國家機構當學士級研究助理，之後進公立大學做博士後研究，過著半年延發薪水的不穩定生活，他批評當前學制體制是為研究而犧牲教學，更指出臺灣生技業博士的困境是「大多在做業務員，不是賣中藥、西藥跟飼料，就是賣實驗試劑跟材料，做研發的很少」（李子赫，2014年11月30日）。對兼職就業博士、博士生以及留洋歸國博士自述性的採訪，完整呈現當事人生命歷程與困境，讓讀者瞭解博士面對的不僅是低度就業的問題，還是整個生命經驗的困境。

從3家平面媒體個案報導方式的比較（見表4），可以發現其共同點在於對於博士就業都有正、反不同的報導，但是在報導方式與內容卻有明顯差異。《蘋果日報》比《聯合報》、《中國時報》更加多元，特別強化對於個案經驗的報導，以訪問、自述的方式呈現出高學歷者的生命經驗以及其他名人的觀察與回應。在報導內容方面，《聯合報》比較傾向於高學歷轉業的正向報導，淡化高學歷面臨的就業問題，而《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則傾向於對於高學歷的就業困境做負面報導，強調社會結構的問題，《蘋果日報》雖一向擅長誇大「偏差行為」，但也更深入探索不同高學歷者的價值觀與生命歷程，掌握到部分高學歷者的人格

	標題	被報導人	日期
《聯合報》	1. 北縣徵才擠爆 留俄博士搶短期工 「五味雜陳」	蔡小姐	2009.06.23
	2. 高學歷薪情差 放棄念博士 改當業務員	溫先生	2013.01.02
	3. 駁郭董 雞排博士生：行行出狀元	宋耿郎	2013.03.15
	4. 幫部落脫貧 博士生返鄉 推契作蔬菜	羅恩加	2014.06.06
	5. 生離死別的領悟 博士生中輟 當起醫務兵	陳建明	2014.03.14
	6. 不忍父過勞 博士回鄉賣魚丸	石念祖	2014.10.27
《中國時報》	1. 《苦情案例》生技洋博士 失望又感慨	魏博士	2007.09.02
	2. 找不到頭路 一堆博士家裡蹲	長春藤名校洋博士 Jay	2007.09.02
	3. 女博士投筆從戎 從基層做起	李碧娟	2010.12.13
	4. 賣雞排不行？博士：個人選擇	鄭勝華（高師大兼任教師）、藍逸之（國立臺北大學博士生）	2013.03.18
	5. 博士扮型農 微電影軋3角	37歲企管博士杜司偉	2013.12.05
	6. 書桌留「死」字 博士生上吊亡	國立中央大學通訊工程學系王姓博士生	2014.04.09
《蘋果日報》	1. 永不出塔的博士	張博士	2004.08.13
	2. 博士找事難 學生不讀書	陳隆昊，唐山書局老闆	2007.02.27
	3. 見人五子登科 博士焦慮深	小霞，碩士研究生	2007.05.21
	4. 人間異語：大學爭升遷 負債也要讀博士	萬年助教林先生	2009.12.14
	5. 天之驕女沒出息	她	2010.11.11
	6. 人間異語：尖端產業變賣藥 博士要出走	B君	2011.09.03
	7. 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郭董數落 博士雞排反大賣／「博士雞排」紅到開分店 老闆：謝謝郭台銘／雞排博士首場校園演講 鼓勵打工、做業務／雞排博士開講「如果重來 不讀博士」／博士雞排 要開分店了／雞排博士演講 老粉絲鼓勵「把前妻追回來」／彎腰苦幹 雞排博士闖出一片天／博士雞排摸彩 挨轟洩個資	宋耿郎、工程師任維海	2013.03.10 2013.03.25 2013.05.06 2013.05.22
	8. 研究生淪街友 偷多多止飢	吳姓男子	2014.03.18
	9. 畢業找嘸出路 博士生吊死	王姓博士生	2014.04.09
	10. 二千碩博士 爭爬電桿	曾姓生醫碩士、國立政大教育系教授秦夢群、《Career》雜誌總編輯臧聲遠	2014.06.30
	11. 我念博士班 只為了「存」個家	侯小姐	2014.11.26
	12. 游牧老師 對人生好疑惑	李子赫	2014.11.30

表 4：3 家平面媒體對於博士就業的個案報導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特質、就業困境，深入探討職涯之外愛情與婚姻的不穩定。這種雙面報導的手法一方面挑戰了過去的文憑主義，讓社會大眾看到聯考「人生勝利組」的失敗，可以滿足教育競爭失利者「幸災樂禍」的心態；另外一方面，以深入的自述報導來反映高學歷者的困境，甚至為他們發聲來批判學術制度與就業環境的問題，以取得年輕世代的肯定與認同。

二、反轉污名：博士生賣雞排的名人效應

2013年3月10日開始，《蘋果日報》以〈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做連續深入的個案追蹤報導，之後用系列報導來追蹤「雞排博士」的發展。第一篇報導用「趕快來買，博士幫你炸的雞排喔！」（蕭夙眉、朱俊彥、鄭敏玲，2013年03月10日）的吆喝聲來吸引讀者注意，配上刻意放大貼在門口的國立政治大學學生證，以及用口罩遮去半臉、手拿炸好雞排的宋生照片，交待他從高中到研究所的高學歷背景，到家庭背景為離婚、育有三子，最後再加上當事人正面的照片，完全不同於過去失意落魄、匿名、隱身、片斷化的博士就業報導。第二、三篇報導呈現「博士雞排」大賣，反駁郭台銘「浪費教育資源」說，以清楚的宋生正面照片、背景為店面配上可口雞排，甚至訪問到「碩士」顧客大讚好吃，刻意拍攝店面前等待的顧客，報導宋生打算註冊商標「博士雞排」，達到反駁郭台銘批評的效果。第四、五篇報導開始介紹雞排博士生後續「超越本業」的各種商業活動，包含演講、商演摸彩活動，將轉職經驗現身說法；第六篇報導雞排博士開分店的訊息；第七篇之後持續報導演講以及最近出書的動態。這一連串男主角現身說法的正面強化報導，表現出博士學位中輟、轉業的心路歷程，透過具名、連續的報導果然「棒紅」雞排博士生，成功地在媒體與網路上引起大眾對於「雞排博士」的熱烈討論，也讓其他兩大報不得不跟進報導，同時都以社論來處理這個議題，並陸續刊出多篇筆者投書，顯示這個正面現身的學用落差個案所引發的媒體漣漪效應。

《聯合報》在3月15日率先跟進，由記者陳靜宜、陳宏睿進行採訪報導，在雞排博士生新聞報導之後，《聯合報》採用成功的博士轉職經驗來取代負面的博士失業報導。同一時間接受刊登的投書分別是戴弘義〈環境差 博士讓位現實〉（兼職教師）、朱立安〈教育浪費稅？錯誤教改 拿百姓開刀〉（教）、李沃牆（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授）〈博士賣雞排 不只在台灣學歷通膨 全球得病〉，以及楊渡《名人堂》專欄〈羅大佑要不要交浪費稅？〉。《聯合報》專欄的幾篇文章主要回應郭台銘「高教低就浪費稅」的看法，將高教通膨視為全球

化的共同困境，強調博士讓位現實就業環境的選擇，但同時維持一貫「錯指課責對象」的立場：避開對於教育部高教政策的批評而轉嫁責任於教改運動。

《中國時報》雖未再做平面專訪報導，但該子集團中天電視在6月3日進行電子媒體專訪。兩篇投書分別由戴伯芬（高教工會理事長）〈博士為何會去賣雞排〉，以及許惠琪（博士生）〈走出『學以致用』的窠臼〉，戴文認為此個案牽涉到更複雜的國家人力資源政策、產業需求、社會文化期望等因素，交付市場供需決定而受文憑主義引導，才是造成當前高教人才通縮的主因。而許文主要的立場在強調跳脫迎合就業條件的功利主義，才能開拓新領域。

一位中輟、離婚的雞排博士生積極翻轉生涯失敗的經驗，利用媒體的宣傳效用持續擴展事業版圖。首先，是本業雞排生意大好而擴張分店，依《蘋果日報》的報導，在郭董批評浪費教育資源之後，知名度及業績比以前暴增3倍，宋生開始徵人、宣稱註冊商標、開分店以擴大營業；其次，以雞排博士為名號進行後續的演講、商演活動，公開給予大眾創業建議。他打鐵趁熱地在2015年出版了新書《雞排博士教你開一間會賺錢的店》，封面用「一舉成名天下知！」、「從準備創業第一天就懂宣傳」，清楚表示：「就我們創業的人來說，不但要會生產產品，更要學會生產新聞」（宋耿郎，2015：29）。他很清楚知道博士雞排賣的是「博士」而非「雞排」，刻意以反差觀感製造出社會異常現象以吸引媒體注意。而他自認的成功之道在於「不斷地創造故事，而非不斷地壓低價格」（宋耿郎，2015：93）。

在主流平面媒體以及電子媒體的推波助瀾下，雞排博士生的人生轉折成為大眾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從他過去成績至上的價值觀，到高中教書的前妻羅列他百大罪狀因而提出離婚，一直到為了養育3個子女而賣雞排，雖然他並不否定念書的重要性，但是卻懊悔地說道：「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選擇，我不會去念博士。」（方德琳，2013）反文憑主義的理念背後是功利與實用主義的思維，一個原本是人生勝利組的失敗故事意外地成為社會的創業與立志奮鬥典範，他的故事回應了每個人生涯中可能出現的錯誤選擇，以及承擔失敗、重新站起來的勇氣；另外一方面，歷經金融海嘯等全球經濟循環之後，此個案更反映了臺灣社會大眾對於高學歷低就業的集體焦慮，失婚的懊悔與養兒育女的重擔，在他身上投射了自己、自己的子女或者是未來子女的生涯不穩定恐慌，分享了當代無法穩定就業的挫折與痛苦經驗；博士賣雞排更是社會對於高等教育擴張反諷的批判，疏解無解的高教危機不安以及無從罪究的錯誤制度心理。

陸、結論：差異化媒體論述與個人敘事的漣漪效應

本研究同時使用比較論述分析與敘事的方法，從3家平面媒體報導方式與內容來檢視學用落差的問題，以博士與就業為關鍵字蒐集相關的報導，以瞭解不同媒體對於高等教育議題處理的差異，說明不同媒體如何「問題化」學用落差的議題，並回應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角色；同時進一步探討被報導人如何回應媒體報導，創造主體敘事之可能性。

3家平面媒體雖然都宣稱對於高等教育採取開放態度，但是訊息產製方式不同，對於學用落差的診斷與歸因不同，期待國家政策扮演的角色也有差異。研究結果回答一開始本文設定的3個問題。首先，從報導方式來看，《聯合報》主要採取系列專題報導，屬於內控式的報導；《中國時報》以名人專欄的方式來探討高教議題；《蘋果日報》採取多種、互動報導方式，包含社論、投書、報導訪問以及即時回應，提供資訊生產者與閱聽人之間的及時互動與回應。而從報導內容來看，《聯合報》的專題報導是依附於國家政策，為官方宣傳相關教育政策；相對地，《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則採取批判立場，《中國時報》以各種專欄的方式來批判教育政策，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高等教育評論，而《蘋果日報》則深掘個人經驗，有時會以反諷與誇張被報導人的經驗，來製造媒體的話題。

其次，3家平面媒體的社論呈現出不同的立場，《聯合報》的社論站在實用主義立場，強調社會須拋開傳統職業尊卑的眼光，也對雙薪教授展現批判，認為他們是造成社會對軍公教污名的原因；《中國時報》社論主要的批判對象是國家政策，主張高教政策應該鬆綁，朝向彈性薪資制度，鼓勵教育的多元價值觀；《蘋果日報》將批判焦點放在兩方面，一面批判馬團隊及學術官僚體制所製造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則帶有反智色彩，大力抨擊文憑主義。最後，對於國家拯救高學歷失業問題的政策，《聯合報》不予批評；但是《中國時報》與《蘋果日報》都極力批判政府對於大專以上的失業者提供短線、補貼式的就業補助。

第三，不同媒體報導個案的方式也呈現差異，《聯合報》傾向於正面報導，以博士轉業為主，淡化博士就業問題；《中國時報》採取正、反雙面報導，強調博士就業危機，也呈現博士轉業可能性；《蘋果日報》對個案採取誇大、嘲諷的報導，但同時提供被報導者主觀、職涯發展困境的深度探訪與自述報導。

相較於過去媒體對於批判國家或市場「單一意識型態」的塑造，從報導學用落差的議題看到不同媒體產制過程中「多元意識型態」的差異，《聯合報》持擁護政府的保守主義，採取實用主義與功利主義的立場，傾向教育商品化與人力資本投資的價值觀；《中國時報》則傾向批判政策的保守主義，伸張菁英階級的立場，主張

回歸教育政策控管；相對的，《蘋果日報》採取自由主義的立場，但是堅持反文憑主義、反官僚主義與反智主義的立場。臺灣當前主流平面媒體既非為國家意識型態所左右，也並不完全是商品化機制的作用，媒體基於自身利益來回應社會輿論與高教政策，形成不同意識型態鬥爭下多元、甚至內部相互矛盾的論述生產。

博士賣雞排的個案不同於過去被污名化的個人或團體，一方面引發大眾對於雞排博士就業選擇的正、反意見爭論，呈現大眾對於學用落差的不同評價；另外一方面則是看到被報導人主動利用媒體的作用，原來只是《蘋果日報》獨家的個案報導，在郭台銘批評與高度的輿情反應下，《聯合報》與《中國時報》也不得不跟進報導，宋耿郎更充分利用「說故事」的能力，讓單一報導成為各報連續報導的事件，透過名人效應來推升雞排事業的品牌形象，創造更大的商機。

回到霍爾的製碼—解碼模型，本研究發現媒體報導中具有「漣漪效應」，研究者將「漣漪效應」定義為：「媒體事件在互動式報導對話過程中擴大形成的社會影響力。」可用以補充兩個未被霍爾深入處理的面向，一是在高度競爭的媒體市場中不同媒體如何發展不同的報導方式與論述能力，編碼過程不僅是「複雜的支配結構」下的意識形態鬥爭，也是回應商業競爭、反應輿情、自我調整的論述生產過程，任何引發社會大眾關注的單一事件，都可能迫使更多媒體競相投入報導，製造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其次，補充受訪者在媒體產製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在製碼過程中涉及符碼生產的兩個面向：報導人與被導人，原來可能被污名化的報導人透過主體敘事，製造更多「故事」被報導，經過特定名人與閱聽大眾即時的回應，進一步翻轉原本媒體製造的污名為名人效應。個人敘事在互動式媒體中所製造的漣漪效應，可能超過原來媒體產製者的預期，成為被報導人利用媒體創造名人效應的實踐路徑。如同高夫曼在精神病院所見，經由媒體商品化的抵抗路徑雖然無法真正改變社會結構，卻是處於結構困境的個人透過資訊協商、情報交換可能採取的回應策略，被報導人敘事將是未來互動式媒體不得不關注的新議題。

參考書目

- 方德琳（2013）。〈人生不後悔 決勝 13 歲〉，《今週刊》，882。取自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ontent-80409-103668>
- 王彩鸞（2013 年 3 月 12 日）。〈朱經武 談觀念 只要能幫台灣 大陸人又有何妨〉，《聯合知識庫》。取自 <http://vision.udn.com/vision/story/7655/737088>

- 吳淡如 (2004 年 8 月 13 日)。〈永不出象牙塔的博士〉，《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040813/1153861/>
- 宋耿郎 (2015)。《雞排博士教你開一間會賺錢的店》。臺北：財經傳訊。
- 李子赫 (2014 年 11 月 30 日)。〈游牧老師 對人生好疑惑〉，《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141130/36236859/applesearch/%E6%B8%B8%E7%89%A7%E8%80%81%E5%B8%AB%E5%B0%8D%E4%BA%BA%E7%94%9F%E5%A5%BD%E7%96%91%E6%83%91>
- 林玉文、段鴻裕 (2007 年 8 月 10 日)。〈兒子 18 分錄取 父母：不可能去念〉，《聯合新聞網》。取自 http://mag.udn.com/mag/beijing2008/storypage.jsp?f_ART_ID=79427
- 林志成 (2010 年 5 月 25 日)。〈教部回嗆土財主：大學非職訓所〉，《中國時報》。取自 <http://newsblog.chinatimes.com/2266/archive/31887>
- 知識贏家 (n.d.)。〈知識贏家網站〉。取自 <http://kmw.chinatimes.com/>
- 侯小姐 (2014 年 11 月 26 日)。〈我念博士班 只為了「存」個家〉，《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1126/513499/>
- 倪炎元 (1999)。〈再現的政治：解讀媒介對他者負面建構的策略〉，《新聞學研究》，58：85-111。
- 黃峰文 (2003 年 11 月 7 日)。〈不能馴養反成負擔〉，《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supplement/20031107/478041/>
- 陳英姿 (2003 年 4 月 20 日)。〈留美碩士，台北開計程車〉，《聯合報》，第 A9 版。
- 管中祥 (2011)。〈弱勢發聲、告別污名：台灣另類「媒體」與文化行動〉，《傳播研究與實踐》，1：105-135。
- 蕭夙眉、朱俊彥、鄭敏玲 (2013 年 3 月 10 日)。〈棄教授夢 博士改賣雞排〉，《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30310/34878500/applesearch/%E6%A3%84%E6%95%99%E6%8E%88%E5%A4%A2%E5%8D%9A%E5%A3%AB%E6%94%B9%E8%B3%A3%E9%9B%9E%E6%8E%92>
- 聯合知識庫 (n.d.)。〈聯合知識庫網站〉。取自 <http://udndata.com/>
- 蘋果日報 (n.d.)。〈蘋果日報網站〉。取自 <http://search.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search>
- (2011 年 10 月 18 日)。〈57k 救博士 翁啟惠：提升產業水平卡實在〉，《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11018/83093/>

- (2009年8月21日)。〈蘋論：棄絕博士學者神話〉，《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90821/31879483/>
- Althusser, L. (1969). *For Marx*. London, UK: Allen Lane.
- Andrews, M., Sclater, S. D., Squire, C., & Tamboukou, M. (2004). Narrative research.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97-112). London, UK: Sage.
- Campbell, C. P. (1995). *Race, myth and the news*.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avies, J. (1999). *Diana: Constructing the people's princess*. Melbourne, Australia: Macmillan.
- Derrida, J. (1981). *Dissemination* (B. Johnson Trans.). Chicago, IL: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 Fairclough, N., Mulderrig, J., & Wodak, R. (1997).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studies: A multidisciplinary introduction* (pp. 357-378). London, UK: Sage.
- Goffman, E. (1968).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London, UK: Penguin.
- (1963). *Stigma: Notes on a spoiled identit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Gramsci, A. (1971).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Q. Hoare & G. N. Smith Trans.). London, UK: Lawrence & Wishart.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 J. W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pp. 56-90). London, UK: Methuen.
- (1980). Encoding/decoding. In S. Hall, D. Hobson, A. Lowe, & P. Will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pp. 128-138). London, UK: Unwin Hyman.
- Hall, S., Critcher, C., Jefferson, T., Clarke, J., & Roberts, B. (1978).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UK: Macmillan.
- Hartley, J. (1996). *Popular reality: Journalism, modernity,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K: Arnold.
- MacDonald, M. (1995). *Representing woman: Myths of the femininity in the popular media*. New York, NY: Bloomsbury.
- Marshall, P. D. (1997). *Celebrity and power: Fame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O'Sullivan, T., Hartley, J., Saunders, D., Montgomery, M., & Fiske, J. (1994).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odak, R. (2004).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C. Seale, G. Gobo, J. F. Gubrium, & D. Silverman (Eds.), *Qualitative research practice* (pp. 185-202). London, UK: Sage.
- Wodak, R., & Meyer, M. (2009). *Methods fo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UK: Sage.

Discourse Analysis and Narrative of Education-Job Mismatch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ed Daily News*, *China Times* and *Apple Daily*

Tai, Po-F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phenomenon of education-job mismatch has been hotly topicalized and discussed by mass media in Taiwan. Interested in the way how the discourse is shaped,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mismatch issues got reported by different news media.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ed Daily News*, *China Times* and *Apple Daily* with discourse analysis, the author finds that the three newspapers do vary significantly in terms of reporting style, content and ideology. *United Daily* shows more internal control in reporting while more compliant to government policies. *China Times* voiced more appeals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 mainly via celebrity columnists. *Apple Daily* tended to be liberal if anti-intellectual, featuring more interviews and testimonials. It therefore allowed the reported persons to apply their narrative tactics which sometimes could eventually create celebrity effects and change the previous social stigma, as exemplified by “doctor selling chicken-steak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ripple effects of the narratives of the reporters and the reported in a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contextualized by ever-intensified media competitions.

Keywords: ripple effects in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celebrity effect, stigma, education and job mismatches

* Email: 034739@mail.fju.edu.tw

Received: 2015.02.15

Accepted: 2015.05.11



繪本敘事轉述為影像歷程初探： 以繪本《雨果的祕密》之跨媒介轉述為例*

賴玉釵**

銘傳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繪本轉述為電影為例，說明繪本圖文結構如何轉述為影像敘事，並闡明繪本之跨媒介敘事潛質。繪本圖文組合形態有便於影像敘事者援用「媒介間互文性」（intermediality；即運用相仿構圖、符碼與情節等呼應原作特質），將繪本轉述為他種類型作品。以連續圖像言之，繪本以多景框描述細節，近似分鏡效果。以文字言之，繪本對話與旁白可轉為電影聲效。文字亦可補述圖像情境，電影敘事者可將此細節具像化呈現，增加眼見為真之臨場感。

關鍵詞：媒介間互文性、跨媒介改編、跨媒介敘事、圖像敘事、繪本

* 本文感謝編輯委員會、匿名評審之指導，也感謝華藝出版社之協助。末學受益良多，敬致謝忱。引用圖片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感謝主編吳伯玲之聯繫。本文敬謝律師李嘉慧女士，提供建議。此文為〈文本召喚式結構與閱聽人美感反應：以虛構類型繪本及非虛構類型繪本之美感交流歷程為比較對象〉（國科會：101-2410-H-130-027-MY2）之部份研究成果。

** 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投稿日期：2014 年 1 月 20 日

接受日期：2014 年 5 月 7 日

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跨媒介敘事 (transmedia narrative) 在圖像敘事領域漸被關注，探索媒介間轉述歷程及潛藏之跨類型質素，如小說改編為電影過程、或文學視角蘊含鏡頭語言等 (Ryan, 2004a, 2004b, 2004d)。

跨媒介敘事研究亦倡言「媒介為中心敘事學」(media-centered narratology)，盼理解科技給予敘事之協助 (Grishakova & Ryan, 2010)。「跨媒介」研究關切如何匯聚不同媒介平台以闡釋故事；近年研究盼由「媒介」形式理解敘事轉述歷程，剖析新作如擬仿原作之媒介形式、符碼與劇情 (即「媒介間互文性」，intermedaility)，以回應跨媒介實踐之態勢 (Collard, 2010; Grishakova & Ryan, 2010; Jenkins, 2006; Kress & van Leeuwen, 2001, 2006; Moore, 2010)。以圖像為例，「媒介間互文性」乃指敘事者可援用與原作相仿構圖、符碼與情節等，與轉述作品達互相指涉效果；或如電影援用小說視角、圖文書之圖像或對白等，以承襲原作特質均為「媒介間互文性」展現 (Wolf, 2005)。

近來傳播研究已留意繪本圖像轉為 iPad 電腦介面時，跨媒介平台敘事歷程之可能 (張寶芳，2010 年 12 月)。故繪本敘事者如何運用「媒介間互文性」的特質，以創作跨越媒介疆界作品，或為往後開展可研究的範疇。繪本轉述為影像等類型乃屬改編過程，意同「轉化」(transposition) 或「由某一類型改編為他種類型」，即從原初文本 (hypotext) 或原作中修正、選擇、放大、事實化、增加劇情、濃縮及融入文化脈絡繼而轉化為它種媒介文本 (Stam, 2005)。

跨媒介研究者盼理解改編歷程、產製方式及模式，剖析文化創意產業鏈增值等議題；敘事者雖強調維護原作「忠誠度」並延伸作品賞析期限，但少針對「媒介載體」如何影響詮釋歷程而進一步思辨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 Moore, 2010)。著名如繪本《野獸國》著名如繪本《野獸國》(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Sendak, 2012)、《北極特快車》(The Polar Express) (van Allsburg, 1985)、《史瑞克》(Shrek!) (Steig, 2008)、《博物館驚魂夜》(The Night at Museum) (Trenc, 2006)、《雨果的祕密》(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均由好萊塢影業改編為電影。改編者多循情節發想，為角色命名、融入多重載具 (如「華納兄弟」改編繪本《野獸國》為電影【野獸冒險樂園】，並推出互動式 App 介紹電影)、運用 3D 特效重製繪本圖像而衍生立體效果。

目前改編研究多半著重「維護原創風格」、「增加戲劇性」、「融入新媒介」或「強化文創增值」，但少著墨於對創作歷程及媒介之反思 (如思索圖像為何能

轉化成特定象徵、視覺元素對轉述歷程之影響、類型對改編歷程之框限等) (孟建, 2005; Faubert, 2011; Moore, 2010)。若從「媒介間互文性」起始, 似可剖析改編者如何反思「媒介間互文性」而顛覆後設形式並引發另種創作可能。

研究者盼理解跨媒介轉述之顯性及隱性層面, 前者包括實體作品如何延展至其他媒介平臺, 後者包含改編文本機制、「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引導敘事者再創作文本、反思後設敘事之基礎等 (孟建, 2005; Faubert, 2011; Havens, Lotz, & Tinic, 2009; Holthuis, 2010)。考量跨媒介之系列轉述中, 作品實可置入「系列加值」脈絡予以討論; 故轉述者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以重組敘事元素、思辨現有敘事形態、挑戰後設敘事等亦可再關注 (Branigan, 1984;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

前述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改編為電影【雨果的冒險】[Hugo] (以下簡稱【雨】劇) (King & Scorsese, 2011), 改編電影於 2011 年獲 11 項奧斯卡獎提名共獲 5 項奧斯卡獎。《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榮獲 2007 年美國出版界奧斯卡獎「鵝毛筆獎」、2008 年美國「凱迪克金牌獎」, 藝術表現亦受稱許; 呈現形式包括繪本、電影鏡頭、經典默劇畫面等, 已具跨媒介敘事特質 (同上引)。

《雨果的祕密》(以下簡稱《雨》書) 圖像已具體呈現事物, 連續圖像有助製作影視改編之電影故事板或分鏡圖, 均為改編有力條件 (Selznick, 2011)。另《雨》書敘事者亦融入電影劇照、電影史料、鏡頭框格設計等, 並模仿電影【有驚無險】[Safety Last] 等情節, 宛若紙上默片 (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由於《雨》書及【雨】劇向電影致意之動機明顯, 故被喻為「寫給電影的情書」(項貽斐, 2012 年 2 月 20 日)。本研究考量繪本具影像語言之特質, 且《雨》書撰寫初衷與「媒介間互文性」相符 (即「繪本」、「鏡頭語言」與「紙上默片」等互涉); 另影視作品改編者亦融入「媒介間互文性」思辨而再創作, 故本文擬以《雨》書為例剖析轉述為影視作品之歷程。

繪本作品轉述為影像時, 實需憑敘事者運用跨媒介轉換策略方能成功改編; 故理解敘事者如何轉換文本結構、並融入「媒介間互文性」而與原作唱和, 可為跨媒介敘事研究之重心 (Jones, 2009)。如圖像由線條、形狀、顏色、若干表現模式組成, 紙本繪畫則透過框格轉換以暗示人物動作、地點變更或時間轉移, 繼而鋪陳敘事結構 (Boyum, 1985)。電影提供動態景象及細密景框, 提供更多細節予觀賞者, 伴隨燈光、色澤轉換、動作表現等呈現擬真感受 (Jones, 2009)。故改編者或可思索如何轉述之不同平台類型語言, 並運用「媒介間互文性」以轉述文本。

如《雨》書轉述為【雨】劇時，改編者如何應用《雨》書原有之「故事板」及「分鏡表」概念？再如《雨》書原作者融入鏡頭語言、景框設計、電影照片等營造默片氛圍，是否有利改編者作「媒介間互文性」之跨媒介轉化？

本研究擬探索繪本作品轉化為電影之歷程，並以繪本《雨》書轉化為電影【雨】劇為例，理解繪本之跨媒介轉述機制。研究問題包括：

- 一、繪本作品之圖文結構為何？具何種潛質可作跨媒介（影像）轉化？
- 二、電影之影音結構為何？
- 三、繪本之圖文結構轉化為影音敘事時，需經何種轉述機制？「媒介間互文性」扮演何種角色？

若以《雨》書轉述為【雨】劇為例，本研究欲探詢：繪本作品具備何種元素而讓敘事者完成轉述動作？電影敘事團隊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而增刪劇情、再現圖像以細緻呈現？

研究者盼理解繪本如何改編為影像類型之歷程，並以《雨》書轉述為【雨】劇為例，從而釐清圖像文本之跨媒介改編機制及「媒介間互文性」影響力。本研究擬從繪本之圖文結構著手，分析繪本具備之潛藏視聽元素；隨後介紹電影文本結構，理解繪本轉述為影音媒介之所需條件。

本研究擬結合「媒介間互文性」之分析面向，先於文獻探索時闡釋繪本之圖文結構、影像之視聽結構；並藉此闡釋繪本與影像之「媒介間互文性」與轉述機制。研究方法則擬將跨媒介轉述歷程與「媒介間互文性」操作化，並依理論結構闡釋分析類目；研究分析則闡釋《雨》書圖文結構與【雨】劇視聽元素之「媒介間互文性」，並依此闡釋「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影響改編歷程。

研究者盼以「媒介」為重心，擬凸顯原作改編時「媒介間互文性」之影響力，或彰顯敘事者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延伸轉述策略。本研究選擇原作者加入改編團隊、且忠於原作情節之改編作品 (Meikle, 2013)，盼聚焦於「跨媒介改編」因素，故暫不論閱聽人評析改編版本之反應 (Leitch, 2008)、好萊塢電影拍攝之市場考量 (Collard, 2010)。

貳、文獻探索

敘事在文字語言已廣被探索，似較少著墨於圖像敘事範疇。圖像表述限制讓它們難如同文字般線性呈現主題，但不能排除圖像擁有視覺文法 (visual grammar) 表述故事主軸 (Ryan, 2004d)。

在視覺文化為導向時代，圖像敘事之呈現與組合形態亦值得關切，如繪本正為「看圖說故事」之類型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繪本多為「文字輔佐圖像」形態，另包括無字繪本 (wordless picturebook) 及圖文書 (illustrated storybook) 等類 (Colomer, Kümmerling-Meibauer, & Silva-Díaz, 2010; Ewert, 2004; Golden, 1990; Janet, 2011;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雨》書則為單幅圖像、連續圖像及文字情節組成，採用圖文接力方式呈現：如開場白後接續 21 跨頁無字圖畫，再以文字補述場景或連接單幅關鍵畫面。《雨》書融合「有字繪本」及「無字繪本」等形式，可視為圖文並重之「圖文書」。

下文擬鋪陳繪本結構、電影結構及跨媒介轉述等相關文獻，並輔以《雨》書及【雨】劇文本分析及敘事者考量，闡述繪本與電影之跨媒介轉述關係。

一、繪本組成結構

視覺敘事之組合形式少以獨立狀態出現，多由眾多符碼組成一系統而形成某類旨趣 (Amount & Marie, 1988 / 吳珮慈譯, 1996; Tudor, 1974)。故若欲分析視覺文本，可先研析單一「視覺符碼」，並考量符碼間「組合關係」，方能論斷「景框如何相互關聯」，既而構成「圖像加乘效果」以描繪情節概要。

下文擬從「物質基礎」起始，說明群組以構成系統之情況，並再說明物質元素如何串連為情節。以下分由繪本圖文結構及電影敘事結構，加以說明。

(一) 有字繪本之組成結構

如前所述，有字繪本結構可分為圖像及文字二層面 (Nikolajeva & Scott, 2006)。以圖像言之，其由視覺形式組成，並進而構築出具像化之「表現客體」(角色及場景)，既而組成特定系統及語境；隨著上述元素之鋪陳，圖像可漸次展開為「圖式化層次」以建構情節 (Ingarden, 1961)。

以繪本文字言之，可分為「語音語調」(如文字旋律、韻律及節奏)、「語義單元」(如淺語展現文義)、「表現客體」(文字描述角色及時空環境，協助擴展圖義)與「圖式化層次」(連綴不同文字段落以形構劇情) (Ingarden, 1973)。

圖文提供不同功能及替代性資訊，宛若音樂般具「對位」及和諧之效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圖文整合關係可包括「分離」(圖文自說自話)、「互補」(如圖像可暗示若干資訊，補充文字未言及訊息)、「對稱」

(圖文指涉同一事物但以不同媒介呈現)、「相反」(圖文呈現倒反訊息,如反諷某事)、「增強」(圖像延伸文義而細緻補充與解釋)(Golden, 1990; Lewis, 2001;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

(二) 無字繪本之組合結構

「無字繪本」敘事者可藉「一致性」與「時序關係」以建構故事因果關係(Masaki, 2010; Nikolajeva & Scott, 2006)。連續圖像「一致性」涵括重複出現之人物、地域及道具等視覺元素;「時序關係」則指藉動作變化、場景轉化、視點轉化而呈現敘事時間(邱婉嬪, 2008; 陳海泓, 2004; McCloud, 1999)。

二、電影作品組成結構：影音整合形式

視覺元素指影像構成的要素,包括人物、環境與文字造型;而聽覺元素則是影片中出現之聲音,如對白、音樂與聲效(王志敏, 2006)。以下就視覺元素與聽覺元素,分述影像文本結構的物質材料。

(一) 電影類型之視覺元素

圖像與影像均為「視覺符碼」組成,再由眾多符碼「組合」後指涉某一系統;靜態連續圖像序列需藉閱聽人想像力予以串接,電影則給予閱聽人直觀訊息,藉鏡頭語言串起「景框間之關聯」再構成「電影圖像加乘效果」(Beronä, 2001; Bordwell & Thompson, 2010)。以下擬依循圖像/影像均由「視覺元素」及多種符碼「組合關係」相似處起始,再闡釋電影之動態語言特質。

以「圖像/影像基本元素」言之,圖像/影像組成元素可化約成符碼研析,如視覺符碼包括布景、道具、服裝、動作、光線和鏡頭語言(Bordwell & Thompson, 2010; Hansen, Cottle, Negrine, & Newbold, 1998; Nelmes, 1996; Solomon, 1976)。如「布景」是為演員行動所建置環境;「道具」為演員週遭物件;「服裝」為演員穿著可助觀眾「辨別角色身分」;「動作」為演員表情和肢體語言;「燈光」為影片亮度,可能取自外景或棚內打燈(Bywater & Sobchack, 1989; Hansen et al., 1998; Nelmes, 1996)。

以「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言之,單一視覺元素亦需結合其他元素,構成某類「眾所熟知」系統以傳達更多元意涵(Daveies, 1994 / 宋瑾等譯, 2007)。如宗教畫描繪羔羊,若加入聖母或天使圖像,則羔羊可映射至宗教系統中以表現耶穌基督(同上引)。

以「景框間之相互關聯」為例，電影可運用鏡頭語言動態呈現視角；另靜態圖像之連續序列（image sequences）亦可模仿影像語言，作近似分頁或分格之圖像呈現（Beronä, 2001）。若單以電影為例，電影創作者強調影像編組及剪接之效，採用跳接或停格以呈現畫面韻律（Bazin, 1999; Bordwell, 1985; Bordwell & Thompson, 2010）。鏡頭語言可助動態圖像呈現，如鏡頭遠近、移鏡和視角等運鏡表現方式，構成電影動態特質（Hansen et al., 1998）。

再以「電影圖像加乘效果」為例，視覺元素經動態組合後具加乘效果而呈現不同意義；如西部片慣習以長鏡頭攝製人與自然環境之對抗關係，移鏡則多由東往西，暗指西部開拓路線（Hansen et al., 1998）。

大體來說，影像視覺元素涵括：具體存在視覺符碼、組合關係、景框相互關聯及圖像加乘效果。

（二）電影之聽覺元素

聽覺元素乃為「戲劇效果有關的動作或影像」服務，配樂、旁白或聲效均可輔助影像呈現（Amount & Marie, 1988 / 吳珮慈譯，1996）。電影聽覺元素包括語言、音樂與音效三者（甘凌，2002; Bordwell & Thompson, 2010），以下分述之。

1. 語言

語言指影片對白與旁白，可交待劇情或傳達角色特質（甘凌，2002；Bordwell & Thompson, 2010）。電影之對白或旁白聲音形式經組合後，方能形成某字詞或片語，帶來更高層次之語義單位；眾多語義單位匯集後，可表述特定客體（如角色）狀態，建構出表現客體意涵；而客體匯整後又成圖式化層次之事件概要，鋪陳概要情節（Ingarden, 1973, 1986）。

2. 電影音樂

音樂結構提供了旋律、節奏、和諧與音調（Ingarden, 1986）。旋律意指音調高低（聲音頻率）；節奏涉及拍子長短、輕重或快慢速度；和諧指樂曲各部分調合程度，避免予人突兀之感（同上引）。電影音樂之主要功能乃為劇情服務；故除理解整合聲音形式、旋律、和諧度、韻律之效果外，實可著墨配樂欲呈現旨趣（張岳，2002；Bordwell & Thompson, 2010）。

3. 音效

音效則包括下列 5 類：動作音效指人或動物活動時發出之聲響，如打鬥聲；自然音效為攝錄自自然環境聲響；機械音效乃機器運作聲；槍炮音效則為火藥爆破音；另特殊音效則指人為製造聲或自然音變造（張岳，2002）。聲效與發音來源同時出現之功效，即協助觀者組合視覺與聽覺元素並形成關聯（Amount & Marie, 1988 / 吳珮慈譯，1996）。

4. 小結

電影文本結構可分視覺元素及聽覺元素。就前者言之，觀眾可構連不同畫面再整合成「有意義」或「具因果關係」事件以明瞭劇情走向；後者言則包括語言、音樂和聲效，均由聲音形式組成。

三、圖像作品轉化為影像之機制

敘事者揀擇若干機制以轉述文本，同時亦會根據媒介類型特質（如電影強調速度感、臨場感與真實感等），作為轉述之重要依據。敘事者可透過「媒介」特質，運用類型之造景、燈光、聲效等安排，轉述故事（Gaudreault, 1999 / 劉雲舟譯，2010）。轉述者改編靜態圖像為影像乃「跨媒介（tranmedia）轉述」歷程，考量影像類型特質如補增故事板等連續景框，或合併靜態圖像之景框而讓影像流利呈現；即詮釋原作既有之符碼、情節與構圖等，藉由「媒介間互文性」彰顯改編與原作干涉或承襲原作（Hutcheon & O'Flynn, 2013; Murray, 2012; Ryan, 2004d）。

「媒介間互文性」可涵蓋「類型互文」（typological intertextuality）及「相互指涉互文」（referential intertextuality），前者為作品模仿特定類型之元素、結構等，後者則為作品間之呼應、引述文句或模仿圖像（Faubert, 2011; Holthuis, 2010; Warner, 2012）。詮釋者可藉「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而融入其他作品之聯想，運用先前素材以開展改編內容（Holthuis, 2010; Pavis, 2001）。故本研究盼自「類型互文」及跨類型符碼之「相互指涉互文」起始，理解《兩》書如何因「媒介間互文性」轉述為影像版本。考量較少文獻探索「媒介間互文性」及轉述機制關聯，故此處擬向「改編領域」借光；梳理改編機制並結合「媒介間互文性」特質，以歸納後續分析指標。

近年研究倡議理解「媒介間互文性」對改編之影響，改編者如何轉述原先素材、主題、類型、敘事結構或媒介平台而「再創造」新文本；並建議日後可鑽研

改編規則、轉述文法、改編歷程之類目與模型 (Booth, 2008; Faubert, 2011; Leitch, 2008; Moore, 2010)。

圖像轉述為影像機制乃為網絡般單論某一機制，故改編歷程應視為整體框架加以研析 (Faubert, 2011; Moore, 2010; Warner, 2012)。改編理論言及之包括統合、選擇素材、濃縮、加戲／放大、事實化，並依影像類型特質並搭配聲音以與畫面呼應 (Gaudreault, 1999 / 劉雲舟譯, 2010)。靜態圖像轉述為影像時，改編者可「統合」(unification) 靜態圖像，如連接框格為流暢影像、新增故事板或分鏡而將圖像轉譯為影像；另改編者需考量影像類型特質，「選擇素材」(selection) 與敘事旨趣相關或原作可彰顯「視聽元素」特質者加以凸顯 (Field, 1952; Jones, 2009; Stam, 2005)。改編者轉述圖像為影像時亦需視媒介形式相異而「重組」(reorganization) 或「濃縮」(condensation)，前者指改變原作結構與敘事元素之排序，後者則考量敘事節奏而刪減原作情節 (Field, 1952; Jones, 2009)。改編者亦可自原作之靜態圖像起始，新增更多素材而「加戲」(extrapolation) 與「放大」(amplification) 等，融入鏡頭語言及動態畫面等作更細緻鋪陳 (Field, 1952; Jones, 2009; Serra, 2010)。改編可藉「事實化」(actualization) 將靜態圖像轉為實物呈現，如依照圖像描繪事物以具體再現電影銀幕之角色及場景 (Gaudreault, 1999 / 劉雲舟譯, 2010; Meikle, 2013; Ryan, 2004b, 2004d)。

易言之，改編者將圖像轉述為影像時，可援用「類型互文」以思辨改編媒介之特質，補述靜態圖像之間隙 (gaps) 而連綴為動態影像，以達「統合」之效。再如改編者亦可藉「類型互文」特質，思考影像之敘事節奏或濃縮時間順序，將靜態圖像「重組」或「濃縮」；或考量影像流暢度及視覺語言，而「加戲」或「放大」情節描寫。

轉述者亦可思索「相互指涉互文」特質，自圖像原作中選擇視聽色彩較明顯者，即考量「媒介間互文性」而「選擇素材」。轉述者亦可取材原作圖畫，從中推演「加戲」或「放大」依據 (如模仿原作特定構圖、符碼、情節等) 而達與原作「相互指涉互文」。再如轉述者可慮及「相互指涉互文」，依據原作圖像設定而作「事實化」參考。

整體言之，研究者可由「媒介間互文性」起始，剖析改編者引述引語、典故及其欲指涉文本，繼而理解轉述理由、對類型表現之期許 (Holthuis, 2010)。故研究者可分析改編者選擇之文本元素，剖析改編作品如何「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等「媒介間互文性」。下文擬從「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起始，闡釋「媒介間互文性」如何落實於跨媒介改編之分析指標。

參、研究方法：個案選擇與分析方式

改編乃為跨媒介之展現，融入不同媒介之再現形式以產製意義；改編者亦可融入不同模式以強調重點、思索不同介面之交流形態 (Young, 2008)。研究者倡言剖析改編歷程應有「理論依據」；如可從原作與改編版之「媒介間互文性」（共享元素）起始，理解詮釋／生產歷程、類型提供之跨媒介敘事資源 (Faubert, 2011; Lowe, 2010; Serra, 2010; Voigts-Virchow, 2009)。

以「媒介間互文性」分析方式為例，研究者可由3種取徑切入。其一由文本分析以理解原作與改編版本如何互涉，研究者比對兩版本相異處並梳理文化脈絡；其二由閱聽人詮釋著手，理解閱聽人如何因「媒介間互文性」引發聯想及解讀活動；其三由作者取徑切入，闡明敘事者如何選擇特殊元素以指涉某一文本 (Booth, 2008; Holthuis, 2010; Lowe, 2010)。

由於本研究無法直接訪談原作者及改編團隊，故擬運用文本分析以理解「媒介間互文性」於轉述時扮演之角色；但本研究仍盼回歸敘事者改編脈絡，故擬引用改編團隊對「媒介間互文性」觀察，剖析改編者如何藉「類型互文」（電影應具何種表現形式）及「相互指涉互文」（援用原作何種語言及畫面等），以呈現「向電影致意」主題。另閱聽人如何因「媒介間互文性」而解讀《雨》書及【雨】劇，則不屬本研究之範疇。本研究盼兼顧「媒介間互文性」之文本分析及作者取徑面向，作為思辨研究方法之基礎。

以文本分析為例，本研究盼以繪本《雨》書為綱領，剖析圖文整合結構及具備何種「仿效電影語言」之潛質；其後再比對電影版本之詮釋、轉化、增刪或細緻化等改編機制，以理解「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具體實踐。以作者取徑為例，考量敘事者對「媒介間互文性」之想像，本研究擬輔以幕後製作說明書籍《電影雨果伙伴們》（*The Hugo Movie Companion: A Behind the Scenes Look at How a Beloved Book Beame a Major Motion Picture*）(Selznick, 2011) 等書、【雨】劇製作特輯【發現月亮】(King & Scorsese, 2011) 等電影團隊訪談（如導演自述），以理解原作者創作初衷、改編團隊如何運用繪本提及之元素作跨媒介轉述。易言之，本研究盼兼顧文本分析、原作者及改編者自剖轉述歷程，以釐清跨媒介轉述時「媒介間互文性」扮演何種角色。

如《雨》書轉述為【雨】劇時，仍盼延續原作「向電影致意」旨趣，並模仿原作構圖、情節與符碼 (King & Scorsese, 2011; Selznick, 2011)。以下擬先介紹《雨》書故事大綱，隨即說明分析繪本結構及影像敘事之策略。

一、《雨果的祕密》及【雨果的冒險】劇情簡介

《雨》書被喻為以「圖畫及文字」譜成之小說，以無字圖畫及文字情節講述而成。主角雨果（Hugo）身處 1930 年代之巴黎，是無父無母的孤兒。他藏身於鐘樓中，與其相伴者僅有父親遺物：廢棄機器人及手寫記事冊。雨果念及曾與父親一塊兒維修機器人，故以記事本為憑，嘗試組裝零件試讓機器人重新運作。

雨果為獲取維修機器人之零件，故持續在玩具店行竊。雨果某日行竊時，遭店家喬治叔叔活逮。店家見雨果記事冊表情驚愕，並堅持據為己有。雨果備感沮喪之餘，與友伴聯手展開奪回記事冊計畫。

雨果修復機器人後，他發現機器人可繪製【月球之旅】代表畫面，而且落款為“Georges Méliès”（喬治梅里埃，為「喬治叔叔」本名）。雨果僅知此為父親最愛的電影，對簽名一無所知。他與友伴共同解謎，想瞭解喬治叔叔、機器人與電影畫面的關係。

雨果在電影研究者協助下，發現原來喬治叔叔原為著名導演梅里埃；機器人乃為梅里埃親手打造之電影道具，且能繪製【月球之旅】圖像草稿。

梅里埃於 1902 年拍攝【月球之旅】時，頌揚人類應追求夢想；他變賣所有家產投入影業，視電影為實踐美夢與冒險之奇幻旅程。一次大戰後，梅里埃感嘆自己作品乏人問津，燒毀大半道具後並將電影膠捲售予鞋廠以貼補家用。梅里埃唯一未燒毀之道具為親手打造之機器人，它能繪製【月球之旅】畫面素描。梅里埃為迴避過往，將機器人捐給博物館，隱身巴黎販售玩具維生。藉著電影研究者及雨果等人努力，梅里埃作品得重新播映與問世，並重拾世人認同與褒揚。

下文擬由繪本圖文結構及影音結構著手，分述《雨》書及【雨】劇轉述策略。

二、繪本圖文結構分析方式

《雨》書乃由單幅圖像、連續圖像及文字敘述組成，全書為 185 幅圖像。本文則延用先前討論繪本圖文結構之分析指標，以分離、互補、對稱、相反及增強加以研析 (Nikolajeva & Scott, 2006; Schwarcz, 1982)。

《雨》書作者乃盼再現電影框格與手繪動畫質感，故分析《雨》書圖文結構整合形式、指涉內容後，則續說明此與影音敘事之關聯。本文逐頁分析《雨》書之圖文關係後，發現《雨》書之圖文整合形態可分成單幅圖像與文字互動、連續圖像與文字互動；研究者並逐一分析圖文形式（僅有文字描述、連續圖像、跨頁滿版圖像）、指涉內容、整合形態及潛藏電影質素。易言之，本研究即盼理解原

作者如何藉繪本「圖文互涉」之跨媒介特質，並運用繪本圖像與默片形式之「媒介間互文性」，理解此書之敘事結構。

三、電影文本結構分析方式

《雨》書作者參與編劇團隊，電影團隊轉述時亦以原作設定為考量；故本文分析電影文本時未依框格逐一區分，乃依繪本圖文整合形式為軸，並比對轉述後之影音結構。

本文參照「電影文本結構」分析指標，將【雨】劇分成視覺元素及聽覺元素兩層面；其後並依「媒介間互文性」為軸，剖析原作與改編作品之跨媒介互涉、改編者之敘事策略。【雨】劇視覺元素可涵蓋視覺符碼（道具、造景、明星、燈光、服裝與動作）、組合關係、景框間連結與加乘效果等。【雨】劇聽覺元素可涵括聲效、對白及配樂等層面，下文則引述繪本文字描寫如何轉化為聲部，並援用電影團隊說法詮釋建構聲部歷程。

四、跨媒介轉述與「媒介間互文性」之分析方式

如前所述，本研究考量「媒介間互文性」取向，盼兼顧「文本分析」並補述「作者取向」之說明。如「繪本圖文結構分析方式」及「電影文本結構分析方式」即以「文本取向」剖析原作與改編版本差異，盼理解電影文本如何呼應繪本之「媒介間互文性」並再述舊時電影。

如前所述，「媒介間互文性」可體現於「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面向。以「類型互文」言之，影像敘事者可依「類型互文」衍生對「電影」之敘事期待，「統合」靜態圖像之景框；再依電影敘事節奏以「重組／濃縮」或「放大／加戲」。以「相互指涉互文」言之，改編者可自繪本「選擇素材」而「加戲／放大」；另可參照原作圖像以「事實化」相關場景。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前文述及，目前跨媒介轉述研究多聚焦於「傳播科技」（數位匯流）對改編歷程影響、「文創產業」與改編歷程之加值鏈、改編與歷史文化意涵。考量跨媒介轉述之「媒介間互文性」扮演要角，故似應回歸「媒介形式」等本質加以探索。如圖像研究者亦指出，敘事者可反思既有載體、圖像意涵之影響（思辨是否陷入圖像公式制約。見孟建，2005）。因此言之，跨媒介研究者更應回歸「媒介」特質，剖析改編歷程中因「媒介」而起之「媒介間互文性」扮演何種角色。

由於目前「媒介間互文性」研究多半聚於文本比對與分析，本研究則整理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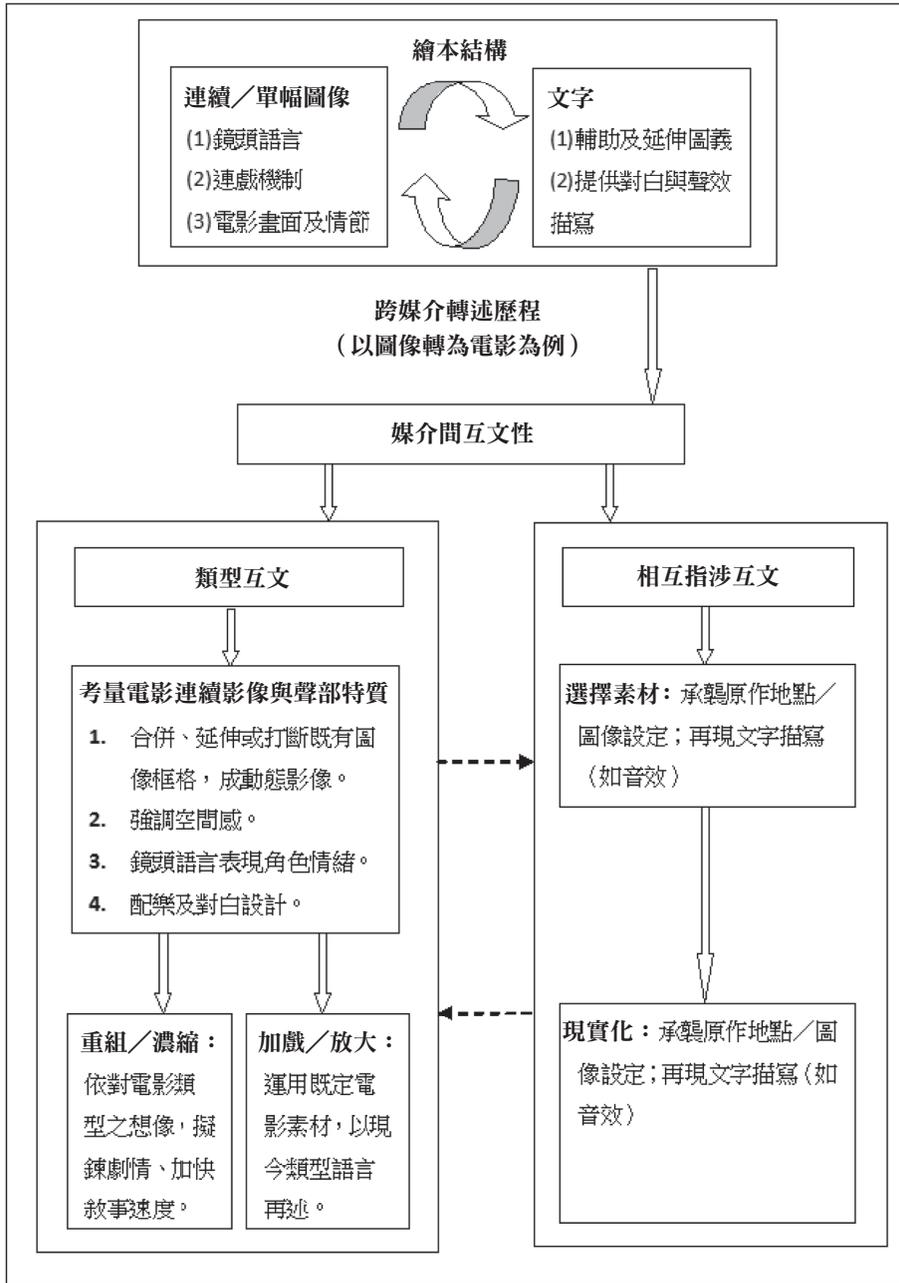


圖 1：「跨媒介轉述」與「媒介間互文性」之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如上文所述，「類型互文」與「相互指涉互文」之類目可能交互影響，故以雙向虛線表之。

本圖像及影像敘事之討論、改編機制，以剖析「媒介間互文性」如何落實於「跨媒介轉述」。本研究亦盼藉此思考，「媒介間互文性」若能引導創作歷程，則其對改編產業鏈之效力為何？若其對敘事者具有影響力，則可否成為「文創加值」之參考？

整體言之，本研究盼藉文本分析以比對「繪本圖文結構」及「電影視聽結構」之「媒介間互文性」，如原作者如何藉「媒介間互文性」與電影語言呼應、改編電影如何與繪本及舊時電影唱和。本研究盼輔以原作者及改編團隊之自述，剖析「媒介間互文性」如何落實於跨媒介轉述歷程。

肆、研究分析：繪本轉述影像機制與歷程

改編者轉述原作為影像時，除可運用先前情節等素材外，亦需運用跨媒介敘事策略等加以統合 (Hutcheon & O'Flynn, 2013; McFarlane, 1996)。研究者可思索，改編者運用「媒介間互文性」轉述時乃運用何種元素、敘事策略在建構意義歷程中扮演何種角色 (Holthuis, 2010; Lowe, 2010)。以下擬說明《雨》書之圖文結構，潛存之轉化為影像條件；之後再闡釋電影團隊改編原作之敘事策略，以剖析「媒介間互文性」扮演角色。

一、繪本《雨果的祕密》之圖文結構

《雨》書由連環畫頁、單幅畫頁及文字情節串連而成；此書涵蓋媒材甚為廣泛，包括素描、電影劇照與攝影照片等。以下擬針對繪本之分離、互補、對稱、相反及增強等機制，說明《雨》書圖文整合方式。若連續畫頁為無字者，則援引相關敘事機制（圖像一致性、因果與時序關係），闡述其如何為繪本內容服務及連戲效果。茲分成「單幅圖像與文字之整合」與「連續圖像之圖像整合」，分析此書之圖文結構。

（一）單幅圖像與文字之整合

原作敘事者亦可運用圖文整合等機制，供同部作品之不同媒材相互呼應及指涉 (Atkins, 2002)。《雨》書乃以跨頁滿版畫頁及長篇文字組成，採用單幅及連續圖像鋪陳，並輔以文字接力補述。《雨》書圖文整合形式包括對稱、互補、增強與擴充情節等數種，而少見分離與相反等層次。

1. 對稱機制

《雨》書蘊含對稱機制，即以不同媒介指涉一事。如以文字說明【火車進站】[L'Arrivée d'un train en gare de La Ciotat] 之情節後，再以【火車進站】電影畫面回應。《雨》書中兩果拜讀電影史書籍，發現 1895 年放映首部電影【火車進站】，觀眾眼見火車衝向銀幕時尖叫甚至昏倒（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346-347）。《雨》書於隔頁即單幅滿版照片，呈現【火車進站】影像（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348-349）。即運用「對稱手法」以不同媒介形式表述同一事物。

故在同一作品之「圖文互涉」部分，《雨》書已具跨媒介相互指涉之特質。再就相異媒介（繪本與電影）「媒介間互文性」言之，【火車進站】截圖提供具像化圖示而有助轉述為影像；且此敘事策略亦為【雨】劇改編者所接納，【雨】劇亦挪用【火車進站】影片以擴充文本意涵。

2. 互補機制

此書融入互補機制，如呈現跨頁畫面後，以文字補述畫頁內容；亦可在文字最末段夾帶細節，後以跨頁畫面具體呈現。

(1) 以圖補文

《雨》書除以手繪圖像作補述或前導外，也引入電影畫面與文字呼應。在繪本圖文結構部分，文字融入角色對話，或可改寫為電影對白；另如描述人物神情可助讀者視覺聯想（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250-251），亦提供具體化影像之素材。圖像描述機器人持續作畫樣態，有助細節轉譯（同上引：252-253）。

如《雨》書文字描述兩果修復機器人後，對機器人描繪事物備感驚奇（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250-251）。《雨》書其後用文字「互補」圖像未言之事，以「單幅滿版畫面」呈現【月】劇畫面（同上引：252-253）。

(2) 以文補圖

除了圖像輔助文字外，亦有文字輔助圖像情節。《雨》書起始並未言及，兩果在垃圾堆中發現何種事物，待隔頁則以「滿版圖像」呈現損壞之機器人（即梅里埃棄置道具。見 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128-131）。《雨》書再以「文字補述圖像」，闡明兩果憶及與父親共同修整機器人之回憶，補充兩果欲修復機器人動機（同上引：132-133）。故跨媒介之文本互涉，亦可見於「以文補圖」之機制。

3. 增強機制及擴展機制

文字亦可再細緻說明圖像細節，融入「增強機制」。如《雨》書以「單幅滿版圖像」描繪博物館遭逢大火畫面後（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122-123），隔頁即以文字互補形態說明火勢如何延燒整棟樓，增強說明博物館火景。《雨》書再以「擴展情節」之故事接力方式，以文字說明兩果父親已遭劫難，並鋪陳兩果居住鐘樓原由（同上引：124-127）。

整體言之，由於《雨》書屬「圖文書」類型，讀者需連接文字及跨頁插圖關係予以補白，方能貫串整體情節。書中單幅電影畫面及關鍵動作跨頁，亦為轉述影像敘事畫面及分鏡表之具像化基礎，有助於影音敘事之跨媒介轉述。在繪本之圖文結構部分，繪本圖像（含挪用之電影影像）及文字則具跨媒介互涉之效，可依「對稱」、「互補」、「增強」及「擴展」等詮釋細節，展現「媒介間互文性」。

（二）連續圖像之畫面結合

《雨》書原作者模仿故事板、鏡頭語言等與電影敘事呼應，供閱聽人翻頁時構成「視覺連戲」之效而若觀賞默片般（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Selznick, 2011）。然此連續圖像形式實與傳統無字繪本不同，而是依附於文字敘述後，以圖文互補方式呈現。《雨》書多以文字先作開場說明，並由圖像接續文字描述而融入一序列圖像。

1. 連續圖像序列之連戲機制

如前所述，《雨》書原作者已融入電影語言創作，藉「媒介間互文性」向電影致意。就閱聽人言之，或可詮釋圖像序列之因果關係，並感知動畫般連戲之效。閱聽人可融入視覺連貫之聯想，如思索動畫或默片等類型，運用想像力以填補圖像間隙（Elleström, 2010; Kuskin, 2010; McHale, 2010）。故就跨媒介轉述言之，實可思索連續圖像與電影語言之「媒介間互文性」，以彰顯「媒介」（圖文書）特質如何為改編歷程加分。

此書之無字圖像貫串方式包括「人物連戲」、「物件連戲」、「地域連戲」、「時間連戲」、「框格變化」等。

以「人物連戲」為例，《雨》書多次呈現特定角色，協助讀者貫串畫面序列；此書也描繪人物局部特寫，融入以小推大之效果以暗喻某位主角之存在。

以「物件連戲」為例，如此書在不同畫頁呈現時鐘與通風口等，有助讀者接續翻頁後場景。以「地域連戲」為例，如開場第四及第五跨頁均存巴黎鐵塔的圖像，協助讀者明瞭故事發生地。

以「時間連戲」言之，《雨》書第一至第五跨頁則依次描繪月亮、繁星至旭日東昇，暗喻時序推移而連戲。

以「框格變化」言之，開場 21 跨頁連續圖畫均無文字說明，且以粗黑底線條作為框格，展現宛若景框之效果。隨著畫頁增加，黑框也逐漸減少，主要畫面構圖增多亦隨之展開故事序幕（見表 1）。

2. 連續圖像圖文整合

視點轉化為圖像敘事之視覺語言，繪者規劃圖像視覺場景，引導讀者轉移視角以瀏覽故事其他內容 (Beronä, 2001)。《雨》書運用鏡頭位移手法，隨著鏡頭移近，讀者似可感知主角視點也逐步逼近。故《雨》書連續圖像實具場景連戲（同一場景不斷放大）與視點連戲（轉換不同視點）功能（見圖 2）。

如自 51 頁起始則以梅里埃視角，以四大跨頁逐一描述記事本扉頁。第一跨頁為梅里埃手指置於記事本上，記事本描繪齒輪、坐定之機器人樣貌 (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 52-53)；第二跨頁之鏡頭拉近，呈現梅里埃手指與機器人扉頁 (同上引 : 54-55)；第三跨頁之鏡頭再拉近，特寫機器人樣貌 (同上引 : 56-57)；第四跨頁則特寫機器人頭像 (同上引 : 58-59)。

圖片形式	圖片指涉內容
21 跨頁 (共 42 頁) 連續圖像，呈現故事發展場。	連續圖像之圖像接續： 1. 第一跨頁之畫面先以月亮起始。 2. 第二跨頁則拉遠鏡頭呈現月亮與繁星畫面。 3. 第三跨頁則拉遠鏡頭呈現月亮照耀巴黎市。以遠景呈現。 4. 第四跨頁則繪製太陽在巴黎升起。以遠景呈現。 5. 第五跨頁則延續城市與太陽之圖像線索，舖陳巴黎火車站樣貌。 6. 第六跨頁之鏡頭拉近，以火車站背景為基底，前為稀疏人群。 7. 第七跨頁再將鏡頭拉近，呈現火車站的人群。 8. 第八跨頁再帶出雨果之特寫 (暗喻雨果在人群之中)。 9. 第九跨頁描繪雨果在火車站一隅。 10. 第十跨頁 (鏡頭拉遠) 則藉著人物連戲，繪製雨果在火車站中奔走。 11. 第十一跨頁引入雨果邁入狹長隧道中。 12. 第十二跨頁則進一步描繪雨果在隧道躲閃之情況。以遠景呈現。 13. 第十三跨頁則以中景呈現通風口，並繪製雨果欲開啟之。 14. 第十四跨頁則以特寫繪製雨果的腳跟已邁入秘道中。 15. 第十五跨頁則以遠景呈現隧道另一頭商家。 16. 第十六跨頁則將鏡頭移近，描繪玩具店中老闆打盹的樣貌。 17. 第十七跨頁則為老闆警戒斜睨神情。 18. 第十八跨頁則為老闆銳利眼神之特寫。 19. 第十九跨頁呈現巴黎火車站之時鐘特寫。 20. 第二十跨頁則以近景呈現時鐘後小男孩之窺伺眼神。 21. 第二十一跨頁則繪製小男孩從時鐘後偷窺玩具店老闆與女孩之互動情況。

表 1：連續圖像之畫面整合舉隅：故事開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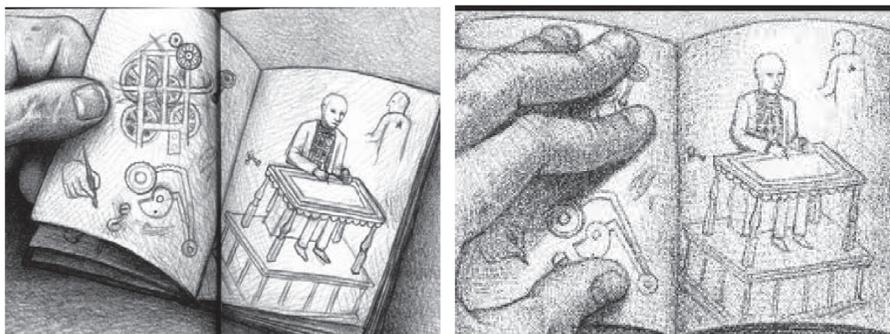


圖 2：《雨》書中梅里埃眼見機器人筆記本之連續畫頁

資料來源：均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52-55）。
註：此連續畫頁亦改編為影像，以動畫特技術轉為流動影像。

影像媒介可將靜態文本轉為動態影像，故改編者如何將圖像或文字轉為流動影像乃值得探析 (Bluestone, 1957)。如「媒介互文性」指某類型挪用另種媒介形式，共享他種類型之元素外，亦再確認自身定位 (Gaudreault, 1999 / 劉雲舟譯，2010)。如前文分析，【雨】劇團隊將《雨》書靜態圖像及鏡頭位移方式，轉以動畫形式、並模擬鏡頭移近之效，或可視為借用「動畫」以重現原作樣貌 (Meikle, 2013)。

易言之，繪本圖像提供表現客體及指涉系統外，也融入鏡頭語言等強化表現客體、表達關鍵場景；改編者可參考構圖及他種類型語言，考量「媒介間互文性」特質加以轉化 (Meikle, 2013)。

（三）繪本作品潛藏之電影質素

研究者曾以繪畫分析（構圖和色塊排列）來拆解電影圖像，如將景框比擬為畫框、畫面與油畫布面等；或藉比較各類藝術表現之差異，彰顯電影為視聽媒介之獨到處 (Aumont & Marie, 1988 / 吳珮慈譯，1996；Bazin, 1999; Bordwell & Thompson, 2010)。上文已述及《雨》書之圖文整合關係，茲將此書蘊含之影像質素整理如下。

1. 電影視覺元素應用

(1) 融入鏡頭語言

「媒介間互文性」可表現於媒介形式之挪用，如電影敘事視角 (point of view) 可模仿文學視角概念 (perspective) 建立「動態影像」類型特質 (Gaudreault, 1999 / 劉雲舟譯，2010；Chatman, 1990; Prince, 1982)。

《雨》書融入鏡頭遠近元素，如以遠景呈現周遭環境、特寫強調關鍵事物及人物表情等。隨著繪圖視角轉換，讀者可從旁觀者視角起始，轉換為某位主角視角而理解其所見與心境。如敘事者轉換鏡頭遠近及切換視角，以八跨頁描述雨果企圖解決機器人謎團之連續圖像（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206-221）。無字連續圖像具動作連戲之效，宛若分鏡表呈現情節而為轉述電影畫面之基礎。

(2) 援引真實電影畫面及情節

Selznick（2007 / 宋珮譯，2012a：356-359）將梅里埃作品特色（即變魔術之「替代」手法），融入繪本《雨》書。文字敘述「爸爸最喜歡的電影叫做【月球之旅】」，並描述梅里埃以魔術起家，並投入電影事業（同上引：354-355）。《雨》書其後以跨二大頁滿版劇照截圖，呈現梅里埃如何運用魔術之「替代」手法而讓仕女貌似消失（同上引：356-359）。

原作者運用「相互指涉互文」援引默片截圖，亦運用「類型互文」等模擬翻頁而構成「剪接」或「跳接」之效，彷彿再現梅里埃「替代」手法。易言之，原作者創作圖文書之連續圖像（如手翻書而引發動畫之視覺連戲），已運用電影動態表現之基本概念，亦呼應早期電影曾援引「替代」等魔術手法加以呈現（Kember, 2010）。

《雨》書原作者亦直接援引梅里埃之作品截圖，藉「相互指涉互文」擴充文本意象。《雨》以【月】劇為藍本，以近似素描等形式將劇照轉為繪本形態。相關圖像如圖3。

整體言之，轉述者除可援用物件、符碼、構圖等相似性外，亦可考量「類型轉化」（如繪本與電影相異）而選擇不同媒材再現。整體言之，改編作品可與原作及其他轉述版本呼應，藉由跨越相異媒介平台之特質，凸顯「媒介」對互文歷程影響力。

2. 電影聽覺元素應用

《雨》書融入對白與聲效等元素，有助轉為影音敘事。原作者以文字呈現雨果與友伴對話，「機器從來不會有多的零件，所有的零件種類和數量都絕對精確。如果整個世界是一部大機器，那麼我在這裡一定是有原因的」（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378）。若日後轉述為電影時可轉為對白，並融入演員腔調等強化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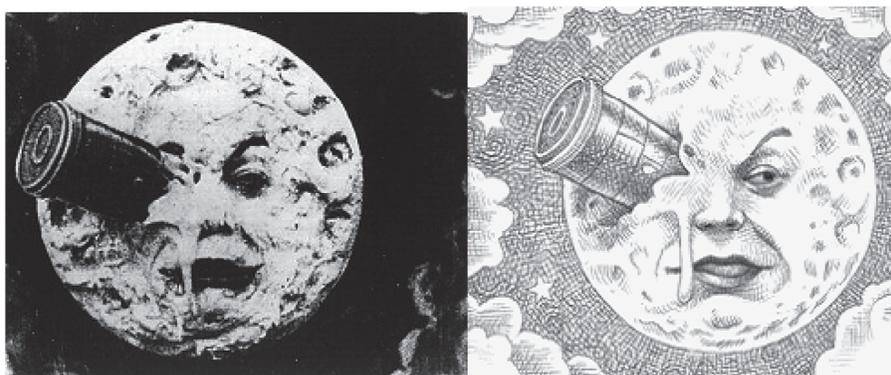


圖 3：【月球之旅】原版畫面及繪本版本

資料來源：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252-253，352-353）。

3. 小結

跨媒介轉述歷程中，意味著敘事者如何將文字／圖框轉為流動影像，採用影音等不同媒介材料及結構而濃縮或放大原作細節。以接收歷程為例，觀眾瀏覽繪本圖像時可從左頁起始、由上而下地理解圖框情節；影像雖亦由框格組成，但偏向動態且更流利轉化，並促使觀眾聚焦於某時段表現 (Jones, 2009)。故改編作品如何適時融入新元素，服膺轉述媒介之特質，亦是跨媒介敘事需面對課題。

《雨》書之圖文結構中，繪本圖像以視覺元素組成，構塑角色與場景等表現客體並組成眾所熟知之指涉系統，也融入連續圖畫之鏡頭語言等層次。《雨》書亦提供對白與聲效等元素，有助轉為電影敘事之聲部。《雨》書敘事者援用電影畫面等「相互指涉互文」元素，並運用鏡頭語言、藉翻頁之視覺連戲等「類型指涉互文」（模仿電影語言），體現與電影之「媒介間互文性」；【雨】劇則依照繪本構圖、電影史畫面及默片等「相互指涉互文」，並融入聽覺元素等兼顧「類型指涉」之效（有別於梅里埃時期之默劇，並融入對現代電影類型之敘事期待）。下文擬針對【雨】劇凸顯之視聽元素，說明原作轉為電影之改編歷程。

二、電影【雨果的冒險】凸顯之視聽元素

「媒介間互文性」（含圖像之相互擬仿）實屬「後設敘事」元素，如援用電影製作手法闡釋電影故事（劉紀蕙，1997；Nikolajeva & Scott, 2006）。以「後設敘事」（meta-fiction）言之，即指電影運用可自我指涉電影再現、製作歷程之形式；創作者可應用拍片歷程、拍片機器、拍片畫面等，表現後設敘事之元素（劉

紀蕙，1997）。由於《雨》書及【雨】劇均蘊藏「媒介間互文性」等後設文本，下文擬依「視覺符碼」、「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景框間之相互關聯」及「電影圖像加乘效果」闡釋電影後設文本如何呈現、【雨】劇如何援用拍攝電影手法再現電影史事，擴充「向電影百年致敬」題旨。

（一）電影敘事之影部呈現

原作者將《雨》書改編時，參照畫稿並延伸至電影分鏡表 (Selznick, 2011)。以下則依視覺符碼、組合關係、景框間相互關聯、加乘效果，分述【雨】劇凸顯之原作元素。

1. 視覺符碼

(1) 布景

電影團隊強調細節展現，強化布景布置。《雨》書僅以文字簡短帶過之梅里埃玻璃影棚，【雨】劇不但具體展現，並融入拍攝【仙女國】美人魚與海怪等片廠實景 (King & Scorsese, 2011)。導演馬丁·史柯西斯 (Martin Scorsese) 及改編團隊之約翰·羅根 (John Logan) 盼讓梅里埃作品如實呈現，除引述黑白默片上色版本外，並搭配【雨】劇情節呈現；【雨】劇除藉援引早期電影片段而展現「媒介間互文性」外，亦仿自歷史檔案照以重構梅里埃拍攝場景等，藉由布景等與歷史照片達「媒介間互文性」(Meikle, 2013)。

易言之，電影團隊援引【仙女國】與【月球之旅】畫面、歷史照片等，藉模仿舊作布景或挪用片段而建構「媒介間互文性」，依此再現 1930 年代之圖景。故【雨】劇實再述／再媒介化 (re-mediation) 早期之默片等經典場景，藉「相互指涉互文」而回應「向電影致意」旨趣。

(2) 道具

以再現【月球之旅】場景為例，電影團隊則參考梅里埃【月球之旅】劇照，而重新構塑道具 (Meikle, 2013)。故電影之道具造型乃引自真實照片，故【雨】劇圖像亦與經典場景具「相互指涉互文」關聯，便於閱聽人聯想梅里埃拍攝實景。

(3) 服裝

導演以歷史照片為本，探究服裝、化妝及髮型呈現；再如研究員瑪莉恩·鮑爾 (Marianne Bower) 則分析許多梅里埃照片，並剖析電影大

師工作與拍片歷程 (Selznick, 2011)。故就服裝設計言之，導演、研究員及服裝設計均援引梅里埃之檔案照片等，再現宛若「改編考古學」之歷程 (Meikle, 2013)。此亦可見服裝符碼及檔案照片之「媒介間互文性」效果，召喚閱聽人聯想早年巴黎場景。

(4) 動作

導演盼劇情流暢呈現，故強調演員肢體動作表達及走位順暢度，盼讓電影宛若舞臺劇般 (King & Scorsese, 2011)。雨果姓氏諧音「Carbret」實具法文歌舞之意，故導演安排巴黎餐廳之歌舞呈現，讓電影融入舞蹈等元素 (Selznick, 2011)。故聲音引發之意象聯想，供改編者融入特定文化情景之動作符碼（如餐廳之歌舞表演）而作改編基礎；以此亦可見「聲音」元素、意象及「動作」之相互指涉關係，故聲效及動作之關聯亦可體現跨媒介互涉之效 (Kress, 2010)。

2. 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

電影團隊改編原作時，連續圖像之視覺效果強烈者便予以保留；如火車站之巨大時鐘呈現，或將雨果居住鐘樓畫面直接轉為影像等 (King & Scorsese, 2011)。《雨》書模仿黑白默片特徵，呈現雨果轉動齒輪為時鐘上發條；【雨】劇仿自《雨》書構圖、機器符碼，作跨媒介之互涉呈現（見圖 4）。



圖 4：【雨】劇場景援用《雨》書構圖舉隅

資料來源：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78）。

故【雨】劇視覺符碼之組合關係實與繪本相仿，即圖像與影像之「相互指涉互文」而具體呈現場景。

3. 景框間之相互關聯

《雨》書原作者表示，此書融入【火車進站】、【月球之旅】及【有驚無險】等作品，繪本創作之主要靈感來自【月球之旅】(King & Scorsese, 2011)。

電影研究員融入梅里埃作品，他表示梅里埃作品充滿豐富想像力，故將此融入劇情而產生更多元表述形式 (Selznick, 2011)。由於【月】劇乃為梅里埃重要作品，而【雨】劇改編【月】劇畫面以貫串主題，彰顯電影導演不僅擬轉述原作情節，亦代表改編範疇涵蓋原作「媒介」等物質特性 (materials) (Meikle, 2013)。

再以默劇【有驚無險】為例 (見圖 5)，【雨】劇亦此構塑主角躲閃警衛追緝之構圖，設置主角懸掛於鐘樓景像。易言之，【雨】劇藉「相互指涉互文」而再現經典默劇場景；在電影媒介出現百年後，運用「媒介間互文性」向電影舊作致意。

以景框間之關聯為例，改編者除盼與原作情節互涉外，亦盼與早年默片之構圖形式及媒介特質等互涉。

4. 電影圖像加乘效果

電影改編時略去繪本開場白描寫，原作以召喚觀眾融入影像方式，描寫鏡頭



圖 5：默片【有驚無險】之構圖亦被【雨】劇沿用

資料來源：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 174-175)。
註：【有驚無險】劇照出現於《雨》書，服膺繪本模仿黑白默片之旨趣；【雨】劇則考量原作運用之電影史料，故模仿早期電影作為劇照構圖。

移向人群與雨果等情節。電影則以近乎一鏡到底方式呈現火車站、車站大門、大門後方時鐘。與原作相較，電影版更強調流暢視覺呈現 (King & Scorsese, 2011)。故【雨】劇改編時已融入對電影類型之想像，盼藉流動鏡頭語言予閱聽人速度感；另亦援引原作之構圖設計（見圖 6），並運用 3D 等數位科技再現城市造景，即實踐原作與改編版之「相互指涉互文」。

導演亦強調電影乃多向度空間組成之媒材，故在空間感上多所鋪陳與發揮；導演與攝影師融入 3D 拍攝手法，強化立體感以豐富原作敘事空間 (King & Scorsese, 2011)。導演欲突顯車站廣大及雨果鐘樓狹隘之空間對比，藉著 3D 攝影畫面技術，空間感差距更加明顯 (Selznick, 2011)。故【雨】劇導演乃藉「類型互文」（3D 電影強調景深與速度感）之想像，藉此鋪陳鏡頭語言。

再如【雨】劇拍攝火車停靠月臺之拍攝手法、取鏡角度均仿自默片【火車進站】，後者為最早出現之電影。故藉早年舊作之鏡頭語言，【雨】劇除體現「相互指涉互文」外，其拍攝手法亦可指涉較深層之文本結構（如運鏡等動態語言）。

易言之，改編者可考量情節及轉述媒介類型，運用媒介之特定語言（如鏡頭語言）轉化文字描述；或運用科技賦予之敘事資源，將靜態圖像轉化為具景深之 3D 畫面。由前文可知，文字轉為影像時需再重新構連 (re-articulation)，並依循類型之物質形式（如文字、圖像及影像等）加以表述 (Kress, 2010)。



圖 6：《雨》書開場跨頁改為【雨】劇起始片段

資料來源：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3-4)；取自《雨》書 21 跨頁之開場片段，原作模仿黑白默片呈現。

（二）電影敘事之聲部呈現

1. 對白

聲音訓練師提姆·蒙尼區 (Tim Monich) 表示，演員中並無法國人且劇本對白未融入法文；故融入法文重音及韻律，盼取代標準英文以服膺法國場景設定 (Selznick, 2011)。

轉述者可引述某作品語句、典故或文本結構，以與原作互涉 (Holthuis, 2010)。梅里埃為謀生計，將影片膠捲賣給鞋廠而熔為鞋跟，讓他往後格外害怕聽見鞋跟聲音。如《雨》書中梅里埃對白「你不知道鞋跟踏地的聲音會招來鬼魂嗎？」(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95)，反映害怕面對昔日過往及不捨。本對白亦轉為【雨】劇臺詞，【雨】劇考量「角色心境及情感」之敘事旨趣，可擇取《雨》書對話轉為對白，藉「媒介間互文性」而與原作呼應。

2. 聲效

如前所述，聲效包括動作音效、自然音效、機械音效、槍炮音效與特殊音效等項。本劇較常運用機械聲效，強調機器人、齒輪或放映機運作等聲響，亦補足《雨》書少描繪之聲效細節。聲效之搭配與選擇，反映改編者對聽覺想像與詮釋，如其臆測閱聽人較易接納之聽覺形式為何 (Kress, 2010)。易言之，改編者為何選擇特定聲效、對應之既有知識（如機械需發出何種聲響等），乃與轉述歷程之圖像元素（如布景及道具）、五感聯想等相繫 (Holthuis, 2010; Kress, 2010)。

3. 配樂

轉述者詮釋文本時，可自文本所指涉對象起始，以聯想或重構文本 (Holthuis, 2010)。編曲者霍華·蕭 (Howard Shore) 表示，配樂期能揭露故事之情感張力 (Selznick, 2011)。【雨】劇人群背景部分則融入更多音效元素，由於劇本設定為1930年代，故融入當時歌舞廳場景音樂及歌聲等配樂 (Selznick, 2011)。

易言之，配樂可因改編者對歷史文化之認知、敘事旨趣等，作為轉述基礎而傳達特定意象 (Kress, 2010)。如電影提供之影音模組等敘事資源，亦提供改編者轉述情節、賦予更多元意義之空間。

三、跨媒介轉述歷程及考量

跨媒介轉述歷程涉及相異媒介形式之轉變，敘事者運用語法（如影像結構或

公式)重製原初作品 (Jones, 2009)。敘事者轉述時需考量閱聽人對傳播形式之共識,如模仿特定類型作品之公式及表述策略以合邏輯地延伸意義;跨媒介轉述多伴隨特定考量或承載敘事功能,協助閱聽人與藝術品持續交流,並讓熟悉原作之賞析者融入改編作品 (Carroll, 2001)。

若再考量「媒介間互文性」因素,則跨媒介敘事者改編原作時,如何選擇原作元素而達跨媒介互涉效果?是否需保留對白、著名引語、典故或畫面等?或再自主題相仿之作品取經 (Holthuis, 2010)?以下擬以【雨】劇轉述繪本、電影海報與史料等歷程,剖析跨媒介轉述之敘事策略。

(一)《雨》書轉述【雨】劇機制：以「媒介間互文性」為探索軸線

敘事者需運用既定類型,以組織、重建、變形為另一類型之文本 (陳蕉譯, 2009 / Deleuze, 2002; Prince, 1982)。以下援引相關機制,並反思《雨》書轉述歷程。

1. 主題統合

主題統合意指融合敘事軸線而成貫串主線及主題 (Jones, 2009)。導演將《雨》書及【雨】劇觀眾群定位為兒童,因此敘事主軸旨在描述孤兒的心路歷程 (King & Scorsese, 2011)。在創作過程中,敘事者如何臆想「讀者反應」扮演極為關鍵的角色 (Fluck, 2002; Nellse, 1993)。創作者預想到閱聽人之喜好或對類型想像,而塑造出特殊之寫作方式、目標與題材以服膺閱聽人之審美需求 (Leitch, 2008; Thralls, Biyler, & Ewald, 1988)。

【雨】劇創作考量兒童生活,如以親情、友情與尋覓歸屬為主題 (King & Scorsese, 2011)。如【雨】劇中【月球之旅】畫面重現,雨果隨即補述「那是我父親看的電影」(King & Scorsese, 2011),回應父子親情等故事旨趣。上述臺詞並未見於《雨》書原作,乃因改編者考量主要閱聽人需求而強化相關情節 (Selznick, 2011)。易言之,跨媒介轉述者除考量「媒介間互文性」等敘事資源外,亦可融入目標族群關切主題或熟悉之敘事形態 (此目標族群可與原作重疊),藉此擴展更多元閱聽群眾。

2. 選擇

影像敘事者可選擇若干靜態圖像元素,以特殊策略鋪陳時序而服膺影像結構,達到轉述之目標 (Coleman, 1985)。【雨】劇承襲原作「向電影致意初衷」,

保留原作引述之電影史場景或圖像，亦加入不同電影史料予以擴充 (Selznick, 2011)。

以圖像為例，【雨】劇中機器人修復後描繪之圖景，乃源自梅里埃當年出品之【月球之旅】默片海報 (King & Scorsese, 2011)。由於《雨》書原作並未模仿原版海報，此為【雨】劇改編後新增敘事元素。故跨媒介敘事者實可參酌作品系譜、特定作品類型等，強化敘事初衷（如「向電影致意」）及敘事元素（【月球之旅】影片等相關文本）之關聯。

如前所述，《雨》書敘事者欲模仿默片形式，以黑白圖像序列呈現類似分鏡表、鏡頭語言之質感；原作者並融入若干梅里埃【月球之旅】及拍攝場景等電影史料，盼模擬影像形式（即「相互指涉互文」）向「電影」致意。【雨】劇改編時則從原作關切角度延伸，選擇與繪本引述之圖像、默片截圖與照片，援用「相互指涉互文」與繪本原作唱和。故繪本轉述為電影歷程中，其敘事主題乃與「媒介」（電影）相繫，《雨》書改編【雨】劇之跨類型相互擬仿，更凸顯「媒介間互文性」之於改編歷程之重要角色。易言之，《雨》書及【雨】劇分別以圖文形式指涉電影、影像再製繪本形式，彰顯「媒介間互文性」對改編歷程之重要性，此為先前文獻較少著墨處。

3. 重組／濃縮

敘事者選定素材後可重新編排敘事邏輯，亦能參考原作結構、事件發展與故事線改編 (Jones, 2009)。濃縮為敘事者去除原作中若干成分，轉述為合乎新作之主題與結構（同上引）。【雨】劇亦有不少濃縮片斷，讓劇情更為凝鍊且加快敘事速度。

如《雨》書提及，火車於 1870 年代發生穿越車站意外，並附上新聞照片闡明；其後則敘述雨果因偷食麵包而被警察追趕，意外掉入火車月台，宛若觀看電影般見火車迎面而來。

【雨】劇則重組上述兩橋段，並融入圖像描繪火車進站景像（見圖 7）。劇中雨果夢見走入火車月台，之後影片跳接至火車進站之遠景、中景、特寫，採用平行敘事手法暗喻雨果正面臨危險。剪輯 Thelma Schoonmaker 盼彰顯戲劇化元素，故濃縮情節以掌握敘事步調與場景轉換速度 (Selznick, 2011)。

《雨》書嵌入新聞圖片，並轉化電影【火車進站】圖像而達「相互指涉互文性」；【雨】劇則依此擴充，除以 3D 場景重現動態之火車失控場景外，亦模仿影史之第一部電影【火車進站】片段而拍攝火車行駛路線 (Selznick, 2011)。易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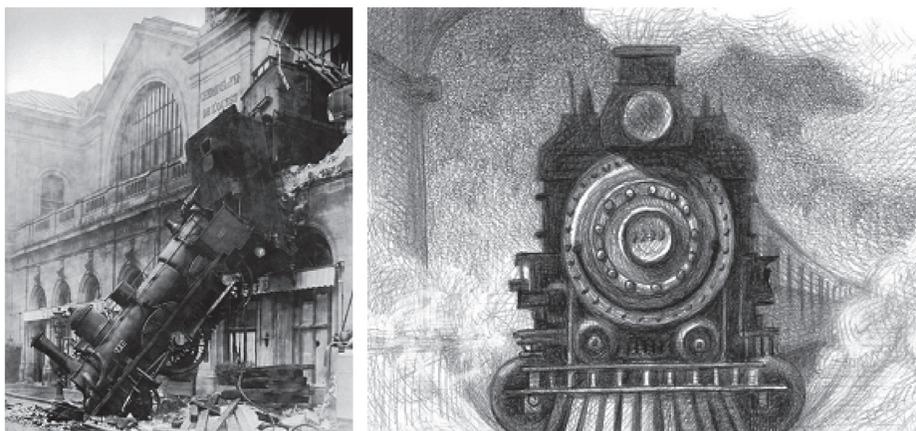


圖 7：《雨》書引述火車穿越車站之新聞圖片

資料來源：左圖及右圖出自臺灣東方出版社之《雨果的祕密》（Selznick, 2007 / 宋珮譯，2012a：382-383，460-461）。

註：右圖則為《雨》書以黑白色調描繪雨果眼見火車迎面而來場景，但【雨】劇則濃縮及重組此敘事形式。

之，轉述者藉 3D 電影「再媒介化」默片；轉述者亦擴充繪本圖像，並增加動態情節以「向電影致敬」。

4. 加戲／放大

敘事者選擇主要事件後，可加戲、濃縮、重組若干情節，也可強化某些題材細緻呈現 (Jones, 2009)。敘事者可融入新題材至改編作品，並結合原作部分情節。

【雨】劇加戲可展現於更細緻之分鏡表現、增加懸疑感、表彰角色情緒、戲劇化呈現故事情節 (King & Scorsese, 2011)。

(1) 融入細緻分鏡概念及他種類型

改編乃跨媒介轉述歷程，敘事者可援引不同媒介形式而賦加意義。故跨媒介敘事研究者實可從「媒介間互文性」起始，比對原版作品及改編版本之「共享基因」，理解改編者之詮釋策略 (Young, 2008)。

《雨》書原作屬圖文小說類型，供讀者摸索及補白，故需再細緻化相關情節 (King & Scorsese, 2011)。電影版轉化連續圖像時，需加入動作細節、位移概念及加強戲劇化成分。如梅里埃翻閱「機器人構造」記事本時（如圖 2 所示），電影版之記事本圖像以動畫形態加以連貫。故影像敘事者可考量原作圖框、序列及鏡頭語言，也可融入更多圖片細節、

動作、不同電影類型以強化連戲效果。媒介敘事者實可挪用改編類型之資源或語法，再述原版故事。

簡言之，改編者可援用動畫表現手法之「類型互文」，並思索繪本原作「手翻書」而宛若動畫效果（如圖2所示），運用繪本原先即存有之「類型互文」特質而再創作。

(2) 強化劇情流暢度

影像敘事者可重新組合靜態圖像框格，讓觀眾能更流暢地瀏覽電影畫面 (Carroll, 2001)，此亦為【雨】劇團隊之訴求。

《雨》書以八大跨頁呈現雨果與伙伴互動場景，如描繪雨果在人群中奔走、雨果友人被絆倒、雨果驚愕神情特寫、雨果伸手援助特寫等畫頁 (Selznick, 2007 / 宋珮譯, 2012a: 206-221)。【雨】劇中使用3D手法並輔以雨果友人之視角，以近景、仰角拍攝許多腳印及鞋底，暗喻面臨被踩踏危險。

無字連續圖像需憑藉讀者補白以建立其間關聯；即從閱聽人翻書歷程，體現宛若觀看不同景框之感受。影像敘事則可運用鏡頭語言、3D電影之科技等「敘事資源」，更流利且具體地交待事件始末；故改編者可藉圖像序列之「相互指涉互文」起始，依原作圖像補述更多景框，不需閱聽人動員想像歷程以連綴景框間關係。

故以跨媒介改編歷程為例，「媒介間互文性」亦體現於不同作品之相互指涉；改編者亦為原作之詮釋者，可運用與敘事主題相關之類型及引語，建立互文關聯 (Holthuis, 2010)。

5. 事實化

【雨】劇團隊著重人物表情、造景及配置等事實化歷程；待視覺元素建置完成後，各圖像系統如何連戲亦為考量重點 (Selznick, 2011)。

(1) 【雨】劇承襲原作地點／圖像設定

以「媒介間互文性」為例，轉述者可「引述」原作語句，模仿呈現方式等再創作；亦可自視覺元素起始，再創作圖像之外在特徵 (Holthuis, 2010)。

【雨】劇開場融入巴黎鐵塔圖景，與繪本原畫相仿。本劇亦持續延續30年代巴黎之場景設定（如圖6所示），並再加入凱旋門擴充法國意象。【雨】劇承襲原作【月球之旅】場景，並在影片末尾映演上色版之

默片【月球之旅】；【雨】劇亦模仿梅里埃原版之【月球之旅】海報，改編為機器人手繪草稿。

敘事者設計文本時亦依循社會規則與公式（如影像需考量聲部及影部），或思索讀者興趣何在以向日標群眾溝通 (Kress, 2010)。以影像敘事者為例，敘事者可集結影像並將特定片段加以銜接，逐步引入高潮之情節或結尾 (Baetens, 2003)。故跨媒介敘事者可依敘事目標（如向梅里埃致意），引述與原作相關場景以擴充改編作品意涵。

(2) 【雨】劇事實化繪本圖像及文字描寫

敘事者轉述靜態圖像及組合序列時，需豐富原先之視覺資訊及細節，讓圖像成功地轉成電影之橋段 (Jones, 2009)。而【雨】劇重製造景時，亦參考現實世界景像作為重構基礎。研究員參考梅里埃於 1925 ~ 1931 年之影片，盼能捕捉梅里埃工作情況及作品風貌 (Selznick, 2011)。片廠之巨型水缸、道具更換等實景，則為【雨】劇研究員考核歷史資料後展現之成果 (King & Scorsese, 2011)。故改編者可依「敘事主題」之相關資訊（如電影史之照片或研究文獻等），建構圖像／影像之「媒介間互文性」，補足原作之「電影史」書寫並以影像呈現。

整體言之，由於《雨》書屬圖文書類型，原作者最初即運用電影之「類型互文」敘事；並參酌默片等經典圖像等，藉「相互指涉互文」而擬仿影像呈現形式。另【雨】劇則融入改編者對現今電影類型之想像，融入視覺及聽覺元素強化感官體驗，並藉鏡頭語言及特效延展空間感。【雨】劇除援用《雨》書圖文之「媒介間互文性」，以選擇元素、重組／濃縮、加戲／放大、事實化外，也將經典電影「再媒介化」融入動態影像而回應「向電影百年致敬」主題。

(二) 《雨》書轉述【雨】劇歷程：以「媒介間互文性」為思辨軸心

跨媒介敘事乃指文本可時存於相異媒介平臺，如繪本改編為影像即為「跨媒介」展現。「媒介間互文性」在改編歷程扮演要角，由於改編者亦為原作之「讀者／詮釋者」，原作提供之圖像與語言如何供改編者聯想其他媒材，或為跨媒介敘事研究探索重心 (Grishakova & Ryan, 2010)。

《雨》書跨媒體轉述歷程中，電影團隊之「隱含讀者」考量似未見轉譯機制等文獻探索。【雨】劇承襲《雨》書之童書特質，以兒童作主要觀眾群，也引導主題統合（如選擇兒童感興趣之機器人為要角）及選擇（以親情與友誼為題）。

電影融合視聽元素乃為「多模組」(multimodality) 敘事展現，研究者關切敘

事者如何使用媒介、運用跨媒介之互文效果以細緻呈現符碼 (Grishakova & Ryan, 2010; Kress, 2010)。多模組敘事研究主張，敘事者需鎖定於特定語言系統（如類型）以細緻呈現符號語言，讓每一元素之功能具體展現 (Kress, 2010; Kress & van Leeuwen, 2001)。若再考量「媒介間互文性」因素，則改編者可運用原作之圖景、文字、情節及敘事結構等「相互指涉互文」，從中串接新版作品之敘事邏輯；敘事者亦融入改編類型（3D 電影等）提供之敘事資源（如增加感官刺激之科技），召喚閱聽人融入更多感官經驗。

在電影團隊轉譯歷程中，則實踐團隊所認知之電影表現形態；即藉動畫等「類型互文」重現繪本原作之動態場景。如作者、導演及攝影師考量電影畫面應具流暢感，故改編原作畫面融入更多動作細節描述；或再補增電影默片海報、檔案照片、默片之經典構圖等，體現「媒介間互文性」而回應「向電影致意」主題。而配樂師及聲音訓練師亦考量原作時地設定（為 1930 年代巴黎），故模擬法國腔以設計角色對白、融入歌舞配樂等，此亦體現語言／臺詞及法國音樂／配樂之跨媒介互涉。

以「媒介間互文性」及跨媒介轉述歷程言之，改編者可依原作圖文以「統合主題」，並依敘事旨趣（如依現今電影語言再述舊時默片）而「選擇」再述元素。電影團隊則帶入視聽元素等「類型互文」機制，以電影結構之敘事語法呈現劇情。若干劇情轉譯為影音後，可藉原作圖像「事實化」以具體呈現，而達「相互指涉互文」之效。改編者「濃縮／重組」仍援用舊時影片或照片，再述【火車進站】及【月球之旅】等動態影像；即運用繪本原初便具有之電影圖像及語言，並以影像敘事之語法予以再述。改編者亦可根據繪本舊作以「加戲／放大」，融入電影史既存之動態畫面、擬仿【火車進站】時車輛行駛月臺之視角，重新置於【雨】劇而向電影百年致意。

研究發現，跨媒介敘事者轉述時則需考量電影類型之敘事期待，如【雨】劇團隊強調電影作品需有之視聽元素；易言之，類型在改編之歷程中實扮演近似「脈絡化」之功能，它提醒敘事者可承載何種模組、各元素功能及意義。憑藉多模組敘事之轉化，敘事者可依類型特質以產製／選擇特定元素作為文本設計參考，而此層推定亦影響轉化歷程、實踐特定之模組形態 (Kress, 2010)。

之前改編文獻多半羅列改編機制，而少著墨於電影產製流程、「媒介間互文性」對改編歷程之影響，或較少思索敘事者如何與目標群眾溝通。本文則以【雨】劇為探索個案，闡釋敘事者如何思索目標族群特質後，從而引導敘事策略、視聽元素設計之歷程。另如先前文獻已言及「轉述」機制，而靜態圖像轉述電影之跨媒介「敘事策略」（如「媒介間互文性」如何體現於改編機制），似少見文獻探

索。本研究結合敘事者策略、改編整體歷程（即「敘事設計」），並再詮釋跨媒介、媒介間互文性、轉述策略之意涵，為本文之研究價值。

陸、結論與研究建議

一、結論

跨媒介敘事研究者認為，每一媒介均可再延展為不同類型（如故事衍生為電影，再延伸為電視、小說與漫畫），並提供多元體驗管道 (Jenkins, 2006)。

本研究以「繪本圖文結構」如何轉述為「影像結構」為軸，並以《雨》書轉化為【雨】劇為例，說明繪本所存在之跨媒介敘事潛質；其後並以「媒介間互文性」為例，說明原作構圖、情節、符碼與歷史照片等對改編歷程之影響。

研究發現，由於《雨》書乃融合小說及連續圖像之形態，故敘事者轉述時可從多面向角度轉譯。以連續圖像言之，繪本頁面宛若分隔景框般描述切割動作，同時作者亦可融入特寫等圖像語言描述角色神情。如繪本《雨》書作者所述，編製《雨》書時乃以黑白圖像呈現，以鏡頭堆疊方式呈現默片般之旨趣。故繪本圖文組合形態，實提供轉述為影像之跨媒介特質，便於敘事者依電影語言改編故事。

以文字層次言之，繪本之角色對話與旁白，皆可轉為電影聲效；文字亦可補述圖像情境，作為改編劇本之參考。電影敘事者可將此細節具像化及事實化呈現，增加觀眾「眼見為真」之臨場感。繪本創作者之敘事策略（如融入電影呈現形式等彰顯鏡頭語言等「媒介間互文性」），亦為轉述為電影之有力考量。

《雨》書實欲紀念電影導演梅里埃，並盼向電影致意。故【雨】劇改編者引入若干電影史上著名畫面或作品加以呈現，或如實重建梅里埃拍攝片段、模擬梅里埃拍攝片場。由於改編團隊亦為原作之詮釋者，可自「梅里埃」、「電影史」、「法國音樂」、「法國文學」等主題出發，引述視覺元素、聲音元素、經典作品引語等，而與他種類型互涉。整體言之，跨媒介敘事者可藉「媒介間互文性」，彰顯改編版本乃承襲原作特質，並應用改編類型之既定語言（如電影之多模組敘事形態）擴增原作意涵。

二、研究貢獻

跨媒介敘事關切故事如何在不同媒介間轉述，著重媒介特質對敘事影響力。媒介擁有的物質資源、表述形式及載體、傳播管道等，均可影響敘事呈現樣貌；

研究者鼓勵理解媒介形式對內容之影響，反思敘事中的媒介本質 (Ryan, 2004b, 2004c)。而敘事者轉述時考量之媒介特性，恰可反應此趨勢。

跨媒體敘事之轉述歷程中，媒體形式之表述形態、混用形態均值得關注 (Herman, 2004)。如《雨》書作者之部分靈感來源為電影導演梅里埃作品，除融入電影片斷外，亦融入鏡頭語言及連環動作圖以模仿默片質感，彰顯跨媒介特色 (Selznick, 2011)。原作者亦參與劇本寫作及角色設定等歷程，較能兼顧改編之原真性 (同上引)。在忠於原著及畫面呈現上，《雨》書如何轉述為影像、繪本彰顯何種跨媒介特質及「媒介間互文性」均可探究。

媒介形式或可開展更多敘述可能性，或施加若干限制。本研究盼思索媒介形式如何形塑內容，提供何種限制以「再創造」敘事結構、或供給更多（或更少）轉述空間並以比對轉變差異 (Herman, 2004)。本研究盼釐清轉述者跨越不同媒體情境以改編內容、融入電影後設文本，理解「電影類型」增加何種表述可能。本研究盼融入「改編」與「媒介間互文性」領域之對話，故將「媒介間互文性」分以「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論之並細緻化分析類目，此亦為本研究對「改編」及「媒介間互文性」之學理貢獻。

三、實務意涵：從「媒介互文性」反思擴充「文創加值」意涵

跨媒介敘事與文創加值乃為研究者關心議題，即藉不同媒介平台、媒介載具以轉述作品概念、以相異形態呈現改編版本樣貌 (Clarke, 2013; Collard, 2010; Moore, 2010; Murray, 2005)。如跨敘事之轉述及改編之產業鏈，乃為跨媒介研究之實務意涵，論及媒介平台匯流與文創產業關聯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 Moore, 2010)。

跨媒介敘事者可依不同類型依此豐富細節、情節，故若將「改編」作為文創產業加值言之，原作實潛藏往後作品之改編元素、另改編作品乃隱含既定作品之因子 (Clarke, 2013; Collard, 2010; Moore, 2010)。跨媒介敘事者改編原作可依既存情節延伸若干插曲，並運用新科技轉述媒介而獲得消費資本 (Clarke, 2013; Faubert, 2011)。如近期繪本轉述之數位繪本或以「動畫」形式呈現，或改編圖像以「加值版電子書」(enriched book) 面世；即運用「類型互文」(如數位繪本與動畫呼應)、「相互指涉互文」(模仿原作構圖及情節)而設計互動腳本。

故就跨媒介研究之實務意涵言之，研究者可理解原作文本如何轉述為新版本或衍生更多文創商品；效用除包括經濟效益及創收，亦思考敘事者如何援用新科

技改編作品、運用不同媒介平台之形式以產製敘事 (Collard, 2010; Faubert, 2011; Jenkins, 2006)。

本研究除承襲「跨媒介轉述」如何「延展原作意涵」之既有面向外，亦觸及改編研究關切之「改編者如何藉媒介再製作品」、「文化創意產業加值」等創收層面 (Jenkins, 2006; Moore, 2010)。如「文創加值」及「跨媒介轉述」之討論面向，較少論及實作者如何藉「反思」原作之「媒介間互文性」而達再創造可能：本研究以【雨】劇為例，闡明改編團隊如何藉「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融入對「載體」（電影）及歷史發展之思辨、從「媒介間互文性」為改編歷程加值。

或如前文所述，「媒介間互文性」乃基於創作者對圖像形式之自省，由既有圖像語言起始而作「後設敘事」思辨。以「視覺素養」為例，其強調「視覺學習」、「視覺思考」及「視覺傳播」(Seels, 1994)；而「媒介間互文性」之後設反思或可與「視覺思考」接軌，供敘事者理解既定圖像／影像語言從何而來，提供「視覺傳播」新基石。

整體言之，跨媒介敘事者援引「媒介間互文性」概念創作時，或可同【兩果的冒險】般由後設視角再思「電影」載具（即思考「媒介平台」屬性、「類型互文」特質），融入更多再創作素材。故反思「媒介互文性」、援引歷史文化相關之素材以擴充意涵（或顛覆既定架構而再創新義），或為思索改編產業與文創加值之新取向。

四、研究建議

本研究乃針對「跨媒介敘事」之「媒介間互文性」如何影響改編策略；「媒介間互文性」引導改編者之聯想，或藉「媒介間互文性」開展改編之再詮釋歷程均值得探究 (Voigts-Virchow, 2009)。

以圖文書《奇光下的祕密》(Selznick, 2011 / 宋珮譯, 2012b) 為例，此書乃分別以連續圖像及文字介紹主角們之成長歷程。此書以圖像再現女主角之成長背景，並以小說形式描述男主角追尋歸屬之始末。敘事者藉暴風雨、尋找、閃電、星空等元素，以內部圖／文相互唱和之方式闡釋故事。易言之，《雨》書繪本圖文乃依電影之「媒介間互文性」起始，以電影「類型互文」及默片圖像「相互指涉互文」達到向「電影百年致意」目標。再如《雨》書轉化成【雨】劇時，亦藉扣合原作言之電影史場景及鏡頭語言，依現今 3D 電影語言「再媒介化」經典默片。而《奇》書（同上引）則藉繪本圖文「媒介間互文性」，串接兩位主角之

敘事軸線。故《奇》書更仰賴圖文整合之內部敘事邏輯，援引之「類型互文」及「相互指涉互文」未必均始於默片等類型。

本研究考量「媒介間互文性」之於改編歷程功能，並輔以電影視聽元素之多模組特質，故以《雨》書轉為【雨】劇為例以剖析「媒介間互文性」與跨媒介轉述之關聯。若以其他圖文書籍言之，其「媒介間互文性」機制（擬仿類型、擬仿情節、模仿符碼、致意之深層結構等）或有不同，亦可能引發相異之改編歷程。

整體言之，原作內部之「媒介間互文性」（圖與文）、改編與原作之「媒介間互文性」，或可再依個案殊異而再作闡釋 (Voigts-Virchow, 2009)。故不同「媒介間互文性」之表述形態，如何引發相異之轉述策略，或為未來可再研析觀點。

參考書目

- 王志敏（2006）。《現代電影美學體系》。北京：北京大學。
- 甘凌（2002）。〈電影聲音的藝術再現——對聲音主觀表現性的討論〉，姚國強、孫欣（編），《審美空間延伸與拓展——電影聲音藝術理論》，頁 123-136。北京：中國電影。
- 吳珮慈譯（1996）。《當代電影分析方法論》。臺北：遠流。（原書 Amount, J., & Marie, M. [1988]. *L'analyse des films*. Paris, France: Fernand Mathan.）
- 宋珮譯（2012a）。《雨果的祕密》。臺北：臺灣東方。（原書 Selznick, B. [2007]. *Hugo*. New York, NY: Scholastic.）
- （2012b）。《奇光下祕密》。臺北：天下文化。（原書 Selznick, B. [2011]. *Wonderstruck*. New York, NY: Scholastic Press.）
- 宋瑾、柯楊、陳燕婷、高拂曉、汪濤、王維等譯（2007）。《音樂的意義與表現》。湖南：湖南文藝。（原書 Daveies, S. [1994]. *Musical meaning and express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孟建（2005）。《圖像時代：視覺文化傳播的理論詮釋》。上海：復旦大學。
- 邱婉嬪（2008）。《親子共讀無字圖畫書歷程之互動與反應》。國立臺南大學幼兒教育學系碩士論文。
- 張岳（2002）。〈美術片聲音元素解構——淺談動畫片的聲音元素及其運用〉，姚國強、孫欣（編），《審美空間延伸與拓展——電影聲音藝術理論》，頁 150-168。北京：中國電影。
- 張寶芳（2010年12月）。〈從媒介機緣談數位敘事的可能與限制〉，「頂尖大學核心計畫年度成果發表會」論文。臺北。

- 陳海泓 (2004)。〈無字圖畫書和錄影帶對兒童故事推論的影響〉，《國立編譯館館刊》，32 (2)：51-63。
- 陳蕉譯 (2009)。《法蘭西斯·培根：感官感覺的邏輯》。臺北：國立編譯館。(原書 Deleuze, G. [2002]. *Francis Bacon: Logique de la sensation*. Paris, France: Editions de la Difference.)
- 項貽斐 (2012年2月20日)。〈雨果的冒險 闖進奇幻世界〉，聯合報，第C3版。
- 劉紀蕙 (1997)。〈跨藝術互文與女性空間：從後設電影談蘿茲瑪的藝術相對論〉。《中外文學》，25 (12)：52-81。
- 劉雲舟譯 (2010)。《從文學到影片：敘事體系》。北京：商務。(原書 Gaudreault, A. [1999]. *Du littéraire au filmique, système du récit*. Paris, France: Méridiens Klincksieck.)
- Atkins, J. E. (2002). Picturing "Samuel Richardson:" Francis Hayman and the Intersections of word and image.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14, 465-505.
- Baetens, J. (2003). Illustrations, images, and anti-illustrations. In M. E. Hocks & M. R. Kendrick (Eds.), *Eloquent images: Word and image in the age of new media* (pp. 179-199). London, UK: Routledge.
- Bazin, A. (1999).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In L. Braudy & M. Cohen (Eds.),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Introductory readings* (pp. 43-56).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 Beronä, D. A. (2001). Pictures speak in comics without words. In R. Varnum & C. T. Gibbons (Eds.), *The language of comics: Word and image* (pp. 19-39). Jackson, MS: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Bluestone, G. (1957). *Novels into film: The metamorphosis of fiction into cinem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ooth, P. (2008). Intermediality in film and internet: *Donnie Darko* and issues of narrative substantiality. *Journal of Narrative Theory*, 38, 398-415.
- Bordwell, D. (1985). *Narration in the fiction film*. London, UK: Methuen.
- Bordwell, D., & Thompson, K. (2010). *Film art: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Boyum, J. G. (1985). *Double exposure: Fiction into film*. New York, NY: Universe Books.
- Branigan, E. (1984). *Point of view in cinema: A theory of narration and subjectivity in classical film*. New York, NY: Mouton.

- Bywater, T., & Sobchack, T. (1989).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criticism: Major critical approaches to narrative film*. New York, NY: Longman.
- Carroll, N. (2001). *Beyond aesthetics: Philosophical essay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tman, S. (1990).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larke, M. J. (2013). *Transmedia television: New trends in network serial production*. London, UK: Bloomsbury Academic.
- Coleman, E. J. (1985). The funnies, the movies and aesthetics.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18(4), 89-100.
- Collard, C. (2010). Adaptive collaboration, collaborative adaptation: Filming the Mamet Canon. *Adaptation*, 3, 82-98.
- Colomer, T., Kümmerling-Meibauer, B., & Silva-Díaz, C. (2010). *New directions in picturebook research*. New York, NY: Routledge.
- Elleström, E. (2010). The modalities of media: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intermedial relations. In L. Elleström (Ed.), *Media borders, multimod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pp. 11-4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Ewert, J. (2004). Art Spiegelman's *Maus* and the graphic narrative. In M. Ryan (Ed.), *Narrative across media* (pp. 178-193). Lincoln, UK: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Faubert, P. (2011). "Perfect Picture Material:" *Anthony Adverse* and the future of adaptation theory. *Adaptation*, 4, 180-198.
- Field, A. E. (1952). *Hollywood, U.S.A.: From script to screen*. New York, NY: Vantage.
- Fluck, W. (2002). The role of the reader and changing functions of literature: Reception aesthetics, literary anthropography, Funktionsgeschichte. *European Journal of English Studies*, 6, 253-271.
- Golden, J. M. (1990). *The narrative symbol in childhood literature: Explor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 Berlin, Germany: Mouton.
- Grishakova, M., & Ryan, M. (Eds.). (2010). *Intermediality and storytelling*. New York, NY: De Gruyter.
- Hansen, A., Cottle, S., Negrine, R., & Newbold, C. (1998).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vens, T., Lotz, A. D., & Tinic, S. (2009). Critical media industry studies: A research approach. *Communication, Culture & Critique*, 2, 234-253.
- Herman, D. (2004). 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 In M. Ryan (Ed.), *Narrative across media* (pp. 46-75).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Holthuis, S. (2010). Intertextuality and meaning constitution. In J. S. Petöfi & T. Olivi (Eds.), *Approaches to poetry: Some aspects of textuality,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mediality* (pp. 77-93).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Hutcheon, L., & O'Flynn, S. (2013). *A theory of adapt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Ingarden, R. (1986). *The work of music and the problem of its identity*. London, UK: Macmillan.
- (1973).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borderlines of ontology, logic,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With an appendix o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in the theater*.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1961). Aesthetic experience and aesthetic objec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21, 289-313.
- Janet, E. (2011). Raymond Briggs: Controversially blurring boundaries. *Bookbird*, 49(4), 49-61.
- Jenkins, H. (2006).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M. (2009). *Found in translation: 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aspects of the adaptation of comic art to film*. Saarbrücken, Germany: VDM Verlag Dr. Müller.
- Kember, J. (2010). Productive intermediality and the expert audiences of magic theatre and early film. *Early Popular Visual Culture*, 8(1), 31-46.
- King, G. (Producer), & Scorsese, M. (Director). (2011). *Hugo* [Motion Picture]. United States: Paramount Pictures and GK Films.
- Kress, G. (2010). *Multimodality: A social semiotic approach to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Kress, G., & van Leeuwen, T. (200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2001).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UK: Hodder Arnold.
- Kuskin, W. (2010). Vulgar metaphysicians: William S. Burroughs, Alan Moore, art

- spiegelman, and the medium of the book. In M. Grishakova & M. Ryan (Eds.), *Intermediality and storytelling* (pp. 49-77). New York, NY: De Gruyter.
- Leitch, T. (2008). Adaptation, the genre. *Adaptation, 1*, 106-120.
- Lewis, D. (2001). *Reading contemporary picturebooks: Picturing text*. London, UK: Routledge.
- Lowe, V. (2010). "Stages of performance:" Adaptation and intermediality in *Theatre of Blood* (1973). *Adaptation, 3*, 99-111.
- Masaki, T. (2010). A strawberry? Or the planet? Children's aesthetic response to the picturebook strawberries by Susumi Shingu, moving art sculptor. In T. Colomer, B. Kümmerling-Meibauer, & C. Silva-Díaz (Eds.), *New directions in picturebook research* (pp. 151-164). New York, NY: Routledge.
- McCloud, S. (1999). *Understanding comics: The invisible art*. New York, NY: Paradox Press.
- McFarlane, B. (1996). *Novel to fil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adaptation*. Oxford, UK: Clarendon.
- McHale, B. (2010). Narrativity and segmentivity, or, poetry in the gutter. In M. Grishakova & M. Ryan (Eds.), *Intermediality and storytelling* (pp. 27-48). New York, NY: De Gruyter.
- Meikle, K. (2013). Rematerializing adaptation theory. *Literature/Film Quarterly, 41*(3), 174-183.
- Moore, M. R. (2010). Adaptation and new media. *Adaptation, 3*, 179-192.
- Murray, S. (2012). *The adaptation industry: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adaptatio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2005). Brand loyalties: Rethinking content within global corporate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7*, 415-435.
- Nellse, W. (1993). Historical implied authors and reader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45*, 22-46.
- Nelmes, J.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Nikolajeva, M., & Scott, C. (2006). *How picturebooks work*. New York, NY: Routledge.
- Pavis, P. (2001). Theatre studies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Theatr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26*, 153-163.
- Prince, G. (1982). *Narratology: The form and functioning of narrative*. New York, NY: Mouton.

- Ryan, M. (2004a). Face-to-face narration. In M. Ryan (Ed.), *Narrative across media* (pp. 41-45).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2004b). Will new media produce new narratives? In M. Ryan (Ed.), *Narrative across media* (pp. 337-359).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2004c). Introduction. In M. Ryan (Ed.), *Narrative across media* (pp. 1-39).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2004d). Still pictures. In M. Ryan (Ed.), *Narrative across media* (pp. 139-144).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Schwarcz, J. H. (1982). *Ways of the illustrator: Visual communication in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cago, IL: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 Selznick, B. (2011). *The Hugo movie companion: A behind the scenes look at how a beloved book became a major motion picture*. New York, NY: Scholastic.
- Seels, B. A. (1994). Visual literacy: The definition problem. In D. M. Moore & F. M. Dwyer (Eds.), *Visual literacy: A spectrum of visual learning* (pp. 97-112). 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endak, M. (2012). *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 Serra, I. (2010). From literature to film through figurative arts: Italian imagistic substitutions. *Adaptation, 4*, 137-166.
- Solomon, S. T. (1976). *Beyond formula: American film genres*.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and Jovanovich.
- Stam, R. (2005). *Literature through film: Realism, magic and the art of adapt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 Steig, W. (2008). *Shrek!* New York, NY: Square Fish.
- Thralls, C., Biyler, N. C., & Ewald, H. R. (1988). Real readers, implied readers, and professional writers: Suggested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25*(2), 47-65.
- Trenc, M. (2006). *The night at the museum*. Woodbury, NY: Barron's Educational Series.
- Tudor, A. (1974). *Image and influence: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film*. New York, NY: St. Martin's.
- van Allsburg, C. (1985). *The polar express*.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 Voigts-Virchow, E. (2009). Metadaptation: Adaptation and intermediality -- Cock and Bull. *Journal of Adaptation in Film & Performance, 2*, 137-152.

- Warner, R. (2012). The cinematic essay as adaptive process. *Adaptation*, 6, 1-24.
- Wolf, W. (2005). Intermediality. In D. Herman, M. Jahn, & M. Ryan (Ed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pp. 252-256). London, UK: Routledge.
- Young, P. (2008). Film genre theory and contemporary media: De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intermediality. In R. Kolk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pp. 224-25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om Picture -- Book Story to Film Narra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media Adaptation Process of *Hugo* from *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Lai, Yu-Cha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ing 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transform a picture-book story into a film narrative? How to appropriate the static graphics of the print text for constructing the audio-visual dynamics of a film?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adaptation process,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the film *Hugo* from the picture-book *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by focusing on the potentials of picture-books as transmedia narratives. Typically combining graphics and text in its print format, the picture book is actually rich in intermediality useful for the adaptation. Thus, the text of the picture book, used to fill in where the visual scene might lack, could be actualized by the narrator in the film to enhance the immediacy of the scene as reality. That explains how the dialogue and narrative in the picture-book *The Invention of Hugo Cabret* are presented in *Hugo* the film as conversation and voiceover with sound effects. As to the sequences of images, multiple frames or series of frames used to bring up the story details in the picture-book are equivalent of the storyboards in film production. By specifying the role “intermediality” plays in the process, the author then identifies several adaptation mechanisms at work, which suggests wha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in transmedia narratology.

Keywords: intermediality, transmedia adaptation process, transmedia narratology, film narrative, picture-book

* Email: raven.claw@msa.hinet.net

Received: 2014.01.20

Accepted: 2014.05.07

院線紀錄片再媒介化之媒介化分析： 以【看見台灣】經驗為例

曹琬凌*

商業周刊編輯部影視顧問

摘要

紀錄片曾是臺灣民主化進程之重要文類，近年卻顛覆另類、小眾性格，紛紛上戲院商業映演並召喚大眾，如【看見台灣】創兩億元票房，即在社會形成巨大擾動。本文以此個案，討論紀錄片再媒介化歷程，以媒介化理論為分析架構，從媒介化研究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兩項傳統出發，視媒介為影響人們日常生活的廣泛效應；一方面分析符合最大公約數的媒介邏輯；二方面剖析空拍紀錄片將「真實」再媒介化，並且新舊媒介混搭所帶來使用者整體經驗。

關鍵詞：再媒介化、使用者經驗、院線紀錄片、媒介化、媒介邏輯

* Email: selena.tsao@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年10月6日

接受日期：2015年1月13日

壹、前言

從上個世紀末胡台麗的《穿過婆家村》進入戲院商業映演開始，紀錄片上院線已成臺灣 10 多年來獨特的文化現象。2013 年上院線紀錄片高達 12 部，其中【看見台灣】更締造國產紀錄片最高票房、觀影人次最高、超過一千場企業與團體包場等歷史紀錄（林昭儀，2014 年 2 月 21 日）。這些院線紀錄片藉由商業映演的行銷手段，引發大眾討論與關注，也鬆動臺灣紀錄片的小眾性格與批判傳統（蘇威銘，2014）。一方面大大拓展紀錄片所承載議題的能見度，另一方面也常被批判為中產社會對於公共道德贖罪券式之寄託。

宛如磁石兩端的正負兩極評價，同樣出現在【看見台灣】的案例。該片在院線上映 3 個半月，以空拍視角關注臺灣積累已久的環境問題，不僅成為街談巷議話題，也成行政立法部門會議重點；媒體形容它是關懷臺灣環境的寧靜革命，到電影院看電影儼然成為一種「愛臺灣運動」（都會地方中心記者，2013 年 11 月 27 日）。但相對於主流媒體呈現之政府與民間空前社會感動、關注與動員；在另類媒體卻遭致濫情、只看問題表象的強烈批判（台灣立報，2013 年 12 月 10 日；胡慕情，2013 年 11 月 7 日；郭力昕，2013 年 12 月 16 日）。

以上兩種論點，似乎不足以解釋紀錄片【看見台灣】在社會擾動的全部面向。作為臺灣第一部大規模空拍電影，本片突破傳統紀錄片攝製規格，採用數位高畫質空拍技術，同時呈現臺灣山川美景與飽受摧殘、破壞的一面，讓生活在臺灣土地上的人們得以俯瞰身處的家園，不僅獨特視角構成嶄新經驗，在傳播途徑上亦見網路社群媒體動員、傳統媒體大幅報導、政策跟進檢討之線上／線下交互影響之議題溢散效益，實為近年難得之傳播個案。本文嘗試從紀錄片之「再媒介化」（remediation）歷程，應用「媒介化」（mediatization）理論為研究架構，討論臺灣此部空拍紀錄片之媒介廣泛效應。

貳、問題意識

「媒介化」是近 10 年內歐陸傳播研究領域積極探索的理論概念，Couldry & Hepp (2013) 分析，此詞是中介（mediation）、媒體化（medialization）等相似概念中之勝出者，用以描繪日常生活、實務媒介組織、以及由各種脈絡和實踐類型而來之無所不在媒介內容與平台形成的廣泛效應（broad consequence）。探討此一概念的學者們認為，媒介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帶來深刻影響，單以文本分析、產製政治經濟學、閱聽人或接收分析不足以盡述；為尋求一個能夠表述媒介橫跨日

常生活與社會所帶來廣泛效應的語詞，促成「媒介化」的整合性概念，並以此批判性分析媒介與傳播以及文化與社會變遷之間的相互關係。

Couldry & Hepp 進一步分析，科技的進步使得媒介在日常生活日趨重要，促成 2000 年代中期「媒介化」概念興起；當擁有高速網路在已發展國家成為常態、行動電話幾近普及、網路搜尋能量大幅擴增、部落格與網路影音分享 YouTube 崛起、以及社群網站的流行，在在使得媒介成為我們每天日常生活中，聯繫孩子、朋友、家人、工作的基本參照點。媒介無所不在以及多面向本質構成我們生活的「肌理」(texture) (Silverstone, 1999: 6)，因而需要從產製／文本／閱聽人的不變三角層面另行發展新研究取徑。

以臺灣紀錄片近年上院線為例，可略窺「媒介化」徵兆。除傳統名人代言、媒體宣傳外，網路社群經營是電影行銷不可或缺的先行策略，如【看見台灣】在 11 月上映約半年前，即以「邀請到臺灣歐吉桑吳念真導演為電影擔任旁白，用充滿情感的聲音帶領大家……」的名人代言感性訴求，開設臉書粉絲團網頁；之後以密度高於一般紀錄片宣傳之影音預告，波段散布包括後製幕後與導演訪談等訊息，臺北戶外首映更利用 FlyingV 網路群眾籌資方式，成功募得 248 萬餘元首映經費，臉書粉絲數快速上升，迄今超過 15 萬人（見 <https://www.facebook.com/Abovetai>），顛覆紀錄片非主流、小眾性格，成功召喚大眾而成為一種流行。

此種主流商品化的發展與傳播策略，若以「媒介化」視角觀之，確實透過多平台、無所不在的內容，在人們每日生活中形成一種網絡，以非線性互文方式構連出大眾認知的廣泛效應。

作為一種傳播實踐途徑，院線紀錄片融合數位高畫質技術以及電影商業映演通路，亦可從「再媒介化」概念加以探討。所謂「再媒介化」，簡單地說就是：「媒介就是它的再媒介化」(a medium is that which remediates)；亦即挪用其他媒介的技術、形式與社會重要性，企圖以真實為名將之更新或重設。此概念認為，媒介在我們的文化中從未孤立運作，必須進入與其他媒體相互關係之中。尤其在今日，我們更必須參照其他媒介而認知此一再現力量 (Bolter & Grusin, 2000)。

在西方紀錄片發展的早期歷史中，正存在此種「再媒介化」現象。紀錄片學者 Nichols (2001) 提出 6 種再現模式之中的「觀察模式」(the observational mode)，就與 1950 年代攝影與收音技術進展密切相關。當時可攜式 16 釐米的攝影機與同步收音技術的發明，解放了必須在攝影棚內拍攝限制；幾乎可自由到任何地點記錄影像與聲音，促成想要去中介而複製生活片段之企圖，也就是，假裝攝影機是不存在的。因此「觀察式模式」中，攝影機與拍攝者成為「牆壁上的

蒼蠅」(fy on the wall)，以一種對世界不冒犯的、觀看的方式來凝視 (Beattie, 2004)。

讓畫面看得「更真」，也成為攝影師無止盡的追求。【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回溯 20 年空中拍攝歷程時曾說：「我們以拍照為職業的人，追求的就是別人拍不出來的畫面。」(齊柏林, 2013: 47) 近 10 年，他開始透過網路標購各種能精進空拍影像品質的美國軍用偵查機鏡頭，後來震撼於日本 NHK 與英國 BBC 拍攝的 HD 空拍影片，開始動念挑戰拍攝動態影像，2009 年決心買下美製的 Cineflex 高畫質攝影系統，內建陀螺儀穩定器，可以抵抗飛行產生的震動，提供穩定的空拍畫質。這套系統是全球第 168 部，卻是臺灣第一部 (齊柏林, 2013)。

「不要懷疑，這就是臺灣。如果你沒有看過，是因為你站得不夠高！」【看見台灣】從這句鏗鏘有力的旁白開始，以第三者所謂「上帝的口吻」直接傳達記錄者觀點；同時，透過數位 HD 攝製技術，使得穩定高角度拍攝成為可能，垂直性鏡頭的視覺語言，讓觀者得以俯瞰式掌握「權力觀點」(the point of view of power) (Kress & van Leeuwen, 1996)。全片雖以第三人稱旁白、即 Nichols (2001) 之「解說式模式」(the expository mode) 主導敘事，觀者卻得以用前所未有的視野俯視「既熟悉又陌生的山川土地，只因我們從未有機會以這樣的角度仔細凝視」(賴青松, 2013: 6)。

當被凝視的對象是臺灣島嶼、是臺灣人民「生於斯，長於斯」的家園，透過觀看而再現的真實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以真實為本質的紀錄片猶如經歷「再媒介化」，嶄新科技再現過去看不見卻存在著的「真實」。

但究竟什麼是真實 (reality)？人類經驗感知以外而獨立存在的真實究竟是否存在？數千年以來哲學家與科學家對此爭議不休，也是新聞傳播研究的重要課題 (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 1999)。在紀錄片領域，早從有此文類以來，如何再現真實的辯論亦未曾止歇；記錄者是在場的主體、還是沉默的主體？一直處於論辯之中。德國新電影重要導演華納·荷索強烈主張風格化，他曾在全球紀錄片重要場域——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 (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 IDFA) 大會上，為紀錄片工作者場景安排 (stage scenes) 的權利辯護：「場景安排 (staging) 是每個紀錄片工作者都該做的事，所謂的真實電影只適用於 1960 年代。」他認為，不斷推陳出新的數位特效軟體與技術，改寫了真實的定義 (林泰州, 2008 年 9 月 9 日)。此種看法無異於呼應了再媒介化的觀點。

【看見台灣】以數位空拍技術再媒介化後的「真實」，加上電影行銷宣傳操作成功，在臺宣傳與映演期間長達九個月，造成的廣泛效應似乎不只「愛臺灣」與「濫情無視於結構」的支持與批判二元論述而已，因而促使本研究嘗試用「媒介化」這個新傳播概念，反思此一現象。

「媒介化」至今沒有統一定義，Deacon & Stanyer (2014) 研究 2002 到 2012 年 14 個主流媒介傳播期刊共 93 篇論文後發現，81% 的文章只提到此詞卻未予定義。德國學者 Hepp (2013) 將此概念歸納為「制度論者」(institutionalist) 與「社會建構論者」(social-constructivist) 兩項傳統：前者認為媒介或多或少具有獨立的媒介邏輯，媒介化指涉不同的社會場域與系統如何適應此一制度性規則的過程，主要關注「大」媒介與其向心力；後者則強調傳播建構社會與文化真實過程中各媒介的狀態，特別關注數位媒介與個人傳播，亦即「小」媒介與其離心力。「媒介化」於是更開放地同時論及如何在某特定媒介傳播過程所建構的真實，以及整體過程中的脈絡化效應 (contextualized consequences) (Couldry & Hepp, 2013; Deacon & Stanyer, 2014; Hepp, 2013)。

如前述，新媒介科技已無所不在的構成我們日常生活的肌理，故要理解此脈絡化效應，若以媒介化研究取徑，除探究【看見台灣】製作行銷團隊背後默示的「媒介邏輯」，亦須關照由傳播建構之閱聽人（或進一步稱之為新科技的使用者）整體經驗。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念萱、李嘉維 (2009) 曾以意義產製 (sense making) 的角度審視閱聽人與科技物之間的準社會互動，從認知面 (knowing)、情感面 (feeling)、體驗面 (doing) 三方面探討使用者整體經驗，本研究嘗試以翁秀琪等人建構的理論概念出發，解析此片滲入人們日常生活之廣泛效應。

綜上探討，本研究擬定研究問題有三：

- 一、紀錄片由另類媒體轉入院線經營之商業主流平台，綜合那些歷史、技術、社會、經濟要素？在【看見台灣】存在哪些媒介邏輯？
- 二、閱聽人作為使用者以那些實體／虛擬社群網絡參與【看見台灣】映演活動，產生那些形式／內容的互動（互文性）？
- 三、使用者由互動所召喚之知識、情感、實踐等不同認知層面何者為重？是否構連或滲透日常生活之環境意識，因而產生轉化或行動？

參、媒介化研究之理論探析

呼應以上欲探討面向，本文分為一、媒介化；二、再媒介化與使用者經驗等

兩節爬梳相關理論。尤其，「媒介化」為傳播研究領域近 10 年逐漸成形之新概念，故先簡述此概念之近期動態發展。

一、媒介化

媒介化一詞，最早可回推 20 世紀初期，匈牙利社會學與人類學家 Ernst Manheim (1933) 在博士後論文《公共意見的傳遞者》(*The Bearers of Public Opinion*) 所提出，他用「人類直接關係的媒介化」描繪現代性中社會關係的改變，此一改變特別標示在所謂「大眾媒介」(mass media) 之興起 (Couldry & Hepp, 2013; Hepp, 2013)。1990 年代與 2000 年初期，學術社群嘗試用此一新語言，取代探討行之有年之媒介效果 (effect)，描述傳播媒介在每日生活與社會的廣泛效應，但此些努力許多源自非英語系學術社群，直到 2000 年中期多重影響促使「媒介化」一詞始成為國際傳播學界共識。

(一) 媒介化研究之建制化歷程

媒介與傳播研究領域日趨國際化，是媒介化研究逐漸形成共識的背景原因之一。包括更多非美國籍會員加入國際傳播協會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ICA)、歐洲傳播研究與教育協會 (Europe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Education, ECREA) 成立、以及諸多國際會議將「媒介化」納入議題，促使以英語為母語學者與來自其他區域者交流。2011 年 ECREA 成立媒介化研究暫時工作小組 (Temporary Working Group, TWG)。

此工作小組於 2012 年在英國舉行首屆工作坊，主題是「媒介化的跨文化與跨國觀點」，反思此一逐漸成形的重要概念。其主要立論為，媒介已成為任何事情的一部分，我們不再能夠視其為分離的領域，必須理解充斥在每日生活的媒介傳播如何改變文化與社會的建構。在此觀點下，「媒介化此一概念用來描述，在媒介與傳播、社會與文化變遷之間，溢散著不同技術的媒介及其相互關係的長期過程」(ECREA TWG, 2012)。「媒介化」一詞至此仍屬動態概念，需進行更具體之概念化工程，行動方案包括——由 ECREA 媒介化工作小組於國際期刊 *Communication Theory* 以媒介化為主題發展專論 (同上引)，此專刊由英國學者 Nick Couldry 與德國學者 Andreas Hepp 主編，2013 年秋天出版。

此專刊導論中，這兩位學者以 2000 年中期作為媒介化概念形成之關鍵時點，歸納 3 點成因：1. 新媒介科技普遍滲透到每日生活，如網路、手機、部落格、YouTube 影音分享、以及社群媒體興起，促使媒介研究從產製／文本／閱聽

人之不變三角，轉向新的研究取向。2. 從 1980 年代即存在著超脫產製／文本／閱聽人之不變三角的研究傳統，朝向關注媒介開放的、非線性效應，代表性學者如英國的 Roger Silverstone 以及哥倫比亞的 Jesús Martín-Barbero，兩者都提出了超越單面媒介效果之中介概念。3. 圍繞著媒介化概念出現更廣泛與異質的匯流趨勢，如 Bruno Latour 於 2000 年初期提出「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 Network Theory)，以及逐漸受到重視的媒介人類學 (Couldry & Heep, 2013)。

正如 ECREA TWG 網站首頁開宗明義所說：「我們身處於媒介攸關每一部分生活的時代，涵蓋工作、娛樂、政治、組織、經濟以及文化與社會層面。為掌握這持續擴增的『媒體飽和』(media saturation) 現象，因而提出『媒介化』概念。」(<http://mediatization.eu>) 此段扼要說明，很容易理解此概念之背景脈絡，但從認識論來看，還需進一步爬梳。

(二) 由制度論到社會建構論

在媒介化研究上，Hepp (2013) 歸納出「制度論」與「社會建構論」兩項傳統，前者主要關注傳統大眾媒體之「媒介邏輯」(media logic)；後者則更有興趣致力於每日生活實踐，特別是數位媒介與個人溝通，聚焦在變遷中的傳播建構之文化與社會。但此兩項傳統不僅共存，近年也向彼此靠近 (Couldry & Heep, 2013: 196)。

從「媒介邏輯」一詞的概念意涵演進，即可窺媒介化研究兩種傳統共存的辯證式過程。被 Hepp 歸於制度論研究傳統起源概念的「媒介邏輯」一詞，在 1970 年代末由 David Altheide 與 Robert Snow 提出，但這兩位學者對此採用中介概念，尚未採用媒介化這詞。直到 Asp (1990) 首先在「媒介化」脈絡中引述媒介邏輯；他論稱，要理解媒介在社會的角色須考慮 3 種不同影響層面：一是市場、二是意識形態、三是圍繞在媒體產製過程的規範系統 (systems of norms)；在此 Asp 明言以 Altheide & Snow 所稱之「媒介邏輯」最能適切形容第三個層面 (Hepp, 2013)。

Altheide & Snow (1979) 最早以媒介邏輯一詞，描述新聞或政治的溝通實踐如何屈附於電子媒介的生產慣習之下 (唐士哲, 2014a)。猶如一套默示規則，媒介邏輯指涉特定媒介內建構訊息的假定與過程，包括節奏、文法以及模式，涉及定義、選擇、組織、呈現的規範或準則，並決定訊息該用怎樣形式呈現 (Altheide, 2004)。即便 Altheide 後來陳明媒介邏輯概念其實涵括更廣，原意在複雜社會脈絡下，反思媒介化過程之意義建構與符號轉換如何制度性鑲嵌於日常傳

播慣例之中 (Altheide, 2013)，但 30 多年前先創術語已成隱喻性概念，觸發媒介化制度論傳統之後續探討。

此一制度論取徑下，德國 Winfried Schulz 與丹麥 Stig Hjarvard 的理論化貢獻最為突出 (Hepp, 2011)。Schulz 提出媒介化 4 個過程：1. 延伸 (extension)：媒介科技延伸人類溝通官能的天然限制；2. 取代 (substitution)：媒介部分或完整取代了社會活動與社會機構；3. 融合 (amalgamation)：媒介活動不只延伸或 (部分) 取代非媒介活動，同時相互整合與混合；4. 順應 (accommodation)：社會所有部分的行動者與組織順應了媒介邏輯 (Schulz, 2004)。在第四個過程，他提及媒介邏輯在社會所造成的改變；但對他而言，媒介化意味此種邏輯的擴散，亦非唯一面向。

Hjarvard (2008) 同樣圍繞著「媒介邏輯」探討媒介化過程，似乎更偏向制度論：「『媒介邏輯』這術語指涉的是媒介制度性與科技的慣用手法，包括傳布素材與符號資源的方式，並且以正式與非正式的規則來操作它」（同上引：113）。他並區分強、弱兩種不同媒介化形式：前者是直接的，社會或文化活動本身假定了媒介形式，之後需與媒介互動並隨之起舞；後者是間接的，符號內容與社會文化活動受到媒介環境的影響，逐漸依靠它並與之相互連結 (Hjarvard, 2004, 2008)。

但將媒介化理解為「一種」制度性媒介邏輯的擴張，並不能清楚解釋此一邏輯的樣貌。Couldry 提出兩個反對觀點，其一、媒介影響太過異質，很難被化約為單一的「媒介邏輯」；其二、此一術語暗示改變具有某種「線性本質」(Couldry, 2008)。挪威學者 Lundby (2009: 117) 亦主張：

只談一個總括性媒介邏輯並不可行，須區別各種媒介特性如何應用到不同社會互動形態之中……，因此必須研究媒介化過程在傳播上的變遷與改變。媒介化研究應強調社會與傳播形式如何在社會互動中發展並被使用。

因此，媒介化研究的制度論傳統雖自「媒介邏輯」概念取得養分，近期媒介化論述卻傾向開放的非線性詮釋。臺灣近年本土研究亦開始探討此一嶄新傳播概念，唐士哲 (2014a) 即以媒介化政治概念分析電視政論節目，闡釋內化於電視政論過程之媒介邏輯。

社會建構論傳統進一步打破線性邏輯框架，將媒介化視為「後設過程」

(meta-process)，以及媒介觸動的形塑力 (moulding forces) (Hepp, 2011; Krotz, 2007, 2009)。Krotz (2007) 主張媒介化為後設過程，促成社會變遷之長期發展或建構，類同於全球化 (globalization)、個人化 (individualization)、商業化 (commercialization) 等概念，既指涉媒介帶來改變的後設過程；亦涵括影響人作為行動者及其社會關係的微觀過程。

Hepp 以「形塑力」描述媒介在傳播過程施加的某種「壓力」(pressure)，例如電視具有某種「壓力」以較線性並適合視覺呈現的方式呈現某些觀念；印刷具有接受較複雜論點的可能，可較緩慢地閱讀，觸及較複雜的文本結構；行動電話使行動中與朋友保持聯繫成為可能，亦帶來必須這樣做的「壓力」。這些例子並非說媒介是「物質結構」產生的直接效果，而是媒介形塑力只有經由特定傳播形式、在不同中介方式中才能成為具體，故強調聚焦包括人類實踐或行動之轉換過程的多元脈絡 (Hepp, 2011)。

Block (2013) 採取文化研究取徑，承認人具有能動性，關注媒介建構真實的符號權力 (symbolic power) 與隨之而來形成意識形態之霸權能量 (hegemonic capacity)。但她認為，無論符號權力、媒介權力、媒介邏輯、形塑力等概念均提問關於媒介培力／去權 (empower/disempower) 的可能。人們在數位媒介提供之平台，雖獲得被肯認、被看見、被聽見的權力，卻也可能強化現存社群／社會的權力關係，導致無法或不願跟上科技發展者去權。

上述種種論述，將媒介化推向更開放方向。近來兩個傳統也彼此交流，一方面倡導制度論者再思「媒介邏輯」概念；另一面主張社會建構論者亦強調探索制度性面向的重要性 (Hepp, 2013)。

總之，學術社群對於媒介化一詞之概念化工程方興未艾，Jensen (2013) 引用 Herbert Blumer (1954) 提出限定性 (definitive)、敏感性 (sensitizing) 兩種概念探討媒介化理論：限定性概念，包括制度化與霸權（類同於制度性傳統）；敏感性概念則包括社會建構、科技動能、以及鑲嵌式傳播（類同於社會建構傳統）。其中，鑲嵌式傳播指涉新、舊媒體混搭結構，此在數位科技時代特別顯著。正因為此鑲嵌性，使媒介化一詞越趨向敏感性而非限定性概念。

二、從再媒介化到使用者經驗

若以結構與行動為光譜兩端，媒介化研究之社會建構傳統更靠向行動，如 Hepp 提形塑力概念，科技本身與個人作為傳播活動的行動者，均為不可或缺的

脈絡性因素。以紀錄片為例，向來存在記錄者、被攝者、觀者之相互關係，【看見台灣】之空拍技術將此推到極致，傳統媒介（紀錄片）鑲嵌數位穩定高空拍攝技術，記錄超越人眼自然界限的俯瞰畫面，不僅應驗「後設媒介」（metamedia）形容現有媒體被嵌入新科技的架構 (Kay & Goldberg, 1999)，亦再媒介化了真實，創造嶄新使用者經驗。

Bolter & Grusin (2000) 之再媒介化概念主張，數位媒介非但未脫離傳統媒介的美學與文化原則，反是再形塑的過程，正如照相再媒介化繪畫、電影再媒介化舞臺劇與照相、電視再媒介化電影與廣播。因此，「媒介就是它的再媒介化」（a medium is that which remediates），過程涉及雙重邏輯——無中介性（immediacy），即真實的透明再現；以及多媒介性（hypermediacy），即媒介本身的不透明性。

再媒介的雙重邏輯，可從三方面加以說明：（一）再媒介化是中介的中介，媒介彼此影響，互相依存；（二）再媒介化視真實與中介是不可切分，本體論上假設所有媒體都再媒介著真實；（三）再媒介視為改造，目標在再形塑或復興其他媒介，特別是對真實的再現 (Bolter & Grusin, 2000)。

再媒介等新理論的出現，似乎說明 1960 年代以來傳播領域理解的媒介概念，或許無法再延續 50 年不變。Jensen (2013) 認為，媒介化研究進一步應聚焦在「舊」媒體／類型，嵌入新傳播資源之對話本質，乃至於媒介整合於各樣天然與人造物件與社會脈絡所構成的新行動脈絡。所謂「物件的網路」（the internet of things）的術語正說明，媒介正以各種形式整合於世俗每日生活，鑲嵌在自然環境與人類身體身上，逐漸超越物質世界的界限。

此種意義來自對話的觀點，正回應語言學家 Bakhtin 所說，回到日常生活世界，意義存在於作者、說話的對象、以及外部文本構成的軸線之中，既產生於人際互動之互為主體的平行軸；也來自文本之間互動產生互文的垂直軸（鍾蔚文，2004）。語言學長久關懷的意義命題，在數位時代以各種不同形式的眾聲喧嘩，等待著被探索。

從使用者角度來看，我們已進入一種「新運算」（new computing）年代，對比「舊運算」年代在乎電腦可做什麼，新時代科技需回應使用者需求，要能夠豐富使用者經驗的活動與關係 (Shneiderman, 2002)。McCarthy & Wright (2004) 主張，我們是與科技共處而形成情緒與感官層面的「活生生的經驗」（felt experience），因而須從生活體驗以及情感面之行動與互動詮釋人與科技之間的關係。

要把「活生生的經驗」化為可分析架構卻非易事，例如坐在黑漆漆的影院中，隨著電影劇情跌宕、人物命運的悲喜，觀者產生個人的、內在的觀影經驗，該如何適切詮釋？好萊塢劇作家 Boorstin (1990) 提出 3 種觀看電影方式，剖析人與電影之間的體驗：第一種偷窺之眼 (voyeuristic eye) 關注新的、奇妙的事物，這經驗就像觀看煙火，被不斷堆加的繽紛色彩與絢爛形狀所牽動；第二種替代之眼 (vicarious eye) 受情感性吸引，猶如我們將自己的不完美投射於某些角色的缺憾之中，產生替代的移情作用而受感；最後，內心之眼 (visceral eye) 則類似一同搭雲霄飛車，不只是移情，而是一種感動、歡喜、害怕的第一手經驗，如看到出其不意被異形攻擊而不禁發出尖叫 (McCarthy & Wright, 2004)。成功的電影往往來自嫺熟操作以上三種「眼睛」，讓人與電影互動出情感共鳴。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解讀如何「閱讀影像」，分析符號產製中，符號產製者尋求將他者再現的複雜過程，包括產製者文化、社會、心理的歷史背景，並聚焦符號產製的特殊脈絡。語義學者與符號學者亦長久關注符號如何中介外在與內在世界的再現關係，其中如「透視」(see-ing) 理論認為，觀者除了看見圖像表面記號、顏色、肌理，也能夠看見圖像外的事物；正如同樣一片雲，有人只看到雲的形象，有人可以卻「看進去」，察覺雲中舞者 (Kenney, 2005)。此差異正來自個別不同體驗、來自於意義產製過程中異質又複雜的整體經驗。

進入數位科技促成新舊媒體混搭時代，使用者除視覺、聽覺，也產生結合觸覺等聯覺現象 (the phenomena of synesthesia)，一種跨越、重疊、或整合的感覺經驗 (Pilotta & Schultz, 2005)。

總括來說，當代研究科技批判與文化研究學者，大多脫離化約的二元觀點 (自主的 vs. 非自主的；科技 vs. 社會決定論)，朝向將科技視為一種生活形式、一種構連概念與科技行動性構想 (Lievrouw & Livingstone, 2006 / 黃守義、許詩嫻譯, 2008)，研究趨勢也轉向視使用者與科技間為一體兩面的共構關係。

翁秀琪等 (2009) 曾建構從使用者出發的網路準社會互動理論，以人機互動研究向實踐／實用轉向為取徑，引用 1956 年芝加哥學派 Horton & Wohl 研究人與傳播科技 (當時是廣播電視) 互動關係之準社會互動 (para-social interaction) 概念，重新打造網路使用者經驗的理論架構，除側重此概念強調使用者中心、互動兩個要點，亦補強生活脈絡以及社群分享互動，歸納出認知面、情感面、體驗面是影響使用者經驗的主要因素，據以審視閱聽人與科技物之間的準社會互動，所建構之三重構面對本文理解觀看者「看進去」、聯覺的互動經驗上，提供具體的詮釋框架參考。

肆、研究方法

媒介化研究在臺灣本土經驗研究尚不多，傳播學者唐士哲爬梳「中介」與「媒介化」概念時說：「媒介化作為一個分析工具，應要能夠描述不同脈絡下整體社會的趨勢發展，藉由具體的實證分析彰顯媒介對不同的建制以及人類行動場域的影響性」（唐士哲，2014b：22）。本文以【看見台灣】紀錄片為經驗實證，將媒介化概念接合臺灣傳播研究脈絡，採取質性研究方法多重配置，包括深度訪談法、文獻分析法、與臉書粉絲團網友貼文回應之次級資料分析，試圖勾勒貼近日常生活經驗之媒介化脈絡性效應。深度訪談對象為處於「媒介邏輯」內之相關人士，如製作團隊、電影行銷人員、環境關懷相關社團人士等（受訪者背景見附錄一）；文獻分析搜集本研究相關報導、評論、研究等資料；一般觀眾意見來自臉書粉絲頁留言之次級資料。回應研究問題所擬之問題構面與操作性概念見表 1。

為聚焦新舊媒體鑲嵌所帶來的使用者經驗，本研究視該電影臉書粉絲團為社群互動場域，在此搜集一般觀眾線上即時、互動、廣泛的意見，以質性研究分析軟體 NVivo 10 擷取文本資料，從電影臉書粉絲團建立起始截至 2014 年 6 月 14 日共取得 20,362 筆貼文與回應。因文本數量龐大，故以該片映前、映中、映後之重要行銷時點，取約 3 天左右之貼文與回應為分析樣本（抽樣點見附錄二），再以軟體建立節點。

NVivo 10 無法辨識中文詞頻，實際操作係以每百筆逐筆觀看方式選取¹，共建立 1,952 個參考點，三構面選取節點數目分別是：知識 201、情感 1,090、實踐 661。因係立意抽樣，少數留言重複選入不同節點，因此數字雖不具量化研究

構面	操作性概念	訪問方式（對象）／次級資料
媒介邏輯	1. 內容製作 2. 電影行銷 3. 資金	深度訪談製作團隊、電影行銷人員相關報導、評論、研究等文獻
互文性	1. 網路社群媒體互動 2. 實體社群互動 3. 環境議題	深度訪談環境關懷相關社團 臉書粉絲團次級資料分析
使用者經驗	1. 知識 2. 情感 3. 實踐	臉書粉絲團貼文與回應之次級資料分析

表 1：研究構面與操作性概念

1 此次利用 NVivo 10 軟體擷取臉書粉絲頁留言後，以每頁 100 筆留言資料逐頁檢視。在設定之電影行銷時點區間，逐筆細看；在時點外，就略看，但若覺得有意義，仍選入節點。

精確意義，但由此亦可見以情感性回應居多（節點總表詳見表 2）。另因留言者資料數量龐大，本文討論時以各次構面節點名稱與軟體選取時，產生之參考點數字²註明引文來源（如視角與高度參考點 1）。本次為學術研究之目的分析臉書粉絲頁文本，惟因個人留言隱私考量，均以匿名方式加以分析，文中亦以歸納性整理為呈現原則，在此不檢附貼文原始文本。

伍、研究發現：媒介化分析之 3 個面向

像是歷史的巧合，被視為西方紀錄片影史早期代表作之《北方的南努克》，正是走向戲院商業映演的開端，不僅由法國電影公司 Pathé Frères 發行，背後並有皮革公司贊助。導演弗萊赫堤曾說，若無此贊助，將無法製作本片 (Beattie, 2004)。此例雖非植基於本土脈絡，但作為紀錄片歷史上第一部長片，仍可見從有紀錄片文類之始，資金／贊助／映演管道就與創作本身息息相關。【看見台灣】創下臺灣紀錄片商業映演佳績，是極端化特例，以媒介化與再媒介化概念觀之，

構面名稱	參考點
知識	201
視角與高度	161
環境議題與批判	45
情感	1,090
愛臺灣愛土地愛家鄉	336
情感共鳴	606
負面反應	15
製作團隊	244
導演等工作團隊	170
音樂旁白等	91
實踐	661
守護家園與省思	124
自我改變	86
觀影行動	428
後續推廣	57

表 2：臉書粉絲頁留言／回應之節點總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於 NVivo10 中建立節點統計數字。

2 研究者審視留言內容並依構面歸類（即建立節點），操作 NVivo10 時，軟體自動依不同構面產生參考點數字，如「視角與高度參考點 1」，即為「視角與高度」次構面下選取的第一筆留言。

亦為難得個案。以下就一、開拓傳播實踐與商業化交雜之媒介化發展；二、新舊媒介促成互文形塑力；三、知識、情感、實踐面之整體經驗分析，3面向加以討論。

一、開拓傳播實踐與商業化交雜之媒介化發展

紀錄片在臺灣的發展，可說亦步亦趨回應整體政經、社會脈絡。解嚴前後如「綠色小組」等反主流影像工作者曾伴隨政治、社會運動，在逐漸拓寬的政治空間中，扮演傳遞訊息、結合社會資源、推動社運發展、記錄運動場景的重要角色（敦誠，1992）。1990年代之後，解嚴後政治禁忌漸除，「反官方說法」利基市場不再；又因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嚴重衝擊本地影視產業，國片產製數量銳減，商業部門無意投資資金，政府單位以經費直接補助包括紀錄片類型的影視產業產製，臺灣紀錄片之街頭草莽的政治與社會運動性格亦隨之改變，朝向以公部門補助為主的產製及消費模式發展（劉昌德，2010）。但處於主流商業價值主導之影視環境，以獨立製片為主的紀錄片產製一直面臨資本不足、映演管道缺乏的雙重困境。

（一）促成開拓傳播實踐管道之脈絡化效應分析

本土獨立紀錄片以非主流另類媒體的面貌，豐富臺灣傳播地景，卻從早年綠色小組時代即存在行銷管道有限與勞動條件低落等兩項問題。江冠明（1992）估計，在 1986～1988 年間，曾有 8 千萬到 1 億元的「反官方說法」錄影帶地下市場，但兩年後，此市場快速消退。當時小眾媒體無力自行開拓營銷管道，委託出售黨外雜誌的流動攤販銷售，有些業者任意盜拷暢銷品，壓縮市場空間，這些工作者也陸續出現財務危機。更因影帶販售多半在吵雜的演講會場，養成觀眾喜歡看「衝突畫面」的習慣，以致「綠色」、「第三」製作比較細膩的社會運動紀錄片，成為滯銷品；另一方面也誤導觀眾口味之「刺激性」和「消費性」取向。

如此，解嚴後言論尺度放寬，其吸引力逐漸降低。因此，縱然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給予此類影片發展養分，工作者卻未得相等回報，生存一直困難，5、6 年之間，相繼成立的反主流影像媒體組織紛紛解散或半解散（戴伯芬、魏吟冰，1992）。

1990 年代後，電子攝影與剪輯技術及費用門檻降低，設備高度普及，促成發聲過程之民主化，紀錄片儼成平民運動，播映管道卻始終處邊緣位置，除公視外，只有受公部門直接或間接資助的影展活動為主要映演管道；因常態映演管道

不足，很難養成觀眾收視習慣，無法進一步「吸引商業資金挹注」（劉昌德，2009年9月28日）。紀錄片工作者資源不足，勞動條件亦低落。研究發現，紀錄片工作者須仰賴另一份工作補貼維持生計；高達2/3受訪者，除紀錄片工作外，還有另一份工作；其收入，占受訪者經常性收入的比例非常高（劉昌德，2007年12月31日）。

此種獨立製片缺乏資源的本質，正是草根性另類媒體經常面臨的困境。Fuchs (2010) 分析，資源不足導致自我剝削與不穩定勞動狀態，同時造成內在時間與精力的衝突，進一步降低其政治潛力。此問題亦如 Atton (2002) 描述，另類媒體在經濟與組織上強調「超前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原則，企圖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採取社會主義原則做事，難與主流媒體抗衡。既造成對個人的自我剝削，也不利另類媒體發展，導致另類媒體生命短暫，有的迅速消失；有的逐漸專業化、制度化，改變內部生產關係，產品內容也開始失去原先基進與開放色彩（成露茜，2009）。

臺灣獨立紀錄片在此發展困境中，逐漸走向電影院線渠道放映，無異正如前述，以專業化、制度化模式逐漸納入商業體系。蘇威銘（2014）分析其中兩層意義：第一，擴大社會效應，使影片議題討論空間更開放，傳播管道從小眾影展、學校巡迴映演、非主流頻道電視放映等，擴展到相對受大眾關注的場域。第二，對於多屬獨立製片之紀錄片工作者而言，上院線也是回收成本的管道之一。雖不是每部紀錄片都能推上院線或適合院線，但如【生命】、【翻滾吧，男孩】、【無米樂】、【奇蹟的夏天】、【牽阮的手】等片仍有不錯的票房與口碑。

開拓社會影響力與資本回收之雙重意涵外，亦揉和創作者希望「作品被看見」的心理期待。導演周美玲曾說，紀錄片嘗試上院線，很多都是導演出於作品好好被觀看的心情，靠著意志力推上院線，因為畢竟在戲院的觀影環境，看影片比較專注（辛佩宜，2009）。

近年來，院線紀錄片票房成績不斷創紀錄。2012年【不老騎士】上院線連續映演兩個月，票房突破3千萬元，刷新2004年臺灣本土紀錄片【生命】總票房1,041萬元紀錄；2014年【看見台灣】票房突破兩億元，勝過許多商業國片（黃亞琪，2012，2014）。票房一再刷新，意味紀錄片小眾性格不再？內容去政治化而不再基進？抑或是走出「另類貧民窟」（alternative ghetto）朝向廣大公眾發聲？答案，或許兼有之。

一方面，不斷創紀錄的票房數字背後傳達：1. 臺灣看紀錄片的觀眾人數變多、題材接受度變大；2. 更多企業與社服團體願意出資拍片，帶來以往電影界無法企

及的社會資源、人脈網絡³（受訪者 E）；另一方面，紀錄片工作者完成影片後，努力將作品推向院線，透過電影傳銷手法，使其成為文化商品，無形中亦向商業市場靠攏。資本主義追求投資報酬率邏輯，與紀錄片記錄真實之社會性本質，亦陷入矛盾中。

如【看見台灣】耗資 9 千萬元，導演齊柏林抵押房子籌資，雖讓人讚揚實踐夢想之勇氣（陳文茜，2012 年 9 月 1 日），但其中 4 千 5 百萬元仍來自企業贊助（黃識軒、許容榕，2013 年 12 月 6 日），投資水準遠超以往紀錄片規格。當成本墊高到不遜於商業劇情片時，想要回收成本，更需以大眾市場為舞臺。受訪者 D 如此形容上映前評估此片的心情：「不上院線是一點機會都沒有，上院線是九死一生。」當攝製規格與資本投資不斷推高，不得不走向商業院線召喚大眾，正如 Hepp 所說，特定媒介在傳播過程之「壓力」隨之而至。

（二）「最大公約數」媒介邏輯與自我審查效應

不是任一部紀錄片都適合院線發行，片商評估是否可上片大致有 3 點：1. 題材能得到大多數人的共鳴；2. 藝術性、商業性、製作規格要達到一定水準；3. 出品人／導演／製作公司有一定的社會資源與企圖心（受訪者 D、E）。反過來說，若議題比較冷門或沈重；或者具體要推動某社會議題與運動，不以被最多人看到為目的，自然也會侷限所謂的「市場」（受訪者 B）。

於是，想在主流商業管道映演，可能出現形式決定內容的效應：

假設全部導演都以上院線為目標，他意識到上院線的時候，它片子必須長成某種樣子，就會有某種自我審查跟閹割，就說：「啊，這觀眾可能不會喜歡，這一段也太硬了。」所以只能把它做到這個程度，而不是那個程度。（受訪者 D）

為符合大多數共鳴或謂市場最大公約數的潛規則，媒介邏輯效應於焉產生。以【看見台灣】為例，為召喚大眾觀眾，包裝、敘事都隨之改變，包括片名原為《域望》，但考量一般大眾理解與接受度，改為【看見台灣】（郭彥劭，2014 年 2 月 25 日）；齊柏林原想聽從導演戴立忍建議，以全無旁白的方式呈現，但

3 近年社服團體／企業組織先後贊助紀錄片拍攝並支持上院線，如【被遺忘的時光】由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會、【不老騎士】由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拔一條河】由統一超商贊助等。

最後還是選擇加入旁白與字卡（張哲豪，2013年12月10日）。因此該片創下兩億元票房驗證了市場策略成功，卻被環境保育團體批評「力道不足」，對於國光石化、六輕、臺東美麗灣的輕描淡寫（江家華，2013年12月30日）。如受訪者B所說：

刻意的避而不談問題嘛！只是在模糊問題，講到最後，就直指我們都是共業啊，我們都是共犯，但是並沒有講，誰該負什麼責任啊！他是講共犯啦！但他不談責任，不談權責啊！（受訪者B）

導演齊伯林接受媒體訪問時，稱此種風格為「溫柔的力量」，他說：「批評、指責最後造成對立，不過，透過對話才能找到機會、找到可行的方法。」（江家華，2013年12月30日）。此種想要觸及多數人的傳播目的，從媒介政治角度檢視，其媒介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指控對象導向一般民眾／消費者，未針對政府或特定利益團體；隨之而來之霸權能量內化於愛臺灣之國族意識形態，最終受益者是直線攀升的票房數字。符合最大公約數的市場邏輯，不僅牽制文本產製過程，也左右符號產製者與觀者之間的社會互動關係，正是將紀錄片過渡、轉化到本土商業劇情片傳銷公式的例證。

（三）臺灣認同意識與市場賣座之構連效應

電影行銷人員觀察，近年國片賣座潛規則之一，即是某種「愛臺灣」基調：

就是在地的情感、土地認同、文化親近性，簡稱愛臺灣嘛！比如說【雞排英雄】、【大稻埕】、【海角七號】，像這些就是臺灣土地上發生的故事，這很多啊！是不是每一片都賣啊！連【父後七日】臺灣的殯葬文化都賣啊！（受訪者E）

電影片商之所以願意發行【看見台灣】，部分亦因題材切合這幾年「愛臺灣」脈絡（受訪者D）。以Schulz (2004) 之順應（accommodation）概念分析，電影發行商順應此本土商業電影賣座的媒介邏輯，從命名到行銷都以「臺灣」為標示。以Krotz (2007) 視媒介化為「後設過程」觀點看，該片進入商業體系映演之媒介化過程，亦與臺灣民主化後推動本土化國族認同交互作用，如徐永明（2013年

11月29日)探討此片時曾說：「臺灣又變成了當紅的字眼，以為李登輝與陳水扁時代的『愛臺灣主義』已經煙消雲散，最近卻成為新的救贖密碼」。

但僅化約為國族主義式的集體情感，似略嫌武斷。臺灣近年來公民與環境意識的覺醒，亦是該片成為「環境的寧靜革命」之社會成因（侯俐安、曹以會，2013年11月27日）。生態作家劉克襄在評論此片時寫道：

一部電影的最後以國旗結尾，不讓您覺得濫情，那也不只是電影的成功，裡面一定還有更大的啟示。我很了然，那是大家對這塊土地的愛護，已微妙轉移到對這面旗子的認同。這個認同不是運動競技場上的國家意識，或是對抗某一外來力量的民族情緒，而是關懷生態環境下，激發出來的家園情感。（劉克襄，2013年11月21日）

該片上映時，臺灣籠罩在一片食安風暴中，民眾對於生活的信心幾乎瓦解，此時【看見台灣】倡議的愛護家園信念，遂成豐厚的公約數，使眾多公民得以參與其中。受訪者A認為，這不僅是2013年特定時空脈絡下的產物，其實彰顯了臺灣過去二十年關懷環境議題與公民意識崛起的結果；這幾年不管反核、1985行動聯盟的白衫軍、甚至太陽花學運，「一次五十萬人出來，這個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代表臺灣的公民社會逐步邁向成熟的階段」。由媒介化之社會建構論來看，【看見台灣】熱潮背後，正是行動者及其社會關係的脈絡性互動結果，絕非以文本美學成就高超、或行銷策略高明就足以解釋其成功。

二、新舊媒介促成互文形塑力

究竟多少人看過【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以兩億元票房估計約一百萬人（項貽斐、陳于嬋，2014年1月7日），臉書粉絲團按讚下片後持續上升到超過15萬、幕後花絮短片如「來自玉山的歌聲」點閱數超過50萬，媒體形容猶如掀起「齊來瘋」（Chisanity）（項貽斐，2013年11月19日）。這中間，多數受訪者都提到，網路新媒介在議題溢散過程扮演重要角色（受訪者A、B、C、D），並且至終不僅傳統媒體跟進報導，政府環保政策也內化其中。

（一）網路活躍使用者動員線上／線下網絡

熟悉電影行銷之受訪者D觀察，上片前臉書粉絲數超過十萬，可看出該片吸引網路活躍使用者（active user），這群對議題關注的知識份子，非常積極轉介、

分享。電影行銷也適時提供助燃薪火：第一、密集露出短片宣傳，包括三支預告片與六支影音花絮，支數與頻率遠高於一般紀錄片上院線行銷規格，讓網路熱情使用者得以透過社群與影音分享平台散布與分享；第二、發布時機結合臺灣大型影展，同為臺北電影節與該片贊助者之某文教基金會，把影展一百場企業形象廣告額度，讓給首支 30 秒前導預告。如此網路加實體播映波段預告大量曝光，成為上片前重要宣傳策略。

從訪談得知，電影行銷人員所謂 active user，包括環保人士認為深具中產階級色彩之荒野保護協會⁴會員。受訪者 A 表示，該協會不僅邀請齊柏林演講，會員也不斷透過臉書分享，自動自發動員包場。由臉書擷取資料顯示，確有荒野分會與夥伴包場之相關留言（觀影行動參考點 30、291）。受訪者 B 亦表示，在上片前曾透過網路平台幫忙宣傳；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的受訪者 C 也說，雖沒有透過組織動員，但相關消息都由網路得知，他說：「片子剛出來的時候，說沒動員，其實也是被動員的，因為在網路上、在臉書大家都在討論這部片的時候，無形中是被動員的」（受訪者 C）。

與劇情片不同，院線紀錄片行銷策略之一，就是「第一時間動員被動式的觀眾進戲院裡面看，影片才有機會……」（受訪者 E），此案例正可見此股網路動員效益。此次擷取臉書貼文與回應文本中，「觀影行動」之次構面總共選取 428 個參考點，數目居各次構面第二高（僅次於情感共鳴之 606 個參考點），似正驗證該片成功召喚出將「感動」化為進戲院「觀影行動」的動員力，並透過網路社群溢散、擴大。只是受限於研究時間與分析軟體，無法確知此些在臉書上表示，要揪團、全家觀看、請同學、邀長輩、兒女、好友等等買票相挺的留言者，與其所參與社團或組織實體活動之相互關係，但由上述三位具環境團體背景受訪者之回答，仍可勾勒出人際互動之互為主體平行軸與文本之間互文性的垂直軸關聯。

紀錄片逐漸興起的網路群眾籌資方式，也在本片一試奏效。抓緊「愛臺灣」、「挺在地」氛圍的電影行銷，在宣傳後期以大量試片方式創造口碑（郭彥劭，2014 年 2 月 25 日），在高雄巨蛋、臺北中正紀念堂舉辦兩場大型首映，將網路人氣導向實體世界。臺北戶外首映採群眾募資平台籌措經費，網友 26 天內捐獻 248 萬元，近 3 千位支持者九成為個人身分，電影公司特別製作長 23 公尺、高 3.3 公尺的巨幅「感恩牆」，首映開始前不少支持者在現場拍照留念（項貽斐，2013 年 10 月 31 日）。

4 荒野保護協會成立於 1995 年，以教育推廣、棲地保育為倡議方式，全臺灣有 11 個分會，1 萬 6 千多個家庭會員，相關資料見《真實付出 在地守護：荒野 2013 成果報告》（荒野保護協會，2013）。

此種互動程度，勝於以往在臉書社群的參與，關心議題僅能按讚或是分享；「現在是你可以投錢，而且投錢其實是當下的衝動跟情緒，並不在乎他的回饋方案是什麼，覺得這是一個公益之心跟熱血，你的錢就投進去了，然後這個事情就成了。」（受訪者 D）。從行銷角度看，網路群眾募資可視為議題能量的前期測試；另一方面，無異於以媒介混搭，多元參與，創造一種「新」媒介化經驗。

（二）政府政策內化於媒介邏輯

傳統媒介也在熱潮中跟進。本研究搜集電影上映前後時期之《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等 4 報文本，共有 1 篇社論（聯合報，2013 年 11 月 28 日）；12 篇全版報導（含相關環境衍生議題，《聯合報》7 次、《中國時報》4 次、《蘋果日報》一次）；各種特稿、評論超過 30 則⁵，報導篇幅顯著程度遠高於一般電影與紀錄片。

瑞典傳播學者 Strömbäck (2008) 提出媒介化 4 個階段，其中第四階段為：政治與其他社會行動者順應、甚至內化媒介邏輯，猶如媒介邏輯征服 (colonize) 政治，而本片造成「看電影治國」效應似印證此概念。行政院長江宜樺觀影之後，11 月 29 日召開「國土保育專案小組會議」，列出 16 項議題，分為 5 個工作小組，宣誓政府行動決心（錢震宇、楊湘君，2013 年 11 月 30 日）。這些存在已久的環境議題包括：盜採砂石、水庫淤積、超抽地下水引起地層下陷、莫拉克風災造成土石流及漂流木等問題、山坡地超限利用、河川污染；工業區空氣污染等等（政治中心，2013 年 11 月 29 日），無一不是臺灣環境沈痾，卻因一部紀錄片「媒介化」了施政行動。

從環境教育的角度，該片可算成功宣廣行動（受訪者 A），《環境教育法》的規範是其中推力。受訪者 A、B 同時提到，政府同意將觀看此片納入抵換環境教育時數⁶ 是重要驅策原因。但也不是一開始就納入，反在影片引起廣泛迴響之後跟進，可視為政策被媒介邏輯征服又一例證。

在上片之前，那時候阿布（電影公司）就有去跟環保署 approach 問，有沒有可能用發公文的方式，【看見台灣】憑什麼，譬如說票根

5 新聞文本搜集以網路檢索為主要方式，《聯合報》、《中國時報》取自新聞資料全文索引系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則以其新聞網站檢索而得。

6 《環境教育法》制定於民國 99 年 6 月（西元 2010 年 6 月），公布一年後施行，依第 19 條規定機關、公營事業機構、高中以下學校及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 之財團法人，所有員工、教師、學生每年應參加 4 小時以上環境教育。

之類的，可以列入環境時數扣抵，那時候這個議題還沒炒熱的時候，環保署連鳥都不鳥他們，上片之後願意做、主動做、用力做。（受訪者D）

由此可見一種「大者恆大」的邏輯。媒體形成話題、民眾情感認同、政府內化於施政、納入環境教育時數……各種因素環環相扣，使得一部原本票房不見得看好之紀錄片，透過新／舊媒介、實體社團／組織人際號召，滲入人們日常生活經驗之中。

三、知識、情感、實踐面之整體經驗分析

紀錄片進入戲院商業映演，縱或存在市場導向之媒介邏輯，但閱聽人具有既是消費者又是公民的雙重身分，在觀看與分享過程如何與之互動、能否產生日常生活抵抗、甚而促成社會改變的動能？正是媒介化研究之社會建構論關懷視角。本文以【看見台灣】臉書粉絲頁留言為範圍，分為知識、情感、實踐等3個構面，項下再分二到四個次構面，分別是：知識（視角與高度；環境議題與批判）、情感（愛臺灣／土地／家鄉；情感共鳴；製作團隊）、實踐（守護家園、自我改變、觀影行動、後續推廣），從使用者整體經驗分析廣泛效應。

（一）再媒介化帶來視覺震撼，卻少見深度論述回應

首從知識面看，這是臺灣第一部大規格的空拍紀錄片，帶來嶄新視覺經驗，有人形容為「視覺解嚴」：「空拍代表一般地面視角的提升與解放，對周遭環境現實的另一個觀點和意象，不僅是政治解嚴後放鬆飛行與攝影活動管制的效應，同時也是延伸固定視野與既定印象的心理認知解嚴」（高志仁，2013年11月3日）。

猶如「解嚴」般視角，拉高紀錄片再現真實的尺度，也是昂貴的數位影像空拍技術促成之紀錄片再媒介化結果。本研究從臉書粉絲頁共選取161個貼文提到獨特視角與高度，以鳥、雲、鷹、甚至神的高度為比喻，讓觀者對家園臺灣有新的認識、理解、震撼。但在「環境議題與批判」次構面下，則只選取45個參考點，不僅比例比情感性留言低很多，且限於臉書之微網誌風格，甚少出現深度論述。留言中僅一篇探討由於農作收入微薄而不得不轉營魚塢的底層結構因素（環境議題與批判參考點4），以及兩篇提到應監督政府「水土保持法」、「全國區

域計畫」放寬開發限制之修法進度（環境議題與批判參考點 2、6）。由此歸納，從臉書粉絲頁所互動出的環境關懷，多屬愛護家園與環境的概括性感受，無法具體針對特定議題甚或形成強有力論述。

（二）臺灣與母親的符號聯結，投射出移情效應

綜觀本文抽樣近兩千則微網誌類型文本中，以濃厚的情感抒發為主要書寫基調，這些文字無論透過電腦、或是手機，呈現高度即時性與互動性，不乏近乎衝動式文字描述，如感動到不行、淚流不止、淚流滿面、眼淚盈眶、內心澎湃久久無法平靜、眼淚和內心的感動真的不是我能控制等等（情感共鳴參考點 5、9、33、67、267）。

互動性亦顯示在上映頭幾天，觀眾熱烈回報各地觀影情況，猶如即時現場報導：「臺北百老匯 19：15 小廳九成滿，但是片尾字幕一出來，拍手歌還在餘音繞樑，觀眾席上都還在窸窣窸窣擦眼淚，戲院工作人員馬上就衝進來大喊請觀眾離開的時候記得隨身的東西……」（情感共鳴參考點 156）、「板橋大遠百看的，很感動又沉重的影片！結束後只有三三兩兩的人離席，大家都還坐著等到最後，這是我第一次看電影有工作人員進來說電影播完了喔，出口在這邊……」（同上參考點 259）。

深一層分析其中情感因素，可發現空拍畫面融合磅礴交響樂與原住民歌聲，加上吳念真旁白主導著臺灣／家園／母親的聯結比喻，成功將觀者情緒轉化為對於臺灣大地作為母親的愧疚與震撼。「一開場的浩瀚就讓我的內心淚流不止……，散場後，我幾乎找不到適合的語言表達心中的感受，此等震撼近如思親之情。」（同上參考點 405）在愛臺灣／愛土地／愛家鄉次構面下，共選取 336 個參考點，數目居所有次構面第三高。其中，愛臺灣、我是臺灣人、我愛母親臺灣、大地母親、認同土地／自己、咱的母親、家園等文字，密集重複出現，更有網友形容猶如「和臺灣土地談一場戀愛」（愛臺灣／土地／家鄉參考點 98、124），已從知識面的開拓視野，進入強烈移情式的內心情感投射。

（三）從生活做起之實踐啟蒙居多

從臉書選取資料分析實踐面經驗，共選取 661 個參考點，討論熱烈度僅次於情感面，據此歸納 3 點：1. 進戲院觀看就是行動，許多人強調 10 多年、甚至 30 年來第一次進戲院（觀影行動 83、87、103），高齡父母也繼【鐵達尼號】之後

再度看電影（同上參考點 149）等等；2. 強調世代傳承，諸多留言特別強調帶兒女來看，建議納為學校教材或校園巡迴（後續推廣參考點 5、8、11、18、19、22、24、26、44、49、55）；3. 從自己改變做起，如不吃高山高麗菜、拒喝高山茶、減用塑膠袋、用環保杯、垃圾分類、垃圾減量等等，這些都是日常生活具體可行，屬於消費倫理或是環保生活的行動自覺（自我改變參考點 1、2、4、7、8、9、10、11、18、20、24、36、40、42、45、53、71、75、79）。

早餐麵包加顆茶葉蛋入腹，留下了兩個塑膠袋，丟掉之際不禁想到看見臺灣影片中麥寮的塑化廠及海邊垃圾掩埋的畫面……思考著，這兩個塑膠袋從入手到丟棄前只陪伴著我十分鐘，我就已經在我的家園，臺灣，創造了兩個永恆的垃圾？！也許當我們鄙視撿塑膠袋於一窩的資源回收人員，同時也在顯示我們的愚蠢與浪費……。（自我改變參考點 19）

從此反身性的貼文，可見空拍影像催化的情感回應，已如同撒種，催動自覺與實踐。即便從批判角度看待本片之環保人士，也不否認強烈認同情感的確帶來某種「教化」效應（受訪者 B）。從這些來自臉書的留言，亦看到落實在日常生活的潛在改變力量。本研究因此認為，視作中產階級贖罪券、無法撼動結構性的批判太過化約，此片所帶來的媒介化效應、或說與每個個人互動之意義，是多元也異質的，所觸發自覺性反思，日後未始不可能出現一種長遠的、個人的、日常生活的改變。

此種發生在日常生活的抵抗，雖有潛力侵蝕主流消費文化的根基，卻不易檢視成效。若要將震撼與感動轉換為更具策略性、組織性行動，環保團體卻發現在行動上存在某種斷裂，很難直接深化於特定議題與環境運動（受訪者 B）；一些環境團體亦曾希望影片下片後趁勢作為教育推廣教材，但受制於商業發行規則，洽談到最後都不了了之（受訪者 A、B）。或許正凸顯電影發行商業機制與公益目的其實存在根本性互斥。感動是一時，要能長久行動，需要策略規劃、資源配套以及長期耕耘，一部依循商業邏輯而行的影片，似無法或無意承擔過多公益的想像與期待。

陸、結論

此次應用媒介化為概念工具，結合使用者經驗分析取徑探討院線紀錄片【看

見台灣】上映引起之廣泛效應，企圖將臺灣傳播學界近來朝向媒介化概念爬梳的努力，應用於本土經驗研究。Deacon & Staney (2014: 1039) 批判當前媒介化研究值得檢視的問題之一，即是 Sartori 所說：「沒有差異的普同概念」(universal concept of no difference)。若以「抽象的階梯」形容，愈概括表述愈處於梯子上端，愈限定則愈下端。這兩位英國學者建議，媒介化可從高統攝性的概念向下走到中層的一般性概念，亦即發展能夠兼具包容性與可操作的指標(indicators)，強化概念化差異。本研究將媒介化概念構連於再媒介與使用者經驗，即為一種創新嘗試，希冀以可操作方式把此概念應用於分析複雜媒介化社會互動關係。

臺灣獨立紀錄片從早期發展存在社會性血脈，受到歷史、經濟、社會等多重因素影響，走向院線映演企圖開拓新的實踐，其中隱見兩股力量相互抗衡：一面是紀錄片作者意欲從主流商業電視掌控播映管道的突圍策略；一面是「商業市場」爭取票房的最大公約數邏輯。二者何輕何重，存乎一心。要如何避免被「收編」而失去初衷，永遠挑戰紀錄片工作者心中的那一把尺。歸納【看見台灣】之經驗，有以下 3 點發現：

一、紀錄片商業映演存在最大公約數的媒介邏輯

臺灣紀錄片上院線商業映演，在【看見台灣】一片創下極佳成績，不單純解釋為行銷策略成功，而是尋求最大公約數的市場媒介邏輯，與社會整體脈絡化發展互動而來之結果：包括民主化後深植臺灣市民社會之國族(本土)意識、公民主體意識崛起、環境教育立法助力等多重社會因素催化；近年觀眾進戲院看紀錄片之習慣與題材接受度變大，企業與社會團體贊助拍攝經費意願提高等產業多重因素亦在其中發酵。因此，【看見台灣】這部沒有高潮起伏劇情、沒有明星卡司，只以臺灣為唯一主角的空拍紀錄片，以極端抽離制高視野，勾起強烈的臺灣認同情感，正呼應市場最大公約數以及社會與個體心理需求，將影片轉化為你／我都是主角的故事；但也受限於最大公約數的邏輯，內容也不得不相應調整或妥協。

二、新媒介構連實體與虛擬社群網絡互動，形成新舊媒體混搭的新經驗

此案例充分顯示社群與影音分享網站之動員力道，透過高頻次宣傳短片波段行銷，吸引大批支持網友分享轉介；大量試片、演講的口碑行銷，把網路人氣轉至實體世界。部分環保團體透過組織內討論，會員亦自動包場支持。本片更應用

群眾籌資平台為戶外首映募款，讓使用者除了按讚、分享，還可進一步「投錢」支持。從臉書粉絲頁留言顯示，不少行動者將進戲院／觀影視為支持環境倡議的方式。議題溢散順序大致為社群網路動員－主流媒體報導－政府內化回應－扞抵環境教育時數；此外，媒介平台之間高度重疊混搭、相互作用，最終呈現「大者恆大」現象，正應驗媒介化觀點，媒介效應已多層次滲入我們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嶄新經驗。

三、使用者整體經驗以情感回應為多，潛在行動能量在於生活實踐

媒介化的生活環境，構成一種整體經驗。從知識面看，空拍俯瞰式鏡頭再現的視覺尺度，延伸紀錄片對於真實的追求，達到再媒介化的結果。觀者因此猶如擁有鳥、雲、甚至上帝般視野，並因看見真相而震驚、感動，進一步催化強烈情感共鳴。除來自「愛臺灣／土地／家園」認同，更受旁白將臺灣喻為母親的符號聯結，激發有如「孺慕之情」般對母親的疼惜與不捨。這種情感性投射，由新媒介如行動網路平台提供立即互動性，大量留言流露來自於此時此刻的衝動性感受。

感動是一時，是否可能轉化為實踐與行動？分析臉書留言後發現，本片敘事將環境遭到破壞歸咎於人人有份的共犯結構，無形中在許多人心中形成你我都有責任的不安與自責；將此比喻為在心中埋下種子，確可能在個人能力及範圍，產生化從生活做起的潛在行動能量，雖然微小卻可能滴涓累積成深遠影響；但也可能只成意念的曇花一現，成效不易檢驗，亦難實際接合具有策略性之環境社運。整體而言，【看見台灣】之媒介化效應，如以 Peters (1999) 藉耶穌撒種者譬喻之撒播概念觀之，雖然「有耳可聽的都應當聽」，但種子是否發芽生長，受到不同內在條件與外在環境脈絡而定。從媒介化社會建構論觀點來看，即便電影商業市場將紀錄片社會性內化於票房消費邏輯似成默示「主旋律」，每一個體／行動者仍可能產生異質且多元的不同回應，被啓蒙的環境意識與消費倫理仍可能帶進日常生活的抵抗之中。

將媒介化與再媒介化等新的傳播概念應用於本土紀錄片研究，是本文之創新嘗試。由於媒介化仍在概念化的動態進程，該如何據此概念配置研究方法，以精確釐清媒介無所不在之實體／網路、線上／線下之間的複雜關係，為此次研究未及掌握之限制；同時由網路鉅量資料雖得以歸納新舊媒介互動產生之廣泛經驗，卻無法區辨使用者性別、年齡／世代、居住區域、政治認同等人口變項，未來研究可補強上述層面，輔以其他方法繼續深化媒介化概念於本土研究之應用。

參考書目

- 台灣立報（2013年12月10日）。〈社論：因為視而不見，所以「看見台灣」〉。
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社論-因為視而不見-所以-看見台灣-161101679.html>
- 成露茜（2009）。〈另類媒體實踐〉，成露茜、羅曉南（編），《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頁371-387。臺北：正中。
- 江冠明（1992）。〈邊地發聲——一份非主流影像傳播的觀察報告〉，敦誠（編），《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頁31-41。臺北：唐山。
- 江家華（2013年12月30日）。〈看見台灣 紀錄片的柔性抗爭——齊柏林：台灣是世界的縮影〉，《中國時報》，A8版。
- 辛佩宜（2009）。〈攜酒江湖無國界——周美玲〉，蔡崇隆（編），《愛恨情愁紀錄片：臺灣中生代導演訪談錄》。臺北：同喜文化。
- 林昭儀（2014年2月21日）。〈「金融挺文創」後，如何複製下一個【看見台灣】？〉，《天下雜誌》。取自 <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6132>
- 林泰州（2008年9月9日）。〈創意紀錄片的先鋒——第二十屆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紀工報》，6。取自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8/09/idfa_09.html
- 侯俐安、曹以會（2013年11月27日）。〈票房數字上升 一場環境的寧靜革命〉，《聯合報》，第A3版。
- 政治中心（2013年11月29日）。〈看見台灣／國土保育列16項問題 由5個工作小組負責〉，《東森新聞雲》。取自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31129/302483.htm>
- 胡慕情（2013年11月7日）。〈鳥目台灣〉，《獨立評論@天下》。取自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le/37/article/727>
- 唐士哲（2014a）。〈從政治化媒介到媒介化政治：電視政論節目作為制度化的政治實踐〉，《中華傳播學刊》，25：3-41。
- （2014b）。〈重構媒介？「中介」與「媒介化」概念爬梳〉，《新聞學研究》，121：1-39。
- 翁秀琪、施伯燁、孫式文、方念萱、李嘉維（2009）。〈從使用者經驗出發的網路資源準社會互動研究：理論建構與使用者經驗研究〉，《新聞學研究》，101：1-44。

- 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1999）。〈似假還真的新聞文本世界：新聞如何呈現超經驗事件〉，《新聞學研究》，58：59-83。
- 徐永明（2013年11月29日）。〈澄社評論——看見台灣 聽見台灣〉，《自由時報》。取自 <http://talk.ltn.com.tw/article/paper/734425>
- 荒野保護協會（2013）。《真實付出 在地守護：荒野 2013 成果報告》。臺北：荒野保護協會。
- 高志仁（2013年11月3日）。〈【看見台灣】空拍＝視野解嚴〉，《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opinion/paper/727366>
- 張哲豪（2013年12月10日）。〈讓紀錄片在電視播放〉，《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forum/20131210/306777/applesearch/> 讓紀錄片在電視播放
- 郭力昕（2013年12月16日）。〈台灣符號、政治維穩、與國族性格——如此【看見台灣】〉，《獨立評論 @ 天下》。取自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le/213/article/840>
- 郭彥劭（2014年2月25日）。〈拉高層次【看見台灣】如何賣出好成績〉，《動腦》。取自 <http://www.brain.com.tw/news/newscontent.aspx?ID=19801>
- 都會地方中心記者（2013年11月27日）。〈看了沒？揪團瘋包場「看完一起哭」〉，《聯合報》，第A3版。
- 陳文茜（2012年9月1日）。〈夢就在當下〉，《蘋果日報》。取自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120901/34480015/>
- 敦誠（1992）。〈我們向水拋石塊〉，敦誠（編），《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頁1-2。臺北：唐山。
- 項貽斐（2013年11月19日）。〈看見台灣衝出6200萬 破億有望〉，《聯合報》，第C版。
- （2013年10月31日）。〈為看見台灣獻聲 林慶台邊聽邊哭〉，《聯合報》，第C版。
- 項貽斐、陳于嬋（2014年1月7日）。〈「看見台灣」全台票房衝破2億〉，《聯合報》，第C版。
- 黃守義、許詩嫻譯（2008）。《新媒介科技手冊》。臺北：國立編譯館。（原書 Lievrouw, L. A., & Livingstone, S. [2006]. *Handbook of new media*. London, UK: Sage.）
- 黃亞琪（2014）。〈看見台灣 票房破億背後兩窘境〉，《商業周刊》，1364：80-81。

- (2012)。〈因為阿媽 她催生千萬紀錄片〉，《商業周刊》，1302：100-102。
- 黃識軒、許容榕 (2013年12月6日)。〈齊柏林：【看見台灣】讓政府有了行動〉，《中國時報》，第C3版。
- 齊柏林 (2013)。《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臺北：圓神。
- 劉克襄 (2013年11月21日)。〈看見與看不見的台灣〉，《聯合報》，第A19版。
- 劉昌德 (2010)。〈台灣紀錄片的產製、消費、與勞動：作為公部門的影視外包工作及其影響〉，《新聞學研究》，107：47-87。
- (2009年9月28日)。〈「紀錄」之後 紀錄片與創作者要往哪裡去？〉，《紀工報》，11。取自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9/09/blog-post_1565.html
- (2007年12月31日)。〈紀錄片創作難餬口，工作者自尋生路？〉，《紀工報》。取自 http://docworker.blogspot.tw/2007/12/blog-post_511.html
- 賴青松 (2013)。〈觀，自然，在當下：一趟跨越時與空的返家之旅〉，齊柏林 (編)，《我的心，我的眼，看見台灣》，頁6-7。臺北：圓神。
- 錢震宇、楊湘君 (2013年11月30日)。〈國土療傷 雙軌並進 江揆：30天彙報〉，《聯合報》，第A6版。
- 戴伯芬、魏吟冰 (1992)。〈台灣反主流影像媒體的社會觀察——從拍攝內容分析談起〉，敦誠 (編)，《邊地發聲——反主流影像媒體與社運記錄》，頁43-52。臺北：唐山。
- 聯合報 (2013年11月28日)。〈社論：「看見台灣」不該只有視覺反省〉。《聯合報》。取自 <http://paper.udn.com/udnpaper/PID0004/248711/web/#3L-4369504L>
- 鍾蔚文 (2004)。〈想像語言：從 Saussure 到台灣經驗〉，翁秀琪 (主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 (上)》，頁199-264。臺北：巨流。
- 蘇威銘 (2014)。〈論院線紀錄片在產製、傳播與觀點上的革新與問題——以楊力州《青春啦啦隊》為研究案例〉，《文化研究雙月報》，143。取自 http://www.csat.org.tw/journal/Content.asp?Period=143&JC_ID=682
- Altheide, D. L. (2013). Media logic, social control, and fear.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223-238.
- (2004). Media logic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 293-296.
- Altheide, D. L., & Snow, R. P. (1979).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
- Asp, K. (1990). Medialization, media logic and mediarchy. *Nordicom Review*, 11(2), 47-50.
- Atton, C. (2002). *Alternative media*. London, UK: Sage.

- Beattie, K. (2004). *Documentary screens: Non-fic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 Block, E. (2013). A culturalist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age of “media hegemony.”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259-278.
- Blumer, H. (1954). What is wrong with social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 3-10.
- Bolter, J. D., & Grusin, R. (2000).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Boorstin, J. (1990). *Making movies work: Thinking like a filmmaker*. Beverley Hills, CA: Salaman James.
- Couldry, N. (2008).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10, 377-391.
- Couldry, N., & Hepp, A. (2013).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191-202.
- Deacon, D., & Stanyer, J. (2014). Mediatization: Key concept or conceptual bandwagon? *Media Culture Society*, 36, 1032-1044.
- ECREA TWG. (2012). *ECREA TWG mediatization report*. Retrieved from http://www.mediatization.eu/fileadmin/user_upload/pdf/resources/ECREA_TWG_Mediatization_Report_2012.pdf
- Fuchs, C. (2010). Alternative media as critical media.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13, 173-192.
- Hepp, A. (2013). The communicative configurations of mediatized worlds: Mediatization research in times of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8, 615-629.
- (2011). *Mediatization, media technologies and the “moulding forces” of the media*. Paper presented at 2011 Virt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Boston, MA. Retrieved from http://www.andreas-hepp.name/Blog/Eintrage/2011/5/26_Paper_auf_der_ICA-Tagung_und_mehr_les/Hepp.pdf
- Hjarvard, S. (2008). The mediatization of society: A theory of the media as agent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 *Nordicom Review*, 29, 105-134.
- (2004).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I. Bondebjerg & P. Golding (Eds.),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pp. 43-64).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 Jensen, K. B. (2013). Definitive and sensitizing conceptualizations of mediatizat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23*, 203-222.
- Kay, A., & Goldberg, A. (1999). Personal dynamic media. In P. A. Mayer (Ed.), *Compute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 reader* (pp. 111-119).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enney, K. (2005). Representation theory. In K. Smith, S. Moriarty, G. Barbatsis, & K. Kenney (Eds.), *Handbook of visual communications: Theory, methods, and media* (pp. 99-106).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Kress, G., & van Leeuwen, T.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New York, NY: Routledge.
- Krotz, F. (2009). Mediatization: A concept with which to grasp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 19-38).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2007). The meta-process of "mediatization" as a conceptual fram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 256-260.
- Lundby, K. (2009). Media logic: Looking for social interaction. In K. Lundby (Ed.), *Mediatization: Concept, changes, consequences* (pp. 101-119). New York, NY: Peter Lang.
- McCarthy, J., & Wright, P. (2004). *Technology as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Nichols, B. (2001). *Introduction to documenta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 J. D.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ilotta, J. J., & Schultz, D. (2005). Simultaneous media experience and synesthesia.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23*, 19-26.
- Schulz, W. (2004). Reconstructing medatization as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 87-101.
- Shneiderman, B. (2002). *Leonardo's Laptop: Human needs and the new computing technologi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Silverstone, 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UK: Sage.
- Strömbäck, J. (2008). Four phases of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13*, 228-246.

附錄一：深度訪談受訪者背景

受訪者	背景	訪談時間
A	環境與生態組織負責人	2014.05.28
B	環境運動者／另類媒體經營者	2104.05.29
C	生態紀錄片製作人	2014.06.05
D	電影發行公司總監	2014.06.05
E	電影發行公司總經理	2014.06.05

附錄二：【看見台灣】電影行銷重要時點

時間	發布內容
2013.05.28	FB 粉絲團成立
2013.06.26	前導預告一：11 月壯闊呈現
2013.08.24	前導預告二：美麗家園篇 11 月 1 日正式上映
2013.09.11	幕後花絮：起飛篇
2013.09.24	10 月 30 日戶外首映 flyingV 群眾募資影片
2013.09.30	正式預告：電影 11 月 1 日全臺上映
2013.10.15	幕後花絮：邁步向前篇
2013.10.22	幕後花絮：東西方樂章
2013.10.23	高雄巨蛋首映會
2013.10.27	幕後花絮：來自玉山的歌聲
2013.10.30	臺北民主大道戶外首映
2013.11.01	院線正式上映
2013.11.06	幕後花絮：聽見·看見
2013.11.23	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2013.12.05	幕後花絮：名人推薦
2014.01.07	報載票房突破兩億元
2014.01.16	正式預告點閱率突破 100 萬人次
2014.02.15	院線下片
2014.03.06、07	屏東放映（車城國中、恆春國中）
2014.03.14	南投放映（地利國小）
2014.03.16	臺南放映（黃氏古厝）
2014.03.21	宜蘭放映（三官宮）
2014.03.23	花蓮放映（泰林文化園區）
2014.03.27	苗栗放映（龍雲宮）
2014.03.28	彰化放映（漢寶園文化園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自【看見台灣】粉絲團。

The Mediatization and Remediation of Cinema-Released Documentaries: A Case Study of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Tsao, Wan-Lin*

Consultant of Editorial Department, Business Weekly

Abstract

Documentaries tend to be considered as alternative, without cinema release, as they have played the pivotal role in the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of Taiwan. Circumstances seem to change, as quite a few domestic documentaries did enjoy greater viewership via mainstream cinema release, just like popular movi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is new development in domestic documentaries with a case study of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the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documentary. Drawing on mediatization theory, which specifies two approaches in its research tradition, i.e., the institutional and the social-constructionist,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remediation of documentaries and examines the related media impacts and effects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al life. She analyses how the documentary film adopted its common-denominator media logic for maximizing its viewership; how it remediated “reality” via its heavily-equipped aerial photography. The paper then concludes that a hybrid use of old and new media technologies, as exemplified by “*Beyond Beauty -- Taiwan From Above*,” inevitably creates brand new user experiences in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aries.

Keywords: remediation, user experience, cinema-released documentaries, mediatization, media logic

* Email: selena.tsao@gmail.com

Received: 2014.10.06

Accepted: 2015.01.13

在傳統與現代性遙譯之間的媒介實踐：新加坡 《叻報》的萌芽與開展（1881~1911）*

黃國富**

馬來西亞大同韓新傳播學院講師

摘要

身為買辦的土生華人薛有禮，在 1881 年創辦新加坡首份中文報刊《叻報》時，聘用「中國」南來文人葉季允主導報紙的運作，大致呈現將南洋從視為中華文明「疆域」的延伸，到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意識日漸清晰的過程。本文發現，對於西方現代性的推展而言，《叻報》以接近中國「傳統」的形式，將現代性元素透過中文進行傳播，更親近讀者與具有說服力，使西方現代性在當地華人社會的遙譯更為可能。然而，在強調社會現代化的工具理性過程中，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此時也獲得強化，使得文化現代性的個體主體性建構受到壓抑。

關鍵詞：文化買辦、印刷資本主義、現代性遙譯、媒體實踐、新加坡叻報

* 此文主要改寫自本人博士論文（2013）《「跨域中華」的新媒介與現代性：新加坡中文報與社會發展（1881~1911）》第四章〈《叻報》與文化仲介〉。

** Email: kockhoo@gmail.com
投稿日期：2014 年 7 月 31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4 月 27 日

壹、前言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期，英國殖民政府在新加坡重要開拓者萊佛士（T. S. Raffles, 1781 ~ 1826）早年所構想的非正式帝國基礎上，將新加坡逐漸建立成為繁榮的貿易金融和移民中心。資本主義與殖民主義在新加坡的發展過程中，殖民者與在地定居者和流移者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力上的相互共構與折衝，逐漸將新加坡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的體系中，且讓現代性（modernity）移植到這新興的港口城市。

殖民統治的本質在於「差異」，透過在人權、現代文明與傳統文化等存在顯著「差異」，使得殖民統治者能以文明的傳道者自居，同時又對他族進行經濟壓榨，以及對其在政治上的抑制和統治的不平等賦予正當性（陳培豐，2013：1）。英國殖民者傾向在被殖民者的族群內部建構與發現其成員的同一性，在外部則建構更大的差異性，如建立「華人」¹的分類，其內部包含不同的方言群（譬如福建人、廣東人等），外部則有界線更清楚的「馬來人」和「印度人」等分類，形成殖民者所定義的多元社會，有利於分而治之的治理；除族群身分的認同建構，殖民者的治理也讓「消費者」、「工人」和「國民」這類現代性敘述進入個體的身分認知（Trocki, 2006）。

在強化不同族群的邊界與引進現代性上，印刷媒介是其中重要的文化機制。殖民政府很可能為了更強化創造一個多元異質社會，促使各種語言報紙在1870年代後在新加坡出現（Trocki, 2006: 66）。首份中文報刊《叻報》在1881年創辦，開始透過印刷媒介建構華人的文化認同與現代性觀念。

然而，以「現代」為形式，卻以「前現代」／「傳統」為實質道德論述的民族主義（錢永祥，2001），也在清朝末年逐漸形成。「中國」²民族主義在甲午戰爭後開始影響「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聚集地，也讓「前現代」與「現代」內

1 由「中國」大陸向外流離的人在稱謂上，一般稱為「華僑」、「華人」或「華裔」，內涵複雜且爭議一直存在，本文主要使用「華人」一詞，泛指流離海外的「中國人」，詳細討論可參見王廣武（1994）。19世紀末葉新加坡的「華人」主要有定居較久的「土生華人」，以及此時大量流離至此的「新客」。

2 葛兆光在《宅茲中國》（2011）與《何為中國》（2014）中，認為「中國」是一個特別的「國家」，它「並非（像歐洲那樣）從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有限『國家』的觀念，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像，近代民族國家從傳統中央帝國中蛻變出來，近代民族國家依然殘存著傳統中央帝國意識。」（葛兆光，2011：28，2014：12-13）。葛兆光認為古代中國人的「中國」經常是一個文明的空間，而不是現代的、有明確邊界的國家，因此，他對歐洲現代的「民族國家」概念是否適用於「中國」這特殊「國家」提出質疑，且認為應從歷史進行更深刻的檢視與理解。本文提及的「中國」，則泛指至清朝結束前的文明空間。

含元素的糾結更為複雜。殖民地政府原本堅決反對在地民族主義，這將挑戰其執政權威與實質利益，然而，在殖民地政府的殖民意識型態與政策，卻弔詭地經常有利於民族主義的建構（Anderson, 1991 / 吳叡人譯，2010），而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是民族主義得以出現的重要條件。

本文的理論關懷源自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Anderson, 1991 / 吳叡人譯，2010）一書提出的印刷資本主義論點。現代性發展中重要元素之一的報紙，是隨著印刷資本主義而蓬勃發展的活字印刷新媒介（media），其特殊的性質且協助創造時間與空間新概念中的複雜內涵，讓現代性的特質與觀念傳播以新媒介為介體，並以「媒介現代性」方式迅速向外播散與產生作用，形成人們日常生活世界實踐場域的媒介文化環境。

安德森（Anderson, 1998: 33）指出，「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東西」（quodidian universals）會透過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展示出來，且它並非一種單向的流動，而是同時讓許多人能共同想像。這些普遍性的東西對特定時刻具有特定意義，且可以塑造那個時刻。這個抽象體系的建構，讓個體找到自身的位置和與他人建立連結，建構自身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然而，人們如何將現代性「逐譯」至日常生活，與政治、經濟與文化元素交混建構在地的現代性？這是本文問題意識的起點。

本文透過晚近有關現代性的反思與討論，主要焦點著重在現代性建構抽象體系中的時間與空間要素，以此為基礎提出詮釋新媒介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逐譯的分析架構。本文嘗試透過中文印刷新媒介《叻報》及其出資人薛有禮（See Ewe Lay, 1851 ~ 1906）家族的背景為主要分析材料，時間從 1881 年創刊至清朝結束的 1911 年為止³，釐析所隱含的特殊意義，能更理解新媒介與現代性在逐譯新加坡華人社會時的特點。

貳、理論與概念的運用與說明

一、不同脈絡下的現代性意涵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指出，在 19 世紀之前，“modern”一詞的用法大部分是負面的意涵；19 世紀以後，“modern”的字義演變朝向正面意涵，等同

3 《叻報》1881 年創刊後數年的紙本已散佚，現存最早的報紙是從 1887 年 8 月 19 日開始，直至 1932 年 3 月 31 日停刊為止。

於「改善的」(improved)、「令人滿意的」或「有效率的」(Williams, 1983 / 劉建基譯, 2004: 248-249)。這個語意的轉變, 可以看到「現代」一詞在 19 世紀變化巨大的語境裡, 成為代表西方內涵的重要詞彙, 且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下向全球擴展其影響力。

哈伯瑪斯 (Jurgen Habermas) 在 1980 年的演講〈現代性：未完成的計畫〉(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Habermas, 1997) 指出, 現代性是根基於啟蒙思想的計畫, 期盼透過藝術與科學不僅能提升對自然力量的控制, 且能更進一步瞭解自我與世界、道德的進步、社會體制的正義以及人類的幸福。哈伯瑪斯將現代性進一步區分為「社會現代化」(social modernization) 與「文化現代性」(cultural modernity), 前者強調的是工具理性 (instrumental reason) 所界定的理性化, 指向資本主義現代化下的經濟與官僚體制, 接近一般所使用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概念。「文化現代性」則強調實質理性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這在原本一貫且連續的世界觀崩解後, 出現 3 個價值領域的分化, 即真理 (truth)、規範 (normative) 和本真性 (authenticity), 它們分別指向自然、社會與主體, 能各自獨立地發展出豐富的文化意義 (Habermas, 1997: 44-45)。

紀登斯 (Giddens, 1990: 1) 認為必須從制度層面來理解現代性, 因為制度的導入引起日常社會生活的改變, 使得個體生活能與自我以直接的方式交織起來。因此, 現代與前現代的區別或斷裂, 主要就是這類「制度性的轉變」, 對於社會結構與個體的建構成相當大影響。現代性基本上由 4 個制度層面互動產生, 即資本主義、工業化 (industrialism)、監控能力 (surveillance capacities) 與軍事力量或是對暴力工具的控制 (control of the means of violence) (Giddens, 1990)。在現代性的發展中, 兩種不同的組織特別重要, 即民族國家和系統的資本主義生產, 兩者結合所創造出來的權力在密切協作下, 席捲了近代全世界各個角落, 將現代性綿密地滲入日常生活。

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 ~ 1984) 則主要從個體的層面來檢視現代性, 他在〈答何謂啟蒙〉(Foucault, 1984 / 汪暉譯, 1998: 430) 一文中指出, 現代性經常被刻劃為一種時間的不連續意識, 這是一種與傳統斷裂的全新感覺, 且是面對正在消逝的時刻之暈眩感覺。然而, 傅柯認為, 現代性其實是一種「態度」, 而非一般所理解的「時間」概念。所謂的「態度」是指「與當代現實相聯繫的模式; 一種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願的選擇; 最後, 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 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 這種方式標誌著一種歸屬的關係, 並把它表述為一種任務。無疑地, 它有點像希臘人所稱的社會的精神氣質 (ethos)」。(Foucault, 1984 /

汪暉，1998：430）因此，傅柯視現代性的「態度」為一種實踐的批判，從中引導我們去建構和認識自身，而這正是從啟蒙中承繼下來的精神財富，讓人們在持續實踐的批判中邁向「成年」。

從以上對於現代性的討論，可以看到人的「主體」狀態被視為現代性「成敗」關鍵，特別是強調主體「反身性」（reflexivity），只是該如何將此「主體」狀態安置到不同脈絡進行評估，一直是充滿矛盾且難以處理的議題，且涉及如何看待「人」的問題。然而，有關現代性的討論多忽略附著於情感的反思部分，甯應斌、何春蕤（2012：38-41）指出，沒有不涉及情感的反身性，所有反思活動中的資訊與知識等都有情緒的附著，只是這類情感的反身性在過度強調理性化的過程中被長期忽略，窄化了現代性的實質意涵。

對於現代性由西方向外殖民而傳散到各地的狀況，不能僅把現代性理解為規範性概念，企求、學習如何成為「現代」，而應視為在現代化過程中，與在地歷史及文化遭遇，經過協商、混合的總體「效果」；而「翻譯」在其間扮演重要角色，它提供人們思考問題的方法，讓不同社會有機的形狀、特性等能夠出現，且也能被表現與傳達（陳光興，2007：389）。現代性逡譯至非西方地區的過程非常複雜，Liu（1995／宋偉杰譯，2008）提出的「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對於我們理解殖民現代性的逡譯有所助益，因為它使我們能夠識別並詮釋歷史偶然的時刻與過程。但是這些時刻與過程既無法歸結為外國的影響，也不能簡化為本土傳統不證自明的邏輯，而是相互摻揉、協商與混合後的「效果」。本文把現代性做為一個「對照性」概念，試圖理解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脈絡下現代性的逡譯與在地接合（articulated）後出現何種樣貌，讓我們對跨域中華的日常實踐中所展現的同質與異質部分有更多理解。

有關外來事物的「移植」，首先必須經過「翻譯」的程序，將其轉化為在地群體能夠理解、接受的語言與文化，這個「翻譯」過程包含字義上的「語言學上的翻譯」，即將外國語彙轉化為意義相當的本地語彙；同時也包括文化人類學意涵的「文化翻譯」，即將不同群體的文化邏輯與實踐，轉化成自身群體能夠理解的文化系統（朱惠足，2009：275）。因此，本文運用「逡譯」一詞，是要強調現代性的「移植」與「翻譯」過程中，外來與在地之間有著更複雜的協商、挪用與交混等元素的創生過程，各種意義與實踐在其間形成接合、轉化與創造，使得群體之間的文化界線出現鬆動、游移、相互穿透等的動態變化，一些新元素得以在此過程中交雜迸現，因此並非簡單與單向的「移植」與「翻譯」。

我們在對本土現狀進行反思與批判時，所採取的視角與判準，基本上建立在

西方知識架構上，使得對現狀的規範想像難以逃脫西方現代性範疇。為了釐清與處理這個困境，似乎得回到對現代性如何在本土開展進行重新的理解與反思，才可能超克西方現代性對我們長期的桎梏。

二、現代性重塑的時空概念

在初期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時間與空間是關鍵的觀念，尤其是兩者被賦予全新意涵，讓現代性的論述與實踐取得更好的動能發揮。

現代性發展中重要元素之一的報紙，是隨著印刷資本主義而蓬勃發展的印刷新媒介，其特殊的性質協助創造了時間與空間新觀念中的複雜內涵，讓現代性的特質與觀念傳播以新媒介為介體，迅速向外播散與產生作用，形成人們日常生活世界實踐場域的媒介文化環境，對整體社會產生重要影響。這是本文著重探討的重點，尤其它如何參與建構新的時間與空間概念，讓非西方文化的被殖民者也能接受，成為建構社會新秩序的重要手段。

紀登思 (Giddens, 1990: 13-14) 認為，社會的秩序問題應被看成是時間－空間延伸 (time-space distancing) 的問題，即：在什麼條件下時間與空間被組織起來且連結在場 (presence) 與缺席 (absence)，這也牽動「邊界」(boundariness) 的問題，即有清楚地各種邊界有利內部秩序的維持。然而前現代所有社會都被紐帶與聯繫交織起來，且貫穿在國家的社會政治系統與「民族」(nation) 的文化秩序之中，其邊界不如現代民族國家般明確。因此，「時間」與「空間」的重新建構是現代性的關鍵與特質，對社會秩序具有重要影響，是必須加以檢視的議題。

現代性的動力機制來自 3 個基本面向，即「距離化」(distancing)、「去鑲嵌化」(disembedding) 及「反身性」(reflexivity)。「距離化」是指時間與空間的隔離。有了「距離化」這一必要條件，讓現代性另一重要動力來源「去鑲嵌化」成為可能。「去鑲嵌化」則是指「社會關係從在地 (local) 互動脈絡中『抽取出來』(lifting out)，且它們在不特別確定的時空跨度 (spans) 中重新建構」。至於現代性中的第三個面向是「反身性」，它是對所有人類活動特徵的界定，在現代性中「社會實踐會不斷地依據所接受到關於實踐的資訊來檢驗和改革，所以構成改變社會實踐的特點」(Giddens, 1990: 21-38)。現代性動力機制中所含括的 3 個基本面向相互連結且呈現相當複雜關係，本文主要處理有關「距離化」的部分，但當中還是會與去鑲嵌化及反身性有所關聯。

時間與空間出現的距離化對於現代性非常重要，它使得官僚體制與現代民

族國家的理性化組織獲得成長的可能性，且有其內在動力和能力去連結地方和全球的領域，還可讓現代世界被放置在一種具全面意義的世界史裡，讓理性化組織運用這樣的歷史來型塑現在（present），強化從過去、現代到未來的線性邏輯，使得理性思考下的意義問題有更多的解釋空間，特別是制度性組織提供對過去進行整體性的適當詮釋，讓個體可與具體或抽象群體進行更多連結（Giddens, 1990: 19-21）。因此，啟蒙時代以降的線性「進步」史觀，逐漸成為主導與極具吸引力的歷史觀點，影響人們對過去、現代到未來的看法，對自身與集體的理解也和前現代有很大差異。

時間與空間對於初期現代性的建構具有極強動力，且這兩項社會構造物（social construct）經過整個體系長期塑造，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自然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且透過想像等方式讓個體與集體產生連結，形成力量強大的集體意識，以現代民族國家體系及資本主義機制的運作方式維繫社會秩序。

麥克魯漢（McLuhan, 1964 / 鄭明萱譯，2006：190-191）指出，人們願意將生活支離破碎成小時、分鐘的現象，僅能出現在高度讀寫的社群。讀寫本身是一種抽象的靈肉分離，隨著讀寫的全面普及，時間就取得圈封或圖畫式空間的性格，可以分而再分，也可以被填充；一旦時間被機械性或視覺性的圈封、分割和填補，就可以越有效地運用它。因此，時鐘並未創造抽象的時間，而是被時鐘強化的讀寫創造出抽象時間。機械與抽象時間型態的建立，在工業大量生產時期也延伸至報章雜誌的定期出刊。因此，大量定期出刊的報章雜誌在市面上流通，且成為許多人日常生活所需後，抽象時間感更被確立下來。

和計時的歷史一樣，製圖學的歷史也鑲嵌在從前現代過渡到現代的過程裡，它大致上是根據清楚的數學原理，改良空間的測量與再現（Harvey, 1990 / 王志弘譯，1993：58）。正如東猜（Tongchai Winichakul）所言，地圖是對現實的一個科學之抽象化（Anderson, 1991 / 吳叡人譯，2010：242）。印刷術普及後，人們有了大量看印製地圖的經驗，才會把宇宙或「世界」想像成平攤在眼前的東西，才會把宇宙看成是隨時等待人們去「探索」的對象，這是在口語文化時代不會發生與不瞭解的事（Ong, 2002 / 何道寬譯，2008：55）。因此，地圖對空間認知的極具重要性，它使現實的空間抽象化，但又讓這抽象化變為可見與可理解的，讓人對現實有具體的掌握，這是一種視覺空間的建構，即它是透過新的科學知識將人們生活的環境給予具體化，讓個體能理解自身所處的「位置」。

上述討論可得知，在建構時間與空間的過程中，各種傳播與運輸的新媒介技術陸續出現與不斷革新，其特殊的介體特質讓人們感受到了不同的生活經驗，也

讓現代性的特質更融入人們日常生活之中，其中印刷革命後出現的各種類型傳播媒介具有重要功能與意義。

現代性的抽象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大量前現代秩序所缺乏的安全 (Giddens, 1990)。新媒介技術則在時間與空間上，協助日常生活的抽象系統不斷地增長，影響人們對自身的理解與外在的認知。印刷術促成一種封閉 (closer) 空間的感覺，即文本的內容已成定論。人們相信印刷文本表示作者的語詞已定稿，是個「終極的形式」，不可能再做變動。這種強加的封閉或完結的感覺，有時是一種清楚的物理感覺，這是一種無意間產生的微妙且真實感覺 (Ong, 2002 / 何道寬譯, 2008: 100-101)。因此可以說像報紙這類新媒介的出現，強化了人們的存在感與安全感，減輕現代性帶來的焦慮感，對個體的建構有一定作用，且它延伸了人們日常的行動範圍，讓意義的傳遞與溝通增加了更多可能性，使人與人的互動產生了很大變化。

參、土生華人的「再華化」與文化買辦

馬六甲的土生華人是在地原住民與移居於此的華人（幾乎皆為男性）交互混合後的後代，兩者不是以同化的方式進行文化融合，而是各主體在互動過程中具有相當的能動性，加上早期外在殖民力量在其中的介入不是很強烈，讓馬來文化與中華文化在比較「自然」的狀態下進行混合，經長年累積讓土生華人文化融合了不同傳統的特性，呈現在地混雜性，因此在文化認同上也有相當彈性，其固著性未必很強烈，且文化包袱相對較輕，對「異文化」與「新事物」的接受度頗高。

土生華人原本是一種較為內在的「交互混合」，然而，當晚近治理能力越來越精進的西方殖民者進入後，殖民力量透過各種方式滲入日常生活，再加上其他元素的涉入，使得被殖民者在主體建構過程中，雖然未必是處於完全被動的狀態，然而個體能動性還是受到一定壓抑，處於一個更複雜的協商過程，當中也涉及許多的現實利益糾葛。

一、薛氏家族的「再華化」

《叻報》創辦人薛有禮是移居南洋第五代的土生華人，原籍福建漳浦縣，其祖先在 18 世紀移住馬六甲，且逐漸在此發跡。1820 年代中期，薛有禮的祖父薛佛記 (See Hoo Keh, 1793 ~ 1847) 在新加坡開發不久後到此地發展，成為新加坡早期華人社會的核心領袖。1839 年獲選擔任馬六甲華人社會中最重要的職務「青

雲亭亭主」，薛佛記回到出生地，不過和新加坡福建幫群仍有聯繫，這時的薛氏家族是新加坡與馬六甲二地福建幫群領袖中的四大家族之一（林孝勝，1995：40；柯木林，2007；莊欽永，1986：22-23）。

19世紀中期前的新加坡和馬六甲土生華人社會，曾出現短期中華文風盛行的氛圍，即由過去的溝通主要是採用口頭語言，此時出現書面語言的運用，其中原因可能是1815年後馬六甲出現9間中文私塾學堂，教育獲得相當程度的推展，使土生華人更有機會接觸中華文化；莊欽永（2007：227）認為，當馬六甲的移民到新加坡後設立書院，基本上是繼承過去在馬六甲的傳統。

薛佛記這一代遷居新加坡的土生華人貿易商，尚未把新加坡視為其落地生根的地方，較多把它當作事業發展的暫時寓居所在，其關係網絡主要還是在生長的「地方」（place）——馬六甲。至於和「中國」的關係，則主要來自先輩在傳統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商貿的往來，即孔飛力（Kuhn, 2008）所說的「通路」（corridor）與「利基」（niche）因素讓其維繫著和原鄉之間的連結⁴。部分土生華人貿易商看重的祖籍同鄉關係，以及願意參與組織同鄉會，很可能多是利益合作的基礎，至於認同問題此時基本上尚未浮現。

在辛亥革命以前，流離至海外的「中國」人未對自己的身分做特別的界定（麥留芳，1985：32）。王賡武（1994：234）指出，華人從未有認同（identity）這一概念，而只有華人屬性的概念，即身為華人和變得不似華人。王賡武所說的認同，應是一種從個體出發的概念，而早期海外華人確實尚未發展出個體認同與集體認同的意識，群體的邊界也不明顯。然而，早期的土生華人一般還是在意自身的華人屬性，在生活上一般表現得「尊重中國文化的傳統價值，也尊重傳統上中國人所推崇的學術、仕途和榮譽」（楊進發，2007：5）。蘇精（2010：232）指出，到1840年代時新加坡土生華人頗為認同自身的華人屬性，保存很多華人傳統的思想言行，渴望別人認可他們的華人屬性，且視他們為華人。

薛有禮的父親薛榮樾（See Eng Watt, 1826～1884）在馬六甲生長，後隨養父薛佛記遷移至新加坡，是1854年當地第一所中文學校萃英書院的創辦人之一，在新加坡經商多年且在社會上有一定聲望。鴉片戰爭後，廈門是被迫開放的5個口岸之一，非常接近薛家的祖籍地，讓他們能在此開啟新事業，也與「中國」這塊土地建立更密切聯繫。

4 孔飛力指出，19世紀後東南亞華人移民與祖籍地的關係愈趨密切，且在流寓地與家鄉之間維持著經濟、社會與文化紐帶的「通路」，許多華人在尋找生計上的「利基」，皆建立在這條「通路」上；官方在其間的涉入不深，民間的聯繫隨著西方經貿往來增加而愈趨活絡（Kuhn, 2008: 43-51）。

薛榮樾是首批到廈門經商的英籍華人⁵，1854年薛榮樾與弟弟茂源（See Moh Guan, 1833 ~ 1879，也稱茂元）、坤元、德源（？ ~ 1885，也稱德元）合資創辦錦興船務行，經營廈門、汕頭與新加坡之間的航線，並在廈門設立錦興分行，由薛榮樾負責業務（莊欽永，2007：228）。「中國」口岸的被迫開放與輪船技術的改進，讓商貿與移動的可能性增加許多，使得具備各種資本的薛榮樾這代土生華人，在空間移動範圍較其父輩更廣闊與頻繁，甚至習於在中國各口岸與東南亞間移動，與中國本土建立較以往密切的情感與商貿關係。

1858年天津條約簽定後，「中國」被迫開放5個口岸（上海、寧波、福州、廈門、廣州），供西方人通商與外國官員居住。薛榮樾此時以外國籍的身分返回父輩的祖籍地，且在廈門長期居住，再娶妻妾王如意，並生下第三個兒子薛有福（See Ewe Hock, 1863 ~ 1884）。他是在大清國日益衰弱後才遷居廈門，因此也感受到了大清國「自強」的氛圍。

薛榮樾讓幼子薛有福自幼年起接受中文教育，後至上海參與考試，成績優異，在當時清廷自強運動下，1874年在清廷幼童留美計畫下成為第三批被遣派到美國的留學生。1881年薛有福尚未畢業，留美計畫卻突然中止；隨後薛有福被清廷召回後服務於海軍，且於1884年的中法海戰中為「中國」捐軀（錢鋼、胡勁草，2003）；同年底薛榮樾於廈門逝世。

從薛榮樾到薛有禮這一代，薛氏家族已和「中國」祖源建立更密切的關係，部分長期在祖籍地生活，甚至已服務於清廷。薛榮樾這位早期的英國籍土生華人，在19世紀中期的中年以後回到祖籍地，像是衣錦還鄉的「歸國華僑」，且娶妻生子，長期居住至老死，並未如其父一樣回到馬六甲安度晚年，且後來並未活躍於新加坡及馬六甲華人社會，此時薛榮樾的「家鄉」可能已不是出生與成長的馬六甲而是祖籍地福建廈門，從中可看到其「再華化」（re-sinolisation）的過程，更強調自身的中華文化部分。

薛榮樾不僅讓自身「再華化」，長子薛有禮也在其安排下到「中國」生活與接受教育（叻報，1911b年12月11日，1911年12月12日）。次子薛有文（See Ewe Boon, 1860 ~ 1909）曾在廈門鼓浪嶼開設大型鐵鍋廠，是早期返「國」投資的「華僑」，其工廠生產的產品主要運到南洋銷售（莊欽永，2007：231-239），且與「中國」商貿一直有往來。

5 1852年的法律允許新加坡華人移民歸化為英國籍，當時有一些商界領導人歸化；1857年後則限定為在海峽殖民地出生者及其子女，才能歸化為英籍。然而，多數僑居者對歸化為英國公民興趣不大，他們計畫存夠錢後回中國的家鄉 (Turnbull, 1972: 36)。

若從薛氏家族的例子來，在整體外在環境改變下，19世紀中葉後部分土生華人出現「再華化」的契機，這裡應是一種親近「文化中國」的狀態，現代民族國家認同的概念應仍處萌芽期。

二、土生華人買辦的特殊性與複雜性

在1820年代中期，歐洲商人開始在新加坡尋找在地夥伴，以接觸與聯繫原住民（主要指馬來人與武吉人[Bugis]）貿易商，從馬六甲移居新加坡的土生華人成為適合的人選(Trocki, 2006: 17)。因此，新加坡買辦的出現，主要是擔任西方與在地商人的中間人，其後慢慢加入其他文化群體，使新加坡買辦出現比中國大陸買辦更複雜的面貌。他們在東西貿易上扮演重要角色，讓不同體系的商貿方式能夠運轉，且不僅是中西兩種文化的中間人，甚至是多種文化的中介溝通者。

薛有禮在馬六甲出生，曾接受英文教育，後來也在「中國」大陸生活與學習中文，對中華文化有一定掌握與認識；以這時期土生華人的身分來看，他應能掌握馬來語。因此薛有禮基本上能夠與在地馬來人、「中國」南來華人以及英國人溝通與互動，對他在各地區活動時有很大幫助。

1877年香港上海匯豐銀行(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 簡稱HSBC、匯豐銀行)在新加坡設立分行，薛有禮在此時成為銀行的買辦，開啟了薛氏家族長期擔任匯豐銀行買辦的時代，至1930年代的逾半個世紀裡，前後有3名薛家人陸續擔任匯豐銀行買辦(Tai, 2010: 511)。匯豐銀行這時正處於開疆拓土階段，薛有禮在20餘歲時獲匯豐銀行青睞聘為買辦，這應和其家族背景、掌握多語、政商網絡與具中華文化背景有一定關係。

Hao (1970 / 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 1988: 210-214) 指出，洋行依靠擔保制度來保證買辦的可靠性時，非常重視「中國」傳統講究的誠信守諾，因此買辦本人在聘僱自己的職員時也要確保其誠信，這使他們必須依賴「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特別是家族和鄉土觀念。「中國」買辦的特點在相當程度上，也出現在東南亞地區的買辦制度，即需要展現自身的「中華特色」。

1864年創辦的匯豐銀行，在殖民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英殖民者運用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港口城市，將「中國」和印度的匯款網絡交織在一起，且他們的資源構成巨大的、與西方主導的銀行業交互流通的區域金融市場之一部分(濱下武志, 2008 / 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 2009: 60-61)。

在1881年《叻報》創刊後，薛有禮應仍繼續擔任買辦職務，直到1890年

才由其二弟薛有文接下這項工作。1901年薛有文年僅13歲的兒子薛中華（See TeongWah, 1888 ~ 1940）加入匯豐銀行，擔任父親的助手，至1909年薛有文逝世後，薛中華繼承了父親買辦的職務（Song, 1967 / 葉書德譯，1993：87），直至1930年代才卸下此職務，薛氏家族擔任匯豐銀行買辦超過50年，這和中國買辦制度採行家族繼承的情況相似。薛家擔任匯豐銀行買辦職務與《叻報》運作的時期重疊性極高，它和《叻報》在1930年代初期的結束直接相關（何舒敏，1978：30），也和《叻報》的創辦及發展過程有極大關係。

葉文心指出，「中國」的買辦商人在生活風格與商業活動上，和傳統商人及鄉紳有很大差異，他們吸收了中西不同元素，塑造出前所未有且混合異國與傳統的特殊風格（Yeh, 2007 / 王琴、劉潤堂譯，2010：25）。對新加坡土生華人的買辦來說，他們的生活原本已交混著中華文化與馬來文化，其後再加入西方等文化元素，使其展現更複雜的狀態與風格，且他們多能掌握一定的「現代」知識與觀念，成為西方現代性透譯過程中的重要知識與文化中介，特別是部分買辦看到了報紙這項新式媒介的重要性與在華人地區的潛力，讓其更有意願成為中介各方文化的「文化買辦」。本文所指稱的「文化買辦」不是一個貶意詞彙，僅是試圖說明買辦在清末時期更複雜的實踐，且是一種跨域的實踐，在各種地域、文化與資本中移動的買辦，有著一定的內在聯繫，這對當時的情勢發展有一定影響，值得做進一步的探討與理解。

薛有禮是出身文化混雜的土生華人，其父親與兄弟皆和本土社會與中國祖籍地有密切連繫，和「中國」應有一些微妙情感；在工作上又是各種商貿與文化的中介者，也需要保持其「中華性」，使得新加坡首份現代中文報紙——《叻報》更顯複雜，絕不能僅以是中國報紙的延續做為結語。

對於薛有禮創辦《叻報》的主要原因，論者有相當一致的看法，均指向是「愛國」與推廣中華文化。陳蒙鶴（Chen, 1967）認為，「愛國心」（patriotic）是重要推力，只是這個「愛國熱誠」從何而來，陳蒙鶴沒有清楚的論述。黃賢強（2008：218）與莊國土（1989）的看法相近，認為薛有禮創辦《叻報》是因為認為當地民智閉塞，也回應新任清廷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的呼籲，為推動中華文化事業而辦報，所以辦報的原始動機單純，並非因為政治與商業利益。然而左秉隆是在1881年8月初三（陽曆9月）到任，但《叻報》約在1881年12月初創辦，在時間上極為接近，似不太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能因呼應清廷領事的倡議而創立報紙，或是薛家早有此意，而左秉隆的上任確給予辦報的助力，《叻報》創辦後的政治觀點始終與清政府相當一致，並與清政府領事館維持密切關係。

《叻報》創辦時即在該報任職的葉季允，在《叻報》（1911b年12月11日，1911年12月12日）創辦30年時撰文指出：

本報居停（指創辦人薛有禮），生長炎洲，沉潛學海，曩歸祖國，讀書十年，嘗慨夫叻地同僑，囿於舊俗，身之與國，漠不相關，怒然憂之，遂以覺世牖民，引為己責，念裨風教者莫良於報，於是毅然奮發，獨任其難。

從以上的引文可見薛有禮確實對中華文化在新加坡的推廣與持續，具有一定的使命感，但很難斷定沒有其他動機。不過本文無意探討薛有禮的辦報動機，而是認為《叻報》這項新媒介在新加坡的出現，原因相當複雜，而消弭文化距離的媒介者角色應被重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多種文化的逐譯角色，意即一種文化買辦的實踐。

《叻報》廣告客戶主要是歐人商行，這與薛有禮的買辦身分極有關聯，也和薛有禮親族的豐沛人脈有關，譬如薛有禮的岳父謝安祥（Chia Ann Siang, 1832～1892）曾在著名洋行——莫實德洋行（Boustead & Co.）任職多年，而莫實德洋行在《叻報》長期大量刊登廣告，極可能有賴這層關係。除有外國人脈的支持，也不能忽略殖民政府的角色。海峽殖民地政府的行政通告，也是《叻報》主要的廣告來源，甚至還取得荷蘭駐印尼殖民政府的公告（叻報，1892年8月15日：6）。另外，印刷業務也是《叻報》的經濟來源，其中新加坡市議會就委託許多印刷業務。

至1900年底以前，《叻報》的每日發行量仍不多，若以發行量來爭取廣告恐怕不易，然而，《叻報》的廣告經常占據報紙半數以上的版位，為其帶來相當穩定的財源。《叻報》和當時新加坡發行的英文報紙一樣，發行目標似乎是瞄準少數社會上層人士，而發行量不是最重要關鍵。從《叻報》前期的廣告可得知，刊登廣告的商家目標主要應是華人社會菁英階層，尤其是將進步與現代化的西方介紹給這些華人。

《叻報》不僅是翻譯較「進步」的英文資訊與意見，其內容會被立法會引用和討論，且也會被西報翻譯（Kanayson, 1964: 90）。《叻報》成為一個殖民者與被殖民者資訊與意見的交流平台，特別是透過翻譯與被翻譯的過程，被殖民者的能動性取得一定的展現，不是一個完全被壓制的狀態。

《叻報》的經營未必能讓薛有禮從中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這份報紙卻讓他得到間接的利益。1892年新加坡《自由西報》在文章中點名推薦薛有禮出任市議員，特別指出他的英語能力與知識在華人中特別出眾，且因為經營報紙，能

持續與時俱進，若由他出任定能獲得其他華人「頭家」（*tawkays*）的支持（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92.02.10: 2）。惟最後薛有禮並未出任此職，原因不明。

1920年代由富商陳嘉庚與胡文虎先後創辦《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使《叻報》面臨更激烈競爭。進入1930年代後，因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使得《叻報》經營者薛中華欠下大筆債務，辭去匯豐銀行買辦與市議員職務，讓《叻報》失去許多過往支持其的廣告主，使報社收入大減。此外，市議會也將印刷業務轉包給他人，對《叻報》造成致命打擊，在1932年宣布停刊（何舒敏，1978：30；Chen, 1967: 53）。《叻報》在缺乏殖民當局與外商支持後，曝露其頗為脆弱的體質，也可見《叻報》能創刊及長期維持，殖民當局與外商力量的支撐應是主要因素，至於他們為何鼎力相助，現實利害關係恐怕才是主要關鍵。殖民者透過文化買辦在殖民地建立文化機制，使其成為各種新觀念與訊息的轉介平台，也讓西方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要素能獲得保障與強化。對於薛有禮來說，買辦與辦報成為相互幫襯的身分，甚至混雜在一起，也成為各種元素調和與轉介的機制。

肆、辦報者跨域宣揚的「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意識

從期刊此傳播形式在「中國」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到一種外來的新傳播形式進入一個新社會，並非單純的橫向移植，而需要與既有的社會文化調和與接合，且不停地與當地的社會變化互動，形成傳統與現代之間不斷搓揉的過程（李仁淵，2007：22-23）。對處於東南亞的新加坡來說，19世紀後半段是新加坡華人社會成形階段，更多華南移民向南遷移，在新加坡這個新興城市體驗西方現代性的撞擊，且活絡的流動狀態使得各種文化在新加坡展開相互滲透與影響，對中文報紙的開展有著重大影響。

一、葉季允的關懷與使命

《叻報》在辦報方向上以上海《申報》為模仿與參考的主要對象，而《申報》創辦人美查（Ernest Major, 1830～1908）等人涉入報紙的出版，主要目的是賺錢。因為不同理由，當時在「中國」辦報的群體認為，若他們以「中國」語言使用方式來玩外國遊戲，勝算頗大，就像美查所言，商人希望「販賣中華文明給中國」（Mittler, 2007）。因此，在現代的經營與操作下，報紙已成承載文化的產品，是一門可以賺錢的好生意。薛有禮和美查分享接近的辦報邏輯，不過在出發點與目的

或有差異，薛有禮不僅希望販賣與延續中華傳統，同時也將西方現代文明帶給海外華人，意即扮演一個文化仲介者的角色，既能發揮其使命感，且能取得一定的現實利益，因此薛有禮經營的《叻報》涵括了文化、政治與經濟因素，使其呈現更複雜的面貌。

薛有禮為達成自己的目標，必須找一位瞭解「中國」文化和西方知識，且瞭解新式媒介操作的執行者。薛有禮相中在《香港中外新報》任職的葉季允（1859～1921），力邀身在香港的葉季允至新加坡主持筆政（叻報，1906年9月18日：1）。葉季允在《叻報》任職主筆前後達40年，根據葉季允在1911年回顧《叻報》創刊30年的文章中，指薛有禮似乎僅是個出資者的角色，對《叻報》內容沒有太多干涉，讓葉季允在辦報上獲得相當大自主權（叻報，1911年12月12日：1）。《叻報》內部組織編制不大，葉季允主導《叻報》前中期的內容發展，甚至被尊稱為「南洋第一報人」（陳育崧，1958）。

葉季允（1859～1927）原籍安徽，自少流寓廣東番禺，曾接受私塾教育，擅作詩文，精於黃術，是一名典型的傳統中國讀書人（柯木林，2007：83）。葉季允和一些「中國」沿海改革者一樣，年青、有好奇心，且在英殖民地香港生活數年，已體驗到現代化所帶來的衝擊，對西方有一定認識與理解。當時殖民地的氛圍也造成「中國」人的羞恥感與自卑感，想要努力改革「中國」，這種情感對形成沿海改革者的民族主義思想具決定性作用（Cohen, 1974 / 雷頤、羅檢秋譯，2003：167）。葉季允雖已遠離中國大陸，但仍有「通路」維繫著居留地與家鄉，因此剛開始時他可能把南洋視為中華文明「疆域」的延伸，然而，在外部環境快速變化與辦報的過程中，現代民族國家——「中國」的政治意識也日漸清晰。

《叻報》在20世紀初以前的銷售量不大，然而其代表著活字印刷出現後，印刷資本主義在新加坡的萌芽，根據蘇碩斌（2006）的看法，而印刷資本主義的重點不在資本主義的產業形式，而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邏輯」；同時，印刷資本主義的重要意義，在於印刷作為「媒介」的作用力，而不是作為「資本主義」的作用力。媒介作用力展現現「現代作者與讀者」的關係，衝擊了原本的社會結構。

《叻報》早期的資訊與言論內容，與告示經常混雜在版面上，後來才慢慢做出更清楚的區隔。《叻報》的言論與訊息，大多沒標示作者姓名，有時採用筆名，不過主要負責人與作者葉季允的想法與作法被視為有決定性影響。身為主筆的葉季允，不僅負責撰寫論說⁶，也要擔起選擇與編輯新聞的工作（Chen, 1967: 31），

6 葉季允曾在1904年辭去編務，《叻報》的日常評論明顯減少；1906年下半年葉季允恢復在《叻報》職務後，《叻報》的評論內容回到以前的狀態，顯見葉季允對《叻報》內容生產的重要性。

其個人傾向影響了《叻報》的走向。早期「中國」的報館實行主筆負責制，編輯經營權由具體承辦者而非出資者所掌握，以保證報紙的獨立性，因此，報刊內容主要反映編者而不是所有者的傾向（桑兵，1991：240）。葉季允在《叻報》的角色，和「中國」報館的主筆大致相同。

《叻報》重視言論，將報社幾乎每天刊登的評論或論說放在頭版，談論的議題廣泛，且接受讀者投稿但需署名（叻報，1887年9月1日：1）。除了報社人員的評論與個人投稿，《叻報》偶而也會轉載其他報刊的評論文章。葉季允指出，古代「中國」有類似所謂的報館，然而現代報館的出現還是源自西方，有其特殊社會功能（叻報，1887年8月22日：1）。身為傳統中國讀書人的葉季允，對此時西方報刊的定位也有不同想像。

葉季允是書生型的早期報人，與西方所說的知識分子有相通之處，但並不能等同。在西方政教分離的傳統中，知識分子強調「公共性」，以批評政治社會為職志，然而，對於葉季允這類傳統的讀書人來說，精神事務與世俗事務並非分離的同一事務，因為人間最重要的精神事務——「成德」需在世俗世界中去完成。陳來認為，儒家對「士」的觀念從來就不是以現實政治的批判為唯一的內容，因為儒家的文化信念和責任倫理，使得儒家更注意文化的發展，更注意道德風氣的變化，更多站在政治之內，而非站在政治之外參與政治（黃順星，2008：71）。

葉季允曾在香港報館工作，對殖民香港的英國殖民者已有所認識，且對報紙這項新媒介有一定的看法與主張，並將其想法與理念傾注於報紙，試圖改變在其眼中缺乏文化素養與現代知識的南洋華人。《叻報》辦報的態度，基本如下所述：

報章之設所以，寓褒貶而別是非，廣見聞而開風氣，達外情而宣上意，持政論以挽頹風，此天下之公言一人之私言，其責任固綦重也。
（叻報，1899年12月25日：1）

葉季允這位「南來文人」來到地處中華帝國邊緣的新加坡主持筆政，剛開始未必計畫在此地久留，然而，他卻涉入在地頗多的文化活動，尤其是和清廷有關的活動。此時中華帝國正由世界的中心移位到了邊緣，因此葉季允試圖在「邊緣的邊緣」發聲，希望能幫助改變中國，讓邊緣重返世界的中心。

葉季允以文化啟蒙者自居，他注意文化的發展，更注意道德禮教的變化，因此不斷向海外華人灌輸傳統道德觀念，且葉季允對其說教文章的影響，似乎頗為滿意，在1888年農曆年前夕的社論中指出：

近年來叻地人才已遠勝於昔日……已大有中國衣冠文物之氣，非復昔年狃獠初啟簡樸之風。（叻報，1888年2月4日：1）

葉季允從創報階段試圖引導南洋讀者變得更具有「中華文化」，然而到了甲午戰爭後，他開始更積極引導《叻報》讀者關注「中國」國事（李元瑾，2001：364）。葉季允在辦報與寫作的目的及策略上，近似清末在「中國」各地的刊物中，有相當大部分是由地方開明士紳主導，以開通民智為主要目的的「啟蒙報刊」，其重點並非政治，而是鼓吹破除迷信與陋俗，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建立富強的國家，擺脫民族面臨的困境（李仁淵，2005：252）。

清末時期選用「中國」作為國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現代國際關係的環境下，要打破原有族群關係與地域關係來重建認同，因此，它已不是先秦時代的中國概念。現代中國的確立，一方面是現代主權體系擴張的後果，另一方面又是在各種複雜關係中重新界定中國的結果（汪暉，2010：30）。然而，清廷官員初期對國家「主權」的認知和西方不一致，英國官員以民族國家主權基礎所建立的國際關係來看待中國領事館在新加坡的設立，然而清廷官員觀念多仍在「天下一家」的帝國想像裡，對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主權觀念不熟悉，雙方在邏輯與認知上的差距形成不少矛盾與衝突。

身在原本朝貢圈中的南洋，葉季允也和清廷官員分享對「中國」的理解與想像，將自身視為「中土子民」。在觸及西方民族國家關係時，條約關係中的主權國家觀念也在葉季允的文章中出現，經常討論「中國」與西方國家談判各種條約的問題，如《叻報》早期的論說〈聞中葡約成事擬說〉（叻報，1887年12月27日：1）、〈論中美立約不能以空言挽回〉（叻報，1888年12月7日：1）。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在19世紀末期，「中國」的現代國家觀念已在新加坡社會出現。

以《叻報》為例，目前保留下來的最早版本（1887年）中可以看到，《叻報》仍沒有清楚的分類，也未設欄目，主要類別有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京報選錄、西方各地訊息、中國與南洋訊息等，此時中國本土訊息重要。這些類別個形式維持相當久，直到1908年9月23日大改版後，才有更清楚的分類，在言論與新聞上，主要分為本館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閩粵、南洋、本坡、本館譯電、京事、行省、外國等欄目。到了辛亥革命後的1911年12月，《叻報》再次改版，在欄目上再做調整，分為論說、本館專電、本館譯電、京省、福建（或閩粵）、要聞、本坡、南洋與附刊等（見表1），原來的清廷敕令隨清帝國的崩

時間	內容主要分類
1887.08.19 ~ 1908.09.21	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京報選錄、西方各地訊息、中國與南洋訊息等。
1908.09.22 ~ 1911.12.09	論說、清廷敕令（諭旨恭錄）、閩粵、南洋、本坡、本館譯電、京事、行省、外國與附刊等。
1911.12.11 改版	論說、本館專電、本館譯電、京省、福建（或閩粵）、要聞、本坡、南洋與附刊等。

表 1：《叻報》的內容粗略分類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註：本文的研究範圍至 1911 年 12 月 30 日。

解而廢除。從以上欄目的變化，大致可以看出《叻報》對「中國」、本土與外國事務，從中可看到《叻報》在不同時期對有不一樣的關注程度，在地域上也出現理解的轉換。

《叻報》在初期經常於頭版刊登清廷的「諭旨恭錄」，偶而會刊登「宮門抄報」，顯示《叻報》對清廷官方訊息的重視，同時也固定轉載京報內容，關注民間的脈動。葉季允這位在「中國」沿海成長與就業的新客，雖然剛開始對新加坡及東南亞地區認識有限，然而《叻報》除有很多「中國」與國際訊息，也有一些新加坡或馬來亞的消息。《叻報》持續報導新加坡殖民政府的訊息，也關注與華人有關的訊息和華人領袖的意見，譬如對華人極重視的墓地事務的持續關注（叻報，1887a 年 8 月 20 日，1887b 年 8 月 20 日：1，1887 年 8 月 24 日：1）；在徵聘「採訪人」時，也強調需熟悉本地社會，以及需掌握中文、英文與馬來文（叻報，1890 年 9 月 5 日：1，1893 年 9 月 5 日：1）。因此，在開辦初期葉季允不僅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中國國境」內部，對於「中華文明疆域」範圍內的在地社會動態，他也有所關注。

二、《叻報》與現代「中國」觀念的建構

1894 年 8 月 1 日中國與日本爆發甲午戰爭，《叻報》在 1894 年 8 月 4 日報導此一訊息，其消息來源是新加坡一華商接到從日本神戶發來的電報告知（《叻報》，1894 年 8 月 4 日：2）。《叻報》對此戰事極為關注，在 1894 年 8 月 6 日即發出論說〈論中日戰事〉進行評議；此後不斷跟進最新情況與發表論說，「愛國」情緒不斷升高，把「敵國」日本人民皆稱為「倭人」，認為小小日本乃夜郎自大，譬如〈論日本非中國之敵〉（叻報，1894 年 8 月 10 日：1）。

然而，情勢發展卻是中國不斷敗退，更激起了華人的憤慨情緒，特別是清楚看到中國的衰弱，在〈憤言〉一文中，直抒心中憤怒：

自天地開闢以來未有之奇憤，凡有心知血氣，莫不發指眦裂者，則今日之以廣運萬里，地球中第一大國，而見欺於數島之倭人也。（叻報，1894年12月28日：1）

同時《叻報》也刊登廣告，販售由上海寄至新加坡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地圖，強化了不同「國家」的區別，將不同國家做更細緻的區分，也讓彼此的疆界與差異更具體展示，透過機械複製的方式廣為流傳。

臺灣被割讓後，《叻報》在〈論割地畀倭〉（叻報，1895年5月15日：1）一文中，表達對割讓臺灣的不滿及亟思變革的途徑；同時也出現〈中國各省宜增練勁旅以固疆圖說〉（叻報，1895年5月13日：1），強調要強化各省武裝力量以保住國家疆界，避免重蹈失去臺灣的痛。《叻報》除了原先出售的中國、日本與朝鮮地圖，也開始加售〈台灣戰圖寄售〉：

啟者，茲有人繪印台灣戰圖，託本館代為銷售，此圖係繪大甲山下之捷，山川景物，彈雨鎗林，莫不羅列於尺幅中，令人觀之不啻身臨是地。諸君有欲覽勝者，請至本館購閱，也特此布聞，本館謹啟。（叻報，1895年10月15日：1）

以上《叻報》在甲午戰爭後的表現，可以看到新加坡的新媒介更清楚顯露其「民族」情感，異常關注中國大陸的發展，憂慮著中國的未來，呼應著中國大陸浮現的「中國」民族主義，且打破時空的限制，試圖建構中華民族的一體感，也使得現代性的透譯摻雜了情感面向。至於物理空間的阻隔，其實也是民族與民族主義形成的重要元素。安德森 (Anderson, 1998) 認為，在物理空間上長距離的流放 (exile) 與遷移 (transportation)，是形成遠距民族主義的重要條件。

創刊之初，《叻報》尚關注新加坡本地事務，但隨著 1895 年後中國國內局勢的變化，相關報導很快便超越了任何其他消息，且有關「中國」政治的文章也增多。在清末時對有關「中國」的問題上，《叻報》的立場自始至終親當權派（柯木林，2007）或傾向保守 (Chen, 1967: 44)。從版式來看，《叻報》也很「傳統」，效仿香港與上海的中文報紙甚於本土的英文報紙，明顯是葉季允主導；在版面配置上，也類似香港和上海報紙，刊登清庭敕令和摘錄北京官報。《叻報》在形式上大致上依循香港與上海的一些重要報章，如《申報》、《中外新報》與《循環日報》。從《叻報》經常轉載這些報紙的社論，可看出該報對這些報紙的重視，

偶而還在這些文章後評論以示贊同 (Chen, 1967)。除重視各地中文報資訊與言論，《叻報》也把探訪訊息的範圍擴大到廈門、汕頭和東南亞各大城市（叻報，1890年1月13日），可見其關懷與有興趣的「中國」，不僅是「中國」大陸，還包括東南亞區域，可將「中國」視為跨域的地理與文化概念。

葉季允是較早來到南洋的讀書人，除積極涉入中華文化的傳承與發揚，也參與遠距「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譬如1905年新加坡華人社會響應中國內地發起的抵制美貨運動中，曾組成一個委員會，聯名向北京政府與美國駐北京公使等表達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立場，其英文稿由重要領袖林文慶所擬，中文稿則由葉季允撰寫（黃賢強，2008：55-56）。《叻報》對此事非常關注，持續報導與評論此事，當中可見主事者葉季允的清楚立場，且他也是在地中華商務總會發起人，參與和介入政治與在地社會的發展。

辛亥革命後，適逢創報30年的《叻報》，在1911年12月11日進行大改版，將報紙開本加大為對開。在報頭旁對改版一事做了說明：

……近者三民主義日益昌明，專制時代已經過去，祖國內地由京朝以迄各省，均以廓然改觀，諸凡制度、典章、兵刑、禮樂，一切新政，有如五光十色，令人應接不遑，加以南洋愛國僑胞，亦多矯然特出，可傳之事，接踵而興，自非再將報紙擴充，恐難免乎缺漏，是以本報不惜工本再置巨機，趁此三十周年之期，即將報章再行增大，以期多載時務，庶足以饗閱者之心……。（叻報，1911a年12月11日）

1911年葉季允寫了篇長文〈本報出世三十周年紀念序〉（叻報，1911b年12月11日，1911年12月12日），回顧過去、整理當下與展望未來。在這個「中國」變動巨大的時代，對中國情勢極為關心的《叻報》，耗費巨資購置印刷機，積極介入整個社會的發展。《叻報》在日期上由清曆（至1911年11月6日）改為農曆一個多月後，再改為黃帝曆，因為清朝已覆滅，民國尚未成立；然而後來又改為農曆，直至1913年才使用民國曆年，顯示《叻報》在中華民國成立時可能仍不願意承認其正統性。

從上述有關「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意識的討論，可以看到在甲午戰爭後兩者雜揉的在論述中呈現，特別是在「中國民族主義」愈趨成型以後。誠如錢永祥（2001：387）所言，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種道德論述，它是以「現代」為形式，卻以「前現代」／「傳統」為實質的論述。民族主義的現代形式主要是提供普遍與平等的成員身分（如國民、公民），讓個人能從傳統、自然的關係中解

放出來；它的前現代實質是民族主義的論述，提供某種自然的、文化的或歷史哲學式的超越建構，以作為民族的集體身分基礎。

民族主義這種半現代、半前現代的特質，會影響到民族國家的現代性走向。民族主義的動力相當程度來自現代與前現代之間的矛盾與衝突，現代指向西方的進步性與理性；前現代則指本土傳統的落後性與情感，兩者在民族主義論述的操作中糾結在一起，讓更多個體的感知被召喚至集體的想像裡面。

印刷資本主義是民族主義得以出現的重要條件之一，因為印刷媒介是操作現代與前現代／傳統論述的重要場域，從中得以建構想像的共同體。印刷報紙是型塑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場域，對於中國大陸本土以外，且又雜揉殖民與東南亞特質的新加坡社會，具有「時空壓縮」特性的報紙跨越時空障礙，在新加坡開展出本土的遠距「中國民族主義」。

伍、《叻報》與現代性敘述的逐譯

殖民者為更有效治理殖民地，會嘗試建構一套「現代知識」，透過這套知識告訴被殖民者西方文化的優越，本土傳統僅屬次等。這套所謂的「現代性敘述」，以西方的分類和邏輯，被普世化為世界邏輯（黃崇憲，2010：24）。

西方「現代知識」在殖民狀態下以強勢姿態逐譯至新加坡社會；1890年後的華人社會中面對處於「自強」的「中國」，積極吸收「現代知識」的「中國」士人與知識菁英，形成各種力量引進新知識與新觀念到新加坡。清廷試圖以過往皇帝的聖諭，教化海外「子民」繼續效忠清廷；不滿清廷腐敗而出現的維新派與革命派也有各自議程，需要透過知識去說明與說服海外「同胞」改革神州大地。「中國」本土不同力量以各種方式與管道建構知識及競爭，新媒介皆成為重要場域，但也因為這些力量的介入與在地力量的接合及協商等，使得在新加坡所發展的現代性內涵更顯複雜。

一、新時空觀念進入日常生活

在現代性敘述的逐譯過程中，涉及的不僅是文字，還有圖像所塑造的各種視覺形象。19世紀下半葉，照相、平版印刷和新聞出版共同改變圖片在「中國」製作、複製、傳播的方式（Yeh, 2007／王琴、劉潤堂譯，2010：90-91）。這些媒介科技的發展使得現代性中「看」的特性被凸顯出來，視覺邏輯慢慢建立起來，成為「現代人」思考的重要憑藉。《叻報》的內容中不僅是文字的敘述，圖像也

逐漸增多，尤其在「告白」⁷或廣告部分，以下從不同面向檢視《叻報》在現代性透譯的論述與操作。

從時間的觀念來看，西方所發展的機械時鐘所塑造的時間觀念與「中國」社會很不一樣，在清朝的正統曆書裡，並沒有以「七」為循環單位的習慣。雖然民間通書採用「七」循環，也與西方所使用的「星期」概念完全不同。傳統曆書的循環是從禁忌的角度提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趨吉避凶，「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未形成以「七」為循環單位來安排事務的習慣（呂紹理，1998：72）。

1872年創辦的上海《申報》最早採用「格勒哥里曆法」（Gregorian Calendar）⁸，在報頭並列標注中曆記日與西曆記日，呈現一種現代的時間概念。《叻報》創刊初期也採用當時《申報》的作法，在報頭日期部分採取中曆為主、西曆為次的並列方式，即以皇帝年號為紀元、中曆記日為主，因此，報頭右側寫著「大清光緒十三年」，左側寫著「丁亥七月初一日」；下方則寫著「大英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八月十九號禮拜五」。在告白或廣告上經常會放上首次刊登的日期，若是宣傳洋貨經常只有西曆，部分也會加上清曆並置，呈現出中西時間觀念此時的混雜狀態；到了民國初期《叻報》慶創報三十年大改版時（1911年12月11日），曾使用黃帝曆取代清曆，與西曆並置，但不久後又將黃帝曆改為農曆。

《叻報》創刊時即採日報形式，每日發行，每周的禮拜天也跟隨殖民政府的規定休息，而不是傳統所重視的農曆每月初一和十五。《叻報》引用的是「星期」概念，是現代性效果的展現，強化殖民者引進的新時間概念，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更習慣以「星期」來安排自身的事務，即工作六天、休息一天的新勞動觀念。此時西方現代性中的「閒暇」的概念也被帶進來，新加坡社會出現越來越多的「休閒」場所，交通也越趨便利，讓休閒活動來調劑新的生活形式。

《叻報》並未因採納西方的現代時間概念，放棄傳統的時間，而是採《申報》的模式，在時間上同時放置農曆與西曆。除固定在禮拜日休刊，一些特定假日《叻報》也不出報，創報前期休刊的假日主要以「中國」節慶為主，如農曆年（休刊時間較長）、中秋節等；1898年後，西曆年與聖誕節也休刊一天，可見西方假日也漸被接受。

《叻報》在每年年初也售賣「華英月份牌」（叻報，1887年10月26日），

7 「告白」與「廣告」意涵接近，《叻報》在創辦初期採用「告白」一詞，直至20世紀以後改採「廣告」。

8 這是由羅馬教宗格勒哥里十三世按羅馬舊曆修訂而來，從1582年後陸續受到各國採納，成為最普遍通用的曆法，通稱西曆或陽曆（黃金麟，2001：188-190）。

強調中西日期並置，且有多種式樣。月份牌也是引進新時間觀的媒介之一，讓中西並存的時間概念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協助建構新的時間感。1902年《叻報》發售最後一次月份牌後，隔年不知何故停售，至1904年改售春牛圖，同樣強調是「遵照中西曆法，分秒無訛」（叻報，1904年1月6日：1）。這些作法讓人們在轉換時間概念時，還保有中國的傳統，畢竟中國雖逐漸接受新的時間觀，但「中國」傳統的節慶仍未放棄。《叻報》在和「國際接軌」，以跟上所謂時代的前沿時，也顯示新媒介的「進步」，但仍未放棄「中國」的傳統習慣與文化。現存最早的《叻報》（1887年8月19日：7）上，可看到《叻報》長期且固定刊登輪船開往東南亞與華南各地的開航時間表，對要往來各地者來說這是重要資訊，也讓西方時間觀注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

每天發行的日報，成為線性時間的重要標記，也強化「新」為進步的內涵，且讓許多互不相識的人，在媒體建構的環境中進行同時的想像。《叻報》也有相當強烈的「新」概念，在目前保存最早的《叻報》上，即出現「新聞」與「時事」的詞彙，且強調是報館的重點：

……報館之所以設，非若談狐說鬼，類於齋諧，騁艷誇妍，鄰於稗乘祇足，為酒餘之談柄，破睡之新聞已也……。 （叻報，1887年8月22日：1）

在大量讀者出現之前，《叻報》持續的出版有著重大意義，其內容與言論的轉變與其所想像的讀者直接相關，譬如對中華文化與「新中國」的想法傾注於其所撰寫的文章與訊息，且讓讀者想像其同胞們，從中建立了連結，共同建構對「中國」的想像。同時透過新媒介的形式與特性，將西方現代性的內涵逐譯至新加坡本土，自然化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新加坡除了商人、廠主及其他資本家，殖民者也積極引進現代的時間觀，透過各種制度與機制進入人們日常生活，讓百姓必須以鐘錶的具體時間來安排生活，新媒介協助推動與塑造了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不斷推介與展示鐘錶的重要性與意義，使其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叻報》上也出現不少售賣鐘錶的廣告，這對時間感的塑造具有重大意義，將西方的時間觀念向更廣大的讀者傳布。這種在城市裡出現的度量時間方式，顯示鐘錶的使用已和工商活動結合為一體，成為一個相互支應的發展動力。人的身體和它所具有的勞動能力，在這種發展趨勢下變成一個可以清楚計算的對象，而這種理性計算的發揮，是西方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條件（黃金麟，2001：200）。

在空間觀念的理解與想像上，19世紀中葉電報海底電纜環球體系的完成，開創了讓新聞在世界快速傳播的可能空間。「中國」在電報事業在西方國家介入下發展迅速，上海與香港的海底電纜在1871年已鋪設完成，且不斷向外延伸；1881年成立大清電報總局後，加速海底電纜的鋪設，不久後電報服務已可達東南亞(Zhou, 2006: 22-36)。隨著時空的壓縮，有關中國的訊息也可快速傳遞到海內外，讓海外華人發現自己與家鄉的距離其實並不遠，強化了和家鄉的聯繫與關係。

「天涯若比鄰」這句話讓19世紀末葉的人感受到其真實性，一些震驚一時的大事，迅即為人們共知同曉，且出現了一個現象，即在現代新聞傳播的過程裡，總會出現「把國外的事務國內化」(domesticating the foreign)的現象。在這個「國內化」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國內文化社會意識型態的編碼，以自己的觀念和語彙來解讀，以及認識形形色色的外國新聞(潘光哲, 2007: 469)。

《叻報》創辦的時期恰是電報網絡鋪設大致完成的時代，《叻報》大量使用各地的訊息，建立本土與外地的區別，且能突破空間障礙，迅速將各地訊息傳送出去，特別是「中國」本土的事情，讓新加坡華人覺得和家鄉越來越靠近。

「國家」與「主權」的概念越來越清晰，在新聞分類上也更加清楚，而所謂的「我國」指向中國大陸這塊土地，「地圖」在這當中扮演重要角色。《叻報》上頭出現各種地圖，如販售由上海出版的「中國」、日本與高麗地圖(叻報, 1895年1月5日:1)；「臺灣戰圖寄售」(叻報, 1895年10月15日:1)更有文章認為中國應該重視有關地圖的知識(叻報, 1897年7月30日:1)。不僅《叻報》，其他報紙也經常刊登出售地圖的廣告，因此可見在1890年代後對地理的想像出現相當大變化，透過地圖的再現讓「中國」形象被描繪出來，建立更具體的聯繫。

二、對西方知識的重視與遙譯

在文化現代性中強調實質理性，包括具有獨立性的真理、規範和本真性之價值，它們分別指向自然、社會與主體。這些價值的獨立，既是指獨立於前現代的超越性根基；又指強烈的自覺與自主。透過文化現代性所發展出來的科學、道德與藝術，是透過內部自行營造、證成自身的價值，從而對這類價值認定發展出高度的自我意識(錢永祥, 2001: 383)。

晚清時期部分書生和文人急切地希望「中國」脫離落後與積弱的狀態，向「進步」的西方看齊，提出各種方案與可能性，這包括「西學中原說」。1860年代

至 1890 年代間，「西學中原說」曾盛行一時，此時是中國學習西方船炮技藝與中西文化激烈衝突的時期，而談論「西學中原說」者，包括王韜、鄭觀應（1842～1922）、薛福成（1838～1894）與黃遵憲（1848～1905）等人，他們在主張學習西方時，試圖運用此說法來調和中學和西學的矛盾，減少引進西學的阻力（熊月之，1994：722-723）。

清末中國南移文人也未脫離上述語境，葉季允身為一名傳統書生，非常重視傳統中華文化的革新，也認為西方「進步」科學與觀念很重要。因此，在辦報與寫作的目的及策略上，葉季允主要鼓吹破除迷信與陋俗，主張科學理性的精神，強調「國家」與「國民」之間的連結，且皆以「國家」富強與現代化為前提，忽略「國民」的實質理性之培養。

《叻報》刊登的各種訊息中有許多來自當地西報和外電，且經常放在重要版位；葉季允的論說也經常吸收西方知識與最新發展後，針對中國和新加坡在地情境所撰寫，在這過程中其實也在透譯西學與現代性，讓讀者更瞭解與親近西方，譬如〈西學略述後序〉（叻報，1888年12月20日：5）、〈論機器〉（叻報，1891年10月26日：1）、〈洋學宜講求說〉（叻報，1892年2月29日：1）、〈論西國富強之源〉（叻報，1893年6月10日：1）、〈熟習洋文乃能深通西學說〉（叻報，1897年6.15日：1）、〈論仿行西學之難〉（叻報，1898年3月30日：1）。

在強調西學的重要性外，「民主」與「科學」成為介紹西學的主要兩大領域。在「民主」觀念的推廣上，有討論西方立法的重要性，譬如〈論立法期於無弊〉（叻報，1888年12月3日：1，1888年12月4日：1，1888年12月5日：1）、〈中西律法利弊論〉（叻報，1891年10月29日：1）、〈中國立憲論〉（叻報，1906年9月25日：1）；有推崇西方的價值與制度建設，譬如〈富強宜求其源說〉（叻報，1888年12月19日：1）、〈自由辨〉（叻報，1903年2月25日：1）、〈說權利〉（叻報，1906年5月5日：1）等論說，對西方民主觀念與制度有頗多介紹，且認為是「中國」邁向富強需要學習的基本知識。

在「科學」觀念的推廣上，早期強調西方器物的進步，譬如火車，傳統中國的農民憎恨火車這個「現代」怪物，因為鐵軌貫穿祖先的墳地，把風水破壞，且當火車轟轟之聲振耳之際，也吵醒寂睡墳中的祖先靈魂，是極為不敬的冒瀆，會為他們和子孫帶來噩運，因此他們疑懼、困惑、也抗拒著現代化（葉啟政，2001：152-153）。然而，葉季允看見與體驗到火車與鐵路的威力，乃在《叻報》不斷倡議中國應興建火車，才能讓中國邁向現代化，擺脫傳統的蒙昧（叻報，1888年7月31日：1，1888年8月20日：1）。除了火車，他也強調西方機器的

帶來的好處，如 1891 年 10 月 26 日的社論〈論機器〉，文末最後還是強調機器始於中國，指著名傳教士丁韜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 ~ 1916）也支持此說法，以強化「中體西用」的論述。葉季允主要強調地是社會現代化中的工具理性，嚮往資本主義現代化下的經濟發展、制度建設與「科學」功能，期盼早日實踐中國的現代化夢想。

葉季允瞭解要深入學習西學，大量翻譯是必經過程，他曾在〈論譯書〉一文中強調翻譯的重要性：

通西學必自閱西書，始閱西書必自譯。西書始洋務之興六十餘年矣，而中外之扞格如故何也。溯自有明通市以來，泰西各國教士已將中國之經傳通鑑，譯以辣丁法英文字，康熙間於巴黎斯設一漢文書館。近則各國都會不惜重資，皆設有漢文館，有能將漢文古今書籍，下至稗官小說，譯成其本國語言者，則厚賞之，其使臣至中國……皆以重金另聘漢文教習不盡，通其底蘊，不止各國之求通漢文也，如此而於譯書一事，其重且久也……。（叻報，1898 年 5 月 25 日：1）

葉季允一直非常重視西學，對西方人的進步也有頗多體驗。他認為西方的進步，與其重視翻譯有關，譬如對中國各個方面的瞭解，有其長期累積的背景。而亟思富強的中國，也必須學習西方的知識與長處，而其基礎來自翻譯，透過對外國書的翻譯，讓更多「中國」人開始瞭解西方，打開進入西學的大門。《叻報》除大力提倡翻譯，也介紹西方主流的「進步」思想，譬如斯賓賽（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的進化觀，《叻報》轉錄了《申報》的文章〈說適〉（叻報，1906 年 4 月 10 日：1）一文，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觀念的重要性。

葉季允在 1909 年農曆新年前夕，從進化角度書寫了一篇文章〈新加坡新年進化記〉（叻報，1909 年 1 月 27 日：9），描繪新加坡華人社會民風已有很程度的進步，人們簡化傳統習俗與減少迷信，並認為華人素質提高，「則我中國之振興，已於此奠具基礎矣。」

然而，葉季允和清末許多知識分子相近，對於西方殖民帝國主義擴張行徑的正當性很少質疑，反之，他們認為以強凌弱、以眾欺寡是生存競爭必須遵循的天演「公例」。在這種不可抗拒的自然鐵律下，被他國侵略的國家僅能追隨霸權國家的先例，按同一法則奮發圖強（沈松橋，2002：720）。因此，如何擺脫「落後」讓自身「強國強種」才是重點，卻未反思「國際現實」的問題是否合理，陷入「進

化」的迷思中。在工具理性主宰下，更難反省西方知識與觀念的問題，不自覺地「翻譯」與宣揚殖民現代性中片面強調的社會現代化之進步性，也強化殖民者的統治正當性。

《叻報》對西方知識的逡譯，其來源主要是轉譯自「中國」，這和葉季允經歷有關，使其知識來源較仰賴「中國」。Wang (1959 / 張奕善譯, 1969: 167-168) 指出，對於同樣的政治與教育觀念，南洋華人在從西方的模型中取法或透過歐洲的教育時，便以懷疑態度視之，可是若繞道「中國」再進口時，則欣然接受且加以傳播。但是也有少數不同取向，譬如另一土生華人林文慶所辦的《日新報》，以他曾在英國留學的背景，是直接引進與翻譯西方的觀念，不過林文慶也受康有為與梁啟超等人影響，尤其是在對「中國」內在問題的理解，因此可以說診斷問題上受中國影響，但是在給予藥方上直接運用其西方知識。

上述可見《叻報》等報紙對翻譯的重視，且其牽涉到的是語言、知識與文化的翻譯。然而，我們在看待這個翻譯過程時，也不應過度從「工具」的角度來理解。張君玖 (2012: 59, 93-94) 指出，翻譯是一種「轉化的創造」(transcreation)，它必然要去協商與重構既定界線的「越界—創造」(trans-creation)，同時也是對既定文化的「創造性轉化」(creative-transformation)。人們普遍認為，翻譯是引介西學或新思潮的必要「工具」，然而翻譯的「工具性」始終被高估，其中的創作與轉造性卻一直被低估。因此，在《叻報》長期的翻譯過程中，創作與轉造性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滲入其中，使現代知識與在地歷史、文化等在遭遇時，出現協商、混合的總體「效果」。

除在《叻報》的工作，本對醫學有所掌握的葉季允，在1901年獨力創辦《新加坡醫學報》，提倡醫學和宣揚健康及衛生，被認為是新加坡第一份中文學術期刊。葉季允擁抱「衛生的現代性」，認為現代的健康與衛生觀念與知識必須更廣泛傳播。葉季允依然從中華民族的角度出發，感慨「中國」的沒落，要恢復昔日的光榮，需下苦工，將東西方醫學知識逡譯到新加坡社會，期盼能加速提升醫學新觀念。他並未否定傳統中醫知識，主要是試圖透過加入西方醫學的優點，使中醫得以轉化與混合為更加精進的「現代」知識，恢復它過往的光彩。

在葉季允的影響下，《叻報》更多的把自己看作是社會教育者，主要職責是反復地對海外華人灌輸傳統的中國文化價值觀，以喚起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熱情並擔負起社會的道德心的作用 (Yen, 1986 / 栗明鮮譯, 1991: 267)。除了宣揚中華文化，在1895年後也開始出現一些對自身地反思，譬如出現〈論古書之不可盡信〉(叻報, 1892年8月20日: 1) 的文章，帶入西方對知識的懷疑精神；《叻

報》關注西方知識與經驗並加以推廣，認為有助「中國」的改革。因此，這裡反省與檢討的「自身」主要是指向集體，對個體的批判較少且不深入。

葉季允瞭解有關知識的淺譯，學校是重要的文化機制，特別是新式學堂，因此他撰文〈論宜毀寺觀以擴充西學書院〉（叻報，1898年1月12日：1），指寺廟不該占用太多資源，而應把資源投入培養人才的學校，也暗示寺廟傳統落伍，西學書院則是現代進步；葉季允另撰文〈論湘省振興西學之速〉（叻報，1898年2月15日：1），讚揚「中國」內地部分地區在辦學上迅速取得成效。葉季允也積極介入新加坡的新式學堂建設，他是養正學堂的發起人，介入在地華人社會的發展，不過這些文化機制的建立與維持主要仰賴華社內部的有限資源，殖民者很少施予援手。

從葉季允對儒家傳統與西學的態度來看，他和很多「中國」士人一樣是個儒家現代化主義者，希望透過西學加速國家的現代化，也就是透過工具理性推動社會現代化，擺脫受列強欺凌的窘境，至於強調實質理性的文化現代性被忽略了，或認為可透過中學來處理。對他們來說，西方強調主體透過反身性與批判來主體性尚未構成問題，也就不需要處理。

誠如陳光興（2007：374-375）所言，19世紀中期以後至20世紀初期的中國與印度知識菁英有一個共通性，在承認西方文化物質層面的優越性下，認為東方的優越性在於文化的精神面，在改革的過程中，重點是要保留自身精神文化的優越性，使得可以在「精神」層次上暫時忍受「物質」上的被宰制。因此，當時的知識菁英從一種實用角度出發，試圖以西方的科學與知識協助國家的復興，在精神文化的層次上仍強調自身的優越性，也才會出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主要學習的是西方的工具理性。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隨著印刷資本主義的推進，像《叻報》這類印刷媒介在新加坡扮演了媒介現代性的角色，在其使用某種象徵符號所建立的媒介環境中，現代性的各種元素逐漸滲入日常生活之中，與流移社會中並非十分穩定的傳統產生衝突、協商與接合等交混狀態，慢慢長出在地現代性的動力與特色。

媒介的隔離又連結特性，讓人從中感受到個體與集體的存在，其實也就是現代性的體制，打破傳統社會的連結方式，讓個體慢慢被凸顯出來，但又同時建構一種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新集體性。個體的出現不等於個體主體性的完成，因為現代性中強調個體的主體性是要展現自我批判的反身性，這是一個不斷建構與實踐的過程，既在需要集體的同時又抗拒集體的各種控制，以達至自我認同的證成，當中有著各種衝突、矛盾與不確定等因素。然而，這類主體性的建構在殖民

社會初期現代性中多未被凸顯，特別是在掌握權力的殖民政府在強調社會秩序下，多強化工具理性的社會現代化，至於對掌權者可能造成威脅的文化現代性經常被擠壓，使得需要文化現代性養分的個體主體性也處於被體制壓抑的狀態，不易讓批判的反身性展現其動力。

陸、結語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初期的新加坡，因自身的地理位置與歷史機遇等因素，在亞洲與世界經濟中持續扮演著多樣且多邊的功能，且讓新加坡成為各種力量交匯所在。身為土生華人的薛有禮家族部分成員，在 19 世紀中葉後的「再華化」過程中與祖籍地建立更密切關係，且因自身的文化資本與跨域的政經關係，使其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條件創辦《叻報》。

從《叻報》創刊至 20 世紀初期薛有禮逝世為止，《叻報》的經營大致相當清晰，在薛有禮主導對外業務與葉季允負責報紙內容上，讓報紙這項新形式的媒介扮演文化仲介角色，將廣告、跨界訊息及文化等連結起來，讓傳統與現代、清廷與殖民政府的訊息等皆能交混地在《叻報》上出現，在矛盾、衝突與曖昧中逐漸影響新加坡華人社會。葉季允在日常的實踐上，也關注時事發展與透譯西方知識，同時積極參與在地文化與教育事業，涉入政治與在地社會的發展。

《叻報》能創辦及長期維持，殖民當局與外商力量的支撐是主要因素，當中除有情誼因素，但現實利害關係恐怕才是主要關鍵，即讓西方人的政治、經濟與文化要素能獲得保障與強化，也使得《叻報》成為各種權力在其中運作、調和與折衝的場域。對於薛有禮來說，商人、買辦與報館創辦者成為相互幫襯、混雜的身分，也使《叻報》這項技術與意義的中介場域，成為東西方文化調和、接合與轉介的文化機制。

在本文所處理的時期裡，對於西方現代性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推展而言，《叻報》是一個重要的傳播管道，它以接近中國「傳統」的形式，將現代性元素透過中文進行傳播，更可能親近讀者與更具有說服力。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論述成為主流後，「中國」人對於西方新媒介的使用是將其視為「器」，其重點是承載中華文化，也透過新媒介這個平台來傳播時空新觀念與西學等「進步」知識，重點還是回歸到「中國」富強這一目標，這也強化了社會現代化的工具理性思維。至於有關文化現代性的個體主體性建構部分，此時期理性化雖仍處萌芽階段，而社會也未具備足夠的條件讓個體發展成為具高度自覺意識的主體，特別是民族主義的發展時強調的集體意識，在相當程度上也壓抑了個體的開展，就算

是自居「文化啟蒙者」的葉季允，經常也身陷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矛盾、衝突與張力之中，尚不易開展更清晰的主體意識。

然而，不應過度從「工具」的角度來理解這過程，其中的創作與轉造性卻一直被低估。因此，在《叻報》長期的透譯過程中，創作與轉造性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滲入其中，加上新制學校等文化機制的陸續出現，使現代知識與在地歷史、文化等在遭遇時，出現協商、混合的總體「效果」，試圖在新加坡建構出在地的新知識與新文化。

在現代與傳統之間，而非由傳統至現代的線性過渡，雖然現代性不斷進入非西方社會，然而，傳統與現代、以及外來與在地之間，長期存在雜揉與糾結的協商與交混等元素的創生狀態，並非呈現現代完全取代傳統的過程，且當中出現各種意義與實踐在其間接合、轉化與創造，使得群體內部成員之間以及和他者的文化界線出現鬆動、相互穿透等的動態變化，使個體的部分能動性能在其間展現，而這複雜的過程需要進行更多且細緻的梳理與審視，才能看到現代性效果在本土的具體展現。

參考書目

- 王玉茹、趙勁松、張瑋譯（2009）。《中國、東亞與全球經濟：區域和歷史的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原書濱下武志〔2008〕。China,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 economy: Region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London, UK: Routledge.）
- 王志弘譯（1993）。〈時空之間：關於地理學想像的省思〉，夏鑄九、王志弘（編），《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頁 47-79。臺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明文書局。（原書 Harvey, D. [1990]. Between space and times: Reflection on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Annu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0, 418-434.）
- 王琴、劉潤堂譯（2010）。《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原書 Yeh, W. H. [2007].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
- 叻報（1911年12月12日）。〈本報出世三十周年紀念序續〉，《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11/LP008917.PDF>

- (1911a年12月11日)。〈報頭旁說明〉，《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11/LP008916.PDF>
- (1911b年12月11日)。〈本報出世三十周年紀念序〉，《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11/LP008916.PDF>
- (1909年1月27日)。〈新嘉坡新年進化記〉，《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9/LP008066.PDF>
- (1906年9月25日)。〈中國立憲論〉，《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6/LP007388.PDF>
- (1906年9月18日)。〈本館約言〉，《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6/LP007382.PDF>
- (1906年5月5日)。〈說權利〉，《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6/LP007270.PDF>
- (1906年4月10日)。〈說適〉，《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6/LP007249.PDF>
- (1904年1月6日)。〈甲辰年春牛圖招售〉，《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4/LP006581.PDF>
- (1903年2月25日)。〈自由辨〉，《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903/LP006321.PDF>
- (1899年12月25日)。〈論報〉，《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9/LP005421.PDF>
- (1898年5月25日)。〈論譯書〉，《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8/LP004950.pdf>
- (1898年3月30日)。〈論仿行西學之難〉，《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8/LP004904.pdf>
- (1898年2月15日)。〈論湘省振興西學之速〉，《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8/LP004867.pdf>
- (1898年1月12日)。〈論宜毀寺觀以擴充西學書院〉，《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8/LP004849.pdf>
- (1897年7月30日)。〈論中國宜講求輿圖之學〉，《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7/LP004709.PDF>
- (1897年6月15日)。〈熟習洋文乃能深通西學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7/LP004673.PDF>

- （1895年10月15日）。〈臺灣戰圖寄售〉，《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5/LP004182.pdf>
- （1895年5月15日）。〈論割地界倭〉，《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5/LP004054.pdf>
- （1895年5月13日）。〈中國各省宜增練勁旅以固疆圖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5/LP004052.pdf>
- （1895年1月5日）。〈中日高明細地圖發售〉，《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5/LP003953.pdf>
- （1894年12月28日）。〈憤言〉，《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4/LP003947.pdf>
- （1894年8月10日）。〈論日本非中國之敵〉，《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4/LP003819.pdf>
- （1894年8月4日）。〈中日開戰確電〉，《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4/LP003814.pdf>
- （1893年9月5日）。〈招請採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3/LP003542.pdf>
- （1893年6月10日）。〈論西國富強之源〉，《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3/LP003469.pdf>
- （1892年8月20日）。〈論古書之不可盡信〉，《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2/LP003227.pdf>
- （1892年8月15日）。〈荷國總領事告白〉，《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2/LP003222.pdf>
- （1892年2月29日）。〈洋學宜講求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2/LP003079.pdf>
- （1891年10月29日）。〈中西律法利弊論〉，《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1/LP002983.pdf>
- （1891年10月26日）。〈論機器〉，《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1/LP002980.pdf>
- （1890年9月5日）。〈延請採訪人告白〉，《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0/LP002637.pdf>
- （1890年1月13日）。〈本館聲明〉，《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90/LP002445.pdf>

- (1888 年 12 月 20 日)。〈西學略述後序〉，《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127.pdf>
- (1888 年 12 月 19 日)。〈富強宜求其源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126.pdf>
- (1888 年 12 月 7 日)。〈論中美立約不能以空言挽回〉，《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116.pdf>
- (1888 年 12 月 5 日)。〈三續論立法期於無弊〉，《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114.pdf>
- (1888 年 12 月 4 日)。〈二續論立法期於無弊〉，《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113.pdf>
- (1888 年 12 月 3 日)。〈論立法期於無弊〉，《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112.pdf>
- (1888 年 8 月 20 日)。〈書本報鐵路利溥事後〉，《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023.pdf>
- (1888 年 7 月 31 日)。〈中國創設火輪車路論上〉，《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2006.pdf>
- (1888 年 2 月 4 日)。〈總論叻地本年大局〉，《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8/lp001869.pdf>
- (1887 年 12 月 27 日)。〈聞中葡約成事擬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835.pdf>
- (1887 年 9 月 1 日)。〈本館佈啟〉，《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735.pdf>
- (1887 年 8 月 24 日)。〈紀本坡議局第三次會議葬地事〉，《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728.pdf>
- (1887 年 8 月 22 日)。〈原例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726.pdf>
- (1887a 年 8 月 20 日)。〈援古証今說〉，《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725.pdf>
- (1887b 年 8 月 20 日)。〈本坡葬規第二次會議情形〉，《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725.pdf>
- (1887 年 8 月 19 日)。〈輪船開行〉，《叻報》。取自 <http://www.lib.nus.edu.sg/lebao/1887/lp001724.pdf>

- 朱惠足(2009)。《「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臺北：麥田。
- 李元瑾(2001)。《東西文化的撞擊與新華知識分子的三種回應》。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八方文化。
- 李仁淵(2007)。〈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王汎森(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3-49。臺北：聯經。
- (2005)。《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分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
- 李榮昌、沈祖煒、杜恂誠譯(1988)。《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中西間橋樑》。上海：上海科學院。(原書 Hao, Y. P. [1970].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呂紹理(1998)。《水螺響起：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臺北：時報。(原書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UK: Verso.)
- 何舒敏(1978)。《新加坡最早的華文日報：叻報(1881-1932)》。新加坡：南海編譯所。
- 何道寬譯(2008)。《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北京：北京大學。(原書 Ong, W. J. [2002].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London, UK: Routledge.)
- 汪暉(2010)。〈帝國的衝突，或帝國主義時代的衝突？〉，《讀書》，1：25-33。
- 汪暉譯(1998)。〈什麼是啟蒙？〉，汪暉、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頁422-442。北京：三聯。(原書 Foucault, M. [1984].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 Rabinow (Ed.), *Foucault reader* (pp. 32-50). New York, NY: Pantheon Books.)
- 沈松橋(2002)。〈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685-734。
- 宋偉杰譯(2008)。《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第2版)。北京：三聯。(原書 Liu, L. H. [1995].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林孝勝（1995）。《新加坡華社與華商》。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
- 柯木林（2007）。《石叻史記》。新加坡：青年書局。
- 莊國土（1989）。《中國封建政府的華僑政策》。廈門：廈門大學。
- 莊欽永（2007）。《新甲華人史史料考釋》。新加坡：新加坡青年書局。
- （1986）。《新加坡華人史論叢》。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學會。
- 栗明鮮譯（1991）。《新馬華人社會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原書 Yen, C. H. [1986].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11*.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陳光興（2007）。《去帝國》。臺北：行人。
- 陳育崧（1958）。《南洋第一報人》。新加坡：世界書局。
- 陳培豐（2013）。《想像與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臺北：群學。
- 桑兵（1991）。〈論清末民初傳播業的民間化〉，胡偉希（編），《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頁 236-252。北京：人民大學。
- 麥留芳（1985）。《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法則》。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君玖（2012）。《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臺北：群學。
- 張奕善譯（1969）。《南洋華人簡史》。臺北：水牛。（原書 Wang, G. W. [1959].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anyang Chinese*.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 黃金麟（2001）。《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 1895-1937》。臺北：聯經。
- 黃崇憲（2010）。〈「現代性」的多義性／多重向度〉，黃金麟、汪宏倫、黃崇憲（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頁 23-61。臺北：群學。
- 黃順星（2008）。《記者的重量：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 1980-2005》。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賢強（2008）。《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
- 葉書德譯（1993）。《新加坡華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原書 Song, O. S. [1967].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葉啟政（2001）。《傳統與現代的鬥爭遊戲》。臺北：巨流。
- 葛兆光（2014）。《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
- 甯應斌、何春蕤 (2012)。《民困愁城：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臺北：台社。
- 楊進發 (2007)。《新馬華族領導人的探索》。新加坡：青年書局。
- 雷頤、羅檢秋譯 (2003)。《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京：江蘇人民。(原書 Cohen, P. A. [1974].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鄭明萱譯 (2006)。《認識媒體：人的延伸》。臺北：貓頭鷹。(原書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熊月之 (1994)。《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
- 劉建基譯 (2004)。《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臺北：巨流。(原書 Williams, R. [1983].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London, UK: Fontana.)
- 潘光哲 (2007)。〈中國近代「轉型時代」的「地理想像」(1895-1925)〉，王汎森(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463-504。臺北：聯經。
- 錢永祥 (2001)。《縱慾與虛無之上：現代情境裡的政治倫理》。臺北：聯經。
- 錢鋼、胡勁草 (2003)。《大清留美幼童記》。香港：中華。
- 蘇碩斌 (2006)。〈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讀者想像——印刷資本主義作為空間想像機制的理論初探〉，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編)，《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81-116。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
- 蘇精 (2010)。《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 1819-1846》。新竹：國立清華大學。
- Anderson, B. (1998).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New York, NY: Verso.
- Chen, M. H. (1967).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of Singapore 1881-1912*.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Polity.
- Habermas, J. (1997). *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M. P. d'Entreves & S. Benhabib (Eds.),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ritical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p. 38-55).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Kanayson, A. (1964). The newspaper of Singapore, 1824 ~ 1914. *Journal of South Seas Society*, 18, 31-95.
- Kuhn, P. A. (2008).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NUS.
- Mittler, B. (2007). Domesticating an alien medium: Incorporating the western-style newspaper into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In R. G. Wagner (Ed.), *Joining the global public: Word, image, and city in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1870-1910* (pp. 13-46). New York,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Tai, Y. (2010). *Chinese capitalism in colonial Malaya, 1900-1941*.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892.02.10).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WEDNESDAY, FEBRUARY 10, 1892. Retrieved from <http://eresources.nlb.gov.sg/newspapers/Digitised/Page/singfreepressb18920210-1.1.2.aspx>
- Trocki, C. A. (2006). *Singapore: Wealth, power 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London, UK: Routledge.
- Turnbull, C. M. (1972).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67: Indian presidency to crown colony*. London, UK: University of London.
- Zhou, Y. M. (2006).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Telegraphy, the internet,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edia Practices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Burgeoning Development of *Lat Pau* Singapore (1881 ~ 1911)

Wong, Kock-Hoo*

Lecturer, One World Hanxing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alaysia

Abstract

Lat Pau, the first Chinese newspaper in Singapore launched in 1881 by See Ewe Lay, a Peranakan Chinese comprador, who recruited Yeh Chi-Yun, a literati from China, to preside over the editorial operations. The newspaper presented Nanyang (Southern Oceans) as a nation-state extending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its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us serving to cultivate a gradually clear Chinese consciousness. Based on data analysis of *Lat Pau* (1881-1911) and See Ewe Lay's family background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s of such a media projection of Singapore via the functioning of print capitalism. It finds that western values of modernity were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more smoothly to the Chinese society in a way that echoed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In the process,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 Chinese nationalism has been reinforced, while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for cultural modernity tended to be suppressed.

Keywords: cultural comprador, print capitalism, translation of modernity, media practices, *Lat Pau* Singapore,

* Email: kockhoo@gmail.com

Received: 2014.07.31

Accepted: 2015.04.27

多元價值的缺席：傳播科系實習教育的再思考

管中祥*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

摘要

媒體污名化弱勢者的報導，除了受限於新聞產製流程，也和媒體工作者集體的「恆久價值」密切相關。Herbert Gans 認為，新聞工作者的文化經驗及教育過程形成了他的「恆久價值」，進而成了選擇與定義新聞的判準，並反應了媒體工作者的價值立場。本文認為，結合文化行動的視野，傳播教育可以強化多元文化教育，透過實習課程安排讓學生進入田野，理解不同的文化群體，培養多元價值，從「被報導」的群體理解他們的處境與想法，進而改變這樣的偏向。

關鍵詞：多元價值、恆久價值、媒體污名化、傳播教育、實習課程

* Email: benlakua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5 年 3 月 15 日

接受日期：2015 年 5 月 18 日

壹、前言：多元價值的缺席？

2006年2月，台灣媒體觀察基金會、中華民國康復之友聯盟等團體，到某報門口抗議污名化精障者的報導，一個月後，立委王榮璋召開「媒體報導如何避免將弱勢族群標籤化」公聽會，邀請精障者及家屬、媒改團體、媒體代表參加。一位平面媒體的副總編輯，聽完精障者及家屬上台表達遭媒體污名化報導對其生活、工作與人際相處所造成的困擾後表示，這是她第一次與精障者面對面接觸，要為過去的錯誤報導表達歉意，並說：在聽完大家發言後才知道「原來媒體是把刀！」

媒體主管表達歉意，但其發言卻讓在場人士感到驚訝，媒體對被報導者造成了這麼大的傷害為何沒有察覺？媒體主管說，這是第一次和精障者面對面接觸，卻也讓我好奇，媒體主管先前對精神障礙者的印象是什麼？

與會的朋友未必都認為媒體是惡意污名化社會中的弱勢群體，也相信許多基層的媒體工作者是出於關懷社會的立場報導相關新聞。但有趣的是，為何媒體對精障者（及弱勢者）的描述大多偏於負面形象？新聞從業者未必有和精神障礙者接觸的經驗，採訪時也大多只是短暫接觸，認識有限，但為何精障者的新聞大多呈現其暴力與無法控制的負面形象（管中祥、戴伊筠、陳雅萱、王皓均，2010）？是什麼樣的工作或生活經驗，甚至是價值觀造成這樣的報導結果？還是，媒體工作者缺乏多元價值的觀點，容易從既有的價值與刻板印象去認識、報導不同的文化群體與弱勢者？除了常見的消息來源選擇、收視競爭等影響新聞產製的可能因素外，還有什麼原因造成了媒體污名化的現象？

作為一個傳播科系的教師，也很想知道，在課堂上我們並不會教學生去歧視弱勢者，但為何歧視的問題卻在媒體普遍可見？透過傳播教育是否有可能避免未來的媒體工作者複製同樣的價值？傳播科系學生進入職場之前，是否／如何有機會接到不同的文化群體，理解多元價值，未來面對不同文化／弱勢群體時，能減少，甚至去除污名化的問題？

為了回答上述的問題，本文從研究者於2012年發表的研討會論文《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¹為起點，以Gans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觀點作為本文主要的理論概念，以此檢視傳播教育中多文化課程與媒體實務問題，反思新聞傳播教育的侷限，接著，回

1 這項研究曾於中華傳播學會2012年會中發表，部分內容改寫成本論文。

歸研究者的教學經驗，討論作為培養未來媒體工作的傳播教育，如何透過實習課程帶領傳播科系學生到不同的文化群體及 NGO「實習」，讓學生經由親身接觸，反省自身的文化經驗，並以此拋磚引玉，反思既有傳播教育及實習機制侷限，思索改進之可能。

貳、新聞產製與恆久價值

這些年，我主要的研究關切媒體與精神障礙者的動態關係，除了討論媒體如何再現精神障礙者；精神障礙者如何透過「文化行動」回應主流社會的污名；同時也在一篇名為《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的研究中，探討了媒體工作者如何產製精神障礙的相關新聞，以及，媒體裡的精神障礙者印象的生產與新聞工作流程、媒體工作者的「恆久價值」之間的關係。

2012 年的那項研究，曾經深度訪談了雲林、嘉義地區的 5 名地方記者（見附錄），以精神障礙者相關社會新聞的產製為主要討論內容，從新聞實務工作中進行分析。瞭解第一線的新聞從業者如何看待精神障礙者？選擇該類新聞是基於什麼樣的價值因素？在新聞產製過程中受到什麼因素的影響？

新聞產製是個十分複雜過程，除了新聞價值的選擇，亦涉及到新聞機構如何安排工作給記者；記者怎樣得到資訊；記者及消息來源之間的溝通及連繫方式為何；記者和同業之間，以及不同新聞機構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合作或競爭關係；新聞機構的內部機制和工作流程之間的關聯，以及不同層級及或不同部門之間如何互動等。新聞產製的每個環節，都或多或少影響了新聞建構的圖象 (Tuchman, 1978)。

在這份《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研究中發現，在上述因素中，消息來源是精神障礙污名化報導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地方記者在一般新聞媒體的編制中，不但人數相對較少，負責的採訪路線多而複雜，工作的地理範圍更為廣大，在新聞常規及截稿壓力下，對於權威性消息來源的依賴更為嚴重，因此，強化了社會對精神障礙者負面印象。不過，更讓人好奇的是，「選擇消息來源」已進入新聞實際產製的階段，而我在本文中想進一步瞭解的是：進入實質產製程序之前，新聞從業者對於精神障礙者的認識又是什麼？

一般社會大眾對精神障礙者存在著諸多類似的迷思，認為精神障礙者心理

狀況及行為舉止大同小異；精神障礙者很危險，容易有瘋狂殺人的舉動；人們對精神障礙者感覺到害怕與不安，認為他們必須受到隔離；他們的行為像小孩一樣，無法自我管理與照顧；另外，也有人會抱持憐憫與同情的態度面對精障者，原因是這些人無行為能力，必須受到醫院的特別照顧（Corrigan & Lundin, 2000 / 張葦中譯，2003；Klin & Lemish, 2008; Rusch, Angermeyer, & Corrigan, 2005: 530）。「與眾不同」的特質，是許多人精神障礙者的刻板印象，其「異於常人」之處主要來自於其可怕的行為與可憐的處境，不僅是一般社會大眾有這樣的看法，新聞從業者也有相同的觀點，共享相同的文化價值，而這樣的「社會共識」不僅符合傳統新聞價值的奇特性，「精神障礙」的身分也成為新聞報導特別強調的重點（管中祥，2012年7月）。

雖然，新聞的選擇與產製通常被視為是專業過程，強調透過科學知識與客觀態度的訓練，避免使自己情感與價值影響專業的判斷；同時在實務操作上，透過專門的技術與機制，也期待可以避免個人主觀價值作祟（Schudson, 1989）。然而，許多時候，新聞價值的選擇即使排除了有形式的政治、經濟干預，或者組織的控管與常規，仍會受到社會文化中的「恆久價值」的無形影響（Gans, 1980: 45）。換句話說，除了前述 Tuchman 所指出的新聞產製流程，以及專業主義、新聞價值之外，新聞機構所屬社會本身的文化價值觀，亦即「恆久價值」都會影響新聞的生產（李立峰，2009：5）。

所謂的「恆久價值」是指記者與一般大眾擁有某種相近，甚至是相同的價值觀點，Gans (1980) 將新聞文本中的價值區分為價值暗示（value implications）與內在於新聞中的價值（values in the news）。價值暗示是文本上可見的價值觀，宣揚了某種意見，可能對社會造成某些影響，而暗示價值背後更根本的基礎，則是內在於新聞的價值。內在於新聞的價值來自於記者自身，當中又分為話題性價值（topical values）與恆久價值。話題性價值指的是，媒體在特定時刻、對於特定行動者或特定活動所表達出來的意見；相對於話題性價值，恆久價值則是長期出現，並且出現在許多不同類型的新聞中，而這通常也是新聞的判斷依據，決定哪些事件能變成新聞，而我們的意見，也是自身恆久價值的闡述，而存在於媒體工作者心中的恆久價值，某種程度也反應了社會的普遍價值。

如同 Gans 所描述，新聞的選擇觀點和媒體工作者自身的恆久價值密切相關，即使他們透過專業訓練，試圖進行客觀且不涉入情感的報導，但在專業工作者的身分之外，也和社會大眾同樣是普通人，享有共同的社會價值。因此，許多新聞從業者會和受眾對某些社會議題有著共同的態度與反應，甚至將自己視為受眾的代表，

反應出觀眾的觀點與價值。新聞產製看似是新聞從業者的專業判斷，但事實上，新聞工作的「恆久價值」已經暗示媒體如何選擇與定義新聞 (Gans, 1980: 263)。

記者本身的世界觀與態度經常決定了新聞的價值是什麼，也就是說，記者挑選出其認為重要的以及不重要的細節，什麼要擷取與什麼被剔除，其實已經反映了他所帶有的價值觀。例如，美國的主流媒體充滿著優勢階級所建構的價值觀點，Itule & Anderson (1994) 便指出，美國的新聞界是以白人觀點來看到社會議題，新聞呈現的是白人眼中的世界，Carter, Branston, & Allan (1998) 也分析美國新聞媒體所呈現的性別面貌，他們發現，中產階級的白人男性不僅掌握了美國新聞機構各個環節的重要位置，也呈現了男性化的新聞敘事，而新聞根本就是陽性特質的肥皂劇。進一步來看，新聞報導中的用字遣詞往往不經意地反應出新聞機構，甚至整體社會的價值與意識型態。van Dijk 研究種族主義的論述再生產也有同樣發現 (van Dijk, 1993 / 齊月娜、陳強譯, 2011: 214)，他指出在媒體領域中，種族主義再生產的最重要機制為「人員雇用」。新聞機構預設少數族群記者能力較差或報導會有偏見等，因此聘任的從業人員多為白人；然而多數的白人記者對少數族群社區沒有深刻的認識，因此相較於少數族群記者的報導，白人記者所撰寫的內容缺乏見識、膚淺且刻板。作為多數的白人記者是在一套白人群體的主流規範與價值中成長，並接受教育與社會化，因此對於新聞的解釋，會傾向於採取一個徹頭徹尾的白人視角。van Dijk 進一步指出，這些機構主要是由白人擁有或管理的，那麼新聞的選擇、新聞價值的定義必然也基於白人菁英的視角。這樣的過程無形中建立一套資訊的產製與循環系統，從媒體機構的設立、記者聘用、消息來源選擇，以及書寫過程中，系統性的選擇與排除某些種族或階級，而優勢的權力階層也在這樣的系統中複製了主流的價值與觀點。換句話說，新聞工作者與社會菁英集團有著共同的階級利益，因而使他們產生共同的政治觀點 (林照真, 2004 年 6 月)。

Gans 強調新聞機構即是社會的一部分，對社會的價值早就習以為常，因此，對於新聞產製的研究，除了探究新聞生產過程中相關的元素外，影響文化的甚深的恆久價值更是分析新聞產製的重要切點。就如同他認為，美國的新聞反應了美國社會的恆久價值，因為新聞工作本身就是社會中的一份子，所以也會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 (李立峰, 2009: 12)。

某些價值判斷是來自新聞從業者個人的經歷與背景，以及他們成長過程的社會接觸與生活經驗。從新聞從業者的背景來看，他們通常是社會的中產階層，較重視社會的穩定秩序，大部分的新聞記者都是大學畢業生，甚至有研究所學位，

同時也有較高薪資與社會地位，並且有更多機會接近上層階級，也因此，往往無形中成為主流價值的維護者與傳遞、複製者，對於「異常者」與社會秩序存在著特定的價值判斷 (Gans, 1980: 211-213)。換句話說，Gans 認為，新聞工作者的「都市中產階級」的類似背景，以及新聞傳播教育經驗，也成了他們選擇與定義新聞的價值判準。

羅文輝等曾針對中港新聞從業者的背景進行系統性的調查，他們發現，典型的臺灣新聞人員為是已婚男性，年齡約 35 歲，大學畢業，主修新聞或傳播，在新聞界工作約 9 年，無黨籍，在政治態度上不支持任何政黨，每月平均收入臺幣 7 萬 2 千元，而臺灣新聞人員中受過大專教育的比例則高達 98% (羅文輝等，2004: 51-53)。雖然這幾年臺灣新聞從業者的社會地位不如以往，但其教育程度、收入較高，並且工作地點集中在北部，仍具典型中產階級的特性。

這樣相同的生活及成長背景造就新聞工作者相近的「恆久價值」，也形成了 Bourdieu 所說的「慣習」(habitus)，不同社會階層與生活經驗的人有著不同的生活模式，提供其日常生活的思維與行為參照，每一個社會階層的人在「慣習」的結構運動下複製自己的生活軌跡，產生自我生活的慣習，也使得不同階層的人則在不同社會慣習的結構化區隔下，各自生活在各自的生活場域之中。有趣的是，慣習又能反過來作為溝通的中介，行為無須明示，也能讓具有共識的人感到合於情理，讓相同養成背景與文化經驗的人擁有相近的價值。因此，慣習造就常識世界 (commonsense world)，讓人們具有共識，進一步將共識標籤為客觀，並不斷再製這些「客觀事物」與共識。也就是說「慣習」，這歷史的產物，本身又依歷史所產生的程式製造個人與集體實作，進而再製造出歷史 (Bourdieu, 2000 / 宋偉航譯，2009: 169)。

「慣習」和「恆久價值」一樣，是某個社會階層的行為模式與思維準則，常久深植在身體和思想的基模之中，並且反應出特定階級本位的品味 (邱天助，2002: 9)。Bourdieu 也認為，這樣的結果未必是新聞工作者有意促成的，更多時候是因為缺乏反身性 (reflexivity) 而不斷將主流與菁英觀點散布與強化，這樣的養成也與新聞記者所受的新聞教育有關。除了前述具有相近的生活經驗與社會階級，強調傳播技術的教育走向，也讓許多記者在尋找消息來源時更信仰專家與主流意識形態。

雖然新聞產製過程很難避免社會文化價值的滲入，但新聞傳播教育仍期望經由專業教育的培育以維護新聞產製的專業性，避免受到個人與社會價值的影響。因此，為了保有專業的獨有性，專業人士必須更控制專業教育的生產過程，藉由

設立專業學校與專屬課程，確保新進入專業的人能夠熟習、掌握與接受專業知識，並使得專業服務的生產者與生產達到標準化（黃順星，2013：24）。不過，新聞傳播教育的實用主義取向，卻造成了新聞記者對不同專業領域與對多元價值理解的侷限，並且過度實用導向。馬成龍（1999）就指出，在以就業為依歸的教育環境下，傳播系所的課程漸漸從人文教育邁向職業教育。陳國明（2001）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認為由於系所競爭激烈，加上市場有限，以實用取向來吸引學生，冀求以速成的技藝傳遞來幫助學生畢業後能輕易謀得糊口之職作為號召。如此卻造成一窩蜂往媒體相關方向跑的畸形發展，使整個傳播教育領域，像是技工訓練所，反而忽略了新聞工作是個複雜的過程，涉及到不同的價值與立場。新聞工作者若缺乏多元價值的訓練與經驗，便容易從既有的「恆久價值」或「慣習」來理解與呈現原本多樣與複雜的社會議題。

參、多元價值缺席的實務教育

在市場的壓力下，本來就已偏向實用取向的新聞傳播教育，更被迫強調實務的技術運用。不過，針對傳播教育過度偏重技能訓練的問題，傳播學界雖然早有相關反思與討論，但如何打破既有的價值，培養新聞工作者多元視野卻很少被討論。

須文蔚、陳世敏（1996）認為，傳播學門的建制和實務工作技能訓練密不可分，不只是傳播教育受實務傳統的深遠影響，很多傳播研究受到實務界的經濟援助。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也說，傳播教育教授很多傳播基本知識，但學生實際操作經驗無法滿足實務界需求。他們提出傳播教育應該教授領域程序性知識，但同時也要傳授知識系統的情境因素。陳韜文（1999）也指出，新聞傳播教育雖然旨在培養學生的思考分析能力，但同時也必須接受新聞工作的技能訓練，因此對於新聞傳播教育者來說，求取學術和實務之間的平衡點，是一恆久的難題。

顯然的，即使認為傳播教育不應該過度偏重技能學習，但在相關的討論中，仍偏向如何在學術與理論之間求取平衡，或者如何透過知識能力的涵養協助技能運用，考量未來工作實務性依然是傳播教育重要的面向。不過，除了「求取平衡」，也有學者指出，傳播教育應注重人文素養的教育，王石番、陳世敏（1996）就認為，傳播教育偏重專業，忽略通識與人文課程，他們提出因應之道強調，傳播教育要培養通識、全觀的傳播人才，大學部傳播學門課程應將大學教育造就為「全人」通識教育。

這是新聞教育重要的思考方向，因為新聞工作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議題，但「人」與「社會」卻有著多樣的面向、多元的價值，存在著不同階級、性別、性取向、種族、年齡、地域等各樣差異，但新聞傳播教育是否引領學生從多元價值去思考、理解、分析人的處境、生命經驗，以及衍生出的各種議題？是否提供多元價值的學習？是否告訴我們如何看待一個人，如何理解人的行為？如何反省我們是從什麼樣位置去看待人？我們看待弱勢者的立場與角度是否存在著各樣的偏見？

在《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論文中，作者即試圖回到新聞傳播教育的面向討論：以精神障礙的報導為例，瞭解新聞媒體呈現精神障礙的報導充著歧視與偏見？以及，這樣的偏向與新聞傳播教育及媒體在職教育之間有何關聯？

一位新聞系畢業的受訪者就說：「您問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有什麼學校老師要特別教導我們採訪精神病患的方法？我的印象中是沒有，以前大多是新聞採訪嘛，採訪就比較技術的層面」。（編號 5 訪談，2012 年 2 月 15 日）不僅養成記者的新聞教育有其盲點，新聞機構的在職訓練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另一位資深媒體工作者在受訪時說：「我擔任地方記者到現在，已經大概 25 年了……我覺得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知與瞭解，對我們記者而言可能也是一個盲點。我們的認知的確不夠啦，報社也沒有給我們這方面的訓練，除非你自己去進修，否則我們就會用一般人的角度去看這些精神障礙者」。（編號 2 訪談，2012 年 2 月 3 日）

同樣的，傳統的新聞訓練雖培養新聞科系的學生與新聞從業者專業技能與知識，讓他們可以快速地處理新聞事件，不過，這些「專業教育」卻未必能帶給媒體工作者多樣的文化視野，甚至反倒形成專業偏見，複製既有價值，而無法用多樣的文化觀點理解與呈現不同文化群體。如同張錦華、黃浩榮、洪佩民（2003）所指出的，新聞傳播教育裡中文新聞採寫教科書的一般採寫原則，多是基於「傳統自由主義」式的多元文化意涵，僅是強調平等對待、尊重少數、免於偏見等原則，但並不重視對不同差異文化的理解。也因此，雖然在新聞學理或新聞實務中都期待新聞記者能保持客觀，能超然地不涉入自身的主觀價值與情感，但在具體的新聞實踐中，都不可能徹底的排除價值，或來自價值的暗示 (Gans, 1980: 3)。

但若如 Gans 所言，新聞從業者的價值會受到其生活與文化經驗，即「恆久價值」的影響，那麼，新聞從業者若能有不同的文化體驗、習得多元的文化價值，例如在生活與工作中與精神障礙的接觸經驗若有別既有社會觀點與文化價值，是否會有不同的認知與價值？是否會影響報導的取材與觀點？

一位在新聞工作之外經常參與社會服務的記者，有許多機會與精神障礙者深入接觸，他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看法就和其他受訪的記者有所不同。

我的觀察是，現在這些精神疾病的人有些是可怕、也有些是不可怕，很多是在社會，或在社區裡面活動，有些則是在家裡沒有就醫，他也不危害人，也沒有暴力傾向。我們擔心的是那些會有暴力傾向或是突然間會失控的患者。那有些是都不會啊...我覺得多接觸、互動會增進瞭解啦，你會知道他們的一些想法，還有一些作為，那也會跳脫過去我們傳統對他們的一些刻板印象，一些對他們污名標籤化的行為。
(編號4訪談，2012年2月9日)

這位受訪者在訪談中多次提及，在他的生活及採訪經驗中，有機會接觸到在雲林、嘉義縣市的「非隔離式」精神障礙者照顧機構。這樣的經驗，不僅讓他對精神障礙疾病多樣型態有所瞭解，知道精神障礙攻擊人的比例很低，也發現他們具有多樣的能力與才藝，並且強調不應該採取隔離的政策來對待精障者。

不只資深的新聞工作者有這樣的看法，曾經與精障者有不同接觸經驗的另一位年輕記者也有類似的觀點。

我有些朋友有重度的憂鬱症或是躁鬱症，不知道的人會覺得他好像很可怕，可是因為他是我朋友，我非常瞭解，才會覺得這樣的病並不是他們想的那樣子，其實他也是精神障礙的一種。我是因為這樣子才會覺得精神疾病不是想像中的那種「肖ㄟ」，也是透過這位認識的朋友，在認知上才会有這樣的改變，否則我會覺得精神疾病是要被捉去控制起來的那種人。所以，我覺得可透過報導讓民眾去理解精神障礙有很多種不同的，並不是只有著刻板印象的那麼一種。(編號1訪談，2012年2月2日)

這位受訪者從事媒體工作12年，是現職的媒體工作者，也在我任教的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就讀，除了因為有精神障礙者的朋友讓她可以理解他們的真實處境。她在訪談時也提到，因為在我開設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及「草根行銷」課程中有機會討論相關議題，讓她反思新聞媒體污名化弱勢團體的問題。同時「草根行銷」課程，也曾安排同學接待受邀到國立中正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

的精障者權益組織「風信子協會」的精障者，陪同他們到嘉義「蔗埕某文化園區」參訪、旅遊，在親身接觸後，修課的學生們對精神障礙者，以及新聞工作有了不一樣的想法。年輕的記者繼續說：

因為那時老師上課有說過，我開始會比較反省自己，好像他們也似乎不是這樣，雖然他們作出這樣的行為，但我必須要去知道他們背後的成因是什麼，而不是就這樣子讓他過去……因為有這樣子的過程（按：指接待「風信子協會」到嘉義「蔗埕某文化園區」參訪），所以我現在絕對不會用大眾的刻板印象去寫新聞。就像剛剛說的，我以前做新聞，大眾是這麼認為，所有人是這麼認為，我就這樣做好了，但我現在會強迫我自己去改變這件事。（編號1訪談，2012年2月2日）

從上述的訪談中可以發現，不論是傳播教育或媒體實務中，大多缺乏讓傳播學生或媒體工作者認識精神障礙者的教育內容或培訓機制，而媒體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與精障者的接觸經驗，也影響了他對精障者的態度，甚至導致報導偏向。不過，這樣的影響關係並非僵化不變，亦即，雖然社會對於精神障礙者較持負面評價，恆久價值也滲透到新聞產製的過程與結果，但不同的生活與文化經驗，以及多元文化的新聞訓練亦可能讓新聞從業者有別於傳統價值對精障者的理解，展現不同文本內容，降低媒體的污名化。

傳播科系中有關多元文化課程並不多，即使有，大多是與文化研究有關的理論取向，然而，對於不同文化群體的理解，不能只是理論爬疏或課堂對話，若有較長時間進入田野，參與文化群日常生活，應該能有較深的理解與親身感受。研究者透過自身過去的教學實踐發現，教師若能調整傳統的媒體實習課程，讓學生進入不同的文化群體、NGO 組織「實習」，不但能讓學生貢獻所學，認識不同的社會群體，也能藉參與來反思既有的階級位置與恆久價值。本文接下來將檢討傳播科系實習制度的現況，分享研究者教授「文化實習」課程的實踐經驗，嘗試提出如何調整傳播教育中「多元價值」缺席現況的可能作法。

肆、傳播教育與文化實習

傳播教育畢竟帶有濃烈的實務傾向，除了老師教授固定理論基礎課程外，實習制度是大學新聞教育中的重要「橋樑」（臧國仁、石世豪、方念萱、劉嘉雯，

2001年7月），不但能幫助學生在「類似」實際實務工作場景中，將學習到的理論知識化為工作能力，引領學生跳脫出實務工作上的思維，加強反覆思考的訓練哲學。

一般來說，傳播教育中的「實習」課程有「校內實習」與「校外實習」兩類（蔡念中，1995）。實習課程不管是實習刊物、電台與電視運作的實習制度，在傳播教育中皆扮演知和行的功能（鍾蔚文、臧國仁，1995），在實際情境中運作，學生更可對整體的傳播環境進一步認識，上課所學也不再只是紙上談兵。不論媒體與傳播系所如何設計實習課程，或是外在的媒體環境如何變化，實習制度作為新聞傳播系所學生學習歷程的一環，其最關鍵的意義乃在於：讓學生在學校教育、實習、再回到學校的過程中，發展成為自主的學習者，透過實習的實務經驗，反思以往所學所為，並重新詮釋學習的意義和方針，進而發展出自我導向的學習（劉光瑩，2008）。

不過，部分傳播科系的學生在經過校外實習之後，反而對於媒體工作及媒體環境比之前失望，對未來也充滿不確定感，實習似乎不再純然是讓新聞傳播系所學生準備好進入職場的職前訓練，而是促使他們重新思考自己生涯定位的觸媒。許多實習生自承實習的經驗對他們來說是一次震撼教育，有人在實習當中發覺自己對新聞工作的夢想遭到了嚴厲的挑戰、有人發現以往被奉為金科玉律的新聞倫理規條在實務工作場域中並不一定會被遵守，還有更多人在實習之後才發覺自己所學不足，因而決定透過繼續深造或是實務工作的機會進行磨練（劉光瑩，2008）。

類似的情況在我教過的學生身上也經常可見，特別是到主流媒體實習的同學，反而會更「認清」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落差，也有人因為更清楚媒體工作的「現實」面貌，因而提早「社會化」，提早學到了新聞產業積重已久的習性。換句話說，到媒體實習能讓學生在畢業前瞭解職場運作與工作場域的點點滴滴，未來工作時不致手忙腳亂，並且能及早適應。然而，這樣的方式也容易養成僅從「媒體」的角度思考現象，有時也會沾染職場上的各種習癖（管中祥，2005）。

不論是校內或校外的媒體實習課程，目的都在於讓學生能熟練實務工作的傳播技能，並提早熟悉未來的職場生態，在這樣的目的與框架下，其實是將傳播教育更往實務的方向推進。然而，如何在知識與實務、理想與現實之間「求取平衡」，重視新聞工作人文素養的培育，讓傳播教育能作為造就「全人」通識教育？或者，傳播科系可以透過什麼樣的「實習」培養未來的媒體工作的多元觀點與媒體實踐呢？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和大部分傳播系所一樣都有校內、校外實習課程。「校內實習」是大三的必修課，透過《中正E報》的實務操作，學習編、採、寫、拍攝、剪輯、製作、活動等實務技能。「校外實習」則是在大三升大四暑假時，由同學自行接洽媒體，或透過系上安排，直接到媒體產業實習一到兩個月。

幾乎所有到校外實習的同學都會選擇到電視台、報紙、公關廣告業、製作公司等機構實習，不過，也有極少數例外。2012年的暑假，就有位傳播系同學選擇到長期關懷臺灣農村議題，並實際採取行動的「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陣」）」實習。

「農陣」是一群關心臺灣農村的農民、農村工作者、NGO、媒體工作者、學者、作家、法律專家、工程師、藝術家、學生等相互連結組織，秉持著「小農經濟」、「永續農業」、「糧食主權」的理念，以多元背景的成員，利用傳統、網路與實質行動，從理論論述到實際的農村農務，展開農民組織、農村田野調查、與社會合作化的小農經濟實踐，並在網路發起農村議題的串聯行動，並藉著媒體持續與臺灣社會展開的對話。這樣的機構和許多在城市裡的NGO有所不同，必須經常進入農村，經驗農村生活，到此實習的同學不僅有機會習得傳播教育甚少提及的農業知識及農村問題，也能瞭解媒體中「被報導者」的日常生活，瞭解他們的真實處境。

有一位來自彰化的學生，大學時期接觸社會運動，很好奇這些組織除了社會抗爭，平日的工作是什麼？她認為，實習不就是對未來的工作先做些嘗試嗎？若是到「被報導」的機構實習，更能瞭解這些組織的主張與運作方式，對未來新聞工作也會有所助益。而當時彰化因國科會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擴建計劃，引發爭議，開發之後將可能造成當地農地嚴重污染，灌溉用水資源將會遭到排擠，當地農民群起抗爭。這位同學想為農村盡一點心力，並擔心到臺北實習的經濟問題，在多重因素的考量下，選擇了以「台灣農村陣線」作為實習點。

「台灣農村陣線」的實習生來自不同科系，「農陣」也在臺灣不同地區有各樣的行動，也因此，不同地區的實習生會因當地的議題與行動，而有不一樣的參與方式。以彰化溪州來說，因為正發生中科搶水抗爭，在地的實習工作就包括如何向農民及鄉民宣導「農陣」的理念，說明擴建計劃造成的種種問題；實習的同學也在當地進行田野調查，蒐集與農田、水圳、農耕、工業污染相關資料，例如溪州農作物種植分布，土壤孕育植物與這條水圳的關係，並試圖回應國會科的必要徵收土地的論述，更有趣的是，這些實習生在這段期間也成了農民的「靠山」，提供相關諮詢，協助當地農民解決問題。

我的工作比較偏向於田野調查，這部分類似於新聞採訪，每天看似與農民閒聊，但也從中紀錄了許多口述歷史。（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訪談，2015年3月2日）

除了能夠「貢獻」自己所學專業，由於到「農陣」實習的學生來自不同的科系，也讓參與實習的傳播科系學生反思自己的位置與處境，以及新聞傳播教育的侷限。

不過與傳播系不同的是實習的友人來自不同科系，社會系、地理系……他們思考的角度自然與我不同，他們發揮自我專業去分析同一件事，最後的結論會是多樣且精彩，這點是我非常自嘆不如的地方，感覺傳播系好像沒什麼路用……對我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必需學有專精，這就像專門跑財經或是醫療線的記者一定對這方面有一定的知識，才有辦法瞭解這些新聞內容……如果你是跑這一線的記者必須瞭解這些團體的點，瞭解他們的訴求，思考的角度也會更廣泛，寫出來的新聞跟別人比起來可能更有觀點。（國立中正大學學生訪談，2015年3月2日）

相較於其它傳播科系學生選擇以媒體作為校外實習的場域，這位到「台灣農村陣線」實習的學生，和其它到傳媒實習的同學收穫也有所不同。不但能貢獻所學，接觸人群，從不同系所背景的實習生身上學到不同的知識與觀點，並且發現傳播教育偏向實務教學所產生的限制，進而產生追求多樣知識的動力。更重要的是，重新思考自己的社會位置，並試著從以往「被報導」的群體理解他們的處境與想法。

這位到台灣農村陣線實習的同學可能只是反應學生個人興趣的「個案」，但除了個別的學生願意到 NGO 組織實習，傳播教育也可以進一步系統性地在課程中設計多元文化相關內容，並且與不同的文化群體、NGO 組織建立合作關係，設立實習點，進行長期合作，讓學生有機會到不同的文化群體去實習。

2004年我在世新大學任教時，曾參與教育部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畫案，負責其中的「文化實習」課程。

「文化實習」的課程和一般傳播科系的媒體實習課大不相同，開設這堂課的目的，是希望修課同學除了能有基本多元文化相關的理論基礎，也能實際進入到

不同的文化群體與場域，實際學習，參與 128 小時的「田野」蹲點課程。透過實地田野考察和參與，親身體驗多元文化差異的狀態、形成機制與問題，培養瞭解文化差異的能力和胸襟，並磨練社會觀察、研究、反思、溝通與行動的能力，讓「多元文化」不再只是課裡的知識與理念，而能成為日常生活的具體實際。

世新大學的「文化實習」課程安排了幾個實習點，主要是考量階級、年齡、性別、種族等不同面向，而這些群體也多與世新社發所有長期合作的關係。包括：美濃愛鄉協進會、馬告國家公園、南洋台灣姊妹會、台染產業工會、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中華民國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萬華社區遊民計畫、同志諮詢熱線協會、婦女新知基金會、婦女新知協會、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苦勞網、全國產業總工會、原住民族學院，以及大文山資料庫計畫（文史工作者與社區組織口述歷史小組）等。除此之外，修課的同學也可以自行選擇。

課程安排區分為實習前、中、後 3 個階段。在學生進入田野前，除了先介紹各個實習點的背景與性質，也會邀集學生討論包括未來實習內容、田野筆記寫作、以及相關倫理等實習事項；實習的同學在實習期間主要是參與該機構的日常運作，包括協助整理資料，規劃與辦理活動，不過，更重要的是與不同文化群體親身接觸，甚至是一起生活，進而瞭解不同文化群體面對主流社會的處境與問題，與當事人一起思索回應方式，共同採取改變的行動，透過日常生活的實踐，認識與瞭解不同的文化。

雖然課程名稱看似像到不同的文化群體「實習」，但更大的意義是在向不同的文化群體「學習」。這些修課的同學原有的知識與技能未必能為實習單位帶來多少協助，但相反的，卻能在一次次的「文化震撼」中反思既有的恆久價值。

實習期間，課程教師會安排同學進行數次面談，瞭解與討論實習時所遇到各樣狀況，並予以回饋，更重要的是反思實習時的觀察，共同討論問題的解決的方式，回應多元文化理論課程提出的各樣觀點；課程最後則是舉辦成果發表會，邀請實習點教師及修課學生共同參與，除由學生報告實習成果，並請實習點教師針對學生學習過程進行回應。

「文化實習」課程的最大意義並不在於理論的耙梳與觀念的建立，而是讓學生在實作中有機會向不同生命經驗者學習，體會到不同的生活經驗，透過親身參與而能有更多的理解與反思。在此過程中，學生不僅能培養更細緻的文化觀察能力、對多元文化有更貼切的想法，更重要的是看到學生的改變。

這樣的課程讓修課的傳播科系學生受到最直接的衝擊，就是被迫重新看待弱勢邊緣團體的形像，打破過去對這些群體存在的刻板印象，挑戰既有的「恆久價值」，在學生進入職場之前，培養多元的觀看視角與觀點。

有位到「遊民工作坊」實習的同學，原本以為是要去幫助「可憐又懶惰」的遊民，但沒想到和遊民相處後，才發現每個遊民之所以會成為「遊民」，其實都有各自的生命歷程與遭遇，並不都是主流媒體與傳統價值所建構的「好吃懶做」形象，相反的，其中有些人中年失業，但仍很努力的打零工養活自己，然而，所賺的錢並無法支付房租，只好四處行流浪。學生也發現，如果真要「幫助」他們，不是只有「憐憫」之心，或提供物質上的協助，更重要的是要解決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問題。

在這位同學原來的觀念裡，遊民是一群「好吃懶做」的人，但在實際接觸後，才有機會反思並挑戰傳統的刻板印象，開始從不同的角度認識遊民，理解他們的社會處境與侷限，也試著從街友的位置認識世界。而另一位到「南洋台灣姐妹會」實習的同學也說，因為這次的文化實習，他開始去關注到這些「新移民女性」們在媒體裡面所出現的新聞其實都只是很負面的，也很少的媒體工作者願意真正的去認識這群人、去聽聽她們想要說些什麼。她們真的很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想改變社會大眾對她們的刻板印象，但是這些正面消息在媒體中又能看見多少呢？這是身為讀傳播系的學生感到最悲哀的地方了（管中祥，2005）。

「文化實習」不僅挑戰了既有的刻板印象，也反思傳播教育及新聞工作的不足之處，一位世新公廣系的學生在課程回饋時也發表類似的看法：

在世新，大部分的同學都會選擇去電視台、報社、雜誌社等媒體單位去實習，總覺得對未來就業會很有幫助，而我因多元文化學程，意外的到南洋台灣姊妹會，而沒有像其他班上同學進入公關公司，本來還擔心少了實務經驗，會影響未來找工作，但卻反而學得該如何以不同角度來看媒體組織。（管中祥，2005）

而另一位到同志諮詢熱線實習的廣電系同學，在第一次回校進行課程討論時就說：「我終於知道什麼是歧視了」，這句話引起我和其他修課同學好奇，難道是在同志團體實習時遭到同志排擠了嗎？沒想到這位同學說：不是的，在那裡的都是同性戀，而我是異性戀，自然就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我想這就是「歧視」吧。

透過實際的接觸，更能感受到「他者」的處境，反轉自身的優勢位置，試著從「異文化」群體的角度理解社會中存在的「歧視」，而這也是對潛藏在心中既有「恆久價值」的挑戰。這位同學在成果發表會上就說：

但現在不一樣，同志不再只是電視裡的人，是我的朋友，是昨天才跟我吃過飯的朋友，我不能容許文化流氓欺壓他們，也不能忍受偏差價值觀對他們的壓迫。這對學傳播的我，無疑是一次重要的學習，現在我口中的「文化流氓」，以後會不會也冠到我頭上？這是值得我謹記在心的。（管中祥，2005）

大部分同學實習的課程雖已經結束，但仍與實習點保持聯繫，甚至在畢業後回到原實習單位擔任志工。而其中一位公廣系的同學畢業後，並沒有到心儀已久的公關公司上班，而是加入高雄的移民團體，她告訴我，這些新移民更需「公關廣告」。

這樣的實習課程對學生而言是深刻的，不僅是一種知識的涵養，更是生活的真實體驗，就像一位同學在課程結束時所說的：「真的多元文化是在實踐過程中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有真正的學習，藉此，我們才能暫時遠離有限的專業視角，以及對差異群體的純粹想像，體會更多的文化面貌（管中祥，2005）。

即使如此，「文化實習」只是研究者個人在傳播科系教學的有限實踐經驗，並不表示傳播科系學生上過多元文化課程與參與過「文化實習」，就必然會對自身價值的翻轉，但，這樣的課程，卻能在現有傳播科系普遍欠缺的多元文化價值的知識與實踐課程中，提供接觸不同文化群體，反思自我文化階級的機會。

伍、結論

新聞報導之所產生偏見／向，相當程度受新聞機構的運作模式的影響，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新聞產製，新聞機構除了設計出一套便於運作的流程，如截稿時間、消息來源、工作常規等。但除此之外，新聞產製仍會受到無形的「恆久價值」影響，這些受制於傳統觀念、生活經驗、教育養成的社會價值往往會穿透新聞產製的種種過程與所秉持的專業意理，顯露於新聞文本之中。

新聞從業者多為大學畢業生，甚至擁有碩、博士學位，來自中產階級家庭，或至少也是進入普遍認為很好的學校就讀、畢業後成為社會的中上階層。新聞工作者在社會團體中的生活經驗，自然而然會將群體中的生活常態與價值觀內化為自身所有，並衍生成為新聞寫作時的判斷與選擇。事實上，這樣相近的生活環境造就了新聞工作者慣有的「常識世界」，並且不斷再製這些客觀事物。在實務操作上，恆久價值往往成為新聞從業者新聞選擇與價值立場的依據，特別在有限的

時間與截稿壓力下，成為快速判斷及組合新聞的重要工具，從新聞素材與消息來源的選擇到書寫，這些主流的觀點不斷被複製。

傳統的新聞傳播教育過度強調專業技能，在相關課程中較少多元文化理論與實務的安排，缺乏多元價值的涵養，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思考，如何讓未來的新聞工作者能與既有的「恆久價值」對話，反思自身的「文化階級」，在進入職場前與不同的文化社群，或被社會排除的邊緣社群接觸，也許有機會改變作為都市中上階級的媒體工作者，在新聞產製過程中，不自覺建構的社會歧視。

成露茜在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期間提出「文化行動派」的概念，以培養未來媒體工作者的多元價值，她主張在大學部開設包括「文化實習」在內的多元文化相關課程，讓學生能瞭解、反省、批判、創新自身的文化；對於別人的文化，尊重、包容、欣賞、學習（成露茜，2005）。這樣的課程是要落實多元文化的精神，培養學生傳播專業理論與相關傳播技能的同時，也涵養學生的多元文化視野（管中祥，2010）。換句話說，媒體工作者至少在知識上要有多元文化的認識，以避免成為主流價值的複製者，不能僅是理論上的堆砌，對於不同文化的認識與理解仍需要更實際的經驗與體驗。

本文所提到的「實習」課程，不論是到「台灣農村陣線」實習的經驗，或者是「文化實習」課程，都讓傳播科系學生有較長間進入媒體以外的機構向不同的文化群體學習，這是傳播教育課程中可以思考的方向。因此，傳播教育的實習課程，除了以媒體作為主要的實習單位外，亦可考量在實習課程中增設不同的文化團體、NGO 組織為實習點，透過適當的教學安排，讓傳播科系學生進入實習，使他們在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外還能有不同的生活體驗。這樣一方面可以在理論與技術的學習之外培養傳播科系學生人文素養及多元眼界，同時也有助於未來的媒體工作者在求學期間便有機會反思既有的階級價值，並在之後的實務工作中，能有多元與同理的角度處理與自己相異文化經驗的「他者」所面臨的處境。

參考書目

- 王石番、陳世敏（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畫研究成果報告》。臺北：教育部。
成露茜（2005）。〈移民與多元文化教育〉，《學生輔導季刊》，97：74-83。
宋偉航譯（2009）。《實作理論綱要》。臺北：麥田。（原書 Bourdieu, P. [2000].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Paris, France: Seuil.)

- 李立峰(2009)。<〈序〉, Gans, H. J. (著), 《什麼在決定新聞》, 頁 1-15。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照真(2004年6月)。<〈製造政治新聞——政治公關機制對媒體議題操控初探〉,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傳播與風險社會」論文。臺北。
- 邱天助(2002)。<《布爾迪厄文化再製理論》。臺北: 桂冠。
- 馬成龍(1999)。<〈「傳」字這條路: 如何走出悲情〉, 《新聞學研究》, 59: 175-178。
- 張葦中譯(2003)。<《不要叫我瘋子: 還給精神障礙者人權》。臺北: 心靈工作坊。(原書 Corrigan, P., & Lundin, R. [2000]. *Don't call me nuts!: Coping with the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Tinley Park, IL: Recovery.)
- 張錦華、黃浩榮、洪佩民(2003)。<〈從多元文化觀點檢視新聞採寫教科書——以原住民族群相關報導為例〉, 《新聞學研究》, 76: 129-153。
- 陳國明(2001)。<〈回歸人本的傳播學教育〉, 《傳播研究簡訊》, 25: 15-17。
- 陳韜文(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 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 《新聞學研究》, 59: 137-141。
-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 《新聞學研究》, 53: 9-37。
- 黃順星(2013)。<《記者的重量: 台灣政治新聞記者的想像與實作(1980-2005)》, 臺北: 巨流。
- 管中祥(2012年7月)。<《誰在建構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 ——精神障礙者新聞的產製分析》,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跨域與轉型: 變動時代中的傳播媒介與互動」論文。臺北。
- (2010)。<〈德智兼修, 手腦並用: 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 《中華傳播學刊》, 17: 3-28。
- (2005)。<〈在實踐中反思多元文化〉, 《中華傳播學刊》, 7: 31-40。
- 管中祥、戴伊筠、陳雅萱、王皓均(2010年7月)。<〈媒體中的精神障礙者圖像〉, 「中華傳播學會年會——傳播研究的在地知識與全球實踐: 從東看, 往南走!」論文。臺北。
- 臧國仁、石世豪、方念萱、劉嘉雯(2001年7月)。<〈大學校園中的新聞實習制度與實驗精神——以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實習刊物《大學報》改制為例〉, 「2001中華傳播學會研討會」論文。香港。
- 齊月娜、陳強譯(2011)。<《精英話語與種族歧視菁英話語與種族歧視》。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書 van Dijk, T. A. [1993]. *Elite discourse and racism*. Newbury Park, CA: Sage.)

- 劉光瑩 (2008)。《從新聞傳播領域學生的學習歷程看媒體實習經驗的教育意義》。國立政治大新聞研究所學碩士論文。
- 蔡念中 (1995)。《視聽傳播科系之校內外實習實施狀況暨規畫改進調查研究》。臺北：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
- 鍾蔚文、臧國仁 (1995)。〈如何從生手到專家？〉，臧國仁 (編)，《新聞學與術的對話》，頁 73-88。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29。
- 羅文輝、陳韜文、潘忠黨、蘇鑰機、陳懷林、李金銓等 (2004)。《變遷中的大陸、香港、台灣新聞人員》。臺北：巨流。
- Carter, C., Branston, G., & Allan, S. (1998). *News, gender, and power*. London, UK: Routledge.
- Gans, H. J.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A study of CBS evening news, NBC nightly news, Newsweek and Time*.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Itule, B. D., & Anderson, D. A. (1994). *News writing and reporting for today's media* (3rd ed.). Boston, MA: McGraw-Hill.
- Klin, A., & Lemish, D. (2008). Mental disorders stigma in the media: Review of studies on production, content, and influence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3, 434-449.
- Rusch, N., Angermeyer, M. C., & Corrigan, P. W. (2005). Mental illness stigma: Concepts, consequences, and initiatives to reduce stigma. *European Psychiatry*, 20, 529-539.
- Schudson, M. (1989). The sociology of news productio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1, 263-282.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附錄：2012年雲林、嘉義地區訪談名單

編號	性別	所屬媒體	年資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1.	女	地方有線電視系統記者	10 年	2012.02.02	嘉義縣國立中正大學
2.	男	衛星電視新聞台地方記者	25 年	2012.02.03	嘉義市風尚人文咖啡館
3.	女	平面媒體地方記者	15 年	2012.02.08	嘉義市三皇三家複合式餐飲
4.	男	平面媒體地方記者	25 年	2012.02.09	嘉義市聖若望主教座堂
5.	女	平面媒體地方記者	15 年	2012.02.15	雲林縣風尚人文咖啡館

Absence of Diversity Values: Rethinking Internships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Kuang, Chung-Hsi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Why minority groups tend to be stigmatized on media? To explain it fairly and fully, one should not stay limited to the process of news production. Instead, one needs to consider the enduring values held by media professionals as a collective. Drawing on Herbert Gans, this paper asserts that journalists hold dear the “enduring values” formulated by their cultural experiences and cultivated in their educational process. This suggests that much can be done i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for boosting multicultural values and perspectives. By appropriating cultural activism in approach, internship programs can be designed in a way like field study so that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the life-worlds of various socio-cultural groups. Thus, cultural diversity can be experienced and understood first-handedly from the angle of minority groups as the reported. With field education as such, there is hope to change the enduring values held by media professionals.

Keywords: diversity values, enduring values, media stigmatizatio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internships

* Email: benlkuang@gmail.com

Received: 2015.03.15

Accepted: 2015.05.18

作育英才而不是打造匠才： 臺灣新聞實務教育的改革進行式

Cultivating Craftsmen, rather than Training Skilled Workers: Taiwan Journalism Practice Education Under Reform

張春炎*

Chang, Chun-Yen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研究所博士
Ph.D.,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前言：實務與學術的拔河

新聞實務教育如何推行？向來是傳播教育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陳韜文，1999）。伴隨此一核心問題，歷年存在一項辯論，也就是新聞傳播教育究竟是要貼近實務訓練，還是要貼近學術發展？1990年代美國大學曾經發生一波裁撤傳播學系的現象，《新聞學研究》對此以「傳播學的正當性危機」為題，聚焦探討此問題（新聞學研究編輯部，1996）。該文指出美國大學強調大學傳播教育以經典學術、通才教育為優先，爾後才發展實用、技能的教育。因此當高等教育經費縮減時，便優先裁撤強調實務教學的傳播學系。現象背後的意義，正是凸顯傳播學門面臨的發展瓶頸，更點出美國傳播教育長期以來深受實務傳統影響，甚至於接受實務界的經濟支持，以至於使新聞傳播教育偏重技術訓練，偏離通識與全人教育的理想（須文蔚、陳世敏，1996）。

臺灣的新聞傳播課程同樣有高比例的實務課程，根據翁秀琪（2001）的研究發現，1991年以後臺灣各大學傳播相關系所均蓬勃發展，在課程設計上也高度

* Email: raingnome@gmail.com

朝向專業性、技術性來發展。不少學者因此批判當時的臺灣新聞教育是「重職業訓練而輕學術訓練」，如此不僅偏離了大學教育的價值理念（翁秀琪，2001），更造成一個矛盾的結果，也就是傳播科系學生雖然比較容易找到工作，但因為無法從大學課程學習中培養足夠的創造力和批判思考力，以至於競爭力薄弱（陳國明，1999）。這也導致了技術教育跟不上新媒體環境，而熟悉技術的學生恐會出現技術能力跟不上環境變遷的問題（皇甫河旺，2012）。

相應的，自 1990 年代也開始有一批傳播學者主張應該積極發展更具人文、通識或全人教育的傳播教育理念（如王石番、陳世敏，1996；吳翠珍，2002；陳國明，1999；臧國仁、蔡琰，2000；鄭瑞城，1998；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在這樣的討論脈絡下，當代臺灣的傳播實務教育正面臨一個關鍵的研究問題，就是：如何培養出具實務能力的傳播人才，卻又不限縮在技術層次的訓練（熊培伶，2008；鄧宗聖，2009）？

因此，我們也可以看到，若干學院也透過課程結構或學制的轉變，嘗試建立傳播教育新典範（鍾蔚文，2012）。以既有的討論和問題出發，本文就此進一步檢視兩個研究問題：

一、當代新聞實務教育的理念是什麼？應有的內涵是什麼？

二、在大學的教學現場上如何實踐這樣的理念？又怎麼進行既有課程變革？

作為初探性質的研究，本論文研究範圍將先聚焦於新聞傳播的實務教學，日後有機會再擴及其他類型（如廣告、公關、數位媒體、行銷傳播等）。本文以參與和規劃實務教學改革的大學教師經驗為本，藉由教師的反思、詮釋和實踐來獲得足以回應問題的資料。

在研究方法上，基於本研究目的，本論文採取深度訪談的方式。訪談對象的挑選，以過去或目前正從事新聞傳播實務教學、教法課程變革的教師，分析瞭解他們對新聞實務課程的看法、教學理念，同時分析他們是如何將理念落實在教學教法，系所課程結構的調整又是怎麼實際進行。自 2015 年 3 月至 4 月間，本研究總共完成了 8 位關鍵教師的口述歷史訪談，並轉謄為逐字稿後進行歸納分析（口述歷史受訪者，請參見附錄一）。

貳、新聞實務教學理念的再省思

自 1990 年代以來，臺灣傳播學界便興起一連串的教育反思，並呼籲新聞傳播教育必須改變。自 1996 年可以發現國內發展新聞教育的重鎮，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系便藉由該系所發行的期刊《新聞學研究》，開闢「專題論壇」，以研究專論或會議發言稿集結的方式，呈現國內外新聞傳播學者對於新聞傳播研究的種種反思。

檢視這一系列的討論，縱然多數討論議題多聚焦在傳播學研究的學科定位，並就知識論、傳播研究的本質進行學術反思，另一方面也不乏有學科知識如何落實在新聞傳播教育的討論。如《新聞學研究》第53期，〈傳播學發展現況〉一文（須文蔚、陳世敏，1996），其中檢視到新聞傳播研究，一直以來有著實務傳統，不僅使得研究受到實務界的牽引，同時也造成教育以技術訓練作為新聞教育核心的狀況。這樣的現象不獨發生於美國，也應驗在1990年代正在蓬勃開創的臺灣傳播系所。該文檢視傳播學術的知識特質，所提出的3點具體建議，亦可以發現其中觸及新聞傳播實務課程改革的呼籲，包括：

- 一、放棄以媒介為類別的研究與教學取向：建議應回到學科知識和概念來進行課程與研究領域的劃分。
- 二、回復多元傳統：建議從人文學科汲取養分，強化傳播學的基礎涵養進行教學。
- 三、回歸學術研究：建議降低高比例的實務課程，同時認為實務課程也不應該僅止於技術傳授，而應該透過經驗、歸納成學理，藉以呼應大學的基本理念，也就是以人文和學術研究為本。

潘家慶等（1996）在同期主題進一步為文探討〈傳播教育核心課程規劃〉，同樣參考大學教育理念、人文教育精神，和傳播學門的概念知識，進一步檢視美國教育改革作法，強調傳播課程改革應該走向課程整合，目的是創造學生能夠擁有共同的智能和社會價值。在這樣的前提下，透過實證調查分析，3位學者指出了，多數受訪者認為新聞科系應該設立人文和專業這兩類的核心課程設計，其中專業便是指偏向傳播實務的課程，包括了電視節目、傳播法規、採訪寫作、視覺傳播、大眾媒介與社會等等領域。這些課程安排係著重於學術與實務的概念知識、科技識讀素養、資訊蒐集和媒介說寫能力等，目的是促使新聞傳播教育能夠更加貼近人文教育的精神

上述研究將新聞傳播研究、教育理念和具體應有的課程設計、教法如何進行，進行了一次系統性的概念串聯，主張新聞傳播教育應該回應大學博雅（通識）教育的本質，進而聚焦於傳播學科的學術知識。因此在新聞傳播實務教育方面，應該著重「技術導向科目的知識基礎」，而不是教育學生能夠「對應產業需求」的技術（須文蔚、陳世敏，1996：27）。這樣的看法也成為日後許多學校進行新聞傳播實務教育改革時，一個重要參考指標。

國內進行大規模傳播課程改制，首見於相關系所創校最早的國立政治大學新

聞學系。早在 1995 年，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與傳播學院一起進行了一場長達 20 年的傳播教育課程反思、改革。從 1995 年到 2000 年初，先後擔任新聞系主任、傳播學院院長、校長的鄭瑞城是推動新教育理念形成，並落實於具體改革行動的要角。在接受訪談時他開宗明義指出，大學教育應該坐落在一種人文理想和視野之上，然而就他的觀察，他卻發現 1990 年代政大的傳播教育與前述理想有不小的落差。他說：

我們（當時的政大傳播學院）已經走向一個太技術化、太瑣碎，已經失去大學教育該有的大致方向了。我覺得如果我們大學教育能夠讓學生接受一種博雅教育，一種通才教育，然後到研究所階段，如果你想學新聞，再來考新聞研究所。花太多時間在技術面的知識，我覺得那是一種浪費。（鄭瑞城，2015 年 3 月 3 日口述訪談紀錄）

當時鄭瑞城聯繫幾位有志一同的教授，率先就大學應有的教育理念進行釐清，隨後再根據釐清後的教育理念進行學系、學院的課程架構、教學內容改革，過程中不斷透過各種場合和形式進行共識凝聚。鄭瑞城認為，當時這樣的教育改革措施對於在 1990 年代的傳播學界來說，許多人或許會認為有些太急太早，但就他個人而言，新聞傳播教育應該改革的想法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鄭瑞城回想自己對政大新聞傳播教育的反省，實際上早在 1987、1988 年，也就是解嚴前後便開始了。根據他的自述，在他接任新聞系主任時正逢 1990 年代大學興起自主、自由的風氣，這樣的時代氛圍促使了大學的自我反省，因此有利於具體的教育檢討被落實。再加上 1995 年 5 月 8 日教育部函文各校進行大學是否試辦前段不分系的研究，因此他才能有效串連其他教授，一起在政大傳播學院內開始對頗具歷史的傳播教育重新檢視、檢討，進行大規模的課程改革。

在 1995 年 9 月至 12 月，政大傳播學院開始進行院內師生調查及舉辦公聽會，同時在 1995 年 10 月進行「傳播教育規劃研究」。這份由王石番、陳世敏（1996）完成的研究報告明確指出，傳播教育應該依循大學的博雅教育理念進行重新定位，從而提出未來傳播學門發展的 3 個具體判準（王石番、陳世敏，1996：3）：

- 一、大學應朝向回歸學術研究本質。
- 二、回歸以造就全人為目標的通識教育。
- 三、回歸大學部為學術重心而以研究所為專業訓練的階段性教育。

上述 3 個判準也成為日後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進行課程改革的教育目標。

1998年鄭瑞城完成自己親自主持的〈傳播學院前段不分系及學程規劃案成果報告〉，進一步以學院為思考，提出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構想，同時強化國立政治大學傳播教育朝向學術研究和通識教育的改革目標，另一方面針對既有的職業／技術傾向的課程教學內容進行調整（鄭瑞城、林元輝、孫秀蕙、侯志欽，1998）。然而這樣的教育改革並不是全盤的拋棄實務課程中有關技術的教學內容，鄭瑞城認為「技術面，是一定要去學，課堂上也要教，但是不需要花太多時間」（鄭瑞城，2015年3月3日口述訪談紀錄）。

在1990年代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帶頭推動實務教育反思後，越來越多傳播學者也都對於大學新聞傳播教育應回歸大學的博雅教育有近似又不盡相同的看法，由於各校的傳播學院或學系的背景和教學特色有所不同，因此反應在各校的新聞實務教學的理念和想像也有所差異。

接受本文訪談的幾位任職不同學校的大學教師都認為，新聞傳播實務教育不應再依循傳統媒體類型來進行個別技能訓練，而是應該掌握各種資訊工作所需知能，培養跨傳播類型的傳播人才（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另外，新聞傳播實務課程除了是技術的訓練之外，還要包含超越技術的學理知識訓練。只是在技術以外應該帶入什麼樣的教育理念、教些什麼，幾位傳播領域教師著重的點也略有不同。以下根據本次口述訪談資料，歸納出幾個不同的思考路徑。

一、重視技藝和知識的養成

曾於2010年至2012年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的陳百齡認為，實務課程與傳播環境難免有一種對應的關係，然而教學的目的並不是要讓學生成為技術工。

我們不會把學生訓練成一個只是會操作（技術）的匠，我們希望學生具有一定的格局，可是他又懂得動手來實做。這件事非常重要。我對於過份技術化這件事情並不贊同，因為這樣只能造就出一堆黑手。你看我們現在的許多傳播機構，他們只重視技藝而不重視腦袋，這就會出現很多問題。（陳百齡，2015年4月2日口述訪談紀錄）

在陳百齡的想法中，實務課程應該被視為是一個能夠與理論概念接軌的知識訓練課程。他以自己的授課為例子，在課堂上的學生除了要學會操作繪圖軟

體、能夠設計標誌之外，還要能夠運用理論來分析說明自己的作品。陳百齡藉此說明，傳播實務課程理想上應該是技術與理論的連結，教育理念是「所有的技能背後的那個知識的連接，應該要讓這一些傳播科系的學生很清楚地去掌握那個脈絡」（陳百齡，2015年4月2日深度訪談紀錄）。

陳百齡回想1995年學成歸國、初任教政大新聞系不久，他便與另外兩位資深教授共同撰文，該文便已經提到上述教育理念。從分析傳播知識性質和傳播工作者應該具備那些知識等問題切入，他們檢視傳播實務教育的內涵，認為即便是新聞實務的課程，其教學目的應該是要讓學生能夠從理論層次思考現象，從技術的訓練中學得組織邏輯、概念的方法（鍾蔚文等，1996）。簡言之，傳播學門中實務課程的教學目的，是要透過技術實作來瞭解技術背後的原理，以及認識不同傳播技術背後的共通性。

任職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的教授張錦華認為，如果思考要怎麼藉由新聞實務來實踐大學的教育意義，這個問題便關係到，大學應該要將學生訓練成什麼樣的社會角色？對張錦華來說，答案很明確，她認為實務教育的目標就是要使學生成為一個技藝師（craftsperson）而不是工匠。

以我們來說，我們叫做 craft 就是說它不是一個 technique，他是一個 craft 就是技藝。技藝裡面包含知識，也包含藝術，是一種精緻的表達能力。所以我覺得 craft 概念是我們在追求的，所以他們（指臺大新研所的學生）基本上都會有一些知識性的內涵，再加上我們非常重視的 critical thinking。所以說，學生們會不斷地去檢視這個技藝在這個社會裡面扮演的角色價值。（張錦華，2015年3月27日口述訪談紀錄）

目前任職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系主任的戴皖文，2014年剛推動完成一波大幅度的課程改革，他也抱持著相近的看法。

最重要的訓練應該是觀點的訓練。所謂觀點的訓練就是說他對任何議題還有自己主動的一些看法，還有批判的能力，這些都是我們非常注重的。……我們會用創作這種觀念，創作並不表示他是技術的，創作本身他是藝術的，它可能是創造力的。（戴皖文，2015年4月16日口述訪談紀錄）

歸納以上幾位傳播學界教師的見解後，可以發現的共通點是，他們都主張：新聞實務課程除了應該教授實務的技術之外，重要的是能夠讓學生掌握技術背後的知識內涵，作法是要能連結傳播學理和新聞理念，目的是要使技術的使用者能夠具備人文和藝術的特質。因此技術教學的過程必須讓學生能提出自己的觀點，在課程中也必須包含美感、美德及批判思考的能力訓練。

二、強調公共／社區參與

著眼於新聞應具備的公共特質，有學者則是更加強調在實務教育中，讓學生能夠藉此具備連結社會、投入社會參與或負擔社會責任的職志。

除了技能之外，知識的涵養是很重要的。但是這個知識必須跟我們將來做一個傳播工作者所需要擁有的社會意識結合在一起。……希望傳播工作者能夠跟他們的社會實踐能夠結合，那也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在課程中，建立社會意識、開闊理論視野這樣的一個概念。（胡元輝，2015年4月16口述訪談紀錄）

有豐富實務經驗，目前在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專職任教的胡元輝，目前負責該系實務課程的改革設計。從知識生產的角度來反思新聞傳播實務課程的定位，他發現過去經常陷入一個爭論不休的議題，也就是傳播實務教育是要更貼近現實，還是要更學術？對此，胡元輝嘗試另闢蹊徑，提出涉世學術（scholarship of engagement）的理念，他認為大學教育應該促進學生的公共服務使命，在課程中注入知識的有用性，從而幫助學生思考如何能夠貢獻社會、發揮影響力。反應在新聞實務教育裡，胡元輝認為應該發展「在地實踐」、社區參與意義的實務課程，讓學生在新聞傳播實務課程中同時學習公民參與（civic engagement），一方面能擺脫大學是知識象牙塔的污名，同時也開創新聞的另一種可能，也就是消解新聞教育與現實的商業新聞操作之間的矛盾關係。同樣是要讓新聞傳播系學生在技術學習之外，更懂得如何與學校所處的地方、社區進行互動，在地方履行新聞的公共精神（另可參見胡元輝，2014）。

強調以社區為基地，進行實務課程的公共實踐教育，則是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早年就有的自我定位，這也直接體現在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新聞實務教育理念上。

世新新聞系比較多實務的課。……它基本上該學的部分，大概都跟其它的新聞科系很像。但是因為世新的小世界的實習，一直強調公共新聞學。所謂的公共新聞學，不管你是使用網路來呈現，使用電視來呈現，還是使用報紙來呈現，它的那個精神，就是跟社區連結的精神，我覺得一直都是世新新聞教育的特色。（鍾起惠，2015年3月30日口述訪談紀錄）

曾經擔任 NCC 委員，目前任教於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鍾起惠認為，新聞教育必須先正本溯源，釐清新聞與資訊之間的不同。她指出新聞的特質就在於公共性，因此在新聞實務教育上，雖然世新新聞系會讓學生學習能夠對應新聞業界需求的技術，但技術之外也會讓學生以大學所處的社區為基地，進行具備社區公共精神的新聞實務演練。

三、發展社會創新的知識學習

相較於前述兩種理念，有教師對於當代的新聞實務教育則是採取更積極的想法。同樣著眼於新聞與社會的關係，認為新聞具備公共服務的責任，同時新聞實務教育也必須對應快速變化的傳播環境，就此反思教學理念應該如何重新設定？任教於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的陳順孝，近年來與幾位志同道合的老師一起自發性地進行相關議題的討論，在持續的腦力激盪和思索後，最終提出了傳播創新的實務教學理念。

我們的傳播創新有兩個方向：一個是以傳播專業來報導社會創新創業故事，讓學生從報導中實地瞭解社會問題、學習創新創業精神；……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東西是，我們要推動傳播領域的創新創業，因為傳播產業正面臨媒體解構、跨界碰撞、專業重組的巨變，在巨變過程中，我們希望帶領學生用新觀念、新策略、新組織、新科技、新文體來創新創業。所以我們就把自己的方向濃縮成傳播創新。（陳順孝，2015年3月14日口述訪談紀錄）

反應在實務教學上，陳順孝認為應該要更有效的讓理論與實務結合，讓學生能夠面對現實的傳播問題，並回到理論去思索，從而提出具體可行的實務解決辦法。值得一提的是，在陳順孝的理念中，課堂上不僅是要建立學生有解決現階段

問題的能力，更重要是要創造學生以更創新的方式來建立傳播的未來性。而所謂的創新，也不僅限於公共服務，同時還應該包含了如何使具公共目的、公共價值的傳播創新創業能夠獲利。簡言之，這樣的實務教育理念，更加著重於在新聞實務課程中訓練學生具備創新能力，讓他們認同傳播創業的目的是要營造有利於社會的影響力，但不需要排斥社會事業具有商業營利的能力。因此，這裡所謂的創新創業，在教育理念上，其實是一種建立學生具備開創社會企業的能力。任教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的林崇偉，對於實務課程的想像與陳順孝相近，他認為目前大學裏頭的實務課程必須要檢討，因為實務課程實際上是離現實社會太遠而不是太近。他認為實務課程在理念上就應該從解決社會上的實際問題出發，「我覺得傳播教育不是要創造能夠書寫新媒體的人，傳播教育應該能夠培養出創造新媒體，以及產製研發新媒體的人，這才是我的期待」（林崇偉，2015年3月26日口述訪談紀錄）。

林崇偉因此以教育創作為理念，提出所謂「Living Lab」的概念，也就是讓學生走出校園、走進社會、瞭解社會，進而從既有的知識中，看見社會的問題、提出可能的新解決方式。

參、理念如何落實於實務課程教學：幾條不同路徑

在有限的文獻資料和初級經驗資料整理之中可以發現，臺灣新聞實務課程在經過持續地反思之後，教育理念上概略有兩個類型的走向，一是強調更加貼近實務，另外就是走向回歸學術。然而在概念上，這兩類理念或許可以被視為是概念光譜的兩端，而不是兩條不相交集的平行線。因此，前述 3 種的教育理念，也不是迥然不同的類型，更像是在光譜之中或偏向學術，或有更貼近現實的定位。

值得探索的是，各種不同定位的教育理念如何被落實在實際的課程教學教法上，或許與各校系所不同改革條件、機會與能力，因而採取不同的改革模式有關。從幾位接受訪談的學者和其正在參與的所屬學校的課程改革方案來看，可以區分出以下幾種不同的落實模式（改革歷程，可見附錄二）。

一、全院改革：傳播通識與部分課程的協同教學

為了實現博雅教育以及專業分流的理念，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以院為單位，進行課程的大幅改革。早在 1998 年開始即試辦前段不分系、後段專業實務課程的學習，並以學程制度取代分系教育。其中新聞傳播實務相關課程設立的

學程，包含「新聞編採學程」、「網路及多媒體學程」與「國際傳播學程」，以及與廣電系合開的「廣電新聞學程」；2001年學程再經重整，整併為「網路及多媒體學程」、「新聞編採」、「國際傳播學程」；2010年再經整合為「新聞與資訊」單一學程，同時設有「採訪與報導」、「資訊設計與媒體企劃」、「社會與文化」三領域，以培養學生整合傳播的能力。除專業學程之外，傳統的新聞技術、編採等應用技能則分別融入不同課程進行教學¹。

同屬具歷史的傳播學院，世新傳播學院在2002年成露茜教授擔任院長任內，開啟全院的課程改革，開設「傳播技能」作為院必修，讓大一新生能夠對於全院各不同學系的傳播專業有所瞭解，某種程度可以被視為是世新傳播學院的專業通識課程。同時於2003年也推出學程規劃辦法，將一、二年級設定為先修課程，三、四年級則可視專業興趣進行學程選修。2004年新聞系推出採訪寫作學程、編輯學程、英文新聞編採等3個學程²。這樣的做法是以院為規模，用實務課程、院必修課，以及學程的設置，打破既有的科系分工、知識分化的毛病，同時也讓學生學得更為整體的傳播實務認知與技能，有助於他們未來面對媒體整合環境能具備應有的整合能力、多元能力（管中祥，2010）。

從學程的名稱來看，這兩間國內歷史最悠久的傳播學院，固然在教學內容設計上有所不同，然而卻一致地以院為單位進行各系所師資和課程革新。鄭瑞城認為，學程課程的設計和推動，是建立教學機制彈性化，如此也才能有效的在實務教學中因應多變的媒體環境，「彈性就是一定要去想一個真的能夠回應社會跟時代的需求那樣一個東西。機制（學程）比較重要，那個彈性出來了，才有那個機制去回應」（鄭瑞城，2015年3月3日口述訪談紀錄）。此外，鄭瑞城認為在個別課程中，應該採取協同教學的方式，「我認為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一門課是某一個老師有辦法單獨去把它教得很好的」（鄭瑞城，2015年3月3日口述訪談紀錄）。

如今在政大新聞傳播課程中，已經落實大一、大二不分系，大三、大四選修學程，此外在若干實務課程也由幾位教師協同教學。政大新聞系的陳百齡所負責的一門課程就是與其他3位老師進行協同教學，至今已經連續合開了12年，他認為這樣不僅改善了同課名不同老師卻有不同教學內容的問題。當進行協同教學時，每位老師也能夠分別就自己專業領域進行更深入的教學。

1 政大課程地圖。請參考網址 http://cis.nccu.edu.tw/coursemap/students/ProCourseMap.aspx?College=400&Dept=402_1。

2 世新新聞傳播學院學程，請參考網址 <http://cc.shu.edu.tw/~cjc/pages/2-1.htm>。

傳播這個領域它的同質性是非常高的，就是說我們有很多的知識其實是共同的。可是我們的學生出去就業找工作的時候，他的那個專業，有時候不見得是可以區分得那麼清楚。比方說，我們有廣告系的同學畢業以後去做新聞的工作，也有新聞系的去做廣告的工作。所以這就讓我們看到，在傳播這個同質性很高的環境裡，我們是不是需要有一個更好的策略，讓同學們能夠既具有傳播的一般知識，又可以有一些他自己的專業。（陳百齡，2015 年 4 月 2 日口述訪談紀錄）

整體而言，由學院所帶動的整體實務課程變革與實施，目的是為能更加貼近傳播通識的教育概念，建立通才的學理教育。此外在實務的課程上，檢討過去「以媒體為依歸來區分系別，然後再依照媒體去設計系的課程」，陳百齡認為會造成實務教育與數位匯流的媒體環境形成極大的落差，因此，政大傳播學院「不再以這個媒體分類作為知識分類的標準」，重新釐清傳播工作的內涵，認定傳播是一個資訊處理的工作，將新聞傳播定位為即時資訊相關的技能，在課程上重新定位傳播的本質，將之視為是一資訊處理的工作，如此也不免需要透過全院總動員，大幅翻修傳播教育知識的內容。歷經教育資源、教師人力、課程的盤點和再改造，陳百齡相信新制度能夠讓傳播教育更加靈活、更貼近新時代的需求。

二、全系改革：基礎技能與社會科學理論接合

相較於上述以院為單位的實務課程改革與落實，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則是以系為單位進行課程改革，歷經過去 3 年密集的討論和行政作業，103 年度入學的大一新生開始適用新的課程制度。

相較於其他歷史更為悠久的新聞系所，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創立時便已經著眼於數位時代的傳播環境，因此在系的課程設計是一套讓學生能夠對應數位傳播特質的課程，

之前這一套課程已經實施了十幾年，這一套課程的好處是在，它完全 for digital，所以我們在這個課程上一條鞭式的訓練，就是讓學生必須從文字的協作到各項傳播的技能都能熟練。另外，除新聞倫理，實習媒體之外，我們還有一些應用的課程可以讓學生能更落實實作這一塊。這一套一條鞭式的課程是不能動的，就是說從我們剛開始時認為，數位的教育必須要匯流。所謂匯流，學生就必須要對各種形式的

媒介都有一些瞭解，所以這一條鞭式的訓練，就是你必須要修完哪些課，才能修後面的課。（戴皖文，2015年4月16口述訪談紀錄）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因為舊有的課程設計，有太多必修，且是修完一個必修才能進入下一個課程，以至於使學生抱怨修課缺乏彈性。在學生陸續反應問題之後，驅使擔任系主任的戴皖文開始嘗試回應，第一年透過課程調整來進行修正，卻發現了原來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既有的課程架構上，因此他決定開啟全系課程架構的改變。參與課程改革討論，也負責實務課程改革的胡元輝談到這次的改革經驗：

我們 return to basic，就是把一些基礎的元素先在大一的時候給你打下基本功。同時把過去比較多的，稍嫌散亂的實做課程再做了一些微調與重組以後，必修學分就可以下降。我們的課程區分四個，基本面的知識（按：指文字、影像、聲音和資訊等四部分的基本知識）。這些基本的知識與技能，我們在大一的時候就教給學生，之後，我們就讓學生可以在這四個 track 上去選修一些進階的課。相對比較整合式的訓練，我們就把它集中在大三的學習上面。（胡元輝，2015年4月16口述訪談紀錄）

在改制後的新課程架構中，實務課程的部分，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的基本構想是：在大一根據傳播的特質區分4個基本技能的訓練課程，包括文字、影像、聲音和資訊；大二實施進階課程訓練，包括：新聞採訪寫作、電視節目製作、廣播節目製作、訊息設計、基礎公共演說；三年級開始訓練整合傳播的能力，同時有更進階的實務課程如深度報導、劇情片製作等；最後在四年級必須完成畢業製作，這一年還增加一個與其他院校不同的實務訓練，也就是要求學生必須要進入在地傳播產業，進行有給職的實習。而課程改革的核心精神，便是要回應「在地精神」的核心精神³。

另一方面，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也增設4個知識型的課程，包括社會學與傳播、心理學與傳播、政治學與傳播、經濟學與傳播，學生必須四選二，藉此建立技能之外的知識涵養，讓學生在更進階的實務課程之外還能夠擁有社會意識，進而在實習課程中讓學生能夠將知識和技術融會貫通，實踐於實作情境。

3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課程地圖，參考網址 http://coursemap.ccu.edu.tw/dept_info.php?deptcd=3354。

豐富大學跟社區的連結，連結的方式之一，當然就是學生可以透過自己的實作去跟地方產生某些的連結。那同樣的，學生能夠對一個地方的事務有比較深入的理解跟參與的話，那以後到任何一個地方去就業，同樣那種精神意識都會存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們是希望更進一步地深化原來我們《中正e報》的精神。（胡元輝，2015年4月16口述訪談紀錄）

許瓊文（2007）曾根據其任教經驗，反思《中正e報》這樣一個強調數位匯流的實習媒體所具有的教育意涵。雖然該研究焦點在於新科技如何影響傳播教育方式和知識內容，然而內文卻也觸及傳播實務教育，認為學生參與實習媒體是一個深具情境性的知識技能的養成，因此教育內容應該具備技術、實務、理論概念知識，及創新能力。國立中正傳播學系全面性的課程改制，相當程度就是有意讓學生有系統地學習，逐步獲得文字、影像、聲音和資訊等4項能力。

三、自主改革：從課程微調到創新教學

相較於由院、系等行政單位的整體課程檢討和改革，在其他地方的情況是，個別教師開啟自發性地課程調整。採取此改革途徑的教師，他們多藉由自身對課程內容反省，或獨自進行教學內容、教法的改變。

首先是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在定位上是新聞專業教學的機構，因此該所因應近年來數位化環境的興起，在實務課程上也增加了視覺影像的課程。另一方面，在新聞所任教多年的張錦華也觀察到，同事們多會在既有課程中增加與數位匯流相對應的教材。

在每一個不同的課程裡面，全部都要加上這個所謂的新媒體的數字（位）的部分，比如像採寫裡面也會加上新媒體的部分，然後編輯課裡面也加上新媒體的部分。（張錦華，2015年3月27日口述訪談紀錄）

除了自發性的課程微調或教材增補之外，有些傳播學門內的教師則是透過進行大幅的課程變更，進而連結其他自發性進行課程變革的老師，以協同教學的方式落實他們對於實務教育的理念。如輔大新聞傳播系副教授陳順孝，為了能夠更有效發展學生具備數位匯流以及社會創新的知識學習，因此他與幾位同校老師以輔仁大學的傳播創新研究中心為基地，定期討論、開會來釐清既有的傳播教育理

念，隨後他們歸納出傳播的問題包括：教育主軸不夠清晰、課程設計多停留在大眾媒體導向、缺乏跨領域的教育規劃，以及課程內容多重複等 4 個問題。因此他們認為，在實務課程中必須要增加能夠幫助學生面對網路鉅變的回應能力的教學內容。教學上，教師則應該更加釐清課程主軸，同時需要改良教學教法（更加強調做中學）、精簡教學課程，讓老師教授擅長課程。

陳順孝指出，他與幾位參加討論的教師在近兩年密集討論後，最後形成共識是要將傳播教育重新定位，主張在實務教育的人才培養，應該是帶領同學探索媒體創新、微型媒體創業、直營媒體經營以及開創傳播新事業等等的創新創業能力。進一步聚集眾人的智慧，他們進一步規劃幾門新興的傳播實務課程，分別是傳播創新創業概論、社會覺察力、新傳播科技、資訊採集與分析、傳播策展、傳播敘事、資訊視覺化、傳播社群經營、微型創業與管理、設計思考與實踐、傳播創新創業實作。這些課程概略也對應了他們對於傳播教育未來的想像，也就是傳播應該是數位敘述和知識轉譯的教學性質，同時傳播教育也應該發展學生傳播創新創業的實務知識。

我們現在已經開了兩門相關課程，就是傳播與社會創新，跟資訊視覺化。明年我們會再開傳播創新創業，然後會開傳播社群經營。另外，我在新聞系提議把新聞系裡面傳統的新聞編輯課，改成新聞編輯與策展，把策展這個概念就帶進來。我們原來有一門課是數位傳播，主要教大家怎麼用電腦，可是我覺得現在好像也不需要教學生怎麼用電腦。所以就把數位傳播改成數位敘事。（陳順孝，2015 年 3 月 14 日口述訪談紀錄）

這樣的自發性發展課程、教學理念，目前雖然受到輔仁大學現任傳播學院院長的支持，然而仍有教師對於若干理念抱持不同看法，短期間尚難以形成共識，因此距離成為學程或者實際融入學院的課程架構，仍有一段距離。陳順孝等幾位老師目前採取的策略是，以先行自發性的開課，逐步完成改革課程的目的，並期待在過程中能夠爭取到更多教師的認同於參與。

由於這些課程設計，內容多涉及到跨領域知識，因此授課方式也同時是以相互奧援、協同教學的方式進行⁴。而在教學教法上，陳順孝強調授課會更加強調

4 傳播與社會創新的課程設計，參考網址 <https://rcci21.wordpress.com/2013/12/12/%e5%82%b3%e6%92%ad%e8%88%87%e7%a4%be%e6%9c%83%e5%89%b5%e6%96%b0-%e6%95%99%e5%ad%b8%e8%a8%88%e5%8a%83%e6%9b%b8/>。

理論與實務的連結，以及建立修課學生對於實務問題的實務解決能力。然而這樣的課程並非走向職業訓練或者產學發展，陳順孝強調「我們反對產學學院，因為我們覺得那是職業訓練所，那我們走的路線是研發」（陳順孝，2015 年 3 月 14 日口述訪談紀錄）。

肆、結論：實務課程改革的現在進行式

臺灣新聞傳播相關科系的實務課程，教育內容究竟應該走向更貼近傳播職業分工的技術訓練，或是建立學生擁有理論學術思考的能力？自 1990 年代中期，當臺灣傳播學術界的教授疾呼，應該恢復大學教育的理念，讓走向職業訓練導向的新聞實務教育獲得重新檢討的機會。歷經 20 年過程，根據幾位受訪者的觀察、經驗詮釋和反思，我們可以看到有諸多大學教師的看法，體現出相近的教育理念，也就是認為實務的訓練不是為了讓學生熟練技術，而是「為了讓學生能夠超越技術」。在這樣的教育理念下，諸多受訪的教師往往會強調，實務課程的內容是讓學生體驗技術、掌握技術背後的道理，進而跟學理知識相互連結。相應的，新聞實務教育的目標則是要讓學生從技術學習中培養出會操作、能分析、肯反思和會表達等不同層次的知識和實作能力。這樣的實務教育，目的在於引導學生成為一個具思考力、批判力與創造力的傳播者，而不再是昔日那種職業訓練意味濃厚的職工養成。

本文認為，歷經 20 年的討論，今日的實務教育的想像，也不僅是單方面讓大學傳播實務教育「回到大學博雅教育的理想」，而是形成更多元、同中有異的想像。受訪的幾位大學傳播教育者，正不約而同透過持續的討論、反思和實踐，試著釐清新聞實務教育與職業訓練之間的差異。正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副教授陳百齡所言，實務教育不是要訓練學生成為既有媒體組織的受雇者，在可以看見的未來，新興媒體環境讓自媒體成為可能，因此他們正在構思未來的實務課程中，增加使學生能夠獲得對應新媒體環境應具備的能力與知識。

另一方面，隨著教學現場個別老師所處的不同教育條件，即便他們都共同發現了傳播環境現況，也預見可能的未來變化，但教育內容、架構乃至教法都採取不同的改革做法。有教師是針對自己所授課程進行微調修正，也有系所透過增補新課程來進行修正和課程改革。

更有如政大、世新傳播學院以學院課程的大規模變革作為因應，建立一系列新實務課程和學程。政大在政大、大二不分系中，便設計了傳播通識課程，其中

部分課程採用協同教學的方式進行，讓學生掌握基礎實務知識又能夠在大三、四發展專精，進行傳播專業的分流。世新傳播學院同樣設置學程制度，此外增設了院必修 - 傳播技能，該課程如同各系專業特色的展示櫥窗，讓各系同學在大一就能夠透過修課，對各系專業形成初步瞭解，藉此也獲得不同系的基本技能以及對傳播工作有整理的認識（管中祥，2010：15）。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更多創新性的課程設計出現，如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在實習課程中增設了數位匯流實習，以及在地傳播企業實習的設計。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的副教授陳順孝則與一群老師志同道合的教師共同協作，在彼此的課程中做了更大幅度的嘗試，希望從一系列課程中獲得傳播創新、社會創業的方向。

諸多課程理念的翻新與教育方式的變化，目前仍持續進行，這也顯示新聞傳播實務課程的改革仍處於現在進行式。正如同幾位參與新聞傳播實務課程改革的教師，多坦言課程改革也是個做中學的過程。陳順孝的自我經驗詮釋，或許可以為這場還在進行中的新聞實務課程、教法改革，作為一個貼切的註解：「我們現在正處在一個知識探險的時代。這 10 年我的一個最大改變，是慢慢承認我不懂（新時代的傳播教育）。那我不懂，我的所有教學變成是我帶著學生去探險。那我這個老師的價值是在於，我是一個有經驗的領隊，我可以告訴學生說這個東西值得注意」（陳順孝，2015 年 3 月 14 日口述訪談紀錄）。

參考書目

- 王石番、陳世敏（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劃研究〉。（教育部委託專案研究成果報告）。臺北：教育部委託專案計畫。
- 吳翠珍（2002）。〈傳播教育通識化，宜學宜術〉，《傳播研究簡訊》，30：12-16。
- 胡元輝（2014）。〈超越校園——大學實習媒體轉型社區媒體之探討〉，《傳播研究與實踐》，4（2）：55-92。
- 皇甫河旺（2012）。〈新聞傳播教育的變與不變〉，《傳播研究與實踐》，2（2）：35-39。
- 翁秀琪（2001）。〈台灣傳播教育的回顧與願景〉，《新聞學研究》，69：29-54。
- 陳國明（1999）。〈華人社會傳播教育前瞻〉，《新聞學研究》，59：179-181。

- 陳韜文(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新聞學研究》，59：137-141。
- 許瓊文(2007)。〈數位化媒體教育課程實驗初探與省思：以某大學實習媒體為例〉，《中華傳播學刊》，11：3-47。
- 須文蔚、陳世敏(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9-37。
- 新聞學研究編輯部(1996)。〈「新」傳播教育：傳播學的正當性危機(主題導言)〉，《新聞學研究》，53：5-7。
- 臧國仁、蔡琰(2000)。〈大學傳播教育的理性與感性〉，《傳播研究簡訊》，27：1-4。
- 管中祥(2010)。〈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中華傳播學刊》，17：3-28。
- 鄭瑞城(1998)。〈大學教育和大學傳播教育——觀念的再思考〉，《傳播研究簡訊》，15：4-6。
- 鄭瑞城、林元輝、孫秀蕙、侯志欽(1998)。〈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前段不分系及學程規劃案〉，(教育部顧問室委託人文社會科學教學改進計畫研究報告)。臺北：行政院教育部顧問室人文社會科學教學改進計畫。
- 熊培伶(2008)。〈傳播教育的未來〉，《傳播研究簡訊》，54：25-30。
- 鄧宗聖(2009)。〈傳播學門學士專業教育的威脅與出路〉，《傳播研究簡訊》，59：4-9。
- 潘家慶、羅文輝、臧國仁(1996)。〈傳播教育核心課程規劃〉，《新聞學研究》，53：85-106。
- 鍾蔚文(2012)。〈尋找傳播教育的新典範〉，《傳播研究與實踐》，2(2)：41-50。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1996)。〈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07-129。

附錄一：訪談名單

項次	受訪者	現職	訪談日期／地點	備註
1	鄭瑞城	退休	2015.03.03 / 媒體觀察基金會	擔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系主任、傳播學院院長時推動課程改革。
2	陳順孝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授	2015.03.14 / 國立臺灣大學社科院	研擬輔大新聞實務課程推動與課程改良。
3	林崇偉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	2015.03.26 / 商業研究院	推動課程服務社會與創新創業。
4	張錦華	國立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教授	2015.03.27 / 國立臺大新聞所	創所教師之一。
5	鍾起惠	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	2015.03.30 / 世新大學新聞系	世新大學新聞系資深教師。
6	陳百齡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	2015.04.02 /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期間協助推動課程改革。
7	胡元輝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2015.04.16 / 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課程改革委員之一，並推動社會科學院課程改革計畫
8	戴皖文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2015.04.16 / 電話訪問	推動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課程改革。

附錄二：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小史記（僅記錄本文研究範圍）

年分	事件
1995	教育部公文函請各校自行研究是否試辦大學前段不分系事宜。
1996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啟動傳播教育課程規畫研究。
1996	新聞學研究 53 期開關專題論壇，檢討傳播學門發展和課程規劃問題。
1997	國立政治大學獲得教育部補助進行傳播學院是否試辦大學前段不分系之研究規劃工作。
1998	完成課程研討會和行政程序，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並提出前段不分系及學程規劃案。
1998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開始試辦前段不分系、後段專業實務課程的學習。
2001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針對學程進行重新整併，推出新學程。
2002	世新傳播學院推動課程改革。
2003	世新傳播學院推出學程規劃辦法。
2004	世新傳播學院施行學程，新聞學系推出採訪寫作學程、編輯學程、英文新聞編採學程。
2010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相關學程再經整合為「新聞與資訊」單一學程。
2013	輔大傳播創新研究中心於 6 月正式成立、9 月中心教師學首次開設「傳播與社會創新」。
2014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開始施行改革後新課程架構。
2014	輔大傳播創新研究中心舉辦「傳播創新工作坊」，開始討論傳播創新創業學程規劃草案。
2015	輔大傳播學院舉辦「傳播創新共融營」，開始共商課程革新。

評《風險社會》

A Book Review of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周桂田*

Chou, Kuei-Tien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Director, Risk Society and Policy Research Cen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徐健銘

Hsu, Chien-Ming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壹、前言

當我們意識到的時候，我們已經坐在文明的火山口旁。

本書的德文版出版時間是 1986 年。1986 年該年發生在前蘇聯的車諾比核災和在美國的挑戰者號事故。Ulrich Beck 教授透過他對德國社會和全球風險的觀察，進而作出《風險社會》本書中的種種判斷，被同一年所發生的巨型意外所呼應。使得在 1992 年出版本書的英文版序言中，Brian Wynne 和 Scott Lash 兩位教授讚嘆本書是二戰後少數、非教科書類型（從行文風格上比較像散文）、卻引發人們廣為注意少數社會科學書籍之一。如今，本書的英文版出版已超過 20 年，卻仍然對研究者有許多啟發；就像 Beck 採取如 19 世紀思想家的位置來分析當代問題並超越既存的基礎來思索未來如何可能，今日的研究者仍可藉其著作來擴大當下的思維並轉向未來的探索。

* Email: ktchou@ntu.edu.tw

從本書中可以得見，Beck 的目標是在追蹤被冠之為「後」（post，或者可代之為 late 或 trans）的事物。這裡的「後」，指涉我們正在踏入而逐漸成型、或甚至仍被當前情況所遮蔽的未來，以及一種我們正在經歷或者目睹、正在過去產生斷裂的現代性情況。Beck 提醒我們，本書在開拓讀者視野的同時，某些內容是站在經驗導向、反映主觀的理論（empirically oriented, projective theory），而缺乏任何研究方法上的防衛措施。無論如何，在本書中陸續可以讀到的經驗事實（主以德國為例）和預測將會發展出的過程，乃是從工業社會重塑成風險社會的過渡情況。

風險社會這本書核心著重在關於工業社會的「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12）。Beck 雖然探討「後」的情況，但是他其實是藉由風險研究和其論述來改革現代主義者的計畫。他所探討的反身性現代化可以說是一種對啟蒙計畫的重構與修補。反身性現代化意謂著對現代化過程的再一次現代化。其目的是為了解決當前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危機，而非加深當前對制度的不信任與衝突。對於 Beck 而言，正如「現代化消融 19 世紀的封建社會結構並產生工業社會，今日的現代化正在瓦解工業社會、而另一個現代性則正在成形中」（Beck, 1992: 10）。不同之處在於 19 世紀的現代化力圖主宰作為他的自然，當前的現代化則是自挖牆角；19 世紀被除魅的是階級與宗教，今日則同樣發生在科學、技術和典型工業社會中的生活方式。這並非現代性的終結，而是超越工業社會設計的現代性之始。前者是典型的（classical）現代化，後者則是反身性的（reflexive）現代化（Beck, 1992: 10）。

貳、主要內容回顧

在本書中，Beck 的研究核心是有關「工業社會反身性現代化的主導理念」。全書共分成 3 部分、8 個章節。前兩部分處理的是反身性現代化產物。第一部分處理的有關風險分配邏輯的論述，並描繪風險社會是什麼樣的事物，試圖重新探究如何定位當代人類的位置。透過對財富分配的邏輯和馬克思與韋伯的理論對話，形塑出風險的邏輯、以及因風險而聚集、因認知和文化各自占有立場的人群。

第二部分則是基於個人主義化的論述。由於現代化過程一方面使得社會得以宰制自然，另一方面也使得對自然的破壞變成社會內部的問題，而不再只是外在環境的問題。這使得原來在工業社會中主要財富分配為首、風險分配受其宰制的邏輯，轉成兩者同時競爭並且互不相容的新情況。再者，個人主義化也是反身性

現代化的產物。就如同傳統社會的現代化瓦解 19 世紀的勞動與生活型態，工業社會的「傳統」——福利國家與勞動市場的一般化、教育和就業關係、家庭與兩性分工——也被再進一步的現代化所瓦解。第三部分則基於前兩部分，主要處理在反身性現代化和個人主義化的情況下，以及如何對作為工業社會基石的科學典範及其視野，以及重塑政治系統及其決策過程。

在本書有幾個關鍵重點，首先是風險分配的邏輯。**Beck** 從毒物在環境中的流布開始探討風險。風險分配跟追求「平均值」解答之間，出現置現實情況於不顧的忽視。這種忽略了年齡、性別、飲食習慣、工作方式、資訊、教育不同，以及單一產品雖然看似在安全範圍內而無害，卻對生物累積的人體健康可能造成影響。在此，自然環境的毒物分布成為人們現實的社會危險處境。

而風險處境所需的知識又因其不可見性，而必須再進一步仰賴科學。因這些危險處境越來越難以感知來接收，又或者可能發生在下一代身上。然而，現代化風險會同時呈現特定地域性及非特定普遍性，而科學的預設並無法掌握不確定和暫時的災害路徑。在這種情況下，科學一邊調查風險的內涵，其過程是建立在假設上，而以機率作為可能性的框架行動。當科學條件被設置在極苛刻的情況下，其對安全的假定使得事實上的意外反而像是真正的意外。因其根本不在計算的公式之內。因此科學理性沒有社會理性是空的，社會理性沒有科學理性是瞎的 (**Beck**, 1992: 30)。

風險的因果關聯性本身就是諸多個別條件彼此互相糾纏之間的複雜集合。試圖找出個別原因和責任，反而可能形成普遍不負責任的共犯結構。風險是現今不存在、但導致今日行動的原因。風險社會因此是一個面向未來的社會。而風險因其作為潛在副作用，而獲得影響我們當下的決策之合法性。但進一步質問，到底是越來越多的風險，還是越來越尖銳的風險感受？

Beck 認為政府的行動在污染排放的設置上，只是為風險進行粉飾而非預防。所以，自風險誕生的是科學工業和政治，透過破壞既有的政治和科學之信任得利。這裡更誕生了理性間的競爭。自然科學雖然輕視大眾的恐慌，但仍在長期的過程中，失去一部分的權力到民主的過程中。他認為人們也應該認識到經濟風險的盲目性，以及邊際值的欺騙效果。

第二個重點是 **Beck** 過去對制度的研究和它與風險社會觀點之相結合，他認為應該要有新的理論與範疇來支持我們的當代研究。兩者連結之處在於被重新拋擲到制度化市場中的個人主義化過程。**Beck** 在論證這點時，再度與 19 世紀的觀察者馬克思和韋伯對話。他認為戰後德國所發展的社會結構已經不再能以階級和

階層視之。他進一步指出風險社會並非階級社會，風險處境也不應當被理解為階級處境，風險衝突也不能被視為階級衝突；現代化風險 (Beck, 1992: 36)，因為風險並不分階級降臨。

在馬克思的觀察中，是貧困化和勞動異化的共同經驗消除個人主義，才能促成階級形成。但在 Beck 的看法裡，今天的個人不再被融合到階級團體之中，而是在福利國家的工資勞動中個人化。他也指出以韋伯的社會階層概念——以市場為中介，使得地位轉為階級的框架來看德國，自 1950 年代以降已隨著教育擴張、大量失業等情況而不能適用 (Beck, 1992: 96-97)。

傳統的階級與階層已然消逝，取而代之的一個已經日趨自我選擇而個人主義化、但又不自主的社會；兩性分工正在重新磨合，並且與新家庭型態和職場生活一同進行。個人在此被福利國家的制度所標準化與納入治理的單位中，但個人的命運卻被重新拋擲到市場競爭中。傳統上的教育文憑和職業取得之間的聯繫變得淡薄，為此也使得工業社會中的職業與家庭生活間的穩定性變得搖搖欲墜。教育和就業間的市場關係之斷鏈，形成某種程度的個人境遇之再封建化。在這個過程中，風險與決策變成每個人的個體經驗，而不再是以階級和階層的形式出現。

由於生活型態的改變，個人主義化、大量失業與新貧窮等「當時的」新現象（如今已經變成我們正試圖習慣，但又試著要掙脫的枷鎖），促使傳統理論必須要轉向新的理論，因為現實環境已來到一個新的水準。但 Beck 並沒有為我們提出最終的解答，而是指出未來的衝突將會越發多元；衝突將能打破既有結構化的意識型態與聯盟形式，並依情境和參與者的訴求主題而有別。

事實上，風險社會一書提供的是一套座標系統，一套對當代工業社會進行反思的定位方式。透過在德國經驗的數據，以及當時流行的論述和過去的社會狀態進行比對，發現了人類在實際生活與感知上的位移。這種位移對貝克教授而言，就是從工業資本主義社會轉向風險社會，也是從財富分配的邏輯轉向風險分配的邏輯。同時也是從維繫工業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小家庭、兩性分工和職業生活位移到個人主義化的新生活型態。最終，在反身性現代化的標題下，如何超越啟蒙科學的信念，並拓展既有科學典範的視野。另一方面，則是對治理的政治過程提出批判，並指出政治的去邊界化現象，以及質問科技與政治的兩難。

Beck 挑戰科學實證邏輯的計算，質疑其是否能確切地表達出當代社會中的境況。這種質疑廣布在全書對於統計平均值、管制標準的建立和邊際值的探討中。這實際上說明當代科學理性壟斷對於事實的說明、也就是論述的權力，這是必須要再被再一次透過民主的過程為之解放。正如 Wynne 和 Lash 在引言中提到，

實驗室知識所打造的風險系統理想模型，與實際的應用環境、設備和知識之間的巨大落差。而需要透過反身的學習過程（reflexive learning process）來與各種知識、次文化和認同進行協商磨合。但這個解放過程所需的卻毫無疑問是更多的科學必須要進入，並且迫使科學反身性不斷地累積，最終達成一種不斷學習的狀態，而非全盤推翻科學。Beck 認識到社會變遷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參、反身性現代化與東亞社會

關於社會變遷過程，Giddens 同樣地在大約的時間點上捕捉到這一鉅變。Giddens 在大約同期的作品如《現代性的後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1990）和《現代性和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1991）等書中，展現出對反身性的另一種剖析，對於個體自我創造和生命敘事，以及對符號標誌和專家系統的信賴承諾與風險。在 Giddens 的眼中，人們進入到高度的或者晚期的現代性之中，而非進入後現代之中。對 Beck 和 Giddens 而言，社會都經過前工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的「簡單現代化」（simple modernization）以及工業社會再現代化—反身現代化（reflexive modernization）此二過程（Beck, 1994; Giddens 1994）。

而 Giddens 進一步闡述現代性特徵的時空分離（separation of time and space）必須仰賴抽象系統（abstract system）加以穩固。人們透過信賴符號標誌（symbolic tokens）和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這兩套抽象系統來重組和調度時空，而這兩套系統需要信任（trust）才能得以運作（Giddens, 1990: 351-417）。換言之，人們必須對現代生活中的抽象系統加以信任——即使他們並不完全瞭解系統的運作——才能夠繼續藉助這套系統來簡化其生活。

但相對於 Giddens 樂觀地透過知識來反省，以改善專家系統所提供的知識技能，以 Beck 的觀點，此處的反省是一種反作用力、副作用。風險的具體性在於難以控制、無法計算、無法賠償、沒有極限，這些無法純粹以知識加以預測和控制的後果成為現代社會／社會變遷的推動力，是一個現代性與其自身自我對質的局面；定義以及處理這些風險成為風險社會的核心議題。換言之，由現代性的發展轉向反身性的過程，Giddens 的概念是對系統現況的反思、讓它更加完善（better）；而 Beck 則是透過現代性的副作用來面對現代性，要從其體系的根部重新挖掘、檢視。

Lash 則認為 Beck 和 Giddens 的行動者過於自我（ego）且偏重於認知層面，

其反身性對應於個別社會對現代性的願景 (Lash, 1994; Lash & Urry, 1994)。Lash 認為 Beck 和 Giddens 所討論的反身性是在認知上的反身性、以對風險的認知來衡量，美學的反身性則是以不安全感 (insecurity) 為衡量。另一方面，Wynne 和 Dressel 同樣認為 Beck 過度偏重認知面；在分析英國和歐盟處理 BSE 爭議時，進一步認為 Beck 將「無知」(non-knowledge)¹ 概念化深具啟發性，但是其分類：「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錯與錯誤的可能性」、「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 5 種模式卻不能夠完全解釋國際或國內的風險治理 (Wynne & Dressel, 2001: 127-129)。

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認為 Beck 的認知面分析無法明確區分：明確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作為論理的 (工具性的) 工具以及社會行動者 (也可能缺乏知識) 審慎反思中所可呈現之對象；具體知識 (embodied knowledge)，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實踐的一部分、往往是整個社會運作的一部分，但沒有或是無法被其行動主體所反思或明確表達。

由於社會與文化的偶然性 (contingency) 可能導致不同的知識與知識構造 (framings)；因此，Wynne 和 Dressel 為了捕捉無知的概念，便使用虛擬知識 (virtual knowledge) 來稱之；這是一種既定社會團體的實際承諾和習慣所建立起的、暗含在的知識或信念。舉例而言，如果飼牛業者添加動物遺骸到飼料之中，他們便暗含著以下正面的信念：若非認為動物飼料不會造成感染，便是即使會造成感染，也不會再感染到其它物種如食用的消費者。Wynne 和 Dressel 進一步將無知經過文化概念化為「邊界知識」(borderline knowledge)，無知 (ignorance) 則是知識的具體元素 (Wynne & Dressel, 2001: 129)，他們認為創建知識條件的過程也正是創造人類自我、道德承諾和文化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無可避免地是選擇性且有限制的認知過程；在此一文化過程中，為使任何的知識一致性與結構性有所發展而內生的保證，導致同時也產生出無知、知識排除與「缺乏意義」(lack of meaning)；換言之，知識和無知共同受到其國家和／或文化脈絡的形塑 (同上引)。

面對這些探討，Beck 在本書中處理人類科學與知識不確定性時，認為風險無疑是一種現代的科技產物，而且必須透過科學的知識來理解。但他也在其指出

1 風險社會的核心中軸是知識與知，無知的概念引自 Beck (1996) 在討論人類的「不知道」(nicht-wissen) 之動態狀態，英文除了 non-knowledge 以外，也同時有 ignorance 之翻譯；由於其關鍵在於「為何無知」的動態狀態，因此才會有「知識的選擇性觀點和仲裁」、「知識不確定性」、「犯錯與錯誤的可能性」、「無能力知道」與「無意願知道」等不同模式。

這意謂著意識（知識）如今決定存在，是知識為社會帶來超載的災難，但也是知識在為社會系統鑲上那關鍵的保險絲。在其後的《世界風險社會》一書中，他也承認風險還是關於習慣與文化；是文化的認識與定義形成了風險 (Beck, 1999)。

不僅如此，不同文化和社會所面臨的風險問題及感知重心也因此將有所不同。Beck 從德國和全球的社會現實中抽象化而得的風險社會概念，適合諸多研究者作為觀察的啟發和起點，但仍尚待深化。2010 年的英國社會學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的風險社會專刊，來自不同國家與文化的作者也從經驗上顯示不同社會的觀注重點與發展情況的不同，使得風險社會的概念始終是保持多元而非單一樣態的。

如南韓學者進一步認為第二現代和反身性現代化，如同全球趨勢，影響東亞極深如同西方一般。Chang (2010) 使用「壓縮的現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 來形容追趕型社會所面臨的急遽擠壓所帶來的後果；因為追趕式發展而以無預期的後果形式產生、威脅生命的風險與危險，大眾挫折且醒悟的認識在東亞非常高。周桂田認為這種短時間內的現代化發展缺乏自主建立的基礎，「產生了擠壓、快速模仿西方社會的變異結果」，使在地社會發展出特殊的「現代」經驗；可能在某些面向有較強的規範力道，有些面向又純粹是形式制度而無實質內涵 (周桂田，2003)。

這是因為後進國家因為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性因素，使其持續在制度和意識型態上受西方支配，從而導致不斷追趕和模仿西方工業社會模型。在以西方視野和範疇來看待在地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反使在地制度的建構始終不夠健全，也難以警覺其社會自主和傳統文化的消逝。這是因為在地社會缺乏引入之制度、科技和思想進行反思與批判基礎的哲學，也因為歷史發展的原因而未能有成熟的公民監督與批判力量。然而，這些深層的原因同樣被主流的西方論述所遮掩，從而掩蓋「多元地區風險發展的事實與問題」(周桂田，2003)。

肆、與社會學對話

另一方面，本書的一個問題在於為了主觀突顯風險社會的邏輯以及當前的各種高不確定性問題對人類的衝擊性，以致於給予讀者一種對傳統社會學問題不那麼重要的傾向。雖然 Beck 的質疑是有意義的：為什麼在傳統社會裡面，分析的範疇是職業、性別、階級、收入……等；到了工業社會，分析的範疇仍是這些；再到未來的社會，分析的範疇仍然沒有變過。Beck 對於社會研究工具和分類標

準的批判是有力的，社會學的反思也有價值，但仍須進一步將其散文般的論述再聚焦。

比方說風險分配。Beck 認為現代化系統性的副作用導致「風險的社會生產」伴隨著「財富的社會生產」而來 (Beck, 1992)。同一性的、在災難中被製造出來的風險劇烈性，排除風險分為不同層級的可能性，並且使 Beck 可以總結到「私人逃生通道」將被關閉，將我們全部描寫為藉由「反身性現代化」(Beck, 1992) 而臣服在災難形式的風險之下。

階級處境與風險處境之間的關係可以透過 Beck 對於「擁有與沒有」和「不受波及與受波及」之關係來修正其判斷；世界中仍然存有特定的一群人、一些國家因為「擁有」較多保護自己的能力而較「不受波及」；同時也有一群人、一些國家因為「沒有」保護機制而「受波及」。風險雖然是不分階級地分配於所有人，但是其造成的危害卻是有差別的。

非常重要，這種社會建構的惡的分配將不僅受階級因素影響，也受其它社會結構而成的弱勢因素，如性別和種族影響 (Adger, 2006; Cutter, Boruff, & Shirley, 2003)。鑑於在許多案例中，弱勢者如非裔美人，占據較高比例且脆弱的位置，也由於他們較低的社會經濟狀態，這些不同的惡的分配之分層化邏輯，可能對這些脆弱的人群進一步放大種族與階級的效果。

來自對食物、水、土地或者是空氣危害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恰是 Beck 平等主義分配模型，因為其極端的不確定性和危害本質的不可預測性。然而，正如前所述，某些並非因階級而建構的風險存有，不會因此降低風險的階級命題之適切性，相反的，還可能因此強化了它的適切性 (Curran, 2013b)。

這是因為，雖然最初的風險分配可能是平等的；但當個體們逐漸認知到這些不同的風險之效應以及其相對的分布，那麼能逃離毒害和風險源頭的能力，將會因為那些可以輕易取得未受污染的食物來源或土地之寡占者，以及那些能在這些「私人逃生通道」上開高價的人，還有只能勉強度日的人之間就也會有巨大的區別，不管這些風險是以何種形式具體出現 (Curran, 2013a)。

事實上，非特定普遍性的、彌漫在我們生活中的那種風險特質，只有在特定地域內的社會、文化與經濟等脈絡進行連結與探討，才能展現真實世界當前與未來對於風險議題的把握。因此，傳統的社會學問題如階級、財富與知識都將以雙重的風險——非特定普遍性與特定地域性的——作為思辨的共同主軸；階級社會對於資源的分配、財富分配的邏輯與風險抵抗的能力，以及掌握無形風險的知識等問題在風險的雙重性格上展現了個別在地社會的風險能耐。而 Beck 所論之國

際不平等因此也可以如此思考：是個別社會的在地脈絡及其能耐，促成在非特定普遍性的風險中之不平等，風險的分配與財富、科技和知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後三者的綜合（synthesis）卻緊密地影響對抗風險的能耐，以及同樣的風險在個別社會中作用的力道。

無論如何，《風險社會》一書如同一本預言書，Beck 預見到今天人們仍然將具不確定性的事物、也就是社會變遷、歸於政治系統治理的工作；即使其實社會變遷與政治系統的關係脫勾，而更多是個別的科學、經濟和社會決策所產生的。

他同時也預見到在風險社會之中，將有越來越多的浮動選民，使得傳統政黨的鐵票或票倉難以為繼。更多情況是政黨必須要一直推出吸引民眾的特點。這也和政治權利的長期深化所導致的政府權力之折損有著同樣的趨勢，並且彼此影響。還有民主的君主政體這一矛盾情形。

藉由此書以及這近 30 年來的風險社會學發展，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專家、知識體系統和價值加入這場風險論述的大戰之中，導致身處其中略感混亂。而本書所指出的許多發展方向和未成形之物，有些已經顯現出來、有些則否。但誠如 Beck 所言，當一個社會愈少公開的認知到風險，則將產生愈多的風險 (Beck, 1999: 144)。藉由本書，研究者仍然能夠自 Beck 最核心的觀點和捕捉未來發展輪廓的方式裡受益。

伍、參考書目

周桂田 (2003)。〈從「全球化風險」到「全球在地化風險」之研究進路：對貝克理論的批判思考〉，《臺灣社會學刊》，31：153-188。

Adger, W. N. (2006). Vulnerability.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16, 268-281.

Beck, U. (1999).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6).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Rethinking modernity in the global social order*. Cambridge, MA: Polity Press.

-- (1994). The reinvention of politics: Towards a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In U. Beck, A. Giddens, &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p. 1-55).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Newbury Park, CA: Sage.

Chang, K. S. (2010). The second modern condition? Compressed modernity as internalized reflexive cosmopolitiza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 444-464.

- Curran, D. (2013a). Risk socie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bads: Theorizing class in the risk societ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44-62.
- (2013b). What i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risk society? A reply to Beck.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4, 76-80.
- Cutter, S. L., Boruff, B. J., & Shirley, W. L. (2003).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4, 242-261.
- Giddens, A. (1994). Living in a post-traditional society. In U. Beck, A. Giddens, &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p. 56-77). Cambridge, MA: Polity.
-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sh, S. (1994). Reflexivity and its doubles: Structure, aesthetics, community. In U. Beck, A. Giddens, & S. Lash (Eds.),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p. 110-173). Cambridge, MA: Polity.
- Lash, S., & Urry, J. (1994). *Economie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UK: Sage.
- Wynne, B., & Dressel, K. (2001). Culture of uncertainty -- Transboundary risks and BSE in Europe. In J. Linnerooth-Bayer, R. E. Löfstedt, & Sjöstedt (Eds.), *Transboundary risk management* (pp. 121-154). London, UK: Earthscan.

徵稿啟事

《傳播研究與實踐》在 2011 年 1 月出版創刊號，由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出版，是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的共同園地；凡是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的研究性論述，均歡迎投稿。每期並針對新聞傳播之關鍵議題，規劃專題，促進學術討論與交流。本刊將對下列議題規劃專題論文，歡迎各界人士賜稿：

第十一期專題（2016 年 1 月）：太陽花與占中運動的媒介與運動

第十二期專題（2016 年 7 月）：風險溝通、媒體再現與公眾認知

壹、定位與特色

《傳播研究與實踐》主要在提倡世新大學創校以來「學」與「術」並重，以及二者相互引領的對話精神。本刊之特色與使命如下：

- 一、提供華人傳播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對話平臺；
- 二、鼓勵傳播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之整合性、實證性、反思性、前瞻性之研究論述；
- 三、促進傳播學門內部不同系所以及與其他學門的知識匯流。

貳、本刊內容

- 一、研究論文：歡迎任何具原創性研究成果之完整論文（文長 15,000 字至 20,000 字）投稿，來稿書寫方式必須符合學術論述格式；符合本刊定位與特色之研究成果將優先刊登。
- 二、專題論文／論壇：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邀請學者專家從不同觀點撰文，進行理性的、多元的以及民主的觀念交流。除邀稿外，專題論文亦歡迎各界投稿。專題論文自三卷二期起，均依研究論文方式送雙匿名審查。
- 三、特邀論文：不定期邀請學者專家針對各期專題之主題或針對學術研究社群與實務工作社群共同關切之議題撰文。
- 四、研究紀要：研究論文通過審查，雖未達一般論文要求，但研究議題重要，研究成果具初步參考價值者，以研究紀要刊出。
- 五、典籍再現：透過邀稿方式，每期選擇對傳播研究社群或實務工作社群具備重大影響的經典著作，進行跨時空的詮釋和省思（文長 2,500 字至 5,000 字）。
- 六、口述歷史專題：不定期刊出由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研究人員規劃之口述歷史專題。

七、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針對當期專題論文／論壇題旨，邀請專家學者針對其個人田野經驗，分享反思與實踐之心路歷程。

參、審查制度

- 一、研究論文將送請 2 至 3 名學者專家進行匿名審查，匿名審查評審人選由本刊編輯委員會推薦。
- 二、本刊主編考量期刊定位和特色，對於通過匿名審查的來稿內容有建議修改權。
- 三、審查結果分為以下四種情況：
 - (一) 刊登；
 - (二) 修改後刊登；
 - (三) 修改後再審；
 - (四) 退稿。
- 四、研究論文審查（包括編輯委員會內部審查、評審審查、主編審查、作者修改）約花費 3 至 6 個月。當兩名匿名審查者意見不同時，在以下兩種情況中，將送交第三位匿名審查員評審，再由編輯委員會決議是否刊登：
 - (一) 刊登 vs. 退稿；
 - (二) 修改後刊登 vs. 退稿。

肆、來稿須知

- 一、來稿格式請參考本刊網頁之最新論文體例。未提及之處，請自行參考《美國心理學會出版手冊》（*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第六版撰寫體例。
- 二、來稿採隨到隨審方式，無截稿日期；請勿一稿多投。稿件請儲存成「.doc」文件檔，並以「稿件名稱」作為文件檔名，透過本刊線上投稿系統上傳；上傳方式請參考首頁上的「使用說明」。若有疑問，歡迎寫信至本刊詢問，電子郵件：crpjour@gmail.com。
- 三、本刊只刊登原創性論文，凡已於國內外之刊物發表之論文，無論語文異同，請勿投寄；於國內外研討會發表之論文，請於會議結束並正式宣讀或發表後，再行投稿；同一稿件，請勿同時投遞多份刊物。一經發現，本刊即予撤稿。
- 四、「典籍再現」、「口述歷史專題」、「田野筆記：反思與實踐」文稿將由主編審查，再由編輯委員會通過後即可刊登。
- 五、「研究論文」來稿刊出，贈送當期期刊 1 本以及抽印本，不另致贈酬款。「專題論文／論壇」、「典籍再現」來稿刊出，則致贈當期期刊 1 本。

伍、論文體例

請參閱本刊線上投稿系統：<http://aspers.airiti.com/CRP>

傳播研究與實踐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第5卷 第2期 2015年7月 Volume 5 Number 2 July 2015

科技部TSSCI 期刊

出版者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 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Airiti Press Inc.
Publisher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Airiti Press Inc.
期刊地址	116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7巷1號
Add	No. 1, Lane 17, Sec. 1, Mu-Cha Rd., Taipei 116, Taiwan
電話 Tel	+886-2-22368225 ext. 3103
傳真 Fax	+886-2-22367150
電子信箱 E-mail	crpjour@gmail.com
華藝地址	234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80號18樓
Add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電話 Tel	+886-2-29266006
傳真 Fax	+886-2-29235151
電子信箱 E-mail	press@airiti.com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2221-1411
ASPERS	http://aspers.airiti.com/CRP
Airiti Library	電子期刊全文請上華藝線上圖書館，網址為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Copyright © 2015 by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傳播研究與實踐

發行公司：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發行
 郵寄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連絡電話：+886-2-29266006 轉 8695 傳真專線：+886-2-29235151
 服務信箱：press@airiti.com Airiti Press 網站：http://www.airitipress.com/

個人					圖書館／機關團體				
	新臺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新臺幣	歐洲	美洲	亞太
一期	\$ 350	€ 31	US\$ 36	US\$ 33	一期	\$ 700	€ 48	US\$ 56	US\$ 53
一年	\$ 600	€ 58	US\$ 66	US\$ 60	一年	\$ 1400	€ 96	US\$ 112	US\$ 106
卷	期	~	卷	期	數量	金額		總金額	
* 臺灣單冊郵寄處理費 65 元				郵寄費用	數量	金額			

注意事項

- 期刊將在付款後兩個營業天內寄出。
- 價格及建議出版日期恕不另行通知可能變更。
- 機構團體是指圖書館、政府機構、公司使用者及公司以個人名義訂購。
- 個人訂戶是指單一個人使用而非以營利為目的者。
- 對於有意或無意扭曲「個人訂戶」一詞者，Airiti Press 保留法律追訴權，並得求償損失。

訂閱者資料

個人姓名	
機關名稱	
發票抬頭及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電子信箱	
收件地址	

付款方式

<input type="checkbox"/> 郵局劃撥	帳號：50027465 戶名：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input type="checkbox"/> 支票付款	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452 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8 樓
<input type="checkbox"/> 信用卡	
發卡銀行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信用卡號	
信用卡有效期限	西元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持卡人簽名	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相同
<input type="checkbox"/> 銀行匯款	
戶名	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	國泰世華銀行 - 中和分行
帳號	045039022102 (總行代碼：013；分行代碼：045)
付款後請傳真或回函本訂閱單，即完成訂閱。	

airiti press  **Subscription For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You may subscribe to the journal by completing this form and sending it by fax or e-mail to

Address: 18F., No. 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Tel: +886-2-29266006 ext. 8695 Fax: +886-2-29235151 E-mail: press@airiti.com Website: <http://www.airitipress.com>

Publisher: College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 Airiti Press Inc.

PERSONAL RATE				INSTITUTIONAL RATE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Europe	US/CA	Asia/Pacific
1 Issue	€ 31	US\$ 36	US\$ 33	1 Issue	€ 48	US\$ 56	US\$ 53
1 Year	€ 58	US\$ 66	US\$ 60	1 Year	€ 96	US\$ 112	US\$ 106
Vol.	No.	~	Vol.	No.	Copies	US \$	Total US \$

*All Price include postage

PLEASE NOTE

- Issues will be sent in two business days after receiving your payment.
- All orders must be confirmed by fax or email.
- Prices and proposed publication d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 Institutions include libraries, government offices, businesses, and for individuals where the company pays for the subscription.
- Personal rates is available only to single-user personal subscribers for personal and non-commercial purposes.
- Airiti Press reserves its right to 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o recover any losses arising from any intended or unintended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term "Personal Subscriber".

BILLING INFORMATION

Name	
Company	
Tel	Fax
E-mail	
Shipping Address	

INTERNATIONAL PAYMENTS

Pay by Credit Card	
Card Type	<input type="checkbox"/> JCB <input type="checkbox"/> MasterCard <input type="checkbox"/> Visa
Card Name	
Card Number	
Expiry Date _____ / _____	CVV number
Signature	

Direct Bank Transfer	
Beneficiary	AIRITI INC.
Address	18F., No.80, Sec. 1, Chenggo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
Bank Name	E.Sun Commercial Bank, Ltd.Yong He Branch
Account No	0107441863017
Swift Code	ESUNTWTP
Bank Address	No.145, Zhongzheng Rd., Yonghe Dist., New Taipei City 234, Taiwan (R.O.C.)